

「禁止酷刑公約之國際標準與實踐」

研究案期末報告書

執行廠商：東吳大學

計畫主持人：鄧衍森教授

協同主持人：徐揮彥副教授、姚孟昌助理教授

計畫研究助理：黃哲融、劉元序

委託單位：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中華民國 一零八 年 一 月 三十一 日

目錄

壹、研究主旨：包括主題、源起及預期目標.....	3
貳、研究內容與方法.....	4
參、酷刑與其他相關行為之概念內涵.....	5
肆、酷刑規範結構指標.....	9
伍、國家義務之內涵要素.....	70
陸、實踐檢視.....	125
(含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及個人申訴之決定).....	125
柒、 國家人權報告撰寫準則.....	256
捌、結論與建議.....	274
玖、附件.....	289
拾、參考文獻.....	431

壹、研究主旨：包括主題、源起及預期目標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約」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下稱禁止酷刑公約)旨在防止世界各地有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情事發生，國際社會之國家與國際機構普遍視其為具有強行法性質之習慣國際法規範。國家即使處於戰爭或危及國家安全之緊急情況，亦不得延宕、擱置或減損履行本公約之義務；其任擇議定書(下稱議定書)則具體規定應於國家層級設置獨立防制酷刑機制，用以確保政府各機關具體落實本公約規範義務並提供救濟管道。

聯合國於 2002 年通過本公約任擇議定書明確規定各締約國應建立國家防制酷刑機制已落實公約義務。三十年間，無論是聯合國人權高專辦針對本公約安排專家進行研究、討論及諮商，特別報告員針對反酷刑議題之報告書中，深入探討各種酷刑之現象與影響。對於相關國家提出之具體建議，包括執法準則與執法人員之操作指南等，概念上，均屬禁止酷刑國際標準之證據資料。此外，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多次審查國家人權報告以及個人申訴案件之意見或決定中，亦確立若干可應用之國際標準。

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自 2009 年將兩人權公約國內法化以來，政府多次申明人權立國政策，遵守普世人權標準，積極落實人權保障。聯合國 9 件核心人權公約中，具有國際強行法性質與效力

之「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約」更是人權保障不可遺漏之公約，對於人權保障與法治發展更具有重大意義。由於本公約規範體例屬於準則性與程序性之性質，雖然明確界定國家義務之類型，卻僅具抽象之態樣，具體之規範內容與相關義務藉由反酷刑委員會之一般性意見雖可見一般，卻仍須針對公約之實踐所得意見加以細究歸納，俾臻明確，始足以在國內法秩序上產生立即適用之效力。本計劃研究目的在於蒐集、整理並分析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根據公約與人權法治先進國家所建構出之國際標準，提供未來政府履行「禁止酷刑公約」有關義務之基準與依據。

貳、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委託研究案之內容，以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及所屬委員會所為之決議、國家報告之審查意見、個人申訴案件之決定及一般性意見。研究方法採用使用文獻研析方法進行蒐集、爬梳整理、分析與歸納出禁止酷刑規範實踐上之國際標準與實踐，結構上，所有國際標準，包括有拘束力之國際公約與無拘束力之軟法，例如宣言，準則與原則、標準等，作為酷刑之規範結構指標；基於公約所生國家義務之說明用以呈現規範結構履行上之基本內涵與模型，具有類似過程指標之說明。最後則以反酷刑委員會對於個人申訴案件之決定以及選取一些先進國家人權報告之結論性意見作為禁止酷刑規範之國家實踐之說明，屬於本研究案有關實踐之研究成果。

參、酷刑與其他相關行為之概念內涵

1948 的世界人權宣言為體現基於人權和尊嚴的新世界秩序，於宣言第 5 條宣示，「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torture)，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自此時起，國際社會有了一項不可逾越的壁壘，用於防止酷刑和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簡稱虐待(ill-treatment))，它保護所有人，沒有例外地，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而不論其管轄區、領土和國籍。普遍和絕對禁止酷刑和虐待所反映的認知是，酷刑或虐待不僅嚴重侵害受害者之尊嚴，而且也使加害者喪失人性，最終使任何在明知的情況下如還容忍這種行為，人類社會就會完全喪失人性。

酷刑及虐待會造成持久的創傷，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所有聯繫，給整個社群造成嚴重損害。聯合國大會第 3452(XXX)號決議正確地將任何酷刑和虐待行為宣示為對人類尊嚴的嚴重侵害且屬於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的行為。

鑒於禁止酷刑和虐待對維持國際公共秩序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自從世界人權宣言明確譴責酷刑和虐待行為以來，國際社會在各項人權條約中已經對禁止這種酷刑和虐待行為作出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定，其中包括：1966 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1950 年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1969 年美洲人權公約第 5 條、1981 年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利憲章第 5 條、2004 年阿拉伯人權憲章第 8 條、1989 年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1990 年保護所有移徙工作者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第 10 條和 2006 年身障人權公約第 15 條。2012 年東協人權宣言第 14 條。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禁止酷刑和虐待的要求，反映出「基本的人性關注，在和平時期甚至比在戰爭時期更需嚴格要求」（“elementary considerations of humanity, even more exacting in peace than in war”）的一般法律原則已獲得權威的認可。

1998 年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 7 條規定，有系統地或廣泛地實施酷刑和其他類似性質的不人道行為構成危害人類罪，如與武裝衝突有關而實施此等行為，則構成戰爭罪(第 8 條)。

禁止酷刑和虐待已公認為習慣國際法的一項核心原則，禁止酷刑也被普遍認為具有強行法的地位與效力。不論戰時或是國家遇有緊急情況，國家不得以任何理由減免禁止之義務。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 29 條規定，本法院管轄權內的犯罪不適用任何時效。因此，酷刑罪之訴追處罰亦無時效問題。此外，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政公約）第 7 條有關酷刑和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並基於公政公約第 4 條第 2 項關於在緊急狀態時減免義務之規定，禁止酷刑和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是不可減免的，因而本公約亦不允許減免國家之義務。

關於酷刑的定義，一些國際文件均載有明確定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75 年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宣言第 1 條，1984 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 1 條，1985 年美洲防止和懲處酷刑公約第條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 7 條第 2 項第 5 款。雖然此等文件用以定義酷刑的用語並不完全相同，但它們在國際及國家實務見解、國家實踐和軟法文件中，以及在公民社會宣傳與學術工作上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與基本上一致的核心概念。

酷刑作為一般性概念，意指為達到特定目的故意使喪失自主能力者遭受疼痛或痛苦，而虐待是指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不一定要求行為具有故意和目的性或受害者自主能力喪失。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的人權事務委員會於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中指出:公約並未界定第 7 條所涉的各種概念。委員會認為不必逐一系列禁止行為，亦不必明確區分不同種類的處遇或處罰；這些區分視實際處遇的性質。目的和嚴厲程度而定。第 7 條不僅禁止造成身體痛苦的行為，而且也禁止使受害者遭受精神痛苦的行為。此外，委員會還認為，禁止的範圍必須擴及體罰，包括以毒打作為教訓和懲戒措施。在此方面，第 7 條特別保障教育和醫療機構內的兒童、學生和病人。委員會並指出，長時間單獨監禁遭羈押者或監禁者可能構成第 7 條所禁止的行為。

委員會關於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中對於自由被剝奪而極易受害者補充《公政公約》第 7 條所載的禁止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規定。因此，不僅不得以違反第 7 條的方式對待被剝奪自由者，包括不得對其進行醫學或科學實驗，而且不得使其遭受與喪失自由無關的任何困難或限制。如同自由的人一樣，必須保障這些人的尊嚴得到尊重。喪失自由者除在封閉環境中不可避免須受的限制外，享有《公約》規定的所有權利。

雖然各項人權條約專門為各國規定了義務，並由此將酷刑和虐待界定為國家官員參與的行為，但國際刑法或國際人道法並沒有規定將國家參與作為認定酷刑或虐待的條件。酷刑和虐待的形式不勝枚舉，無窮無盡，因此無法詳盡地進行編目歸類，它們從員警暴力、恐嚇和羞辱到逼供，從剝奪聯繫家人或接受醫療的權利到將藥物戒斷症狀作為手段加以利用，從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拘禁到長期任意拘禁或濫用單獨囚禁等。雖然酷刑和虐待的多種表現形式不一定涉及同樣的嚴重性、故意性和有目的地作為手段致人疼痛或痛苦，但它們都涉及有悖於人性尊嚴的嚴重侵害身心健全的行為。

肆、酷刑規範結構指標

(有關酷刑之國際標準問題，內容為國際文件有關酷刑之標準，包含條約與無拘束力之軟法(soft law)文件；人權機構一般性意見之規範內容，特別報告員與其他專家之建議事項。)

《禁止酷刑和其它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公約》

第 1 條

1.為本公約目的，「酷刑」指為自特定人或第三人取得情資或供詞，為處罰特定人或第三人所作之行為或涉嫌之行為，或為恐嚇、威脅特定人或第三人，或基於任何方式為歧視之任何理由，故意對其肉體或精神施以劇烈疼痛或痛苦之任何行為。此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其他行使公權力人所施予，或基於其教唆，或取得其同意或默許。但純粹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之疼痛或痛苦，不在此限。

2.本條規定並不妨礙載有或可能載有適用範圍較廣規定之任何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

本公約第 1 條對於酷刑之定義為: 1. 為本公約目的，「酷刑」指為自特定人或第三人取得情報或供詞，為處罰特定人或第三者所作

之行為或涉嫌之行為，或為恐嚇、威脅特定人或第三人，或以任何理由為任何方式之歧視，故意對其肉體或精神施以劇烈疼痛或痛苦之任何行為。此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其他行使公權力人所施加，或基於其教唆，或取得其同意或默許。但純粹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的疼痛或痛苦不在限。

基於此，本公約之酷刑行為，係為具體目的，如為取得供詞、獲取情報、進行處罰、侮辱、歧視，行為主體必須有公職人員的參與，不論直接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或基於官方授權行使公權力的其他人，故意使某人遭受在肉體或精神上劇烈疼痛或痛苦的行為。

然而第 1 條規定之目的，是例示性規定，因此其他類似之目的亦有本條之適用。解釋上，故意施加劇烈的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如其目的與國家或其機關之政策或利益有關，此所稱有關，指有直接之行為與目的之連結關係，例如基於反恐、仇外等國家政策或利益之目的，即屬之。非有直接之行為與目的間之連結關係，例如嚴酷之軍事訓練，其目的由於不屬於第 1 條指涉之處罰，雖有間接之國家利益與政策之目的，仍無本條之適用。

因此，故意施加劇烈的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目的，純粹是行為人個人滿足心理上之快感所造成，即非第 1 條所包含之目的。然而如其行為另有處罰、恐嚇或歧視之目的成分，且為國家所默許或認可時，即仍有第 1 條之適用。判斷標準依不同情況，客觀上說明其存續的時間長短，處遇的方式，對於身體或精神所生之影響，

特別要考量受害者的性別，年齡與健康狀態。因此委員會特別強調，第 1 條的意圖和目的並不非是要對行為者的動機進行主觀上探究，而是應根據有關情況進行客觀判斷。

故意施加劇烈的身體或精神上的痛苦的意義，所稱故意，不僅指積極作為，亦包括消極不作為。但不包括過失。所稱劇烈的身體或精神上痛苦，除客觀因素外，尚應考量主觀因素。行為人必須注意到或可以認知受害者對於身體或精神上痛苦的差異性，即使客觀上雖未達酷刑之門檻，從特定受害者之主觀感受仍有構成劇烈疼痛或痛苦之情形，即應視為已構成劇烈疼痛或痛苦。

精神上的痛苦亦屬於第 1 條之酷刑概念要素，故意造成精神上痛苦，最常見之方式應屬恐嚇。因而以恐嚇作為一種酷刑形式，即有第 1 條之適用。威脅亦屬恐嚇之一種態樣，

本公約第 1 條所述的各種酷刑，包括採用恐嚇手段等，正如人權委員會在其關於《公政公約》第 7 條的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所說，特別報告員提請各國政府注意，禁止酷刑不僅與造成身體痛苦的行動有關，而且還與造成受害人心理創痛的行動有關，例如恐嚇和其他形式的威脅。因此，施加酷刑之威脅，當然構成精神上的痛苦。例如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Estralla 控訴烏拉圭案件的意見所指出的，受害人 Miguel Angel Estrella 是阿根廷著名鋼琴師，他申訴受到死亡威脅，要用電鋸鋸斷他的雙手，暴力對付他的親屬或朋友。委員會的結論是，申訴人受到嚴重的心理酷刑，意在迫使他承認犯行。他的

雙臂和雙手因此喪失感覺達 11 個月，並且右手大拇指常年感到不適。

1

一、酷刑與虐待的區別

本公約第 16 條規定，「締約國應承諾在該國管轄的任何領域內防止公職人員或任何行使公權力人員施加、教唆、同意或默許進行未達第 1 條所定義之酷刑程度之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行為。包含於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及和第 13 條所規定義務，亦適用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本公約第 1 條定義邊緣外的行為，特別是並非故意的行為或並非以上述規定之具體目的而實施的行為，即可構成本公約第 16 條所指的虐待。旨在羞辱受害者的行為，即使沒有造成劇烈疼痛或痛苦，已構成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酷刑及虐待行為的區別，公政公約的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與禁止酷刑公約委員會都表示，雖無須對於何等行為構成酷刑，使用列舉方式作成規定以區別酷刑與虐待間之差別。但卻有足於做為區別的要素，亦即應考量行為的性質，目的與其嚴重性。

因此，人權事務委員會通常於其做成之意見中，往往僅表示違反第 7 條而已，非敘明其行為屬於何等態樣。

¹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特別報告員奈傑爾羅德利(Nigel Rodley)對於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之報告，A/56/156, 第 4 段。

然而反酷刑委員會認為，二者的區別雖非明確，仍有一些構成要件上的差異。例如，虐待無酷刑之目的，無故意之要素，或者其疼痛或痛苦未達劇烈程度。²

聯合國酷刑特別報告員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Manfred Nowak 教授認為二者間之區別應從行為之目的與受害者無助(powerlessness)之狀態理解，而非僅以遭受疼痛或痛苦之程度論之。當中可作為區別酷刑與虐待之重要事實因素為受害個人之人身自由問題。³

Nowak 教授指出，虐待的概念最重要的是以不合比例的方式使用警力。如果用警棍毆打被拘禁者，造成劇烈疼痛或痛苦以獲取供詞，即屬於酷刑；用警棍毆打一個進出牢房的被拘禁者，則可能構成虐待。但在街上以同樣警棍毆打示威者，或為驅散非法示威遊行或者如監獄暴動，用警棍毆打行為人，也許可視為執法人員合理使用強制力。換言之，既然為了執法對涉嫌罪犯、暴亂分子或恐怖分子可以合法地使用強制力，並甚至由警方或其他安全部隊使用致命武器，則只有當這類使用強制力與所達到之目的和導致的疼痛或痛苦有某種程度上的不相稱，才構成虐待。根據本公約第 16 條或公政公約第 7 條，這類使用強制力是否合法或過分，取決於在具體情況下所使用之強制力的程度。不成比例使力或過度使用警力，均構成虐待，永遠是禁止的。但在用比例原則判斷虐待範圍之外的合法使用強制力時，僅適用於有關個人仍然能夠動武反抗執法人員或第三者的情況。一旦該人停止抵抗警方使用強制力，即被執法人員制服並喪失反抗能力，則比例原則不再適用。⁴

所稱受害者喪失反抗能力，即是受害者在某種情形下喪失自主能力，才使他特別易受到任何肉體或精神壓力的傷害。酷刑作為對

² 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包括酷刑和拘禁問題，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處罰問題，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曼弗雷德諾瓦克(Manfred Nowak)的報告，E/CN.4/2006/6, 35 段。

³ Ibid. Para. 39.

⁴ Ibid. Para. 38.

個人之人格和尊嚴的最嚴重人權侵犯，是以受害者喪失自主能力的情況為前提，即完全受到另一個人的控制。通常是個人自由受到剝奪的情況。

深入分析本公約第 1 條和第 16 條的起草基礎以及根據反酷刑委員會的實踐而對這兩個條文的一貫解釋，使我們認為，區分酷刑與虐待之決定性標準，可能最好理解為行為之目的和受害者的喪失自主能力，而並非如歐洲人權法院和許多學者所主張的以所施加的疼痛或痛苦的程度為區別。⁵

同樣地，儘管使用強制力的比例原則是確定虐待的一個因素，受害者喪失自主能力則是酷刑之核心概念的最重要因素。換言之，只要某人能夠對執法人員依當場情況所需而合法適度使用的強制力作出抵抗，此一使用強制力就不屬於受禁止的虐待範圍。但是，有關個人一旦受警方實際控制 例如，喪失戰鬥能力(*hors de combat*)、無法反抗或逃離房舍、被捕和被帶上手拷或被押進警車或監所等，從此刻起，比例原則即停止適用，並不再允許使用肉體或精神強制措施。如果這類強制導致了為達到特定目的而施加劇烈疼痛或痛苦，則必須被視為酷刑。如果偵訊方法並未達到劇烈痛苦或疼痛的程度，但是為了羞辱被拘留者，即可視為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因而違反本公約第 16 條和(或)公政公約第 7 條。另外，公政公約第 10 條規定了一個只適用於被剝奪個人自由者的特別權利，即受人道和有尊嚴之待遇。⁶

除了在某人未受另一人實際控制的情況下，虐待的行為受有比例原則的檢驗，這是一個評估其適用範圍的先決條件。然而，如果某人被拘禁或受另一人實際控制，即屬喪失自主能力之狀態，比例原則即不再適用。⁷

⁵ Ibid. Para. 9.

⁶ Ibid. Para. 40.

⁷ Ibid. Para. 41.

執法人員和其他官員在拘禁環境之外使用強制力 (extra-custodial use of force)，是本公約規範義務相當值得注意的問題。當國家官員訴諸不必要、不適當或過度的強制力，但並未直接侵犯生命權時，這一問題尤其具有意義。儘管各國當然必須有能力採用一切適當的手段，包括必要且合乎比例的強制力，維持公共安全和法律秩序，於此情況，在未受充分控制的環境下使用強制力時，任意與濫用強制力具有高度風險。⁸

於此情況下，應如何解讀諸如「酷刑」、「虐待」、「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等用語，應注意的是此一主題與保護其他基本權利之間的關係，例如，最主要的是與和平集會權、言論自由和生命權之間的關係。

而在解讀相關法律規定時，應參照國家實踐、國際實務見解以及普遍獲得確認與體現用於規範執法人員使用強制力的條件和方式最重要之軟法 (soft law) 如，執法人員行為守則 (Code of Conduct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和執法人員使用強制力和武器的基本原則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⁹

二、反酷刑委員會通過第二號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 No. 2: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2 by States partie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2008)¹⁰

不歧視原則為保護人權的一項基本和普遍原則，對《公約》的解釋和適用至為重要。「不歧視」已納入了《公約》第1條第1項所載之酷刑定義本身，該項明文禁止為「基於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

⁸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HRC/34/54, para. 41.

⁹ Ibid. Para. 42-43.

¹⁰ CAT/C/GC/2, 24 January 2008.

由」所作出之特定行為。委員會強調，是否歧視性地使用精神或肉體暴力或虐待，是決定某一行為構成酷刑與否之重要因素。(第 20 段)

委員會強調，涉及單獨拘禁審訊的情況下，警衛須與受審訊或拘禁者為同一性別。隨著新預防措施的發現、試用和證明有效(諸如對所有審訊過程進行錄影、實施 1999 年《伊斯坦布爾議定書》一類的調查程序或採用新式教育公眾或保護未成年人的辦法)，可依照第 2 條之授權，在其餘條款基礎上擴大為防止酷刑所需要採取之措施範圍。(第 14 段)

三、單獨監禁問題

長期單獨監禁在一個秘密地點，相當於施加酷刑。因而特別報告員認為，單獨拘禁是認定一個人是否面臨酷刑危險的最重要因素。拘禁期限的長短經常被作為確定虐待行為嚴重性的主要因素。對此，特別報告員重申並敦促各國宣布單獨拘禁為非法。特別報告員在 El-Megreisi 控訴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的案件中強調指出，委員會的結論是「Mohammed El-Megreisi 被單獨監禁 3 年以上，直到 1992 年 4 月，才讓他的妻子探望他，從那天以後他又被單獨監禁在一個秘密地點。委員會根據這些事實發現 Mohammed Bashir El-Megreisi 先生被長期單獨監禁在一個神秘地點，就是酷刑、殘忍和不人道待遇的受害人，這違反了《盟約》(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研究者註)第 7 條第 10 條第 1 項的規定。」¹¹

四、酷刑特別報告員 Nigel Rodley 的提議 (摘要)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Sir Nigel Rodley, submitted pursuant to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2001/62, E/CN.4/2003/68, 17 December 2002)

¹¹ 人權事務委員會，CCPR/C/50/D/440/1990，段 5.4，引用於奈傑爾羅德利報告，A/56/156，同上註，段 11。

不能與外界接觸的羈押常常會發生酷刑行為。因此，不能與外界接觸的羈押應視為非法，應當立即釋放不能與外界接觸的被羈押者。有關拘留的時間與地點以及執行拘留執法官員的身份應當詳盡記錄；應當記錄實際羈押情況的有關信息。有關法律規定應當保障被羈押者在被羈押後的 24 小時之內獲得法律幫助。應當處罰未遵守上述法律規定的看守人員。在特殊情況下，允許被羈押者與其律師馬上接觸會產生真正的安全問題，那麼限制被羈押者與其律師接觸需要得到法官許可，至少應當允許被羈押者與獨立律師會見，例如律師協會推薦的律師。(第六段)

在任何情況下，被羈押者的親屬應當在其被羈押後的 18 小時之內知曉拘留及羈押地點。在被拘留的時候，此人應當接受醫學檢查，應當定期進行醫學檢查，改變羈押地的時候必須對其進行醫學檢查。應當記錄訊問時在場者的身份狀況。應當記錄訊問的所有情況，錄影最佳，詢問時在場的所有人員應當記錄在案。在庭審時應當排除訊問記錄之外的證據。給被害人蒙眼睛及帶頭套的做法常會使指控酷刑化為泡影，因為這會使被害人無法指認實施酷刑者。因此，應當禁止蒙眼睛及帶頭套的做法。被依法拘留者在其訊問人員或者偵查人員控制場所的時間不能超過法律許可的獲取審前羈押司法令狀時間，在任何時候不得超過 48 小時。他們應當立即轉移至其他權力機關控制的審前羈押機構，此後不得與訊問人員或者偵查人員進行不受監督的接觸；

被行政羈押者常常遊離於司法控制。被行政羈押者應當獲得與被刑事羈押者相同程度的保護。同時，有關國家應當考慮為了符合國際標準，廢除所有形式的行政羈押；(第七段)

法律法規應當賦予所有被羈押者質疑羈押合法性的能力，例如申請人身保護令。上述程式應當能有效進行；(第八段)

有關國家應當採取以下有效措施防止囚犯之間的暴力行為，即暴力行為的調查報告、起訴並處罰有關責任者、給弱勢者提供保護

性羈押措施、避免使其陷入雪上加霜的不當待遇之危險從而防止其遊離於獲得必要之外保護的監獄囚犯。(第九段)

五、死刑問題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的特別報告員不確定是否已出現新的禁止在一切情況下的執行死刑的習慣法。習慣國際法的發展尚未禁止一切情況下的死刑，意謂保留死刑在理論上是符合國際法的，但在實踐中，國際人權的司法實踐上要求越來越嚴格的條件，以至於執行死刑幾乎不可能不違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規定。雖然《公政公約》第 6 條並未禁止死刑，但規定了嚴格的條件。然而，第 7 條絕對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從而產生的結論是，任何違反第 7 條的執行均構成任意剝奪生命的行為。

12

自 1966 年《禁止酷刑公約》通過以來，國際、區域和國內實踐和法律的發展都支持廢除死刑。特別報告員回顧《美洲人權公約》(1969 年)及其《關於廢除死刑的議定書》(1990 年)；《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1950 年)及其《經第 11 號議定書修正的關於廢除死刑的第 6 號議定書》(1983 年)和《關於在所有情況下廢除死刑的第 13 號議定書》(2002 年)；《旨在廢除死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項任擇議定書》(1989 年)。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1945-1946 年)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6 年)不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1998 年)、《起訴應對 1991 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所犯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負責者的國際法庭規約》(1993 年)以及《起訴應對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994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盧安達境內的種族滅絕和其他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行為負責者和應對這一

¹² High-level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ques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A/HRC/36/27, para. 16.

期間鄰國境內的種族滅絕和其他這類違法行為負責的盧安達公民的《國際刑事法庭規約》(1994年)都禁止死刑，甚至禁止對戰爭罪、危害人類罪和滅絕種族罪實施死刑。超過160個會員國已廢除死刑或在法律上或實踐中暫停執行死刑。全球完全廢除死刑的趨勢可能最終形成禁止死刑的普遍習慣法規範。此外，歐洲人權法院指出，死囚區現象¹³以及任何執行方法或對執行的恐懼¹⁴等同於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¹⁵

特別報告員另提及一些執行方法，造成了不必要的身心痛苦或羞辱，被認定違反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規定。這些方法包括以石刑、窒息、絞刑、電椅、焚燒、活埋、斬首、注射處死(未經測試和/或執行不當)實施執行和任何形式的秘密或公開執行。秘書長曾在2015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死刑與人的尊嚴、生命權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規定不符(見A/HRC/30/18,第55段)。他強調，許多國家的法院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並指出，由於死刑構成的極端的身心痛苦違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規定，美國的許多州已廢除死刑。¹⁶

特別報告員強調，死刑問題不單純是一個技術性法律問題。這是一種報應刑制度和蓄意的非人道處罰，故意給罪犯及其家人造身心痛苦，可被用來殺害無辜的人及給其家人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必須認真思考罪犯、受害者和及其家人固有的人的尊嚴以及人類社會的尊嚴和道德權威。¹⁷

¹³ Ibid. Para. 17. Soering v.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7 July 1989.

¹⁴ Ibid. Para. 17. Al-Saadoon and Mufdhi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of 2 March 2010.

¹⁵ Ibid. Para. 17. High-level panel discussion on the ques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¹⁶ Ibid. Para. 18.

¹⁷ Ibid. Para. 19.

有些國家代表指出，死刑是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一種形式。他們表示，死刑不是文化問題、宗教問題或主權問題，死刑或酷刑的使用沒有任何合理理由。¹⁸

1. 酷刑逼供

有些國家代表表示關切的是，一些最終判處死刑的案件曾使用酷刑逼供。一些遭受酷刑的個人供認了他們沒有實施的死刑罪。還有人提及在中國(包括臺灣)、巴林、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日本、沙烏地阿拉伯、蘇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葉門，存在據稱通過酷刑或脅迫刑訊逼供的情況。¹⁹

2. 缺乏透明度

有些國家代表說，國際人權司法實踐上認為，缺乏透明度，特別是秘密處決，缺少關於處決時間和埋葬地點的資訊以及不能將屍體交還親人等情況，構成了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代表指出，缺乏透明度導致無法就死刑和廢除死刑問題舉行有建設性的辯論。還有代表強調了政治領導人在改變公眾輿論方面的作用以及領導人在提出支持廢除死刑的論點時做到充分瞭解情況和勇敢的必要性。²⁰

3. 死囚現象(Death row phenomenon)

有些國家代表指出從國家、區域和國際人權司法實踐上都認為死囚現象構成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他們特別指出了對人的尊嚴的破壞、有辱人格的拘禁環境以及死囚遭受到難以想像的焦慮和嚴重心理痛苦。國家掌握預知死亡的權力不可避免地造成嚴重的精神傷痛或痛苦，屬於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範圍。²¹

¹⁸ Ibid. Para. 34.

¹⁹ Ibid. Para. 36.

²⁰ Ibid. Para. 37.

²¹ Ibid. Para. 41.

4. 處決方法

有國家代表提及歐洲聯盟禁止出口用於注射處死的藥物，²² 指出一些藥物的副作用會造成長期和不必要的痛苦。他們還回顧了美國製造公司為防止其藥物用於處決所採取的措施以及法院指示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防止非法進口用於處決的藥物的命令。禁止酷刑委員會也曾表示，由於注射處死可能造成嚴重疼痛和痛苦，其使用應受到審查(見 CAT/C/USA/CO/2, 第 31 段和 CAT/C/USA/CO/3-5, 第 25 段)。有代表進一步指出，應譴責和改變低質量的注射處死方法或其他導致身體酷刑的方法。²³

5. 對家人和其他相關個人的影響

有些國家代表討論了死刑對家庭成員及其周圍其他個人的影響。他們報告說，父母被判死刑的兒童，遭受創傷和長期影響。特別有必要討論的是父母被判死刑或被執行的兒童人權，以及不知囚犯將於何時被處決、不能進行探視或告別的囚犯親屬的痛苦。不就執行時間和日期作出適當通知尤為令人擔憂。代表們特別指出剝奪有關人員重返社會的第二次機會以及剝奪家庭與親人生活在一起的第二次機會的殘酷性。各國應使赦免請求更加容易使用和透明，並應表現出對所有相關人員的生命、幸福和尊嚴的尊重。²⁴

此外，使用死刑對其他個人也產生不利影響。有人提請注意行刑者所遭受的痛苦和創傷，一些行刑者曾在大會第七十一屆會議期間與一些代表進行交談。行刑者告訴代表，他們在處決囚犯時遭受的痛苦使他們成為了反對死刑的堅定宣導者。一些代表呼籲作出死刑判決的人，特別是法官和檢察官，以同家人和行刑者相同的方

²² Ibid. Para. 44. Regulation (EU) 2016/213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November 2016 amending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36/2005 concerning trade in certain goods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capital punishment,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²³ Ibid. Para. 44.

²⁴ Ibid. Para. 45.

式目睹處決情況，以便他們充分瞭解死刑對家人和其他相關個人的廣泛影響。²⁵

六、《受刑人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1955)

體罰、暗室禁閉和一切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處罰應一律完全禁止，不得作為對違犯行為的處罰。(第 31 點)

除非醫官曾經檢查受刑人身體並且書面證明他體格可以接受禁閉或減少規定飲食，不得處以此種處罰。(第 32 點)

戒具如手鐐、鐵鍊、腳銬、拘束衣等，永遠不得作為處罰用具。此外，鐵鍊或腳銬亦不得用作戒具。除非在下列情況，不得使用其他戒具：(1) 移送受刑人時防其逃亡，但受刑人在司法或行政當局出庭時，應予除去。(2) 根據醫官指示有醫藥上理由。(第 33 點)

七、《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禁或監禁者原則》」 (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1988)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禁或監禁者均應獲得人道待遇和尊重其固有人格尊嚴之處遇。(原則 1)

對於遭受任何形式拘禁或監禁的人不應施加酷刑或施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任何情況均不得作為施以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的理由。(原則 6)

應禁止不當利用被拘禁人或被監禁人的處境而進行逼供，或迫其以其他方式認罪，或作出不利於他人的證言。審問被拘禁人時不

²⁵ Ibid. Para. 46.

得對其施以暴力、威脅使用損害其決定能力或其判斷力的審問方法。
(原則 21)

即使被拘禁人或被監禁人同意，也不得對其做任何可能有損其健康的醫學或科學試驗。(原則 22)

八、《受刑人待遇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1990)²⁶

應廢除或限制使用單獨監禁作為處罰的手段，並鼓勵為此而作出的努力。(第七段)

九、《執法人員使用強制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1990)

執法人員在執勤時應盡可能採用非暴力手段，最後不得已方求諸使用強制力或火器。他們只能在其他手段起不到作用或沒有希望達到預期的結果時方可使用強制力和火器。(原則 4)

執法人員不得對他人使用火器，除非為了自衛或保衛他人免遭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傷威脅，為了防止給生命帶來嚴重威脅的特別重大犯罪，為了逮捕構成此類危險並抵抗當局的人或為了防止該人逃跑，並且只有在採用其他非極端手段不足以達到上述目標時才可使用火器。無論如何，只有在為了保護生命而確實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才可有意使用致命火器。(原則 9)

²⁶ G. A. A/RES/45/111, 14 December 1990.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45/a45r111.htm>

在驅散非法而非暴力的集會時，執法人員應避免使用強制力，或在實際無法避免時應將使用強制力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原則 13)

執法人員對被拘禁或扣押人員不得使用火器，但在為了進行必要的自衛或保衛他人免遭死亡或重傷的直接威脅時，或為了阻止構成第 9 條原則所述危險的被拘禁或扣押人員逃跑而確有必要時除外。(原則 16)

第 2 條

1.締約國應採取有效之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出現酷刑之行為。

2.任何特殊情況，不論為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動盪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狀態，均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之理由。

3.上級長官或政府機關之命令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之理由。

一、《反酷刑委員會通過第二號一般性意見》(2008) (General Comment No. 2: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2 by States partie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2008) ²⁷

第 2 條規定之防止酷刑的義務範圍十分廣泛。防止酷刑的義務與第 16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防止其它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的義務是不可分割、互為依存與相互關聯。防止虐待義務與防止酷刑義務實際上相互重疊，而且基本上相一致。第 16 條規定防止虐待的手段，「特別」強調了第 10 至第 13 條所列之措施，但未將有效防止虐待措施僅僅限於這幾條規定，正如委員會曾解釋，還包括諸

²⁷ CAT/C/GC/2, 24 January 2008.

如第 14 條所規定之補償。實際上，虐待與酷刑之間往往沒有明確界限。經驗顯示，發生虐待的情況往往也會助長酷刑的發生。因此，締約國必須採取防止酷刑所必須之相同措施以禁止虐待情事。所以，委員會認為，《公約》中禁止虐待也是不可減損的規定，必須採取不可減損之有效措施以防止虐待的發生。(第 3 段)

締約國有義務消除有礙於杜絕酷刑和虐待之任何法律性或其它障礙；採取積極有效措施義確實防止此種行為和再度發生。締約國有義務依照委員會就具體來文通過之意見和結論性意見不斷檢視並修正其本國法律和執行《公約》的情況。

第 2 條第 2 項規定，酷刑之禁止是絕對的，不可減損的。該項強調，締約國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況」作為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施行酷刑之理由。《公約》指出之特殊情況包括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動盪或任何其它社會緊急狀態。其中包括任何恐怖主義行為或暴力犯罪威脅以及國際性或非國際性武裝衝突。任何國家若以此種情況或其它維護公共安全或避免出現緊急狀態之一切情況為由而施行酷刑或虐待，委員會一概深感關切並斷然反對。委員會也反對任何以宗教或傳統為由違反絕對禁止酷刑之規定。委員會認為，締約國若以特赦或採取其它阻撓辦法事先排除或表明不願意對施行酷刑或虐待者進行立即與公正的追訴和處罰，皆違反第 2 條第 2 項之不可減損原則。(第 5 段)

委員會還認為，與不可減損原則相聯繫之「其管轄的任何領土」概念包括任何領土或設施，必須用來保護在締約國法律上或事實上控制之下的任何人，無論是對公民還是非公民，不得有任何歧視。委員會強調，防止酷刑之國家義務也適用於法律上或事實上以締約國名義、與締約國配合或因應締約國之要求而行事的所有人。(第 7 段)

《公約》為締約國而非為個人規定義務。國家為其官員和其他人員之行為和不行為承擔國際責任，其中包括以官方身份或代表國

家行事、與國家配合行事、在其公務人員指揮或控制下行事或表面上依法行事之代理人、私營承包商和其他人員。因此在各種監管或控制情況下，例如在監獄、醫院、學校、負責照顧兒童、老年人、精神病人或身心障礙者的機構、兵役單位以及若國家不加干預就會縱容和擴大私下傷害危險之其它機構和環境內發生之酷刑和虐待行為，締約國均應禁止、防止和糾正。然而，對於習慣國際法和其它條約加諸國家或個人施行酷刑和虐待後之國際責任，《公約》未作任何限制。(第 15 段)

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政府當局與以官方身份行事之其他人直接犯下、教唆、煽動、鼓勵、默許或以其它方式參與或共同犯下《公約》所界定之酷刑行為。因此，締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政府當局或以官方身份行事或表面上依法行事之其他人同意或默許任何酷刑行為。委員會斷定，締約國若未履行這些義務，即違反《公約》。例如，對私人擁有或管理拘禁中心之情況，委員會認為，鑒於有關人員負責執行國家職能，因而他們是以官方身份行事，所以不得減損國家官員對其進行監督並採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酷刑和虐待之義務。(第 17 段)

對於特別有可能遭受酷刑的某些少數或邊緣化個人或人群加以保護，是防止酷刑或虐待義務的構成部分。就《公約》規定之義務而言，締約國必須確保其法律可以實際地適用於所有人，無論其種族、膚色、族裔、年齡、宗教信仰或教派、政治見解或其它見解、原籍或社會出身、性別、性傾向、變性身份、心智障礙或其它身體障礙、健康狀況、經濟狀況或土著身份、拘禁理由等，包括被控犯下政治罪行或恐怖主義行為者、尋求避難者、難民或其他受到國際保護者或其他任何地位或具不利特性者。因此，締約國應確保特別可能遭受酷刑的群體成員受到保護，全力起訴和處罰一切對這些人施行暴力和虐待行為者，並確保實行其它正面預防和保護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上述各項措施。(第 21 段)

在可能發生酷刑或虐待行為的環境中消除就業歧視和不斷進行宣傳教育，對防止發生這種違反《公約》的行為及養成尊重婦女和少數群體的風氣至為重要。委員會鼓勵各國提倡雇用少數群體成員和婦女，尤其是在醫療衛生、教育、監獄/拘留所、執法、司法和法律等領域以及國家機關和私營部門。締約國應在其報告中說明此方面之進展情況，並依照性別、種族、原籍和其它相關身份分列資料。(第 24 段)

禁止酷刑規定的不可減損性尚可見諸第 2 條第 3 項所載之原則，即上級官員或政府當局的命令永遠不得被行為人援引為施行酷刑之理由。因此，下級機關之行為不得為上級機關所庇護，個人應為其行為負責。同時，上級機關(包括公職人員)若知悉或應當知悉正在發生或有可能發生此種違禁行為，卻未採取合理與必要的預防措施，他們也不能逃避其因下級犯下酷刑或虐待行為所必須承擔之責任或刑事責任。委員會認為，獨立公正的檢察主管機關和司法機關必須充分調查任何涉及酷刑或虐待行為者之上級官員的責任，包括直接教唆或鼓勵酷刑或虐待行為與同意或默許此種行為的責任。抗拒被其認為非法的命令或在調查酷刑或虐待行為(包括上級官員所犯酷刑或虐待行為)過程中予以合作的個人，應保護其不致遭受任何形式的報復。(第 26 段)

委員會重申，本一般性意見不得被認為妨礙任何國際文件或國家法律中規定至少包含《公約》各項標準或提供更高程度保護之任何規定。(第 27 段)

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35 號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 No. 35- Article 9 :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2014)²⁸

²⁸ CCPR/C/GC/35, 15 Dec 2014.

被拘禁者本身必須被帶到法官面前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的其他官員面前。被拘禁者親身出席聽審可提供機會詢問他們在被羈押時受到的待遇，且在命令繼續羈押的情況下便於立即將其轉移到還押拘禁中心。因此，這是人身安全的一種保障，也可防止酷刑和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在隨後的審訊和後來法官評估羈押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聽審會上，被逮捕者有權得到法律援助，原則上，提供援助的應當是選定的律師。(第 34 段)

對防止酷刑至關重要的一些保障，對保護處於任何形式拘禁中的人免受任意拘禁和人身安全損害也很必要。下面僅舉一些例子。被拘禁者應只收押在得到官方承認為拘禁場所的設施中。官方應保有統一的登記冊，用來登記被拘禁者的姓名、拘禁地點、到達和離開時間以及負責拘禁他們的人員的姓名；登記冊要隨時可供包括親屬在內的有關各方查閱。應允許獨立的醫務人員和律師及時和經常探訪，與在拘禁之合法目的的要求允許家屬在監督下探視。應以被拘禁者懂得的語言立即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權利；提供以適當語文(包括盲文)印刷的傳單可有助於被拘禁者時常保持知情。應讓被拘禁的外國人知道他們有權與其領事機構聯繫，或者，如果是尋求庇護者，有權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聯繫。應建立負責訪查包括精神健康機構在內的所有拘禁場所的獨立和公正機構。(第 58 段)

三、《反酷刑委員會通過第四號一般性意見》(2017) General comment No. 4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3 of the Conv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22,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2017)²⁹

委員會回顧指出，絕對禁止《公約》第 1 條所界定的酷刑。《公約》第 2 條第 2 款規定：「任何特殊情況，不論為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動盪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狀態，均不得援引為施行酷

²⁹ CAT/C/GC/4, 2018.

刑的理由。」委員會還回顧指出，其他虐待行為同樣予以禁止，而且禁止虐待的規定同樣是不可減免的。(第 8 段)

四、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關於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Art. 12,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000) ³⁰

享有健康權，不應理解為身體健康的權利。健康權既包括自由，也包括權利。自由包括掌握自己健康和身體的權利，包括性和生育上的自由，以及不受干擾的權利，如不受酷刑、未經同意強行治療和試驗的權利。(第 8 段)

五、《有效防止和調查法外、任意和立即處決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1989)

各國政府應以法律禁止一切法外、任意和立即處決，應確保任何此類處決均應根據其刑法規定視為罪行，並應考慮到這種罪行的嚴重程度而給予適當懲處。不得以任何特殊情況，諸如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狀態、內部政治不穩定或任何其他公共緊急情況等作為進行這種處決的理由。在任何情況下，包括但不限於內部武裝衝突、公職人員或其他執行公務的人員或在此種人員唆使或同意或默許下行事的人過分或非法使用武力等情況和在押期間發生死亡情事等情況下，均不得實行這類處決。這項禁令應超越政府當局發佈的命令。(第 1 段)

³⁰ E/C.12/2000/4, 11 Aug 2000.

為了防止法外、任意和立即處決，各國政府應確保嚴格控制包括明確逐級指揮所有負責偵緝、逮捕、拘留、看管和監禁的人員以及法律授權使用武力和火器的人員。(第 2 段)

各國政府應禁止高級官員或公共當局授權或教唆其他人進行這種法外、任意和立即處決的命令。所有人員都有權利和義務違抗這種命令。對執法人員的培訓應強調上述規定。(第 3 段)

在不損害上面原則 3 的情況下，不得援引高級官員或公共當局的命令作為進行法外、任意或立即處決的理由。高級人員、官員或其他公職人員如有合理機會防止其屬下人員所犯行為時，得認為應對這類行為負責。在任何情況下，包括戰爭、戒嚴或其他公共緊急狀態，均不得豁免任何被指控參與法外、任意或立即處決的人免於受到公訴。(第 19 段)

六、《執法人員行為守則》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1979)

執法人員不得施加、唆使或容許任何酷刑行為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也不得以上級命令或非常情況，例如戰爭狀態或戰爭威脅、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國內政局不穩定或任何其他緊急狀態，作為施行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理由。(第 5 條)

七、《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 (The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1990)

各國政府和執法機關應確保，對上級官員如果知道或應該已經知道其管轄下的執法人員正在或已經採取非法使用武力或火器手段

而沒有在其權力範圍內採取一切措施予以阻止、禁止或報告者，追究責任。(第 24 段)

如果執法人員知道致人死亡或重傷的使用武力或火器的某一命令明顯是非法的，而且有合理機會可以拒絕執行此種命令，則不得以服從上級命令作為辯護理由。無論如何，責任也屬於發出此種非法命令的上級官員。(第 26 段)

八、《聯合國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Guidelin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ors, 1990)

檢察官應在刑事訴訟、包括提起訴訟，和根據法律授權或當地慣例，在調查犯罪、監督調查的合法性、監督法院判決的執行和作為公眾利益的代表行使其他職能中，發揮積極作用。(第 11 段)

檢察官應適當注意公務人員所犯的罪行，特別是對貪汙腐化、濫用權力、嚴重侵犯嫌疑犯人權、國際法公認的其他罪行的起訴，和依照法律授權或當地慣例對這種罪行的調查。(第 15 段)

九、《關於醫務人員、特別是醫生在保護被監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方面的任務的醫療道德原則》(Principles of Medical Ethics relevant to the Role of Health Personnel, particularly Physicians, in the Protection of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1982)

醫務人員、特別是醫生，與被監禁或拘留的人的職業關係，其目的如超出確定、保護或增進被監禁或拘留的人的身心健康以外，為違反醫療道德。(原則 3)

醫務人員、特別是醫生，如有下列情形者，亦為違反醫療道德：

(a) 應用他們的知識和技能以協助對被監禁或拘留的人進行可能對其身心健康或情況有不利影響並且是不符合各項有關國際文件的審訊；

(b) 證明或參與證明被監禁或拘留的人可以接受可能對其身心健康不利並且是不符合各項有關國際檔的任何形式的待遇或處罰，或是以任何方式參加施行任何這種不符合各項有關國際文件的待遇或處罰。(原則 4)

上述原則不得以包括社會緊急狀態在內的任何理由予以減免。
(原則 6)

十、酷刑特別報告員 Nigel Rodley 的提議（摘要）(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Nigel Rodley, submitted pursuant to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2001/62) ³¹

一旦發生酷刑行為，最高當局應當公開譴責所有形式的酷刑行為。最高當局，特別是負責執法者，應當公開表示：在酷刑發生時，羈押場所負責人個人要為酷刑行為的發生承擔責任。為了使上述建議行之有效，有關當局尤其要不期而至地到訪容易發生酷刑行為的警察局、審前羈押場所及教養所。應當開展旨在喚起普通公眾知曉在被拘留及羈押時享有相關權利的運動，特別是投訴所受執法官員待遇的權利。(第 3 段)

十一、《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1979)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販賣婦女及意圖營利使婦女賣淫的行為。(第 6 條)

³¹ 2002 年 12 月 17 日，特別報告員 Nigel Rodley 先生依照人權委員會 2001/62, E/CN.4/2003/68 決議所提供的特別報告。

十二、《兒童權利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89)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的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第 19 條)

締約國承擔保護兒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色情剝削和性侵犯之害，為此目的，締約國尤應採取一切適當的國家、雙邊和多邊措施，以防止：

- (a) 引誘或強迫兒童從事任何非法的性活動；
- (b) 利用兒童賣淫或從事其他非法的性行為；
- (c) 利用兒童進行淫穢表演和充當淫穢題材。(第 34 條)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國家、雙邊和多邊措施，以防止為任何目的或以任何形式誘拐、買賣或販運兒童。(第 35 條)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促使遭受下述情況之害的兒童身心得以康復並重返社會：任何形式的忽視、剝削或凌辱虐待；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或武裝衝突。此種康復和重返社會應在一種能促進兒童的健康、自尊和尊嚴的環境中進行。(第 39 條)

十三、《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2010)

任何人都不應受到秘密監禁。

在不影響締約國在剝奪自由問題方面的其他國際義務前提下，各締約國應在本國的法律中：

(一) 規定下令剝奪自由的條件；

(二) 說明有權下令剝奪自由的主管機關；

(三) 保證任何被剝奪自由的人，只能羈押在官方認可並加以監督的地點；

(四) 保證任何被剝奪自由的人都能獲准與其家屬、律師或他或她選擇的任何其他人取得聯繫並接受探視，且僅受法律規定條件的限制，如果此人是外國人，應根據相應的國際法，准許其與本國的領事機構聯繫；

(五) 保證主管機關和法律授權機構的人員可進入被剝奪自由人的羈押地點，如有必要，應事先得到司法機關的批准；

(六) 保證任何被剝奪自由的人，或在懷疑發生強迫失蹤的情況下，由於被剝奪自由的人無法行使這項權利，任何有合法利益的人，如被剝奪自由人的家屬、他們的代表或律師，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權向法院提起訴訟，以便法院立即對剝奪其自由是否合法作出裁決，如果剝奪自由不合法，則應下令釋放。

各締約國應保證編制並維持一份或數份被剝奪自由者的最新官方登記冊和/或記錄，並在收到要求時，及時將之提供給有關締約國在這方面有法律授權的任何司法或其他主管機關或機構，或該國已加入的任何相關國際法律文書所授權的司法或其他主管機關或機構。登記冊中收入的資料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 (一) 被剝奪自由者的身份；
- (二) 被剝奪自由的人，收監的日期、時間和地點，以及剝奪此人自由的負責機關；
- (三) 下令剝奪自由的機關及剝奪自由的理由；
- (四) 負責監管剝奪自由的機關；
- (五) 剝奪自由的地點、收押日期和時間，以及剝奪自由地點的負責機關；
- (六) 被剝奪自由者健康的主要情況；
- (七) 若在剝奪自由期間死亡，死亡的情況和死因，以及遺體的下落；
- (八) 釋放或轉移到另一羈押地點的日期和時間、目的地，及負責轉移的機關。(第 17 條)

在不違反第 19 和第 20 條的情況下，各締約國應保證，任何對以下資訊有合法利益的人，例如被剝奪自由者的親屬、他們的代表或律師，應至少能獲得以下資訊：

- (一) 下令剝奪自由的機關；
- (二) 剝奪該人自由以及收押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 (三) 負責監管剝奪自由的機關；
- (四) 被剝奪自由者的下落，包括在轉往另一監押場所的情況下，轉移的地點和負責轉移的機關；
- (五) 釋放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 (六) 被剝奪自由者健康的主要情況；

(七) 若在剝奪自由期間死亡，死亡的情況和死因，以及遺體的下落。

必要時應採取適當措施，保護本條第一款中講到的人和參與調查的人員，不得因查尋被剝奪自由者的情況，而受到任何虐待、恐嚇或處罰。(第 18 條)

十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993)

各國應譴責對婦女的暴力行為，不應以任何習俗、傳統或宗教考慮為由逃避其對消除這種暴力行為的義務。

各國應以一切適當手段儘快採取政策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為此目的：

(d) 應在本國法律中擬定刑事、民事、勞動或行政處分規定，以處罰和糾正使婦女受到暴力傷害的錯誤行為；應為遭受暴力行為的婦女提供運用司法機制的機會，並根據國家立法的規定為受到傷害的婦女提供公正而有效的補救辦法；各國還應使婦女瞭解通過這種機制尋求補救的各項權利；

(f) 應全面擬定能促進保護婦女免受任何形式暴力行為傷害的預防性方法和各種法律、政治、行政及文化性質的措施，並確保不致因法律、執法方式或其他幹預行動方面缺乏性別敏感性而出現使婦女再次受傷害的情況；

(k) 應促進針對普遍存在的對婦女的各種形式暴力行為，尤其是有關家庭暴力行為而進行的研究、資料收集和統計資料彙編，並應鼓勵研究探討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的原因、性質、嚴重程度及後果，以及研究為防止和糾正對婦女的暴力行為而實行的措施的有效性；此類研究的統計資料和調查結果應予以公佈。(第 4 條)

第 3 條

1.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之危險，任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

2.為確定此等理由是否存在，有關機關應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在通常情況下，該國家境內是否存在一貫重大、明顯或大規模侵犯人權之情況。

一、**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 No. 20 - Prohibition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icle 7, 1992)**

委員會認為，締約國不得透過引渡、驅逐或遣返手段使個人回到另一國時有可能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締約國應在其報告中指出已為此採取何種措施。(第 9 段)

二、**《有效防止和調查法外、任意和立即處決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1989)**

不得強迫遣返或引渡任何人到某一國家，如果有相當理由認為該人在該國將成為法外、任意或立即處決的受害者的話。(第 5 段)

**三、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的第 35 號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 No. 35- Article 9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 2014)³²**

將一個人遣返到一個國家，而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她)在那裡會面臨人身自由和安全遭受嚴重侵犯的真實危險，如長久任意拘禁，這可能構成《公約》第七條所禁止的不人道待遇。(第 57 段)

**四、《反酷刑委員會通過第四號一般性意見》(2017) (General
comment No. 4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3 of the Conv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22 ,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2017)³³**

《公約》第 3 條第 1 款規定，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任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第 5 段)

對於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危險的人員「不予遣返」，這項原則同樣是絕對的。(第 9 段)

各締約國必須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或屬於其控制或權力範圍內的任何地區內、或在締約國內註冊的船舶或飛機上，對任何人(包括請求或需要得到國際保護的人)適用不遣返原則，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視，也不論當事人的國籍或無國籍狀態及其在普通法和緊急狀態法之下的法律、行政或司法地位如何。如委員會在其第 2 號一般性意見第 7 段中所述，「其管轄的任何領土」這一概念包括任何領土或設施，必須用以保護在法律或事實上受締約國控制的任何人，無論是公民還是非公民，不得有任何歧視。(第 10 段)

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當事人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有可能在目的地國遭受酷刑的一個群體的成員，在將被遞解至的國

³² CCPR/C/GC/35, 2014

³³ CAT/C/GC/4, 2018.

家內有遭受酷刑的危險，便存在《公約》第 3 條中的不遣返義務。委員會的慣例是，只要酷刑風險是「可預見、針對個人、現實存在而且真實的」，便認定存在「充分理由」。(第 11 段)

任何若被遞解至某一國家便可能遭受酷刑者，只要風險持續存在，均應獲准留在有關締約國管轄、控制或權力範圍內的領土之內。不得在缺少正當法律依據和保障措施的情況下對當事人實施拘留。拘留應始終是需要依據個案評估 並接受定期審查的例外措施。此外，若面臨風險者在被遞解至另一國家後會隨之面臨被遞解至有充分理由相信此人將有遭受酷刑危險的第三國，絕不得予以遞解。(第 12 段)

締約國應通過主管的行政和(或)司法當局對每起案件進行單獨、公正和獨立的審查，審查應符合基本的程式性保障措施，特別是保證審查過程及時而透明、對遞解決定進行複審並使上訴具有暫緩遞解的效力。每起案件中，當事人均應及時獲知預定的遞解行動。集體遞解出境，若沒有對每起案件中的個人風險進行客觀審查，應被視為違反不遣返原則。(第 13 段)

締約國不應採取勸阻措施或政策，例如在惡劣的條件中無限期拘留、對庇護申請不予處理或過度拖延、或削減尋求庇護者援助方案的資金。這些措施會迫使根據《公約》第 3 條需要得到保護的人，不顧個人在原籍國面臨遭受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風險，返回原籍國。(第 14 段)

《公約》第 16 條規定締約國有義務防止未達到《公約》第 1 條所述酷刑程度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行為。(第 15 段)

在就涉及原則的每起案件做出評估之前，締約國應考慮面臨遞解者可能遭受的其他形式的虐待，其性質是否可能改變以至構成酷刑。(第 16 段)

委員會認為，劇烈的疼痛或痛苦並非總能得到客觀評估。評估取決於暴力或虐待行為的實施對個人造成的消極的身體和(或)心理影響，同時考慮到每起案件的所有相關情況，包括待遇的性質、受害者的性別、年齡、健康狀況和脆弱性，以及其他任何狀況或因素。(第 17 段)

締約國可能會發現根據《公約》第 3 條承擔的義務與根據某多邊或雙邊引渡條約承擔的義務之間出現衝突，特別是在與非公約締約國締結引渡條約時尚未批准本公約，因而尚不受第 3 條規定約束的情況下。此種情況應依照不遣返原則適用相關引渡條約。(第 23 段)

同樣，締約國應避免將個人遞解至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們有可能遭受非國家實體的酷刑或其他虐待的另一國，這些實體包括為《公約》禁止的目的、非法採取行動造成劇烈疼痛或痛苦的團體，接受國在事實上無法控制或僅能部分控制它們，或無法阻止其行為，或無法遏制其不受處罰的現象。(第 30 段)

第 4 條

1. 締約國應確保將一切酷刑行為定為刑事犯罪。該項規定也應適用於意圖施行酷刑以及任何人共謀或參與酷刑之行為。

2. 締約國應考量前項犯罪之嚴重程度，處以適當刑罰。

一、《反酷刑委員會通過第二號一般性意見》(2008) (General Comment No. 2: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2 by States partie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2008)³⁴

³⁴ CAT/C/GC/2, 24 January 2008

締約國至少須依照《公約》第 1 條所界定之酷刑行為要素和第 4 條之要求，將酷刑行為列為可依照其刑法予以處罰之罪行。(第 8 段)

《公約》中的酷刑定義與國內法中納入之定義間嚴重出入及有罪不罰之現象會造成實際或可能的漏洞。在某些情況下，儘管用語相近，但國內法或司法解釋可能限定其含義。因此，委員會要求每一締約國確保政府所有部門皆會根據《公約》的定義來界定其國家義務。委員會確認，國內的定義如有擴大，只要包含《公約》標準並且至少依照《公約》標準予以適用，也有增進《公約》宗旨和目的之作用。委員會特別強調，第 1 條之用意和目的並不對作案者之動機進行主觀探究，而是必須根據有關情況進行客觀裁斷、必要調查與確認各級指揮人員與直接涉案者之責任。(第 9 段)

委員會確認，大多數締約國在其刑法典中將某種行為確認或界定為虐待。與酷刑相比，虐待可能在疼痛或痛苦的程度上有所差別，且無須證明施行虐待是基於不被容許之目的。委員會強調，若虐待過程中包含酷刑要素，僅以虐待罪名起訴有關行為亦違反《公約》。(第 10 段)

委員會認為，締約國若將酷刑行為界定為有別於普通攻擊行為或其它犯罪行為的罪行，可直接促進《公約》防止酷刑和虐待的總目標。為這種犯罪行為確立罪名和定義，有助於實現《公約》的目標，特別促使每一個人—包括作案人、受害人和廣大公眾—都認識到酷刑罪之特別嚴重的性質。將這種罪行列入刑法，還可：(a) 強調依照罪行的嚴重程度加以適當處罰之必要性；(b) 加強禁止規定的威懾作用；(c) 強化負責官員追查具體酷刑行為之能力；並且(d) 使公眾有能力和權力進行監督並於必要時質疑國家違反《公約》的行為與不行為。(第 13 段)

委員會已表明，如果國家當局或以官方身分行事或表面上依法行事的其他人知悉或有合理理由相信非國家官員或私人行為者正在

施行酷刑或虐待，卻未依照《公約》阻止、調查、起訴和處罰這些非國家官員或私人行為者，國家應承擔責任，其官員應視為違反禁止酷刑規定之行為者、共犯或根據《公約》為同意或默許此種行為而負責者。國家若未予以適當注意並進行干預以制止和制裁酷刑行為，並為受害者提供救濟，就會縱容非國家行為者，使他們違犯《公約》不許之行為且不受處罰。因此，國家的漠不關心或無所作為構成鼓勵和/或事實上准許。當締約國未能防止諸如強姦、家庭暴力、切割女性生殖器和販賣婦女等基於性別之暴力行為和保護婦女不受此種行為之危害，委員會即適用此項原則。(第 18 段)

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的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 第四十四屆會議(1992 年) (General Comment No. 20 - Prohibition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icle 7, 1992)

締約國在提交報告時應指出其刑法中關於懲處酷刑以及殘忍、不人道和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的規定，具體闡明對從事這類行為的政府官員或代表國家的其他人或私人一律適用的處罰規定。不管是教唆、下令、容忍違禁行為，還是實際從事違禁行為，凡違反第七條者均須承擔罪責。因此，不得處罰或加以惡整拒絕執行命令者。(第 13 段)

三、《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2010)

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在本國的刑法中將強迫失蹤行為列為犯罪。(第 4 條)

各締約國應考慮到強迫失蹤罪的極端嚴重性，對之給予相應的處罰。(第 7 條)

四、特別報告員 M. Cherif Bassiouni 教授所提供的特別報告
Final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Mr. M. Cherif Bassiouni,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resolution 1999/33, “The
right to restitution,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for victims of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E/CN.4/2000/62, 18 January 2000)³⁵

違反國際人權法及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構成國際法所規定的犯罪，即要求國家履行以下義務：起訴被指控違反國際人權法及國際人道法者、處罰上述違法者、在進行調查及起訴時，與有關國家及相關國際司法機構開展合作並向其提供幫助。

為了上述目的，有關國家應當使其國內法對國際法規定的犯罪實施普遍管轄，適用適當立法以應用引渡程序或者將違法者交付他國或國際司法機構，在追求國際司法正義時，提供司法協助及其他形式的協作，包括幫助及保護被害人及證人。（第 3 段）

第 5 條

1. 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在下列情況下對第 4 條所述之犯罪有管轄權：

(a) 犯罪發生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或在該國註冊之船舶或航空器上。

(b) 被控罪犯為該國國民。

(c) 受害人為該國國民，而該國認為應予管轄。

³⁵ 根據人權委員會第 56 次會議 2000 年 1 月 18 日日程的 11.d 項 作出的 1999/33 決議提交 (E/CN.4/2000/62)

2.締約國也應採取必要措施，確定該國對被控罪犯在其領域內，且該國並未依據第 8 條規定引渡至本條第 1 項所述之任何國家時，行使管轄權。

3.本公約不排除依照國內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轄權。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2010)

各締約國應考慮到強迫失蹤罪的極端嚴重性，對之給予相應的處罰。(第 7 條)

一、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定對下述強迫失蹤罪案行使管轄權：

(一) 犯罪發生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上，或發生在在該國註冊的船隻或飛機上；

(二) 指稱的罪犯為其國民；

(三) 失蹤人為其國民，締約國認為適當的情況下。

二、各締約國還應採取必要措施，在指稱的罪犯留在任何該國管轄的領土上時，確定對該強迫失蹤罪案的司法管轄權，除非該國根據其國際義務將嫌犯引渡或移交給另一國家，或移交給該國承認其管轄權的某個國際刑事法庭。

三、本公約不排除根據國內法行使任何其他刑事管轄權。(第 9 條)

第 6 條

1.任何締約國管轄之領域內如有被控違反第 4 條所述犯罪之人，該國應於檢視所獲情資根據情況確認有其必要時，將此人拘束，或採取其他法律措施確保此人留在當地。拘禁及其他法律措施應合乎該國法律之規定，但留置期間只限於進行任何刑事訴訟或引渡程序所需。

2.該締約國應立即對事實進行初步調查。

3.按照本條第 1 項被拘束者，應予協助，立即與最近之所屬國家代表聯繫。如為無國籍人，則與其通常居住國之代表聯繫。

4.任何國家依據本條將某人拘束時，應立即將此人已被拘束及構成拘禁理由通知第 5 條第 1 項所指之國家。進行本條第 2 項之初步調查之國家，應迅速將調查結果告知上述國家，並徵詢其是否有意行使管轄權。

一、《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2010)

對強迫失蹤罪的犯罪嫌疑人，任何締約國在研究了所掌握的材料後，確定情況屬實，案情需要，應將在其境內的嫌犯拘留，或採取其他必要法律措施，確保其不得潛逃。這種拘留和其他法律措施，應根據該締約國的法律規定，但在時間上僅限於確保對該人的刑事訴訟、移交或引渡程式所必需。

採取本條第 1 款所述措施的締約國，應立即展開初步詢問和調查，確定事實。該國還應將根據本條第 1 款所採取的措施，包括拘留與致使實施拘留的犯罪情節，以及初步詢問和調查的結果，通知第九條第一款中所指的締約國，並表明它是否準備行使其管轄權。

三、根據本條第一項被羈押的任何人，得立即與本人所持國籍國之最接近的適當代表取得聯繫，如他或/她為無國籍人，應與其慣常居住地國的代表取得聯繫。(第 10 條)

第 7 條

1.締約國如在其管轄領域內發現有被控違犯第 4 條所述任何犯罪之人，在第 5 條所指情況下，如不引渡，則應將該案移送各主管機關進行追訴。

2.各主管機關應根據該國法律，比照情節嚴重之犯罪案件處理。對第 5 條第 2 項所指之情況，起訴及定罪所需證據之標準絕不應寬於第 5 條第 1 項所指情況之適用標準。

3.任何人因第 4 條規定之犯罪而被起訴時，應確保其在訴訟所有階段皆可享有公平之待遇。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1、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法院得因民主社會之風化、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關係，或於保護當事人私生活有此必要時，或因情形特殊公開審判勢必影響司法而在其認為絕對必要之限度內，禁止新聞界及公眾旁聽審判程序之全部或一部；但除保護少年有此必要，或事關婚姻爭執或子女監護問題外，刑事民事之判決應一律公開宣示。

2、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

3、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

(一) 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

(二) 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

(三) 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

(四) 到庭受審，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權利；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

(五) 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作證；

(六) 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

(七) 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

4、少年犯罪之審判，應顧念被告年齡及宜使其重適社會生活，而酌定程序。

5、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

6、經終局判決判定犯罪，如後因提出新證據或因發見新證據，確實證明原判錯誤而經撤銷原判或免刑者，除經證明有關證據之未能及時披露，應由其本人全部或局部負責者外，因此判決而服刑之人應依法受損害賠償。

7、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第 14 條)

第八條

1.第 4 條所述各種犯罪應視為締約各國間現有之任何引渡條約所列可引渡犯罪。締約各國承諾將此種犯罪作為可引渡犯罪並列入將來相互間締結之引渡條約。

2.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之締約國，如收到未與其簽訂引渡條約之另一締約國之引渡請求，可將本公約視為引渡此犯罪之法律依據。引渡必須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定之其他條件。

3.不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之締約國，應在相互之間承認此種犯罪為可引渡犯罪，但引渡須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定之條件。

4.基於締約國間進行引渡之目的，應將此種犯罪視為不僅發生在行為地，而且發生在依據第 5 條第 1 項必須確定管轄權之國家領域內。

第九條

1.締約各國就第 4 條所規定之任何犯罪提出刑事追訴時，應儘量相互協助，包括提供為追訴而掌握之所有必要證據。

2.締約各國應依照相互間司法互助之條約，履行本條第 1 項規定之義務。

一、《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2010)

締約國在對強迫失蹤罪提起刑事訴訟方面，應彼此提供最大限度的司法協助，包括提供所掌握的訴訟所必需的全部證據。(第 14 條 1 項)

此種司法協助應符合被請求締約國國內法或適用的司法協助條約規定的要件，特別是被請求締約國可藉以拒絕提供司法協助的理由，或對提供司法協助附加的條件。(第 14 條 2 項)

各締約國應相互合作，並應彼此給予最大限度的協助，援助強迫失蹤的受害人，查找、發現和解救失蹤者，在失蹤者死亡的情況下，挖掘和辨認遺體，並將之送返原籍。(第 15 條)

第 10 條

1. 締約國應確保將禁止酷刑之教育課程與資料納入所有可能參與拘束、偵訊或處理任何形式之逮捕、拘禁或監禁者之一般或軍事執法人員、醫務人員、公職人員及其他人員之訓練中。

2. 締約國在發給前項人員之職務規則或相關指示中，應納入禁止酷刑規定。

一、**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 No. 20 - Prohibition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icle 7, 1992)**

締約國應告訴委員會，他們如何向廣大民眾傳播關於第七條禁止的酷刑和處遇的有關情況。涉及監護和對待遭受任何形式逮捕、羈押或監禁的任何個人的執法人員、醫務人員、警員以及任何其他人必須獲得適當指示和培訓。締約國應告訴委員會，他們下達了何種指示並提供了何種培訓，以及如何在這個人應遵循的活動規則和道德標準中貫徹第 7 條禁止等情況。(第 10 段)

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 No. 21 - Humane treatment of person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Article 10, 1993)

此外，委員會再次提及，報告應列明，是否已在負責喪失自由者的管理人員的指示和培訓中貫徹了各項適用的規定，並列明此類人員在履行職責時是否嚴守這些規定。還應具體指出，被逮捕或遭拘禁者是否可以知道這類訊息，是否可以利用有效的法律途徑，使其能確保這些規則得到遵守，確保在規則遭蔑視時可提出申訴，並在受到侵害後獲得充分賠償。(第 7 段)

三、《有效防止和調查法外、任意和立即處決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1989)

各國政府應禁止高級官員或公共當局授權或教唆其他人進行這種法外、任意和立即處決的命令。所有人員都有權利和義務違抗這種命令。對執法人員的培訓應強調上述規定。(第 3 段)

四、《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1990)

在培訓執法人員方面，各國政府及其執法機關應特別重視員警道德倫理和人權問題，特別是在調查過程中應注意其他不用武力和火器的辦法，包括和平解決衝突、理解人群行為和運用勸說、談判和調解方法以及技術手段，以便限制使用武力或火器。執法機關應根據具體事件檢查其培訓方案和實施程序。(第 20 段)

各政府和執法機關應對參與使用武力或火器場面的執法人員提供疏緩緊張情緒的指導。(第 21 段)

五、酷刑特別報告員 Nigel Rodley 的提議（摘要）(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Sir Nigel Rodley, submitted pursuant to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2001/62, E/CN.4/2003/68, 17 December 2002)

2002 年 12 月 17 日，特別報告員 Nigel Rodley 先生依照人權委員會 2001/62, E/CN.4/2003/68 決議所提供的特別報告。

有關國家應當採取以下有效措施防止受刑人之間的暴力行為，即暴力行為的調查報告、起訴並處罰有關責任者、給弱勢者提供保護性羈押措施、避免使其陷入雪上加霜的不當待遇之危險從而防止其遊離於獲得必要之外保護的監獄受刑人。應當考慮進行相關培訓專案，以促使監獄官員意識到採取有效步驟防止並救濟受刑人之間暴力行為的重要性，向其提供相關手段。為了符合《保護所有形式的被羈押或監禁者的原則》，受刑人應當根據其性別、年齡、犯罪的嚴重程度聯合國大會 43/173 決議。以及初犯/累犯、審前羈押/宣判後羈押加以區別羈押；(第 9 段)

應當向員警及安全官員提供培訓課程及培訓手冊，假如有關方面提出要求，應提供聯合國諮詢及技術支援。安全人員及執法人員應當符合《受刑人待遇的最低標準》、《執法官員行為守則》、《執法官員使用強制力及武器的基本原則》、《保護處於各種形式羈押及監禁的所有人員的原則》，上述指導方針應當翻譯為本國文字。在培訓中應當尤為強調不折不扣地絕對禁止酷刑的原則，執法人員有義務不服從上級官員令其實施酷刑的指令。有關國家的政府應當將其認可的國際標準轉化為國內保證，應當使執法官員熟知其應當遵守的規則；(第 11 段)

醫療人員應當根據《關於醫療人員，特別是外科醫生在保護被羈押人及受刑人禁止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方面所起作用的醫學倫理原則》開展工作。政府及職業醫療組織應當採取嚴格措施制止醫療人員直接或者間接參與酷刑行為。上述禁

止包括以下事項：例如檢查被羈押者是否“適合詢問”、涉及酷刑或不當待遇的程序、給受到不當待遇的被羈押者提供治療，以便使其能夠接受進一步的酷刑行為。在有些情況下，醫療人員停止提供適宜的治療措施，應當受到處罰。(第 12 段)

**六、特別報告員 M. Cherif Bassiouni 教授所提供的特別報告
Final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Mr. M. Cherif Bassiouni,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resolution 1999/33, “The
right to restitution,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for victims of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E/CN.4/2000/62, 18 January 2000)**

假如被害人提出申請，保證不再發生違法事件應當包括：

在國際人權法及國際人道法培訓及所有層次的培訓材料中準確描述有關違法行為；(第 10 段之 8)

要持之以恆地強化社會各界，特別是軍隊、安全機構及執法官員的人權培訓；(第 10 段之 14)

第 11 條

締約國應經常有系統的審查在其管轄領域內對遭受任何形式之逮捕、拘禁或監禁之人進行審訊之規則、指示、方法及慣例以及對他們拘束及待遇之安排，以避免發生任何酷刑事件。

第 12 條

締約國應確保有合理理由確信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已發生酷刑行為時，其主管機關立即進行公正之調查。

一、《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2010)

各締約國應確保任何指稱有人遭受強迫失蹤的人，有權向主管機關報告案情，主管機關應及時、公正地審查指控，必要時立即展開全面、公正的調查。必要時並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舉報人、證人、失蹤人家屬及其辯護律師，以及參與調查的人得到保護，不得因舉報或提供任何證據而受到任何虐待或恐嚇。(第 12 條第 1 項)

在有正當理由相信有人遭到強迫失蹤的情況下，即使無人正式告發，締約國也應責成本條第一款所指的機關展開調查。(第 12 條第 2 項)

各締約國應確保本條第 1 款所指主管機關：(第 12 條第 3 項)

擁有展開有效調查所需的權利和資源，包括查閱與調查有關的文件和其他材料；(一)有權進入任何拘留場所，或有正當理由認為可能藏匿失蹤者的任何其他地點，必要時事先取得司法機關的授權，司法機構也應儘快作出裁決。(二)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和懲處妨礙展開調查的行為。各締約國尤應確保，涉嫌犯有強迫失蹤罪的人不得利用其地位影響調查的進行，例如對投訴人、證人、失蹤者親屬或他們的辯護律師，及參與調查的人員施加壓力、恐嚇，或實施報復。(第 12 條第 4 項)

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 No. 20 - Prohibition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icle 7, 1992)

應將第 7 條與《公約》第 2 條第 3 項連起來看。締約國應在報告中指出其法律制度如何有效保障第 7 條所禁止的一切行為立即停

止以及進行適當救濟的情況。國內法必須確認人們有權因受到第七條所禁止的虐待之害提出申訴。為使救濟有效，有權機關必須就申訴迅速進行公正調查。締約國報告應提供關於補償受虐待者和申訴者須遵循的程序以及關於申訴者數目的統計數字和如何處理這些統計數字的情況。(第 14 段)

三、《有效調查和記錄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的原則》(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2000)

國家應確保立即切實調查關於酷刑或不當待遇的申訴和報告。即使沒有明示申訴，但如果有其他跡象顯示可能發生了酷刑或不當待遇，也應進行調查。調查員應獨立于涉嫌施行酷刑的人及其服務的機關，並應具有能力、公正無私。他們應能諮商公正的醫療專家或其他專家，或有權委託這些專家進行調查。進行此種調查所用的方法應符合最高的專業標準，調查結果應予公佈。(第 2 段)

如果因缺乏專門知識或懷疑存有偏見，或因顯然一貫存在濫用職權行為，或出於其他實質性理由，既定程序不足以完成調查，國家應確保通過獨立調查委員會或類似的程序進行調查。選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成員應為公認為公正無私、具有能力和獨立性的人。成員尤應獨立於任何涉嫌實施此種行為的人及其可能服務的機構或機關。委員會應有權取得調查所需的一切資料並應根據這些原則的規定進行調查。(第 5 段 (a))

在合理時間內提出一份書面報告，其中應包括調查的範圍、程序和評價證據所用的方法以及根據對事實的認定和適用的法律提出的結論和建議。報告編寫完畢後即應公佈。報告還應詳述查實確已發生的具體事件、據以作出這些判斷的證據並開列作證證人姓名，

但須予保護的證人，不公佈其身份。國家應在合理時間內對調查報告作出答覆，並酌情表明擬為此採取的步驟。(第 5 段 (b))

四、酷刑特別報告員 Nigel Rodley 的提議(摘要)(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Sir Nigel Rodley, submitted pursuant to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2001/62, E/CN.4/2003/68, 17 December 2002)

有關國家應當採取以下有效措施防止受刑人之間的暴力行為，即暴力行為的調查報告、起訴並處罰有關責任者、給弱勢者提供保護性羈押措施、避免使其陷入雪上加霜的不當待遇之危險從而防止其遊離於獲得必要之外保護的監獄受刑人。應當考慮進行相關培訓專案，以促使監獄官員意識到採取有效步驟防止並救濟受刑人之間暴力行為的重要性，向其提供相關手段。為了符合《保護所有形式的被羈押或監禁者的原則》，受刑人應當根據其性別、年齡、犯罪的嚴重程度聯合國大會 43/173 決議。以及初犯/累犯、審前羈押/宣判後羈押加以區別羈押；(第 9 段)

一旦被羈押人或者近親屬、律師提出酷刑指控，應當立即進行調查，除非指控明顯是無中生有，涉嫌政府官員應當立即停職，等待調查結果及隨之進行的法律及行政處分程序。假如庭審時被告人提出受到酷刑或者其他不當待遇，那麼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責任轉移給控方，控方應當證明被告人供述並非出自包括酷刑及類似不當待遇等非法手段。應當特別關注設立以下證人的保護計劃，即這些證人知曉所發生的酷刑或者其他不當待遇，而這些酷刑或者其他不當待遇可能會涉及有犯罪前科者。假如服刑中的受刑人面臨危險，應當將其轉移至另外一個羈押場所，以便對其採取特殊的安全措施。酷刑指控證明是確有此事，那麼應當向被害人或其近親屬提供補償。如果發生羈押時的死亡，或者被害人被釋放後不久發生死亡，應當由司法機關或者中立機關進行調查。如果有可信證據證明某人實施過酷刑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那麼應對其進行審判，假如其構成犯

罪，應當加以處罰。應當禁止通過諸如大赦、賠償法等形式豁免實施酷刑者刑事責任的有關法律條文。假如酷刑發生於官方羈押地，羈押場所負責人應當受到紀律處分或處罰。不得利用軍事法庭審判實施酷刑者。應當建立旨在接受投訴並進行調查的全國性獨立機構，例如全國委員會、擁有調查權及起訴權的官員懲戒全國委員會。對酷刑行為的指控應當立即加以處理，應當由與所調查、起訴案件的被害人沒有利害關係的獨立機構進行調查。此外，醫學鑒定工作應由司法機關或者其他獨立機關掌控，而不應當由諸如員警、處罰機構這些同樣的政府機構執掌。

在上述背景下，有關國家應當根據《有效調查並記錄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原則》的指導，將其作為打擊酷刑的有效工具；(第 10 段)

第 13 條

締約國應確保聲稱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遭到酷刑之個人有權向該國主管機關申訴，該國主管機關對其案件應進行迅速而公正之調查，並應採取步驟確保申訴人與證人不因提出申訴或提供證據而遭受任何不當處遇或恐嚇。

一、**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 (General Comment No. 20 - Prohibition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icle 7, 1992)**

應將第 7 條與《公約》第 2 條第 3 項連起來看。締約國應在報告中指出其法律制度如何有效保障第七條所禁止的一切行為立即停止以及進行適當救濟的情況。國內法必須確認人們有權因受到第七條所禁止的虐待之害提出申訴。為使救濟有效，有權機關必須就申

訴迅速進行公正調查。締約國報告應提供關於補償受虐待者和申訴者須遵循的程序以及關於申訴者數目的統計數字和如何處理這些統計數字的情況。(第 14 段)

二、反酷刑委員會第 3 號一般性意見：締約國對第 14 條的執行 (2012 年)(General comment No. 3 -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14 by States parties, 2012)³⁶

滿足賠償(satisfaction)應包括履行《公約》第 12 和 13 條之調查和刑事起訴義務，以及以下補救辦法：旨在停止繼續侵權之有效措施；認證事實並充分和公開揭露事實真相，但真相揭露限於不對受害者、受害者親屬、證人或以及出面干預以協助受害者或防止發生進一步侵權行為者造成進一步傷害或威脅其安全和利益；追查失蹤者的下落、尋查被綁架兒童的身份、尋找遇害者屍體、並按照受害者或受影響家庭已表達或可推想的願望協助發掘、辨認和重新安葬受害者的屍體；作出官方聲明或司法裁判；恢復受害者和與受害者有密切關係的人的尊嚴、名譽和權利；對侵權責任人的司法和行政制裁；公開道歉，包括承認事實和接受責任；紀念和悼念受害者。(第 16 段)

第 14 條

1.締約國應在其法律體制內確保酷刑受害者獲得救濟，並享有獲得公平及充分賠償之強制執行權利，包括儘量使其完全復原之方式。如果受害者因受酷刑致死，其受撫養人應有權獲得賠償。

³⁶ CAT/C/GC/3, 2012.

2.本條規定不影響受害者或其他人依據國家法律可獲得賠償之任何權利。

一、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 No. 20 - Prohibition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icle 7, 1992)

委員會注意到，一些國家對酷刑行為實行大赦。一般而言，這種大赦背離國家調查這類行為、保證在其管轄範圍內無人受此行為傷害以及保證將來不發生這類行為的責任。國家不得剝奪個人獲得有效救濟、包括獲得賠償和儘量恢復正常生活的權利。(第 15 段)

二、反酷刑委員會第 3 號一般性意見：締約國對第 14 條的執行(2012 年) (General comment No. 3 -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14 by States parties, 2012)³⁷

第 14 條規定締約國提供救濟之義務有兩個方面：程序性救濟和實體性救濟。為履程序性義務，締約國應頒布法律並設立申訴機制、調查機關或機構，包括獨立司法機關，這些機構能夠判決確定酷刑和虐待受害者是否有救濟權並對根據其判決取得救濟；締約國還應確保此機制之有效運作而且令所有受害者皆接近使用。在實體性方面，締約國應確保酷刑或虐待受害者獲得充分、有效救濟和賠償，包括補償和儘量使其得到完全地復原。(第 5 段)

上文第 2 段已指出，賠償包括以下五種形式：回復原狀(restitution)、賠償(compensation)、復原(rehabilitation)、滿足賠償(satisfaction)和保證不再犯(guarantees of nonrepetition)。委員會承認《關於嚴重侵犯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的受害者獲得補

³⁷ CAT/C/GC/3, 2012

救與賠償權之基本原則和準則》(《基本原則和準則》)所列舉之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下充分救濟的各項要素。賠償必須適足、有效和全面化。委員會提醒締約國，於確定向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救濟和賠償措施時，必須考慮每一個別案件的特殊性和具體情節，救濟應根據受害者的特殊需要予以設計，並與加害人犯下之侵權行為的嚴重性相稱。委員會強調，對於未來侵權行為而言，提供賠償具有內在預防和威懾效果。(第 6 段)

公權力機關、受委託執行公務之私人違反酷刑或虐待行為，或公務機關知曉或有合理理由相信非國家官員或私人已犯有酷刑或虐待行為，卻未按照《公約》履行預防、調查、起訴和處罰這些非國家官員或私人之責時，國家負有向受害者提供救濟的責任(第 2 號一般性意見)。(第 7 段)

「回復原狀」係指考慮每一個案件的具體情況，旨在回復狀態至違反《公約》行為發生之前受害者狀況的一種救濟形式。《公約》規定之預防義務，要求締約國確保不會造成受害者再度遭遇酷刑或虐待的危險境況。固然受害者或許認為回復已不可能，國家仍應向受害者提供獲得救濟的充分途徑。為使回復切實有效，締約國應致力著手處理造成侵權行為之結構性原因，包括性別、性取向、身心障礙、政治或其他見解、種族、年齡、宗教等任何形式的歧視和所有其他理由的歧視。(第 8 段)

委員會強調，單靠金錢賠償未必足以對酷刑和虐待的受害者提供充分救濟。委員會確認，就第 14 條規定之國家義務履行而言，締約國僅提供受害者金錢賠償是不夠的。(第 9 段)

第 14 條規定之及時、公正和適足之酷刑或虐待賠償權利是多層次的，不論是金錢的或非金錢的賠償，應足以填補酷刑或虐待所造成具經濟可評估之損害。包括：償付已支付的醫療費用，提供資金，支付受害者所需創後醫療或復原服務，確保盡可能地全面康復還原；提供彌補身體或精神傷害之金錢和非金錢傷害賠償；補償酷刑或虐

待所造成殘疾所導致之收入和潛在收入損失；補償就業和教育等機會的喪失。此外，締約國向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適足賠償，應包括法律或專家援助與提出救濟索賠所需之相關費用。(第 10 段)

委員會確認，向任何由於違反《公約》行為而受到傷害的人提供盡可能完全復原的途徑。包括醫療和心理、護理、法律和社會服務等整體之措施。就本一般性意見的理解，「康復還原」系指恢復功能或令受害者獲得因個人處境發生變化後所需要之新技能。復原力求使有關人員能獲得最大可能的自理能力和功能，並能對其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進行調整。使受害者康復還原之目標應盡可能恢復其獨立性、身體、心理、社會和職業能力；並使其能充分融入和參與社會。(第 11 段)

委員會強調，締約國提供「盡可能地完全復原」之義務，係指需恢復原狀並彌補受害者—其人生境況包括尊嚴、健康和自理能力可能由於酷刑的延續性影響而無法完全恢復—所遭受的傷害。此義務履行與締約國的可用資源無關，且不得推遲。(第 12 段)

為履行向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盡可能完全復原之義務，各締約國應採取長期綜合方針，確保向酷刑和虐待受害者提供現存適當且容易取得的專業服務。這些服務應包括：藉以評估和評價個人治療需求和其他需求的程序，該程序尤應基於《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的有效調查和文件記錄手冊》(《伊斯坦布爾議定書》)；這些服務可包括廣泛地跨學科措施，例如，醫療和身心復原服務、融入和社會服務、面向社區和家庭的扶助和服務、職業培訓與教育等。將受害者之體能和承受力納入考量的整體性復原方針至關重要。此外，受害者可能面臨再度受創的風險，他們對可令其回想起曾經遭受之酷刑或虐待的行為有切實恐懼。因此，需建立一個可提供協助之充滿信心和信任的氛圍，此項工作應優先安排。如有需要，提供之服務應當保密。(第 13 段)

《公約》規定提供復原服務的要求，並不排除在酷刑後立即向受害者提供醫療和心理服務之需要。提供初期護理並不意味已履行提供盡可能完全復原之義務。(第 14 段)

締約國應確保在國內設立有效的康復還原服務和方案，考慮受害者的文化、個性、歷史和背景，且不加歧視地提供予所有受害人，無論受害者在邊緣化或弱勢群體中的身份或地位如何，包括尋求庇護者和難民。締約國應立法設立具體機制和方案，向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康復還原服務。經具合格的獨立醫療專業人員進行評估之後，應儘快向酷刑受害者提供使用康復還原方案的途徑。進入康復還原計劃之條件，不應取決於受害者是否已尋求司法救濟措施。第 14 條規定之盡可能提供完全康復還原的義務，可通過以下辦法實現：由國家直接提供復原服務、通過資助取得私人醫療、法律和其他設施，包括由非政府組織管理的設施。如屬後者情況，國家應確保這些私人團體不受報復或恐嚇。受害者擁有選擇服務提供者的機會至關重要。所提供之服務，應使用相關語言。鼓勵締約國建立評估系統，評估康復還原方案和服務之有效實施情況，包括通過使用適當指標和基準。(第 15 段)

一國若不及時對酷刑行為指控進行調查、提起刑事追訴或進行與指控相關的民事訴訟，可構成事實上的拒絕救濟，從而違反該國在第 14 條下的義務。(第 17 段)

《公約》第 1 條至第 16 條規定具體的預防措施，締約國認為這些是防止酷刑和虐待的必要措施。為保證酷刑或虐待不再發生，締約國應採取措施，打擊對違反《公約》之侵權行為者有罪不罰的現象。這種措施包括：向公職人員印發關於《公約》條款，尤其是絕對禁止長官對下屬進行酷刑之有效明確指示。其他措施應包括下列一部或全部：對軍隊和保安部隊進行公民監督；確保所有司法程序符合正當程序、公平和公正之國際標準；加強司法機構的獨立性；保護人權維護者和法律、衛生以及幫助酷刑受害者的其他專業人員；

建立制度，對所有羈押場所進行定期和獨立監測；向執法官員以及軍隊和安全部隊優先和持續地提供人權法律培訓，包括涉及邊緣和弱勢群體之具體需要；向衛生和法律專業人員和執法人員提供關於《伊斯坦布爾議定書》的專項培訓；促進公職人員包括執法、懲教、醫療、心理、社會服務和軍事人員對國際標準和行為準則的遵守；審查並改革會助長或允許酷刑和虐待的法律；確保國家遵守《公約》第 3 條之禁止遣返的義務；確保個人或團體可獲得暫行性服務，例如向性別相關或其他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庇護場所。委員會指出，締約國採取此處所列措施，亦即履行《公約》第 2 條防止酷刑行為的義務。此外，保證不再發生的作為可為根治暴力的社會關係提供幫助。這種保證包括但不局限於：修改相關法律、打擊有罪不罰現象並採取有效的預防和威懾措施。(第 18 段)

根據《公約》第 2 條規定，締約國應制定「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轄下的任何領土內出現酷刑行為。」委員會在第 2 號一般性意見中明確表示，「締約國至少必須按照《公約》第 1 條所界定之酷刑行為要素和第 4 條要求，將酷刑行為定為刑法須加以處罰的罪行。」若締約國未能明確制定法律將《公約》義務納入，並因此導致酷刑和虐待未列入刑事犯罪，這種情況阻礙受害者行使和享有第 14 條所保障之權利。(第 19 段)

為落實第 14 條，締約國應制定法律，向酷刑和虐待受害者明確提供有效補救和獲得充足與適當救濟的權利，包括賠償和盡可能完全康復還原。這種法律必須允許個人行使這項權利並確保其獲得司法救濟。集體賠償和行政賠償方案可視為救濟形式，這種方案不得使個人獲得補救和救濟的權利失效。(第 20 段)

締約國應確保，本國國內法作出規定，遭受暴力或創傷的受害者應得到適當護理和保護，避免他們在為伸張正義和提供救濟的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中再度受創。(第 21 段)

《公約》要求締約國，一旦在其管轄下的任何領土內發現被指控的酷刑犯罪人，應對其起訴或引渡。為此須進行必要立法，使之成為可能。委員會認為，第 14 條並不僅限適用於在締約國境內遭受傷害的受害者或由締約國國民所為或針對締約國國民施加之傷害。委員會讚揚締約國為向在其領土之外遭受酷刑或虐待的受害者提供民事救濟所做的努力。當受害者無法在侵權行為發生國境內行使第 14 條所保障之權利時，這一點特別重要。事實上，第 14 條要求締約國確保所有酷刑和虐待受害者都能使用補救措施並獲得救濟。(第 22 段)

在結論性意見中，委員會闡明為確保第 14 條規定之受害人有權得到國家充分救濟。在這方面，委員會強調，締約國履行第 12 條、第 13 條與第 14 條之義務有重要關係。根據第 12 條，凡有合理理由確信，因締約國之作為或不作為致使在其管轄下任何領土內發生酷刑行為，締約國應立即進行有效和公正的調查；第 13 條規定，委員會在第 2 號一般性意見中確認，締約國應確保建立公正和有效的申訴機制。若第 12 條和第 13 條之義務未得保障，受害者就無法獲得充分救濟。申訴機制應為公眾所知曉並能加以利用，被剝奪自由者無論是被拘留、或安置在精神病機構中，還是在其他地方，皆可以經由相關機制進行申訴，例如熱線電話或拘留設施中的保密申訴箱；也包括弱勢或邊緣群體的人，包括表達或傳訊能力受限制的人。(第 23 段)

在程序方面，締約國應設立主管機構，通過法定程序執行最終判決，使酷刑或虐待受害者能夠獲得救濟，包括適當賠償和康復還原。(第 24 段)

為保障受害者之救濟權，締約國主管機關必須及時、有效和公正地調查和審查任何指控遭受了酷刑或虐待的案件。作為一項標準措施，這種調查應包括《伊斯坦布爾議定書》所規定之具獨立性的法醫對受害者之身體和心理進行檢查。(第 25 段)

對於啟動或完成對酷刑或虐待申訴的法律調查方面有不當拖延，會損害受害者享有之第 14 條保障之救濟權利，包括公平和充分賠償以及盡可能地完全康復還原。

儘管刑事調查可使受害者掌握有利的證據，但民事訴訟和受害者的索賠要求不應取決於刑事訴訟結束。委員會認為，在確定刑事責任之前，不應不正當地拖延民事賠償。民事責任應獨立於刑事訴訟而存在，應為此目的制定必要之法規和制度。若國內法律要求民事賠償應以刑事訴訟先行，不進行或不當拖延刑事訴訟構成締約國疏於履行《公約》義務。紀律處分不應被視為第 14 條所稱之有效補救辦法。(第 26 段)

根據第 14 條，締約國應確保在其管轄下之任何酷刑或虐待行為受害者獲得有效救濟。締約國有責任採取一切必要和有效措施，確保所有受害者都能得到救濟。這種責任包括，若有合理理由相信已發生酷刑或虐待的情況下，即使沒有申訴，締約國也有義務立即啟動程序，確保受害人獲得救濟。(第 27 段)

委員會積極鼓勵締約國承認委員會有權審理個人根據第 22 條提出申訴，以使受害人能夠提交來文並尋求委員會的意見。此外，委員會鼓勵締約國批准或加入《禁止酷刑公約任擇議定書》，以加強防止酷刑和虐待的預防措施。(第 28 段)

委員會強調，締約國必須積極確保受害者及其家人充分瞭解可以要求救濟之權利。在這方面，索賠程序應當透明。而且，締約國應提供扶助和支持，儘量減少申訴人及其代表的困難。民事訴訟或其他訴訟，不應加諸受害者難以承受的經濟負擔，令其無法或難以要求救濟。當現有民事訴訟無法提供受害者充分救濟時，委員會建議實施酷刑和虐待受害者便於近用的機制，包括設立國家基金，向酷刑受害者提供救濟。應採取特別措施，確保邊緣或弱勢群體人員的索賠權利。(第 29 段)

不論是否存在其他補救辦法，必須自始至終向受害者提供司法救濟，且應允許受害者參與其中。締約國應向缺乏必要資源無法提出申訴和索賠之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適當法律扶助。回應受害者、其律師或法官的請求，締約國還應隨時向受害者提供證明酷刑或虐待行為的所有證據。締約國不提供證據和相關資料，如醫學鑒定或治療記錄，會損害受害者提出申訴和要求救濟、賠償和復原的權利。(第 30 段)

締約國還應採取措施，防止侵犯受害人的隱私，保護受害人、其家人和證人，以及在涉及受害人權益之司法、行政或其他訴訟之前、期間或其後各階段代表受害人針對恐嚇和報復出面干預的其他人。未提供保護會阻礙受害者提出申訴，因而侵犯受害者尋求和獲得賠償和補救的權利。(第 31 段)

在保護人權方面，不歧視原則是一項基本而普遍的原則，對於解釋和適用《公約》而言具有根本意義。締約國應確保司法途徑和尋求與獲得救濟之可用機制；採取積極措施，確保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獲得救濟，不論種族、膚色、民族、年齡、宗教信仰或歸屬、政治或其他見解、原國籍或社會出身、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心理或其他身心障礙、健康狀況、經濟或土著地位、被拘留的原因，包括被指控犯有政治犯罪或恐怖行為者、尋求庇護者、難民或其他受國際保護的人，也不論任何其它地位，包括基於上述因素被邊緣化或弱勢化的人。(第 32 段)

應向具有同樣身份認同的群體例如少數群體、土著群體和其他群體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的集體賠償措施。委員會指出，集體索賠措施並不排除個人救濟權。

司法和非司法程序應適用對於性別敏感的程序，避免對酷刑或虐待的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與使其蒙受恥辱。關於性暴力或基於性別的暴力，以及被害人享有正當程序和公正司法保障，委員會強調，在任何訴訟中，無論是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訴訟，在確定受害者的救

濟(包括賠償)權方面,與基於性別的暴力相關的證據和程序規則必須對婦女和女童的證詞給予同等權重,正如對於所有其他受害者,亦應如此;而且,必須防止採用歧視性證據與對受害人和證人進行騷擾。委員會認為,申訴機制和調查程序必須採取具體考慮性別層面之積極措施,確保性暴力和性虐待、強姦、婚內強姦、家庭暴力、女性外陰殘割與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均能訴諸司法訴訟,尋求並獲得有效救濟。(第 33 段)

為避免對酷刑或虐待受害人造成二度傷害與使其蒙受恥辱,上段所述各項保護同樣適用於基於身分認同和群體(例如第 32 段在不歧視原則下列出的群體)而被邊緣化或弱勢化的任何人。在司法和非司法程序中,對任何此類人員必須使用敏感性做法。委員會指出,司法人員必須接受關於酷刑和虐待之各種影響,包括對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受害者影響之專項培訓,和關於如何對酷刑和虐待(包括表現為性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歧視)受害者使用敏感性做法的培訓,以防止再次傷害受害者與使其蒙受恥辱。(第 34 段)

委員會認為,對有關員警、監獄工作人員、醫務人員、司法人員和移民事務人員進行培訓,包括關於《伊斯坦布爾議定書》的培訓,是確保有效調查的根本措施。

此外,救濟工作所涉官員和工作人員應接受方法與策略的培訓,以防止酷刑或虐待受害者再次遭受創傷。這種培訓應包括,對於衛生和醫療人員而言,需要對基於性別的暴力和性暴力的受害者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視受害者說明實際可用的緊急醫療程序,包括身體和心理治療。委員會還敦促締約國在員警機關內設立人權辦公室,設立專責小組,配備接受過專門培訓的警員,處理基於性別和性暴力案件,包括對男人和男童的性暴力,以及針對兒童和種族、宗教、民族或其他少數群體和針對其他邊緣化或弱勢群體的暴力。(第 35 段)

此外，委員會強調，提供適當程序解決兒童的需要，同時考慮到兒童的最佳利益和兒童在所有涉及自身之事務中，包括在司法和行政訴訟中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根據兒童年齡和成熟度，對其意見給予應有重視。締約國應確保制定有利於兒童健康和尊嚴的、具有兒童敏感性的賠償措施。上述保障非常重要。(第 36 段)

取得救濟之權利的關鍵要素，有關締約國明確承認提供或判給受害人賠償措施，是對作為或不作為所造成違反《公約》之侵權行為的賠償。因此，委員會認為，締約國不得將實施發展措施或提供人道主義扶助作為對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救濟的替代品。

締約國不得援引國家發展水準作為未向酷刑受害者個人提供救濟的理由。委員會提請締約國注意，後續各屆政府和繼承國仍有義務保障救濟權的享有。(第 37 段)

《公約》締約國有義務確保救濟權確實有效。妨礙享有救濟權和有效執行第 14 條的具體障礙情形包括但不限於：國家立法不夠完善，在使用申訴和調查機制以及補救和救濟程序方面存在歧視；沒有採取適當措施，將指控的犯罪人逮捕歸案；國家保密法、舉證責任負擔和程序要求妨礙確定救濟權；訴訟時效、特赦和豁免權之法律規定；未向受害者和證人提供充足法律扶助和保護措施；連帶的恥辱，以及酷刑和虐待的生理、心理和其他相關影響。(第 38 段)

此外，締約國不執行由國內、國際或區域法院作出之關於向酷刑受害者提供賠償措施的判決，構成對救濟權的重大障礙。締約國應協調一致之機制，使受害者可執行跨國界判決，包括承認其他締約國法院判決的效力，並協助查封犯罪人的財產。

關於第 14 條義務，締約國應確保邊緣化和/或弱勢化群體成員在法律上和事實上可及時地、有效地使用救濟機制，避免有礙這些群體成員尋求和獲得救濟的措施，解決他們獲得救濟方面可能面臨之各種正式或非正式障礙。這類障礙例如，不適當的司法或其他程序，要求將損害量化，從而對有關個人在得到或使用金錢補償上造

成不相干之負面影響。正如委員會在第 2 號一般性意見中所強調，「性別是一個關鍵因素。女性身份與其他.....辨識特徵或地位相交織，決定著婦女和女童遭受或有風險面臨酷刑或虐待的方式及其後果。」締約國應確保，在保證所有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的人，包括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LGBT)，必須得到公正和平等對待並獲得公正和充分賠償、康復還原以及具體需要相對應之其他賠償措施。在提供上述措施方面必須重視性別要素。(第 39 段)

由於酷刑影響具有持續性，所以不應適用法定時效致使受害者應得的救濟、賠償和復原會因此被剝奪。對許多受害者而言，時間流逝並不會減輕傷害，在某些情況下，傷害會因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症候群而增加，須給予醫療、心理和社會支持。未獲救濟者往往難以得到這些支持。無論侵權行為何時發生，也無論侵權行為是由前政權實施或在其默許下實施，締約國應確保所有酷刑或虐待受害者都能獲得救濟。(第 40 段)

委員會一向認為，赦免酷刑罪與締約國在《公約》下的義務，包括第 14 條規定之義務不相容。委員會認為，赦免酷刑和虐待行為人對受害者獲得救濟的努力造成不可承受的障礙，並助長有罪不罰風氣。因此，委員會要求締約國取消對酷刑或虐待行為者的任何赦免。(第 41 段)

同樣，對任何國家或其代理人，或對非國家行為方之酷刑或虐待行為給予豁免，亦屬違反國際法。與對受害者提供救濟之義務直接衝突。在法律允許或事實上存在有罪不罰現象的情況下，受害者無法尋求充分救濟。令侵權者得以逍遙法外，系屬剝奪受害人充分享有第 14 條規定之權利。委員會確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向受害者提供救濟。(第 42 段)

委員會認為，締約國對限制第 14 條適用之保留與《公約》的目標和宗旨不相容。因此，委員會鼓勵締約國考慮撤回限制適用第 14

條的任何保留，以確保所有酷刑或虐待受害者皆可取得救濟和補償。
(第 43 段)

三、《有效調查和記錄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的原則》(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2000)

1. 有效調查和記錄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下稱酷刑或虐待)的目的包括下列各項：

(a) 澄清事實，確定並確認個人和國家對受害人及其家屬的責任；

(b) 查明防止此種情事再度發生所需的措施；

(c) 促進起訴和/或酌情對經查實應負責任的人採取紀律處分，並表明有必要由國家提供充分的賠償和補救，包括公平和充分的經濟賠償和提供醫療服務和康復的辦法。

第 15 條

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以酷刑取得之供詞為證據，但其供詞作為指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之證據者，不在此限。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2010)

各締約國應確保任何指稱有人遭受強迫失蹤的人，有權向主管機關報告案情，主管機關應及時、公正地審查指控，必要時立即展開全面、公正的調查。必要時並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舉報人、證

人、失蹤人家屬及其辯護律師，以及參與調查的人得到保護，不得因舉報或提供任何證據而受到任何虐待或恐嚇。(第 12 條第 1 項)

《聯合國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Guidelin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ors, 1990)

當檢察官根據合理的原因得知或認為其掌握的不利於嫌疑犯的證據是通過嚴重侵犯嫌疑犯人權的非法手段，尤其是通過拷打，殘酷的、不人道的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或以其他違反人權辦法而取得的，檢察官應拒絕使用此類證據。並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確保將使用上述手段的責任者繩之以法。(第 16 段)

第 16 條

1.締約國應承諾在該國管轄之領域內防止公職人員或任何行使公權力人員施加、教唆、同意或默許進行未達第 1 條所定義酷刑程度之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行為。特別是包含於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13 條涉及酷刑之義務，亦適用於其他形式之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2.本公約各項規定不妨礙其他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有關禁止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或有關引渡或驅逐之規定。

伍、國家義務之內涵要素

本公約規定締約國的義務與責任而非有關個人的責任。國家為其官員和其他人員的行為和不行為承擔國際責任，其中包括以官方身分或代表國家行事與配合國家行事、在其指揮或控制下行事的私

人承包商和其他人員。因此，每一締約國應禁止和防止在一切監管或控制的情況下發生酷刑和虐待行為，並對此種行為作出糾正，這些監管和控制的情況包括監獄、醫院、學校、負責照顧兒童、老年人、精神病人或身障人的機構、兵役單位以及如果國家不進行干預就會縱容和擴大私下傷害危險的其他機構和環境。

對特別有可能遭受酷刑的某些少數或邊緣化個人或群體加以保護，是防止酷刑或虐待義務的構成部分。締約國必須確保其法律實際上適用於所有人，而無論其種族、膚色、族裔、年齡、宗教信仰或教派、政治意見或其他意見、國族根源或社會出身、性別、性傾向、變性身份、精神或其他障礙、健康狀況、經濟狀況或原住民身分、基於任何原因被拘禁，包括政治罪行或恐怖主義行為的人、尋求避難者、難民或其他受到國際保護的人或具有任何其他地位的人。

防制的方法應包含直接防制與間接防制二者。前者意指從降低危險因素與消除可能的原因防止酷刑發生。透過訓練，教育與定期訪視羈押處所防止酷刑發生，注意會導致酷刑與虐待的原因，創造不會發生酷刑的環境。

間接防制之作用在面對已發生酷刑或虐待時，為避免其再發生，進行調查，訪談，譴責，起訴與處罰行為人，賠償受害者所採取之嚇阻行為。

委員會指出，國家漠視或對於非國家機關或非公務員之酷刑與虐待行為之不作為，可視為是鼓勵或許可其行為，而有構成防止義務之違反。換言之，國家或其公務員知悉或有理由確信有酷刑與虐待行為發生時，有義務採取注意義務為防止其行為之發生或繼續，對於行為並應依法訴追處罰。如有違反此防止義務，國家應負義務違反之國家責任外，有關公務員依其情形應視為共同正犯，教唆犯或幫助犯。

一般政治環境是考量上的重要因素。例如缺乏強烈的政治意志禁止酷刑或其他虐待，缺乏透明的治理方式，缺乏法治觀念等都是促成酷刑發生的因素。

社會與文化環境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例如社會普遍有暴力行為，對於犯罪一般民眾普遍支持採取強硬手段，也都是增加酷刑或虐待的危險因素。

法律環境是否有明確的法律禁止與處罰酷刑也是酷刑防制之重要要素。

非國家行為主體實施的酷刑和虐待

本公約打擊酷刑措施幾乎完全側重於國家是潛在加害者的情況。然而，有組織的武裝團體、私人軍隊和安全承包人員、傭兵、外國戰鬥人員和其他非國家行為主體越來越多地參與惡意干涉人權的行為，包括違反禁止酷刑和虐待行為。

此問題應聚焦討論的是，國家的善盡注意義務，以及在涉及對絕對禁止酷刑和其他虐待之處罰時，非國家行為主體在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直接義務。非國家行為主體雖不直接受人權條約的拘束，但是其他禁止酷刑和其他虐待行為的條約規定，則可能對他們有直接約束力。最明顯的是，國際人道法規定，絕對禁止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以與武裝衝突相關的理由，採用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待遇或處罰。³⁸

此外，任何採用酷刑或其他虐待行為之待遇或處罰可構成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或滅絕種族罪，依國際刑法都會受到起訴。因此，普遍禁止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待遇或處罰也是基於國際法一般法律原則所生的義務，即國際法院所指的「基本的人道考量」

³⁸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HRC/34/54, para. 44.

(elementary considerations of humanity)。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第一項，這些一般法律原則與條約和習慣一併構成獨立的國際法淵源。³⁹

此外，國家如將部分的執法、情報和軍事行動授權給私營軍事或安保公司。外包任務和職能可能從保護特定人員、物品和基礎設施，到運營尋求庇護者審理機構甚或整個犯罪嫌疑人和罪犯拘禁設施，甚至還可能包括使用強制力。在這種環境下，對個體承包人參與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國家不得推卸自己的國際法律責任。⁴⁰

《禁止酷刑和其它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公約》逐條注釋

國家義務

第 1 條

1. 為本公約目的，「酷刑」指為自特定人或第三人取得情資或供詞，為處罰特定人或第三人所作之行為或涉嫌之行為，或為恐嚇、威脅特定人或第三人，或基於任何方式為歧視之任何理由，故意對其肉體或精神施以劇烈疼痛或痛苦之任何行為。此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其他行使公權力人所施予，或基於其教唆，或取得其同意或默許。但純粹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之疼痛或痛苦，不在此限。

³⁹ Ibid. Para. 45.

⁴⁰ Ibid. Para. 47.

2.本條規定並不妨礙載有或可能載有適用範圍較廣規定之任何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

注釋：

國家必須在法制與政策上確認，在其管轄範圍內的任何地方杜絕及消弭一切形式的酷刑和其它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為國家義務。不只因為國家有確保人人生命神聖與身心完整性的固有義務，也是現代憲法乃至於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與眾多國際人權章典明白確認。禁止酷刑之規定不僅具有國際強行法之性質，也是法治國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所竭力確保之絕對規律。為此，履行本公約之規定為國家義務之最低標準。國家必須簽署、確認與履行國際法上合乎本公約目的與宗旨、且標準更高之公約或聯合國的決議。

國家有義務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政府當局與以官方身份行事之其他人直接犯下、教唆、煽動、鼓勵、默許或以其他方式參與或共同犯下第一條所界定之酷刑行為。國家應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政府當局已以官方身份行事或表面上依法行事之其他人同意或默許任何酷刑行為。

911 事件之後，許多國家試圖將某些逼供做法重新解釋為並未違反禁止酷刑和虐待規定，不斷出現試圖縮小被酷刑之定義範圍與求處論罪

的論點，例如過分強調所造成疼痛和痛苦的「嚴重性標準」，特別是要將造成嚴重傷害或長期損害作為考慮將行動視為違反禁止規定的前提條件。伴隨著這種趨勢的是出現了「強化審訊」或「壓力手段」等委婉術語以及越來越多地使用專門為避免在身體上留下痕跡而設計的方法，如壓力姿勢、剝奪睡眠、窒息刑、戴頭罩或蒙眼、長期保持身體不適狀態、精神壓力和破壞感觀穩定。毫無疑問，為達到脅迫、恐嚇、處罰或歧視目的有意給喪失能力者施加疼痛的行為一律構成酷刑，無論預期的疼痛或痛苦是由單一方法還是由多種手段和情況疊加造成，並且無論追求的目的是即時實現，在受害者重複或長期遭受疼痛或痛苦後才實現，還是因受害者忍受能力強或其他干預情況而無法實現。任何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無論是否正式構成酷刑，都是非法的，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正當理由可言。

國家必須依照本公約第一條定義酷刑，並據此定義履行本條以降之實體規定。鑒於酷刑形態隨環境時間而變動，本條文定義為例示而非列舉，更非窮盡式之規定。國家必須基於保障人身與心理完整性以及人性尊嚴之目的，調整酷刑定義之具體內涵以充分實踐本公約。例如國家必須嚴禁對於婦女進行之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強迫懷孕、強迫絕育或嚴重程度相當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保障兒童在任何處所免受任何形式之體罰或霸凌。或使人在國家權力支配下的人員進

行不具醫療意義也非為該人員的利益而進行之有損健康與尊嚴之實驗。

國家履行公約義務之保障對象除本國國民，也包括合法入境者、移徙勞工及其家屬、難民或非法入境者。適用在緊急狀態或武裝衝突。在任何狀況下，國家之義務不可減免。

鑒於被任意監禁、長期監禁或強迫失蹤者最容易遭致酷刑對待，國家必須確保無人遭致強迫失蹤或不受任何外在監督的監禁狀況。

國家必須提供受刑人或收容人必要且適足之醫療照護。未善盡此義務時往往危害其健康甚至生命。例如，缺乏緊急產科護理服務或拒絕提供流產服務往往導致孕、產婦死亡和生病，在某些情況下相當於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國家必須落實無歧視原則，凡基於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蓄意使人遭受劇烈疼痛和痛苦的行為也構成了一種獨特形式的酷刑。

第 2 條

1.締約國應採取有效之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出現酷刑之行為。

2.任何特殊情況，不論為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動盪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狀態，均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之理由。

3.上級長官或政府機關之命令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之理由。

注釋

國家有義務尊重、保障並履行國際人權及國際人權法，諸如：

- (1) 作為締約國一方的有關條約所規定的國際人權法；
- (2) 國際習慣法所具有的國際人權法；或者
- (3) 將國際人權及國際人權法併入其國內法，或者在其國內司法體系中直接適用國際法；
- (4) 使用適當、有效的司法及行政程序以提供公平、有效、迅速司法救濟的其他適當措施；
- (5) 當國際法與國內法存在差異的時候，確保適用能夠提供最大程度的保護；

國家應在法令規定與對公務人員培訓中明確重申禁止酷刑和虐待的絕對性和不可減損性，並對無論在任何地方發生的侵犯行為加以譴責，予以追訴。在解釋和執行禁止酷刑等規定時，應堅持其精神、目標和

宗旨，遵循其他相關法律原則，如人的尊嚴、不歧視和不遣返原則。
並且竭力遵守相關軟法標準與聯合國決議。

國家應毫無保留地批准旨在落實禁止酷刑和虐待規定的所有國際法律文書，特別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以及其他普遍性和區域性文書，包括旨在保護經歷特定類型脆弱性的個人的文書，如《兒童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作為一項普遍強行法，酷刑、奴役和滅絕種族等令人憎惡的做法被絕對禁止，這不是因為它們實際「效果」，而是因為它們會破壞受害者、施害者乃至整個社會的人性和誠信。國家有義務採取具體有效防止酷刑之措施，包括簽署任擇議定書成立國家防制酷刑機制。並追究造成酷刑之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國家應確保本國的立法至少符合國際法的要求，確保本國所有國家制度、法律程序和機構的政策和做法明確地以消除酷刑和虐待為導向。締約國有義務消除妨害杜絕酷刑和虐待之任何法律性或其它障礙；採取積極有效措施確實防止此種行為和再度發生。

若國家立法未能根據施加酷刑之嚴重性作出相稱制裁，若未能就行使普遍管轄權或者消除對酷刑和虐待方面的追訴限制或豁免，均違反國家義務。

應建立完全獨立的獨立、公正和無障礙投訴和調查機制，確保有效防止酷刑和虐待。各獨立國家、國際和非政府監測機制，包括國家防範機制和國家人權機構、防範酷刑小組委員會、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民間社會以及在武裝衝突情況下的紅十字委員會，應當完全可以進入有人被剝奪自由或面臨真正的酷刑或虐待風險的場所。獲得專門授權的人權機構和人道主義組織定期對拘留場所開展獨立監測是防止酷刑和虐待的最有效的保障措施之一。

國家應確保所有機構、法律機制與程序中都有針對酷刑和虐待的預防性保障措施。特別是，被剝奪自由者應有機會在被捕後立即通知其親屬、聯繫律師和就醫，並隨時訴諸獨立的投訴機制。

國家應廢除未經定期獨立審查的無限制行政拘留，廢除僅基於個人殘疾、法律行為能力、移民身份或類似適當標準實施的拘留或強制收容；

國家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販賣婦女及意圖營利使婦女賣淫的行為。

國家有義務確保身處任何形式拘禁中者，免受酷刑以及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處遇對待，並確保防制機制的有效與持續。特別保護被收容人，防止他們遭到工作人員和其他囚犯的暴力和虐待。應根據國家法律禁止單獨拘禁並將其規定為刑事犯罪。

國家有義務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的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國家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不致非法使用有關國際條約中界定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也要保護兒童免遭一切形式的色情剝削、性侵犯、誘拐、買賣或販運之害。

國家有義務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促使遭受下述情況之害的兒童身心得以康復並重返社會：任何形式的忽視、剝削或凌辱虐待；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或武裝衝突。此種康復和重返社會應在一種能促進兒童的健康、自尊和尊嚴的環境中進行。

酷刑之禁止是絕對的、不可減損的。國家有義務立法嚴禁執法人員以上級命令或非常情況，例如戰爭狀態或戰爭威脅、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國內政局不穩定或任何其他緊急狀態，作為施行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理由。也不可用來作為強迫失蹤的辯護理由。

不承認以脅迫式或酷刑防制進行的審訊，即使基於反恐的理由。無任何理由可以合理化實施酷刑、奴役和種族滅絕等被絕對禁止的侵犯行為。

對於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危險的人員，「不予遣返」這項原則同樣是絕對的。

國家不得對施行酷刑或虐待者進行特赦或給予任何形式的責任豁免。須追究指揮系統中各級官員教唆、同意或默許此種行為之法律責任。

國家必須為其官員和其他人員之行為及不行為造成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之情事承擔國家責任。例如在監獄、醫院、學校、負責照顧兒童、老年人、精神病人或身心障礙者的機構、兵役單位以及若國家不加干預會造成縱容和擴大酷刑和虐待行為時，國家應禁止、防止和糾正。若公務員或以法令受託執行公務者知悉或

有合理理由相信非國家官員或私人行為者正在施行酷刑或虐待，卻未依照《公約》阻止、調查、起訴和處罰這些非國家官員或私人行為者，國家應承擔責任。其官員應視為違反禁止酷刑規定之行為者、共犯或根據《公約》為同意或默許此種行為而負責者。

國家必須注意到社會邊緣化及其他脆弱性與遭受酷刑和虐待的風險增加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最貧窮和處境最不利的社會階層的個人被施以酷刑、虐待、任意拘留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拘留條件的可能性最大。嚴厲的刑罰政策和過度訴諸監禁導致暴力和監禁惡性循環，進而使最為邊緣化的個人幾乎無法逃避地陷入暴行的惡性循環當中。遭受社會經濟邊緣化的個人最有可能被脅迫承認自己未曾犯過的罪行，或遭受有組織犯罪分子和其他非國家行為體的虐待。窮人所面臨的污名化和邊緣化往往意味著他們的虐待投訴無法得到認真對待。拘留場所是典型的使人喪失權能的環境，權力不對稱、污名化和歧視以及其他形式的脆弱性都在這裡出現。被剝奪自由者往往被錯誤地視為被拋棄者，不應獲得同情、資源或保護，這使他們面臨程度更高的酷刑和虐待風險。國家有義務對特別可能遭受酷刑的某些邊緣化個人或少數群體加以保護。包括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囚犯之間的暴力行為，即暴力行為的調查報告、起訴並處罰有關責任者、給弱勢者提供保護性措施。

國家之上級機關不可庇護下級機關行為，個人應為其行為負責。同時，上級機關(包括公職人員)若知悉或應當知悉正在發生或有可能發生此種違禁行為，卻未採取合理與必要的預防措施，他們也不能逃避其因下級犯下酷刑或虐待行為所必須承擔之責任或刑事責任。抗拒被其認為非法的命令或在調查酷刑或虐待行為(包括上級官員所犯酷刑或虐待行為)過程中予以合作的個人，應保護其不致遭受任何形式的報復。

國家應制止消弭基於污名化、妖魔化或任何形式的邊緣化的暴力或歧視性政治言論、政策和做法。應作出特別努力，防範針對經歷特定脆弱性的個人的酷刑和虐待，例如社會少數群體成員和土著群體成員、非正常移民或其他非國民、患有身體或心理殘疾的個人、疾病患者或藥物依賴者、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雙性者以及更普遍的兒童、婦女和老年人。

國家必須防止針對兒童的酷刑和虐待，特別是在教育與收容機構內地體罰或虐待。

國家有高度的義務預防和消除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在各種背景下針對婦女、女童及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變性者和兩性人的實施的、構成酷刑和虐待的性別暴力和歧視。加深性別刻板觀念和加劇傷害的

現有歧視性法律、規範和體制框架；對受害者身心健康、享受其他人權情況及實現生活目標的能力造成的長期影響。

國家必須廢止所有支持對婦女進行歧視性、父權式壓迫的法律，包括將婚內強姦排除在強姦罪之外或對與受害者結婚的強姦犯予以赦免的法律，以及將通姦定為犯罪行為的法律。

健全、獨立與合格的人權機構有助於防範酷刑與虐待。除國家防範酷刑機構外，予以非政府組織和人權維護者提供一個安全、便利的行動環境有助於保護人權，特別是防止酷刑和虐待。國家必須堅持有效執行禁止酷刑和虐待規定的意志，提供國家酷刑防制機構足夠的資源和支持。

國家不得處罰拒絕實施或拒絕隱瞞等同於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的行為的抗命人員，也不得允許在此類命令得到服從的有關案件中以長官負責作為刑事辯護的藉口。

各國必須嚴加監管拘禁環境之外使用武力的行為，並且必須確保所有國家人員訓練有素、裝備得當且有指南可循，以防止在其轄域內發生任何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行為。這不僅

包括制定關於使用武力和武器的明確指南，而且還包括對武器（包括部署武力和“低致命性”武器的其他手段）進行系統的法律審查。

國家必須立法在所有公立和私立醫療機構中強制執行禁止酷刑的規定，方法諸如：宣佈在醫療環境中犯下的傷害行為可構成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對醫療做法進行管理，防止以任何藉口實施虐待行為；將預防酷刑和虐待的條款納入醫療政策之中。對醫療機構中的酷刑和虐待行為進行訴追，包括：查明導致傷害行為的法律、政策和做法；實施全國性預防機制，以系統地開展監測、接受申訴並啟動起訴。

絕對禁止對身心障礙者實施的所有強制性和未經同意的醫學干預，應立即終止僅以精神障礙者為由進行強制性精神干預的行為，財政資源短缺不是推遲執行的理由。應使用社區服務取代強制性治療和羈留。

第 3 條

1.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之危險，任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

2.為確定此等理由是否存在，有關機關應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在通常情況下，該國家境內是否存在一貫重大、明顯或大規模侵犯人權之情況。

注釋

對於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危險的人員，「不予遣返」這項原則同樣是絕對的。 國家有絕對且不可減損的義務在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時，不將該人員驅逐、移交或送回該國。

本公約締約國此後若考慮締結或加入引渡條約，應確保《公約》與該條約之間不存在任何衝突。

國家須以法制禁止透過引渡、驅逐或遣返手段使個人回到另一國時有可能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或有相當理由認為該人在該國將成為法外、任意或立即處決的受害者。國家在責任不將此人驅逐、遣返、引渡或以任何其他方式移送至該另一國，國家須建立有效法律和程序保障的重要性，並確認即使獲得外交保證，各國也不因此解除其依據國際人權、人道主義和難民法特別是不遣返原則承擔的義務；

各國家必須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或屬於其控制或權力範圍內的任何地區內、或在國家內註冊的船舶或飛機上，對任何人(包括請求或需要得到國際保護的人)適用不遣返原則，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視，也不論當事人的國籍或無國籍狀態及其在普通法和緊急狀態法之下的法律、行政或司法地位如何。如委員會在其第 2 號一般性意見第 7 段中所述，「其管轄的任何領土」這一概念包括任何領土或設施，必須用以保護在法律或事實上受國家控制的任何人，無論是公民還是非公民，不得有任何歧視。

國家須以法制禁止將人遣返到一個國家，而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她)在那裡會面臨人身自由和安全遭受嚴重侵犯的真實危險，如長久任意拘禁。只要酷刑風險是「可預見、針對個人、現實存在而且真實的」，便認定存在充分理由。

國家應考慮面臨遞解者可能遭受的其他形式的虐待，其性質是否可能改變以至構成酷刑。只要風險持續存在，均應獲准留在有關國家管轄、控制或權力範圍內的領土之內。不得在缺少正當法律依據和保障措施的情況下對當事人實施拘留。拘留應始終是需要依據個案評估並接受定期審查的例外措施。此外，若面臨風險者在被遞解至另一國家後會隨之面臨被遞解至有充分理由相信此人將有遭受酷刑危險的第三

國，絕不得予以遞解。在未經個人風險評估的情況下被驅逐到根據普遍標準被認為「安全」的國家。這種做法不符合禁止遣返要求，很可能構成集體驅逐。國家應明訂確定引渡、驅逐、遣送或送回個人的標準以及相關決定的程序。並且提供處理驅逐、遣返或引渡外國人的官員符合本公約規定之培訓。

雖然難民法規定的不遣返保護僅限於具有難民身份的人，並允許存在基於國家或公共安全考慮的例外情況，但基於威懾的處罰性和歧視性政策的廣泛使用破壞了禁止遣返原則，將越來越多的移民推向非正常路線以及偷運者和販運者的手中。且須注意，強制性長期或無限期刑事或行政拘留的條件往往令人震驚，並使非正常移民面臨遭受酷刑或虐待的重大風險。

國家不得於未經正當程序將被拘留者轉移到別的國家或領土接受以酷刑和虐待方式進行的審訊。提供「特別引渡」地便利，包括允許使用其領空和機場是違反國家義務行為。任何參與或唆使和支持此類行動的行為都可能導致其自身成為由此造成的侵犯人權行為(包括酷刑和虐待)的合謀者或者需要共同承擔責任。

被要求提供外交保證的國家往往有理由相信會實施酷刑和虐待的國家，而遣送國一般對查明接收國隨後是否遵守缺乏利益。因此，即便

結合返回後監測機制，外交保證本身也無法提供足夠的保護來避免這種虐待。因此，國家不得隨意以有外交保護為由，任意遣返。

國家可能會發現根據《公約》第3條承擔的義務與根據某多邊或雙邊引渡條約承擔的義務之間出現衝突，特別是在與非公約締約國締結引渡條約時尚未批准本公約，因而尚不受第3條規定約束的情況下。此種情況應依照不推回原則適用相關引渡條約。

第4條

1.締約國應確保將一切酷刑行為定為刑事犯罪。該項規定也應適用於意圖施行酷刑以及任何人共謀或參與酷刑之行為。

2.締約國應考量前項犯罪之嚴重程度，處以適當刑罰。

注釋

國內法應當將酷刑列為最嚴重的特定罪名。國家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在本國的刑法中將強迫失蹤行為列為犯罪。必須依照國家法律對這種虐待行為施以適當的刑事定罪和有效起訴。然而，許多國家的刑法對該罪行採用過於狹隘的定義，或者僅僅因為公職人員的同意或默許而未能對其施以刑事定罪。在許多情況下，國家立法未能就施加與酷

刑的嚴重性相稱的制裁、行使普遍管轄權或者取消酷刑和虐待方面的限制或豁免法規等問題作出規定。

國家處罰之酷刑以及殘忍、不人道和侮辱之處遇或處罰，包括教唆、下令、容忍違禁行為，還是實際從事違禁行為，凡違反第七條者均須承擔罪責。因此，不得處罰或加以惡整拒絕執行命令者。

由於國家法律中存在追究個人責任的正式障礙，例如適用時效法、集體大赦、豁免和其他管轄權障礙，這種缺陷阻礙追究酷刑行為者刑責，國家必須消弭這種有罪不罰的情形。。

應在本國法律中擬定刑事、民事、勞動或行政處分規定，以處罰和糾正使婦女受到暴力傷害的錯誤行為；應為遭受暴力行為的婦女提供運用司法機制的機會，並根據國家立法的規定為受到傷害的婦女提供公正而有效的補救辦法；各國還應使婦女瞭解通過這種機制尋求補救的各項權利；

各國政府應確保對執法人員任意使用或濫用武力或火器的情況，按本國法律作為刑事犯罪予以懲處。

國家須制定在調查酷刑行為負責的執法人員時予以之紀律措施之立法(例如停職)。

各國為逃避其國際義務，往往委託給其他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實施酷刑和虐待，或在明知的情況下容忍其他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的這種做法。例如將部分傳統公共事務外包給私營承包商，包括軍事、情報和執法職能。例如，外包業務可包括：保護特定人員、物體和基礎設施；對集會進行治安管控；運送和審訊嫌犯；管理移民設施、收容照料機構，甚至監獄和教養所。特別是在拘留設施人手不足和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出現了事實上將內部監獄管理委託給主要囚犯群體的趨勢。國家必須建立監督和問責機制來控制公司行為體和其他私營承包商，強制它們遵守人權，消除侵犯行為不受處罰的現象。

若國家立法未能根據施加酷刑之嚴重性作出相稱制裁，均為違反國家義務。

國家應追究未能阻止其下屬實施酷刑或虐待行為之指揮官和其他上級的責任。

911 事件之後，許多國家試圖將某些逼供做法重新解釋為並未違反禁止酷刑和虐待規定，不斷出現試圖縮小被酷刑之定義範圍與求處論罪的論點，例如過分強調所造成疼痛和痛苦的「嚴重性標準」，特別是要將造成嚴重傷害或長期損害作為考慮將行動視為違反禁止規定

的前提條件。伴隨著這種趨勢的是出現了「強化審訊」或「壓力手段」等委婉術語以及越來越多地使用專門為避免在身體上留下痕跡而設計的方法，如壓力姿勢、剝奪睡眠、窒息刑、戴頭罩或蒙眼、長期保持身體不適狀態、精神壓力和破壞感觀穩定。毫無疑問，為達到脅迫、恐嚇、處罰或歧視目的有意給喪失能力者施加疼痛的行為一律構成酷刑，無論預期的疼痛或痛苦是由單一方法還是由多種手段和情況疊加造成，並且無論追求的目的是即時實現，在受害者重複或長期遭受疼痛或痛苦後才實現，還是因受害者忍受能力強或其他干預情況而無法實現。任何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無論是否正式構成酷刑，都是非法的，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正當理由可言。國家必須予以追訴。

第 5 條

1.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在下列情況下對第 4 條所述之犯罪有管轄權：

- (a) 犯罪發生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或在該國註冊之船舶或航空器上。
- (b) 被控罪犯為該國國民。
- (c) 受害人為該國國民，而該國認為應予管轄。

2.締約國也應採取必要措施，確定該國對被控罪犯在其領域內，且該國並未依據第 8 條規定引渡至本條第 1 項所述之任何國家時，行使管轄權。

3.本公約不排除依照國內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轄權。

注釋

各國政府應確保經調查確定在其管轄下的任何領土上參與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者以及參與法外、任意和立即處決行為者送交法院追訴審判。或將這些人緝拿歸案後將其引渡到希望行使管轄權的其他國家追訴審判。不論違法者或者被害人國籍或身處何處，也不論在何處犯下此一罪行，國家均應予以起訴或引渡給相關國家管轄。

國家應在國內法對國際法規定的犯罪行為，包括酷刑，實施普遍管轄。或者將違法者交付他國或國際司法機構時，提供司法協助及其他形式的協作，包括幫助及保護被害人及證人。

為消除有罪不罰現象，在被控實施酷刑行為的犯罪人出現在其管轄下的任何領土時，將被控實施酷刑行為者交付起訴或引渡，無論此類行為在何處實施，並鼓勵其他國家也這樣做。鼓勵各國考慮建立或保持

適當的國家流程來記錄關於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指控，並確保依照適用的法律提供此類資訊。

各國必須防範和調查人販子和蛇頭等非國家行為體對難民、尋求庇護者以及其他非正常移民實施的酷刑和其他虐待行為。例如有組織的武裝團體、私營軍事和安保承包商、僱傭軍、外國戰鬥人員和其他非國家行為體在管轄範圍內參與惡意干涉人權的行為，包括違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規定的行為。

由於國家職能私有化的趨勢仍在繼續，許多國家未能充分監管此類服務或對承包商及在其指導和控制下的其他非國家行為體實施的域外侵犯行為確立管轄權，或對在其管轄權範圍內成立的公司行為體的域外行為履行其盡責義務。

國家必須提供立法、行政與司法相關措施，保護潛在受害者，特別是在家庭暴力、性暴力和性別暴力的背景下提供保護。並且消除對於此類暴力和虐待受害者的行為人進行法律追訴的障礙。若國家立法未能就行使普遍管轄權或者消除對酷刑和虐待方面的追訴限制或豁免，均是違反國家義務。

第 6 條

1.任何締約國管轄之領域內如有被控違反第 4 條所述犯罪之人，該國應於檢視所獲情資根據情況確認有其必要時，將此人拘束，或採取其他法律措施確保此人留在當地。拘禁及其他法律措施應合乎該國法律之規定，但留置期間只限於進行任何刑事訴訟或引渡程序所需。

2.該締約國應立即對事實進行初步調查。

3.按照本條第 1 項被拘束者，應予協助，立即與最近之所屬國家代表聯繫。如為無國籍人，則與其通常居住國之代表聯繫。

4.任何國家依據本條將某人拘束時，應立即將此人已被拘束及構成拘禁理由通知第 5 條第 1 項所指之國家。進行本條第 2 項之初步調查之國家，應迅速將調查結果告知上述國家，並徵詢其是否有意行使管轄權。

注釋

當有合理理由相信有人遭受酷刑或虐待時，國家應迅速開展公正的調查，以確保追究任何此類行為的責任，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責任。各國應進一步確保以任何未能阻止其下屬實施酷刑或虐待的罪名追究指揮官和其他上級的責任；

涉及強迫失蹤罪的犯罪嫌疑人，任何締約國在研究了所掌握的資料後，確定情況屬實，應將在其境內的嫌犯拘留，或採取其他必要法律措施，

確保其不得潛逃。這種拘留和其他法律措施，應根據該國家的法律規定。

國家應立即展開初步詢問和調查，確定事實。該國還應就相關措施，包括拘留和致使實施拘留的犯罪情節，以及初步詢問和調查的結果，通知相關國家詢問是否預備行使其管轄權。被羈押者，得立即與本人所持國籍國之最接近的適當代表取得聯繫，如他或/她為無國籍人，應與其慣常居住地國的代表取得聯繫。否則已行使拘留權之國家必須依法追訴。

國家國行使管轄權，調查身處其領土內被控有第 4 條所述罪行案件，對於可能也對被拘押者具有管轄權之其他國家有通報義務。

追訴酷刑行為者責任固然側重於國家公務人員為施害者的情況，國家也必須追訴非國家行為體之責，包括有組織的武裝團體、私營軍事和安保承包商、僱傭軍、外國戰鬥人員和其他非國家行為體。這些團體參與惡意干涉人權的行為，包括違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規定的行為。也包括以激烈仇恨性言論鼓動歧視與私刑暴力者。或是以國家安全和反恐名義提倡和煽動使用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之言論。

若有合理理由相信有人遭受酷刑或虐待時，各國應迅速開展公正的調查，以確保追究任何此類行為的責任，酌情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責任，並確保受害者獲得充分的補救和康復。

國家應調查未能阻止其下屬實施酷刑或虐待行為之指揮官和其他上級的責任。

第 7 條

1. 締約國如在其管轄領域內發現有被控違犯第 4 條所述任何犯罪之人，在第 5 條所指情況下，如不引渡，則應將該案移送各主管機關進行追訴。

2. 各主管機關應根據該國法律，比照情節嚴重之犯罪案件處理。對第 5 條第 2 項所指之情況，起訴及定罪所需證據之標準絕不應寬於第 5 條第 1 項所指情況之適用標準。

3. 任何人因第 4 條規定之犯罪而被起訴時，應確保其在訴訟所有階段皆可享有公平之待遇。

注釋

不引渡被控訴涉及酷刑行為人時，就必須毫不拖延地將其案件提交司法予以起訴。

國家必須確保被指控犯罪者在訴訟的所有階段都得到公平待遇的措施，包括得到法律諮詢的權利、在被證明有罪之前被推定無罪的權利、在法院面前平等的權利等；並且確保起訴和定罪所要求之證據標準在指稱犯罪者為在國外犯下酷刑行為的外國人案件中一體適用。

考慮到越來越多地實施暴力和虐待由私人進行，這些私人行為體不僅包括有組織犯罪分子和有組織武裝團體，還包括在國家官員的唆使或同意、默許下行事的公司行為體、私營承包商或公民個人。國家除須防止此類暴力，保護潛在受害者，特別是在家庭暴力、性暴力和性別暴力的背景下提供保護，更應對於加害者進行追訴。

第 8 條

1. 第 4 條所述各種犯罪應視為締約各國間現有之任何引渡條約所列可引渡犯罪。締約各國承諾將此種犯罪作為可引渡犯罪並列入將來相互間締結之引渡條約。

2. 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之締約國，如收到未與其簽訂引渡條約之另一締約國之引渡請求，可將本公約視為引渡此犯罪之法律依據。引渡必須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定之其他條件。

3.不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之締約國，應在相互之間承認此種犯罪為可引渡犯罪，但引渡須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定之條件。

4.基於締約國間進行引渡之目的，應將此種犯罪視為不僅發生在行為地，而且發生在依據第 5 條第 1 項必須確定管轄權之國家領域內。

注釋

根據《公約》第 8 條規定，國家必須承認酷刑為可引渡的罪行，以便於引渡涉嫌犯有酷刑行為和/或相關酷刑未遂罪行及共謀和參與酷刑罪者。也應該明訂酷刑為重罪，方可就在境外犯罪者列為可得司法追訴的對象。

國家必須對於涉及酷刑的行為者進行普遍管轄。並且透過條約或是司法互助機制，為引渡設立法律根據。

若欠缺引渡條約時，本公約可以直接作為要求引渡的法律依據。

本公約締約國此後若考慮締結或加入引渡條約，應確保《公約》與該條約之間不存在任何衝突。

國家不得在未經司法程序下將被拘留者轉移到別的國家或領土接受以酷刑和虐待方式進行的審訊。不得對這種所謂的「特別引渡」提供便利，包括允許使用其領空和機場，或者充當發生酷刑和虐待。

第 9 條

1.締約各國就第 4 條所規定之任何犯罪提出刑事追訴時，應儘量相互協助，包括提供為追訴而掌握之所有必要證據。

2.締約各國應依照相互間司法互助之條約，履行本條第 1 項規定之義務。

注釋

根據《公約》第 9 條規定，締約國之間必須在所有涉及酷刑罪及相關酷刑未遂罪、共謀和參與酷刑罪的刑事訴訟事項中相互提供最大限度的司法協助，包括提供所掌握的訴訟所必需的全部證據。

各締約國應相互合作，並應彼此給予最大限度的協助酷刑與強迫失蹤的受害人，查找、發現和解救受害者，在受害者死亡的情況下，挖掘和辨認遺體，並將之送返原籍。

各國有責任設法通過各種形式的合作，包括同其他面臨類似資源挑戰的國家交流最佳做法，盡可能彌合差距。

第 10 條

1.締約國應確保將禁止酷刑之教育課程與資料納入所有可能參與拘束、偵訊或處理任何形式之逮捕、拘禁或監禁者之一般或軍事執法人員、醫務人員、公職人員及其他人員之訓練中。

2.締約國在發給前項人員之職務規則或相關指示中，應納入禁止酷刑規定。

注釋

國家有義務就禁止酷刑、殘忍、不人道和侮辱之處遇與處罰事項，對於可能參與拘留、審訊或處理遭到任何形式的逮捕、扣押或監禁者之一般或軍事執法人員、醫務人員、公職人員及其他人員進行持續、針對性、強制性且合於聯合國設立之國際標準的訓練，培訓中充分將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相關決議與處理個人申訴之決議納入教育課程與資料。

執法人員和調查人員開展適當培訓，使他們具備適當的能力，從而確保其使用非脅迫性詢問技巧，避免在拘留場所以及在範圍更加廣泛的執法行動中過度使用武力。⁴¹

國家必須通過課堂教學和情境模擬訓練，就如何合法使用武力、武器和其他設備以及如何有效實施替代性非暴力方法和戰術向所有執法人員提供強制性的基礎、延續性、經常性培訓和行動指南。

培訓處理被拘留者或尋求庇護者問題之醫務人員，使其能早期揭露被害人酷刑的生理和心理痕跡。對司法和其他官員的培訓的應納入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思維與資訊。

所有可能從事涉及使用武力的工作的人員都應接受培訓，以避免任何過度的使用武力。參與訊問嫌犯的檢察官、調查員和其他人員應該拋棄基於供詞的調查，並接受法證的、非脅迫性詢問方面的專業培訓。

應為負責體檢、確定移民身份或對指稱虐待進行司法裁決的人員提供具體、專項、職能的培訓，內容包括根據《伊斯坦堡議定書》識別和記錄酷刑和虐待的跡象；促進公職人員包括執法、懲教、醫療、心理、社會服務和軍事人員對國際標準和行為準則的遵守。

⁴¹ 參考 聯合國(A/71/298)以及避免在拘留場所以及在範圍更加廣泛的執法行動中過度使用武力(A/72/178，第46段)。

國家須對執法機關和拘留設施工作人員教導女性、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囚犯的特殊情況和獨特需要以及提供符合《曼谷規則》等標準的培訓。

相關培訓要對於易遭致迫害與虐待的群體敏感，並納入反歧視的教導。要注意涉及婦女、青少年、少數族裔、宗教或其他少數性別群體等之任何培訓。且要定期評估相關培訓課程的效果。

國家應向民眾傳播關於禁止酷刑的相關資訊，鼓勵民眾參與監督防止執法人員進行酷刑或虐待。提供民眾有關法律保障資訊。

國家應禁止高級官員或政府授權或教唆其他人進行酷刑、殘忍、不人道和侮辱之處遇與處罰。所有人員都有權利和義務違抗這種命令。對執法人員的培訓應強調上述規定。培訓內容可包括培訓如何使用武力及所有可利用的現代科學犯罪調查方法，說明必須向上級部門舉報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案件。

在培訓執法人員方面，政府及其執法機關應特別重視員警道德倫理和人權問題，特別是在調查過程中應注意其他不用武力和火器的辦法，包括和平解決衝突、理解人群行為和運用勸說、談判和調解方法以及

技術手段，以便限制使用武力或火器。執法機關應根據具體事件檢查其培訓方案和實施程序。

政府和執法機關應對參與使用武力或火器場面的執法人員提供疏緩緊張情緒的指導。

司法人員必須接受關於酷刑和虐待之各種影響，包括對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受害者影響之專項培訓，和關於如何對酷刑和虐待(包括表現為性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歧視)受害者使用敏感性做法的培訓，以防止再次傷害受害者與使其蒙受恥辱。

國家必須為醫務人員提供適當的人權教育和資訊，向其宣傳禁止酷刑和虐待的規定，以及構成酷刑和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各種情況的存在、廣度、嚴重性和後果；宣傳尊重人身健全和人的尊嚴、尊重多樣性以及消除病理化和仇視同性戀態度的文化。

國家必須為從事兒童工作的所有人員開辦強制性培訓，包括關於《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有效調查和檔記錄手冊》以及發現、記錄和預防酷刑和虐待方面的培訓；

國家必須持續提高醫務和法律專業人員對酷刑和其他虐待進行有效醫療記錄的技能，包括為此就如何使用《伊斯坦堡議定書》和其他相

關材料，培訓法醫病理學家、醫學/法律人員、全科醫生、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衛生部官員和社會工作者；以及律師、國家調查人員、檢察官、法官、監獄官員、員警、移民官員、非政府組織活動者、國家人權委員會和類似機構的成員以及司法部、國防部和內政部的代表。

第 11 條

締約國應經常有系統的審查在其管轄領域內對遭受任何形式之逮捕、拘禁或監禁之人進行審訊之規則、指示、方法及慣例以及對他們拘束及待遇之安排，以避免發生任何酷刑事件。

注釋

國家必須確保何收容或拘留處所的工作人員尊重被剝奪自由者的尊嚴和人權，

逮捕監禁的最初幾個小時和單獨拘禁期間遭遇酷刑和虐待的風險最大。因此，必須在逮捕後立即實施預防性保障措施，包括通知被逮捕監禁者的家人或其指定之人，與律師和醫生取得聯繫，向被拘留者提供有關其權利、現有補救措施和逮捕理由的資訊。

拘留場所是典型地會使人喪失權能的環境，權力不對稱、汙名化和歧視以及其他形式的脆弱性都在這裡出現。被剝奪自由者往往被錯誤地

視為不應獲得同情、資源或保護，這使他們面臨程度更高的酷刑和虐待風險。在逮捕和監禁的早期階段，在單獨拘禁期間，更普遍的是在過度監禁政策下，這些風險最大。如果是具有特殊脆弱性的個人，與拘留有關的風險和邊緣化程度還將進一步惡化。國家必須特別關心這些被收容人的人權狀態。

國家必須根據《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囚犯待遇基本規則》、《維護所有遭受任何刑事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關於醫務人員、特別是醫生在保護被監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方面的任務的醫療道德原則》和《執法人員行為守則》諸規定經常地、有系統地、有效地檢討對遭到任何形式逮捕、拘留或監禁者進行審訊的規則、指示，方法和慣例，以及對其拘押和處遇的安排。竭力防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在監獄或收容處所發生。必須對於容易承受特別風險者之提供額外保障。

國家必須確保被剝奪自由者享有迅速通知和接觸律師、醫生、家庭成員之權利，以及涉及外國人案件中享有通知本國領事之權利。

國家必須對被拘留者執行強制性體檢制度，從而能夠在被拘留者進入、移送和離開拘留場所時，查明酷刑和其他虐待的身體和心理跡象，包括在羈押候審期間以及在監禁期間定期進行和應請求進行。

國家人權主管機構或監察機關應經常地、有系統地、有效、持續地訪察監獄和其他拘留地點、監督對男子和婦女進行之所有形式的暴力--包括對男子和婦女的各種形式之性暴力以及囚犯之間所有形式暴力。應容許合格獨立機構或機制，包括授權國際監督或非政府組織進行檢查。

醫療機構是一個特殊的環境，在醫療機構中，通過與其他特徵和結構或情境因素相互作用，酷刑和虐待的巨大且複雜的風險變成現實。在對社會心理殘疾患者進行強制入院和治療的情況中，風險尤其巨大。精神病患往往被剝奪了法律行為能力，無法參與或只能不充分地參與有關自身治療的決策。令他們容易遭致酷刑或虐待的風險，因此國家須特別關注其處境。

兒童自然會比成年人經歷更大的脆弱性，因為他們的發展階段以及他們逃避或應對源於自己所在環境的虐待的能力有限。這種脆弱性在允許或容忍家庭暴力、性虐待、童婚和童工的法律制度中變得更加複雜，在兒童被強行送入監獄、少年拘留中心、孤兒院或醫療機構的情況中更是特別嚴重。被剝奪自由的兒童更容易患上抑鬱症、焦慮症或其他心理創傷，比他人更容易出現自殺和自殘的情況。即使是短期拘留也會嚴重損害兒童的福祉和認知發展。除非作為最後手段並且符合兒童

最大利益原則，國家不得剝奪兒童的自由。國家更需要杜絕在教育處所對於兒童的體罰與精神虐待。

國家必須確保所有被拘留兒童定期接觸受過創傷知識培訓的兒科醫生和兒童心理學家，並在剝奪自由設施內部提供專門的醫學檢查，以發現酷刑和虐待案件，包括獲得法證評估；

國家必須考慮老年人在被剝奪自由或被安置在機構化照料場所時，普遍脆弱性往往因其在享受人權方面遇到系統性和結構性障礙而加劇，包括與身心障礙有關的歧視、年齡歧視、忽視和無視。國家須特別關注其處境。

身心障礙者在各種監管場所和監管場所之外面臨酷刑或虐待的風險有所增加。對患有身體、社會心理或智力殘疾的人士的虐待經常被系統性忽視，他們往往被剝奪了無障礙的投訴或溝通管道。非正常移民面臨遭受酷刑或虐待的高度風險。國家須特別關注其處境。

國家對於慫恿、煽動、命令、容忍、默許、同意或具體實施酷刑或虐待行為者，包括經認定發生違禁行為的任何羈押地點或任何其他剝奪人身自由地點的負責官員，必須追究其責任，移送司法，並按罪行輕重加以處罰；

第 12 條

締約國應確保有合理理由確信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已發生酷刑行為時，其主管機關立即進行公正之調查。

注釋

凡有合理理由認為已在拘禁環境之外發生構成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使用武力行為，各國即有義務立即展開公正的調查，以確保對任何此類行為充分追究責任，包括追究其行政、民事和刑事責任，並確保受害者獲得適當的補救和復原。

當國家有理由認為其管轄下已發生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行為時，必須保證有關機關立即進行公正調查。並且須啟動合乎聯合國標準，如《伊斯坦堡議定書》之調查程序，包括醫療檢查和法醫判讀之措施。

國家必須對醫療機構中的所有酷刑和虐待指控開展及時、公正和徹底的調查；如有充分證據，可起訴責任人並對其採取行動；為受害者提供切實補救和糾正，包括賠償措施、抵償和不再重犯的保證，以及恢復原狀、補償和康復。

國家應確保調查主管機關擁有展開有效調查所需的權利和資源，包括查閱與調查有關的文件和其他材料；有權進入任何拘留場所，或酷刑發生地點進行訪視調查。

國家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和懲處妨礙展開調查的行為。

國家必須確認人們有權因公約禁止之酷刑或虐待之害提出申訴與救濟有。國家機關對該申訴迅速進行公正調查。即使無明示申訴，但如果有其他跡象顯示可能發生了酷刑或不當待遇，也應主動進行調查。調查員應獨立、合格、公正無私。有權諮商公正的醫療專家或其他專家，或委託這些專家進行調查。進行此種調查所用的方法應符合最高的專業標準，調查結果應予公佈。

國家必須在合理時間就上述調查提出報告，其中應包括調查的範圍、程序和評價證據所用的方法以及根據對事實的認定和適用的法律提出的結論和建議。

某些情況的確可能會使禁止酷刑和虐待的確切範圍出現不確定性。如果在是否允許某一具體的作為、不作為或情況方面存在不確定性，國家必須本著基於善意，根據國際判例以及為其執行而制定的標準和準則中反映的目標和宗旨來解釋。如果仍有疑問，各國應始終謹慎行事，

因為有關作為、不作為或情況只有在其作為酷刑或虐待的條件被肯定地排除之後才能被允許。在涉及具有特定脆弱性的人員的情況下，需要特別的解釋性警告，這可能會增加違反禁止規定的可能性。

國家應確保所有機構、機制和程序中都有針對酷刑和虐待的預防性保障措施。特別是，被剝奪自由者應有機會隨時訴諸獨立的投訴機制。應廢除未經定期獨立審查的無限制行政拘留；廢除僅基於個人殘疾、法律行為能力、移民身份或類似適當標準實施的拘留或強制收容。

各國應建立有效的使用武力情況監測和報告制度，並應向公眾開放有關資料，包括關於使用武力的時間、物件和手段以及所致損害的統計資料。

第 13 條

締約國應確保聲稱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遭到酷刑之個人有權向該國主管機關申訴，該國主管機關對其案件應進行迅速而公正之調查，並應採取步驟確保申訴人與證人不因提出申訴或提供證據而遭受任何不當處遇或恐嚇。

注釋

國家必須保證，任何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個人有權申訴並有權要求案件得到迅速、有效和公正的調查，並保證申訴人和證人不受虐待或恐嚇。國家不應對酷刑行為者，因為大赦背離國家公正調查申訴與保證在其管轄範圍內無人受此行為傷害以及保證將來不發生這類行為的責任。國家不得剝奪個人獲得有效救濟、包括獲得賠償和儘量恢復正常生活的權利。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向受害者提供救濟。

國家有義務調查酷刑和其他虐待，因此，必須對酷刑和其他虐待進行有效的醫療和法律調查與記錄，以便防範此類犯罪、追究責任和提供補救，以及推動有關酷刑問題的國際法的一般應用。各國有義務制定並適用符合《伊斯坦堡議定書》的有效的證據收集程序，以履行其調查酷刑和其他虐待指控的義務。

國家必須確保勝任能力、公正、獨立、及時和徹底等調查的基本原則被載入法律，並得到有關部門和人員的正式承認與遵守，包括檢察官、辯護律師、法官、執法人員、監獄和軍事人員、法醫和保健專業人員以及負責被拘留者醫療事務的人員。

國家確保迅速將任何遭逮捕或羈押者當面移交法官或其他獨立司法官員，允許他們在整個羈押期的所有階段迅速和定期獲得醫療照顧和法律諮詢並允許他們的家人和獨立監測機構予以探視，是防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有效措施；

若有主管機關拒絕調查其案件的情況下，國家必須保證受害人可以取得其他有效的救濟辦法。處理相關申訴，必須對於婦女、兒童、特殊族裔、宗教、身心障礙者、少數性別群體等被害人容易受到傷害壓迫的身份保持敏感。並且確保申訴人不會受到妨礙人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之任何歧視與法律程序上之限制，以致於造成無法救濟之情形。要有效防止對於被害人在調查申訴過程之二度傷害。

對於涉及酷刑或虐待行為者，必須在調查期間立刻被停止職務和/或被禁止進一步與指稱的受害者接觸。應確保酷刑加害嫌犯不會利用其地位影響調查的進行，例如對投訴人、證人、被害人及其親屬或辯護律師，及參與調查的人員施加壓力、恐嚇，或實施報復。

國家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舉報人、證人、被害人與其家屬及其辯護律師，以及參與調查的人得到保護，不得因舉報或提供任何證據而受到任何虐待或恐嚇。未提供保護會阻礙受害者提出申訴，因而侵犯受害者尋求和獲得賠償和補救的權利。

國有須注意國家保密法、舉證責任負擔、訴訟時效之程序以及特赦與豁免權之法律規定妨礙受害者之權利救濟請求權。

國家應該對酷刑受害者進行有效之賠償或補贖。包括：停止繼續侵權之有效措施；認證事實並充分和公開揭露事實真相。唯真相揭露應限於不對受害者、受害者親屬、證人或以及出面干預以協助受害者或防止發生進一步侵權行為者造成進一步傷害或威脅其安全和利益。調查失蹤者的下落、尋查被綁架兒童的身份、尋找遇害者屍體、並按照受害者或受影響家庭已表達或可推知的願望協助發掘、辨認和重新安葬受害者的屍體；作出官方聲明或司法裁判；恢復受害者和與受害者有密切關係的人的尊嚴、名譽和權利；對侵權責任人的司法和行政制裁；公開道歉，包括承認事實和接受責任；紀念和悼念受害者。

國家必須為所有被剝奪自由的兒童建立適當和保密的申訴機制，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包括法律援助、資訊、代表和援助，保障遭受酷刑或虐待的被剝奪自由的兒童訴諸法律，並確保提交申訴的所有兒童的安全。

國家必須建立保障措施和機制，使醫務專業人員能夠在不受任何騷擾、恐嚇或報復的環境中，並以符合其保密義務的方式，報告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指控與證據。

第 14 條

1. 締約國應在其法律體制內確保酷刑受害者獲得救濟，並享有獲得公平及充分賠償之強制執行權利，包括儘量使其完全復原之方式。如果受害者因受酷刑致死，其受撫養人應有權獲得賠償。

2. 本條規定不影響受害者或其他人依據國家法律可獲得賠償之任何權利。

注釋

締約國應確保司法途徑和尋求與獲得救濟之可用機制；採取積極措施，確保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獲得救濟，不論種族、膚色、民族、年齡、宗教信仰或歸屬、政治或其他見解、原國籍或社會出身、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心理或其他身心障礙、健康狀況、經濟或土著地位、被拘留的原因，包括被指控犯有政治犯罪或恐怖行為者、尋求庇護者、難民或其他受國際保護的人，也不論任何其它地位，包括基於上述因素被邊緣化或弱勢化的人。

國家應確保任何的酷刑或虐待受害者獲得充分、有效救濟和賠償，包括補償和儘量使其得到完全地恢復康復還原。「康復還原」系指恢復功能或令受害者獲得因個人處境發生變化後所需要之新技能。復原力求使有關人員能獲得最大可能的自理能力和功能，並能對其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進行調整。使受害者康復還原之目標應盡可能恢復其獨立性、身體、心理、社會和職業能力；並使其能充分融入和參與社會。

復原服務和方案，考慮受害者的文化、個性、歷史和背景，且不加歧視地提供予所有受害人，無論受害者在邊緣化或弱勢群體中的身份或地位如何，包括尋求庇護者和難民。

國家必須為其公務人員的酷刑加害行為負責，從而有賠償受害者之責任。國家必須為酷刑受害者提供賠償，賠償包括以下五種形式：回復原狀、賠償、復原、滿足賠償和保證不再犯。賠償必須適足、有效和全面化。委員會提醒締約國，於確定向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救濟和賠償措施時，必須考慮每一個別案件的特殊性和具體情節，救濟應根據受害者的特殊需要予以設計，賠償應當與違法行為的嚴重性和所受損害的嚴重程度相稱。賠償，應足以填補酷刑或虐待所造成具經濟可評估之損害。

為履行政程序性義務，締約國應頒布法律並設立申訴機制、調查機關或機構，包括獨立司法機關，這些機構能夠判決確定酷刑和虐待受害者是否有救濟權並對根據其判決取得救濟；締約國還應確保此機制之有效運作而且令所有受害者皆接近使用。

國家必須回應性別暴力受害者迫切需要，提供盡可能使其完全康復的服務，包括和獲取生理和心理保健服務。應持續監測和分析婦女、女童及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變性者在獲取所有服務和使用康復方案方面遭受的歧視制訂運作規程、行為守則、規章和培訓模式；對關於獲取服務和使用申訴機制方面存在不平衡和直接或間接歧視的申訴進行記錄、調查、懲處和補救。

國家必須提供恢復與尊重受害者尊嚴、安全和健康保護之措施，以及防止加害者再犯和協助受害者康復及重新融入社區之有效且具體之措施。締約國確保不會造成受害者再度遭遇酷刑或虐待的危險境況。

締約國應致力著手處理造成侵權行為之結構性原因，包括性別、性取向、身心障礙、政治或其他見解、種族、年齡、宗教等任何形式的歧視和所有其他理由的歧視。

一國應當根據其國內法和國際法律義務，就可以歸責於該國的作為或不作為，向受害人提供賠償。個人、法人或其他實體被裁定對受害人負有賠償責任的，應當向受害人提供賠償，如果國家已向受害人提供賠償，國家應當向加害人求償。

公權力機關、受委託執行公務之私人違反酷刑或虐待行為，或公務機關知曉或有合理理由相信非國家官員或私人已犯有酷刑或虐待行為，卻未按照《公約》履行預防、調查、起訴和處罰這些非國家官員或私人之責時，國家負有向受害者提供救濟的責任。

國家應提供扶助和支持，儘量減少申訴人及其代表的困難。民事訴訟或其他訴訟，不應加諸受害者難以承受的經濟負擔，令其無法或難以要求救濟。向缺乏必要資源無法提出申訴和索賠之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適當法律扶助。當現有民事訴訟無法提供受害者充分救濟時，委員會建議實施酷刑和虐待受害者便於近用的機制，包括設立國家基金，向酷刑受害者提供救濟。應採取特別措施，確保邊緣或弱勢群體人員的索賠權利。索賠程序應當透明。

國家應向具有同樣身份認同的群體例如少數群體、土著群體和其他群體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的集體賠償措施。集體賠償和行政賠償方案可視為救濟形式，這種方案不得使個人獲得補救和救濟的權利失效。

在確定受害者的救濟(包括賠償)權方面，與基於性別的暴力相關的證據和程序規則必須對婦女和女童的證詞給予同等權重，正如對於所有其他受害者，亦應如此；而且，必須防止採用歧視性證據與對受害人和證人進行騷擾。委員會認為，申訴機制和調查程序必須採取具體考慮性別層面之積極措施，確保性暴力和性虐待、強姦、婚內強姦、家庭暴力、女性外陰殘割與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均能訴諸司法訴訟，尋求並獲得有效救濟。

救濟工作所涉官員和工作人員應接受方法與策略的培訓，以防止酷刑或虐待受害者再次遭受創傷。這種培訓應包括，對於衛生和醫療人員而言，需要對基於性別的暴力和性暴力的受害者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視受害者說明實際可用的緊急醫療程序，包括身體和心理治療。設立專責小組，配備接受過專門培訓的警員，處理基於性別和性暴力案件，包括對男人和男童的性暴力，以及針對兒童和種族、宗教、民族或其他少數群體和針對其他邊緣化或弱勢群體的暴力。

國家須提供適當程序以處理兒童被害人救濟問題。須考慮到兒童的最大利益和兒童在所有涉及自身之事務中，包括在司法和行政訴訟中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根據兒童年齡和成熟度，對其意見給予應有重視。

締約國應確保制定有利於兒童健康和尊嚴的、具有兒童敏感性的賠償措施。

國家不得援引國家發展水準作為未向酷刑受害者個人提供救濟的理由。

締約國不執行由國內、國際或區域法院作出之關於向酷刑受害者提供賠償措施的判決，構成對救濟權的重大障礙。締約國應協調一致之機制，使受害者可執行跨國界判決，包括承認其他締約國法院判決的效力，並協助查封犯罪人的財產。

國家應確保，在保證所有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的人，包括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LGBT)，必須得到公正和平等對待並獲得公正和充分賠償、康復還原以及具體需要相對應之其他賠償措施。在提供上述措施方面必須重視性別要素。

由於酷刑影響具有持續性，不應適用法定時效致使受害者應得的救濟、賠償和復原會因此被剝奪。對許多受害者而言，時間流逝並不會減輕傷害，在某些情況下，傷害會因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症候群而增加，須給予醫療、心理和社會支持。未獲救濟者往往難以得到這些支持。

國家應向受害者的直系親屬或受撫養人以及因出面協助深陷困境受害者或防止發生加害行為而受到傷害者提供康復服務。

赦免酷刑罪與締約國在《公約》下的義務，包括第 14 條規定之義務不相容。赦免酷刑和虐待加害人對受害者獲得救濟的努力造成不可接受的障礙，並助長有罪不罰風氣。國家應取消對酷刑或虐待行為者的任何赦免。對任何國家或其代理人，或對非國家行為方之酷刑或虐待行為給予豁免，亦屬違反國際法，與對受害者提供救濟之義務直接衝突。

第 15 條

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以酷刑取得之供詞為證據，但其供詞作為指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之證據者，不在此限。

注釋

國家必須確保除非用來證明被控施用酷刑者確曾刑訊逼供，不得在任何訴訟程序中援引任何經確定是以酷刑方式取得的供詞作為證據。此項禁止應擴大適用於通過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而取

得的供詞。一旦通過酷刑和虐待獲取的證據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在國家的任何訴訟程序中被採信，就無法有效保障禁止實施酷刑和虐待。國家必須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採納以酷刑取得之證詞口供作為證據，但這類口供證詞可為證明施用酷刑者逼供的證據。

若干國家將在第三國通過酷刑或虐待手段但並非通過與第一國合謀取得的證據視為可以採信。這是不可以接受的。無論如何，排除規則均適用。⁴²

儘管排除規則是明確的，但許多國家未能對查明和排除此類證據所必要的調查、法律證據和司法程序作出規定。其他一些國家只允許排除在酷刑下取得的證據，但排除規則同時也適用於其他形式的虐待。

當檢察官根據合理的原因得知或認為其掌握的不利於嫌疑犯的證據是通過嚴重侵犯嫌疑犯人權的非法手段，尤其是通過拷打，殘酷的、不人道的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或以其他違反人權辦法而取得的，檢察官應拒絕使用此類證據。並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確保將使用上述手段的責任者繩之以法。

⁴² A/HRC/25/60, paras. 23-30.

國家確保被控實施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的人員在此類指控待決期間以及被判有罪後，不得參與收押、審訊或處理任何遭逮捕、羈押、監禁或以其他形式被剝奪自由者。

政府行政部門包括收集、交流和接收資訊在內的一切行動均接受依據國家尊重絕對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義務，包括預防和阻止酷刑及其他虐待行為的義務；

確保在國家請求外國情報部門為其從事活動的情況下適用所有關於絕對禁止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法律標準。

在情報交流中，如果資訊源自系統性或普遍實施酷刑的國家，推定所收集或接收的資訊為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產物。如果知道或應該知道存在發生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行為的真實風險——即使沒有系統性實施酷刑，不要收集、交流或接收資訊，並確保明確向提供國表達反對此種待遇的立場。

第 16 條

1.締約國應承諾在該國管轄之領域內防止公職人員或任何行使公權力人員施加、教唆、同意或默許進行未達第 1 條所定義酷刑程度之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行為。特別是包含於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13 條涉及酷刑之義務，亦適用於其他形式之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2.本公約各項規定不妨礙其他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有關禁止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或有關引渡或驅逐之規定。

注釋

國家有義務禁止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行為，並將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行為定為非法。任何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無論是否正式構成酷刑，都是非法的，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正當理由可言。

第 10、第 11、第 12 和第 13 條所規定之國家義務以適用與調查、追訴、防止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行為，國家必須對於受害這提供前條規定之救濟保障。

國家有義務保障監獄或收容處所之被收容人權利。特別需要遵守並落實《曼德拉原則》。務必要解決監獄超收人犯、囚犯間暴力、對囚犯的

紀律措施、醫療和衛生條件、被收容人取得必須用品及未成年人拘留條件相關之問題。

陸、實踐檢視

(含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及個人申訴之決定)

一、個人申訴之決定

為了確保充分保護所有人免遭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與其他國際人權條約一樣，「禁止酷刑公約」規定，在符合一定的條件下，個人有權就締約國違反「公約」的一項或多項規定提出申訴。研讀委員會對於個人申訴之決定，有助於清楚的認識本公約在實踐上之標準。

依據禁止酷刑公約第 22 條規定: 1.本公約締約國得隨時依據本條，聲明承認委員會有權接受及審議在該國管轄下聲稱因該締約國違反本公約條款而受害者或其代表所送交文件。如為未曾聲明之締約國，則委員會應不予受理。

此為個人有權向反酷刑委員會提出申述之法律基礎，也是落實公約義務最重要之手段。前提為締約國須作聲明，反酷刑委員會使能取得受理申訴之權限。

本研究案搜尋歷年來反酷刑委員會對於個人申訴案作成之決定進行研析後，依公約第 1 條之第 16 條安排提出摘要說明有關規範違反之態樣，作為公約義務實踐之重要參考資料。

第 1 條 酷刑之認定

在 Rached Jaïdane 控訴突尼西亞案⁴³中，申訴人指控在拘留期間，締約國官員為獲取口供，採取蓄意行動，對申訴人實施酷刑和虐待行為⁴⁴，締約國未能採取一切有效措施以防止申訴人遭受此類行為。委員會注意到，申訴人提交了相關體檢報告，以及締約國未反駁任何指控。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收到的資料委員會得出結論認為，申訴人的指控必須予以充分考慮，他所遭受的虐待和酷刑是締約國官員以官方身份實施的，認定締約國違反公約第 1 條所指酷刑行為。⁴⁵

在 Bouabdallah LTAIEF 控訴突尼西亞案中⁴⁶中，委員會指出，沒有明顯的暴力痕跡並不一定表示未對當事人實施酷刑或虐待，締約國法官也不可因申訴人身上未表現出明顯的暴力痕跡（lack of obvious traces of violence）駁回申訴人的體檢要求。這種行為引起「嚴重的疼痛或痛苦，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可能留下非明顯但真實的暴力痕跡，⁴⁷亦違反公約第 1 條之規定。

⁴³ Rached Jaïdane v. Tunisia (CAT/C/61/D/654/2015)

⁴⁴ Ibid. 在該案中，締約國官員在拘留和審訊期間對申訴人實施的酷刑及虐待行為包括毆打（徒手及使用武器）、電擊、用煙頭燙傷、水刑（把頭按進水中）、強姦和死亡威脅。

⁴⁵ Ibid. Para. 7.4. See for example, *Jean Ndagijimana v. Burundi* (CAT//C/62/D/496/2012), para. 8.2; *Niyonzima v. Burundi* (CAT/C/53/D/514/2012), para. 8.2; *Kabura v. Burundi* (CAT/C/59/D/549/2013), para. 7.2, and *Damien Ndarisigaranye v. Burundi*(CAT/C/62/D/493/2012), para. 8.2.

⁴⁶ Bouabdallah LTAIEF v. Tunisia, Communication No. 189/2001, “Selected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Volume I”, United Nation Publication, p.143, para. 9.6。在該申訴中，突尼西亞政府否認對申訴人實施酷刑，稱一切行為均符合法律的正當程序。然申訴人稱，突尼西亞警方在其被拘禁期間，除酷刑外，還實施許多不人道的處罰，如禁止申訴人如廁、睡覺，進食等，且政府為隱瞞酷刑後留下的痕跡，會對遭受酷刑之人超時拘禁，以至於在審判前其遭酷刑的痕跡消失或不明顯，然後以沒有明顯的酷刑痕跡為由剝奪遭酷刑之人進行體檢的權利。

⁴⁷ Ibid. P. 144, para. 10.5.

在 Ennaâma Asfari 控訴摩洛哥⁴⁸案中，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的意見，在其所提到的聽證會上，申訴人和他的律師均未對酷刑提出投訴。委員會回顧其判例認為，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都應該得到迅速和獨立的法律和醫療援助，並應能夠與家屬聯繫以防止酷刑。⁴⁹考慮到根據申訴人的說法，他沒有獲得任何這些保證，在締約國沒有令人信服的資料對這些指控提出質疑的情況下，委員會認為申訴人在被逮捕、審訊和拘留期間所遭受的身體虐待和上海，違反公約第 1 條所指的酷刑。⁵⁰

另外在 Ashim Rakishev（父親）和 Dmitry Rakishev（兒子）控訴哈薩克斯坦案中，Dmitry Rakishev 在酷刑行為下身體上遭受的極度疼痛，拘留設施負責人雖然被迫叫來救護車，卻拒絕授權其住院治療。對此，委員會回顧「伊斯坦堡議定書」的規定，根據有關規定，酷刑方法可以指身心兩方面，可以包括剝奪基本需求，如食品、水和醫療服務等。⁵¹委員會認為，在 Dmitry Rakishev 病況危急時他沒有得到醫療援助，並拒絕讓他住院治療，可被認定為一名官員有意施加極度疼痛和痛苦以強迫他認罪。⁵²

第 2 條 防止酷刑行為之義務

同樣在 Ashim Rakishev（父親）和 Dmitry Rakishev（兒子）控訴哈薩克斯坦案中，委員會認為根據申訴人所稱遭到酷刑行為之情況，除非締約國能夠提供令人信服的其他解釋，否則應當認為締約國應對申訴人所遭受的傷害負責。在該案中，締約國對拘留設施負責人玩忽職守進行了調查，負責人被定罪和判刑，但未從服一天刑。在

⁴⁸ Ennaâma Asfari v. Morocco (CAT/C/59/D/606/2014)

⁴⁹ 關於締約國執行「公約」第 2 條的第 2 號一般性意見（2007 年）

⁵⁰ Supra note 25. Para. 13.2.

⁵¹ 「有效調查和記錄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手冊」，第 145(n)段。

⁵² Ashim Rakishev and Dmitry Rakishev v. Kazakhstan (CAT/C/61/D/661/2015), para. 8.2.

綜合申訴人的指控以及在證人的證詞以及法醫文件的佐證下，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沒有履行其防止和處罰酷刑行為之義務，違反公約第 2 條第 1 款。⁵³

同樣在 Rached Jaïdane 控訴突尼西亞案中，申訴人是在未向其出示逮捕令的情況下被捕，且未在法定期限內審查對其拘留之合法性。在審查拘留期間，剝奪了申訴人與家人聯繫以及其所需之醫療護理，但實施有關酷刑行為者卻未受到處罰。委員會認為這是對公約第 2 條第 1 款（與第 1 條一併解讀）之違反。⁵⁴另外在 Damien Ndarisigaranye 控訴蒲隆地案中，委員會補充，在羈押期間無法律援助或接觸家人，同樣係未採取必要立法或措施以防止酷刑行為⁵⁵。

除上述情況外，在 Déogratias Niyonzima 控訴蒲隆地案中，委員會呼籲締約國採取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防止出現酷刑和虐待行為，還應採取緊急措施，將所有拘留場所置於司法控制之下，防止其官員任意逮捕和實施酷刑。⁵⁶

第 3 條 引渡與遣返問題

本公約第 3 條關於可能遭受酷刑危險之判定：在諸多個人申訴中，申訴人常援引本公約第 3 條之規定，阻止締約國將該申訴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可能遭受酷刑危險的國家。例如 Mafhoud Brada 控訴法國案，委員會認為，國家在進行驅逐、遣返或引渡時，要確定有

⁵³ Ibid. Para. 8.3.

⁵⁴ Supra note 20. Para. 7.6. See example Jean Ndagijimana v. Burundi(CAT//C/62/D/496/2012), para. 8.4 ; E.N. v. Burundi(CAT/C/56/D/578/2013), para. 7.5.

⁵⁵ Damien Ndarisigaranye v. Burundi (CAT/C/62/D/493/2012), para. 8.3.

⁵⁶ Déogratias Niyonzima v. Burundi(CAT/C/53/D/514/2012), para. 8.3.

關個人是否會在他將返回的國家面臨遭受酷刑的風險。一個國家存在一貫嚴重，公然或大規模侵犯人權的情況並不構成一個充分的理由來確定一個人在返回該國時將面臨遭受酷刑的危險。同樣，沒有嚴重侵犯人權的情況並不意味著不能認為某人在其具體情況下有遭受酷刑的危險。國家必須有其他理由證明有關個人將面臨個人風險。⁵⁷

因此，委員會在決定某一申訴時，應當基於申訴人提供之確定的可預見、真實的和個人遭受酷刑風險之證據。⁵⁸根據其對「公約」第3條的一般性評論，對國家當局的調查結果給予「相當大的重視」。⁵⁹

在 C.T.和 K.M.控訴瑞典案中，委員會回顧其關於第3條的第1號一般性意見，指出委員會有義務評估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訴人如果被驅逐、遣返或引渡，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必須以超越理論或懷疑的理由評估酷刑風險，危險必須是個人的和存在的。在這方面，委員會在其申訴中確定，酷刑危險必須是可預見、真實的和個人的。⁶⁰

在實踐中，締約國會以各種理由將申訴人驅逐、遣返或引渡出該締約國，如在 Adel Tebourski 控訴法國案中，申訴人因在法國參與恐

⁵⁷ Mafhoud Brada v. France (Communication No. 195/2002), Selected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Volume I, United Nation Publication, P154, Para. 13.2; See for example, S.S.H.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254/2004), para. 6.3; Communication N° 238/2003, para 8.3; R.D.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426/2010), para. 9.2; A.M.A.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344/2008), para. 7.2; Ismaev v. Canada (communication No. 333/2007), para. 7.3; X. v. Kazakhstan (communication No. 554/2013), para. 12.3.

⁵⁸ Supra note 23. Para. 13.9.

⁵⁹ Supra note 34. Mafhoud Brada v. France (Communication No. 195/2002), para. 8.3.

⁶⁰ C.T. and K.M. v. Sweden (Communication No. 279/2005), para. 7.3, Selected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Volume I, United Nation Publication, P226. See for example, A.R. v. Netherlands (Communication No. 203/2002), para. 7.3; X. v. Kazakhstan (communication No. 554/2013), para. 12.5; A/53/44 and Corr.1, annex IX, para. 6

怖活動而被逮捕入監，在服刑結束後，法國政府以該申訴人對國內公共安全有危險為由，將申訴人驅逐出境。在這方面，委員會申明，本公約第 3 條的目的是防止一個人通過驅逐、遣返或引渡而面臨遭受酷刑的風險，以防止有充分理由認為他將是有可能遭受酷刑，不論該人的性格如何，特別是他對社會構成的危險。⁶¹換句話說，本公約第 3 條對締約國境內的任何人是提供絕對保護。一旦該人在第 3 條規定的條件下暗示有遭受酷刑的危險，締約國不能再引用國內關注的理由，認為其未能履行本公約規定的義務，保障其管轄範圍內任何人擔心如果他被遣返到另一個國家，將面臨遭受酷刑的嚴重危險。⁶²

第 4 條 酷刑立法與處罰

在 Rached Jaïdane 控訴突尼西亞案中，委員會認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對於已經發生多年，但尚未得到審理的酷刑行為案件，係違反該條第 2 款之規定。⁶³

在 Mr. Kepa Urra Guridi 控訴西班牙案中，申訴人稱對於實施酷刑行為之負責人刑罰上的實際減免或給予赦免都侵犯了受害者獲得有效司法都權利。⁶⁴對此，委員會回顧了先前的判例，即公約的其中一個目的是避免允許犯有酷刑行為之人逃脫處罰。委員會還回顧，第 4 條規定締約國有責任考慮到酷刑行為之嚴重性，對那些實施酷刑行為負責人實施適當的處罰。在該案中，對警衛施加較輕的處罰和給予赦免是不符合適當處罰之義務。同時，在刑事訴訟期間，警

⁶¹ Adel Tebourski v. France(Communication No. 300/2006), para. 8.3, Selected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Volume I, United Nation Publication, p.241.

⁶² Ibid. Para. 8.3.

⁶³ Supra note 20. Para. 7.7. 在該案中，委員會認為本案已發生 21 年多，但尚未得到審理，委員會建議突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 1999 年前所犯的酷刑行為被作為罪行起訴，處以與罪行嚴重程度相稱的刑罰」。

⁶⁴ Mr. Kepa Urra Guridi v. Spain(CAT/C/34/D/212/2002), para. 3.2.

衛雖然不受紀律處分，但對他們指控的嚴重性係應該進行紀律調查。因此，委員會認為違反了公約第 4 條第 2 款規定。⁶⁵

第 5 條 普遍管轄權的確立

在 Suleymane Guengueng 等 7 人控訴塞內加爾案⁶⁶中，申訴人稱其國家查德之前總統 Hissène Habré 在任期內實施高壓統治，謀殺和系統性的酷刑行為數不勝數，申訴人也是受害者之一，在 Habré 政權被推翻後，Hissène Habré 逃往塞內加爾避難。申訴人向塞內加爾的一名法官提出對 Hissène Habré 的指控，指控他實施酷刑行為。然締約國法院沒有就申訴人指控的案情做出裁決。⁶⁷對此，委員會回顧，根據公約第 5 條第 2 款，「每一個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以便在被指控的罪犯出現在任何案件中的情況下確立對此類罪行的管轄權，且不對其進行引渡」。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沒有採取「可能必要的措施」，且遵守這一義務的合理時限已大大超過⁶⁸，係違反公約第 5 條第 2 款之規定。

第 7 條

同樣，在 Suleymane Guengueng 等 7 人控訴塞內加爾案中，Hissène Habré 在逃往塞內加爾避難後便在塞內加爾被起訴違反禁止酷刑公約，被塞內加爾法庭因無管轄權而駁回。對此，委員會回顧，根據公約第 7 條，「締約國如在其管轄領土內發現有被控違犯第 4 條所

⁶⁵ Ibid. Para. 6.7.

⁶⁶ Suleymane Guengueng et al v. Senegal(CAT/C/36/D/181/2001).

⁶⁷ Ibid. Para. 9.3. 在完成司法程序後，塞內加爾最高上訴法院裁定「沒有任何程序條文賦予塞內加爾法院起訴和判決的普遍管轄權，如果在共和國領土內發現，則推定犯罪者或[酷刑]行為中的同謀...這些行為是外國人在塞內加爾境外實施的；Hissène Habré 在塞內加爾境內出現，無法證明對他提出的訴訟是正當的」。(“no procedural text confers on Senegalese courts a universal jurisdiction to prosecute and judge, if they are foun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presumed perpetrators of or accomplices in acts [of torture] ... when these acts have been committed outside Senegal by foreigners; the presence in Senegal of Hissène Habré cannot in itself justify the proceedings brought against him”)

⁶⁸ Ibid. Para. 9.5.

述任何罪行的人，在第 5 條所指情況下，如不進行引渡，則應將該案提交主管機關以便起訴」。委員會指出，起訴被指控的酷刑行為人的義務並不取決於先前是否有他的引渡請求。根據公約第 7 條，締約國僅在提出引渡請求時，可以選擇的替代方案 (a) 進行引渡或 (b) 將案件提交至它自己的刑事訴訟司法系統，其目的是防止任何酷刑行為逍遙法外。⁶⁹

委員會認為，締約國不能援引其司法程序的複雜性或源於國內法的其他理由來證明其未能履行公約規定的義務。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有義務起訴 Hissène Habré 涉嫌酷刑行為，除非它能證明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起訴。對於最高上訴法院作出不可上訴的決定，終止了在塞內加爾起訴 Hissène Habré 的任何可能性，委員會認為締約國違反公約第 7 條之義務。⁷⁰

第 11 條 定期審查之義務

在 *Ashim Rakishev and Dmitry Rakishe v. Kazakhstan* 一案中：「委員會注意到申訴人屬於《公約》第 11 條方面的訴求和締約國提供的打擊酷刑而採取措施的說明。但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提供的說明其努力防止和打擊酷刑的資訊是一般性的(of a general nature)，並不能表明它已採取具體措施(specific measures)防止在這一拘留地點發生酷刑問題。」⁷¹委員會似乎說明在《公約》第 11 條定期審查任何形式的逮捕、扣押或監禁的義務上，重點在於是否採取足夠具體、特定審查、監督措施以防止在逮捕、扣押或監禁時遭酷刑。⁷²

⁶⁹ Ibid. Para. 9.7.

⁷⁰ Ibid. Para. 9.8.

⁷¹ Supra note 29, para. 8.4. See example, *Taoufik Elaïba and Christian Act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Torture (ACAT-France) v. Tunisia (Communication No. 551/2013)*, para. 7.4.

⁷² See example, supra note 2, para.7.8.

在 *Damien Ndarisigaranye v. Burundi*⁷³ 一案中「由於明顯沒有任何機制監測申訴人被羈押在其中的國家情報局牢房」⁷⁴ 因此明顯違反《公約》第 11 條，其中委員會特別強調「委員會回顧關於布隆迪第二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在該意見中，委員會對以下情況表示關切：警方可羈押的時間過長；多次超過允許的羈押期；未能對被羈押者進行登記或未能確保此種記錄的完整；未能遵守對被剝奪自由者的基本法律保障；沒有法律條款保障經濟能力有限的人獲得就醫和法律援助的機會；過度使用審前拘留，不對其合法性和總時長的任何限制進行定期審查(見 CAT/C/BDI/CO/2，第 10 段)。」⁷⁵ 此等缺乏監督機制違反《公約》第 11 條，乃屬當然。除此之外，未監督監禁時的醫療情況，也會構成第 11 條監督義務的違反，在 *Ashim Rakishev and Dmitry Rakishe v. Kazakhstan* 一案即說明締約國沒有採取措施「向囚犯和被拘留者提供適當和有效的醫療護理，包括充分的藥品和由獨立醫生進行檢查」儘管委員會建議將衛生保健管理轉交給衛生部，拘留設施的醫生仍向這些設施的管理部門報告，因此不能被視為是獨立的。」⁷⁶ 從此說明可看出，除了醫療護理亦要求醫療之獨立性。

第 12 條 主動調查義務

委員會在多個案件指出迅速調查的重要性，即「委員會回顧指出，《公約》第 12 條還規定，調查應當是迅速和公正的，其中迅速調查最為重要，因為首先要確保受害者不會繼續遭受酷刑；其次，一般而言，除非所使用的方法會產生永久的或者嚴重的影響，酷刑、特別是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所留下的酷刑痕跡很快會消失。」⁷⁷

⁷³ Supra note 32.

⁷⁴ Ibid. Para. 8.4.

⁷⁵ Ibid.

⁷⁶ Supra note 29. Para. 8.4.

⁷⁷ See for example, supra note 29, para. 8.7; *Blanco Abad v. Spain* (Communication No. 59/1996), para .8.2.

委員會在多個案件說明調查必須是建立在公正(impartial)的前提下，亦即「如果可以證明沒有公正地開展調查，則調查本身不足以證實締約國遵守了《公約》第 12 條規定的義務。」⁷⁸

此外，在多個案件中，委員會要求調查應注意的細節即「刑事調查必須力求確定據稱行為的性質和情節(nature and circumstances)，並確定可能參與人員的身份。」⁷⁹

第 13 條 申訴後調查義務

委員會在多個案件表示《公約》第 13 條不要求受害者根據國內法下的程序就酷刑提起正式申訴，也不要求有提起刑事訴訟的明確意向聲明(express statement of intent)，受害者僅需提交事實使有關當局注意，就足以使締約國有關當局負有義務將其視為受害者的一種默示但已明確表達(a tacit but unequivocal expression)希望按公約即時與公正調查有關事實。⁸⁰

以下這兩個案例在說明締約國不得以缺乏醫學報告或沒有暴力跡象等為由拒絕申訴人的申訴，在 *Dhaou Belgacem Thabti v. Tunisia* 一案，申訴人向軍事法庭提起申訴，但是突尼西亞認為申訴人應使用正式的國內救濟手段，例如：向法院展示已向檢察官辦公室提交申訴的證明；展現明顯遭受不人道或酷刑待遇的跡象；提交醫學報告，因此，該案被法庭以申訴人沒有醫學報告為由無視，突尼西亞亦表示，法院有安排相關醫學檢查，是當事人自己沒有要求，委員會認為醫療檢查在相關指控後就應自動提供，無待當事人正式請

⁷⁸ See for example, supra note 29, para. 8.7; *Mr. Kostadin Nikolov Keremedchiev v. Bulgaria* (Communication No. 257/2004), para. 9.4.

⁷⁹ See for example, *F.K. v. Denmark* (Communication No. 580/2014), para. 7.7 ; supra note 20, para. 7.10.

⁸⁰ See for example, supra note 23, para. 10.6; *Dhaou Belgacem Thabti v. Tunisia* (Communication No. 187/2001), para. 10.6; *Blanco Abad v. Spain*, (Communication No. 59/1996), para. 8.6.

求，委員會最後認為突尼西亞違反《公約》第 13 條即時調查的義務。⁸¹在 *Bouabdallah Ltaief v. Tunisia* 一案，申訴人向預審法官 (examining magistrate) 申訴同時並要求醫學檢查，但是突尼西亞認為申訴人應使用正式的國內救濟手段，例如：向法院展示已向檢察官辦公室提交申訴的證明；展現明顯遭受不人道或酷刑待遇的跡象；提交醫學報告，因此，法院以沒有明顯受到暴力的跡象為由拒絕醫學檢查，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應在有虐待控訴後就安排系統性組織的醫學檢查 (arrange for medical examinations to be organized systematically when allegations of abuse were made)，委員會最後認為突尼西亞違反《公約》第 13 條即時調查的義務。⁸²

第 14 條 賠償義務

委員會在多個案件均強調《公約》第 14 條不僅承認獲得公正和充分賠償的權利 (the right to fair and adequate compensation)，而且要求締約國確保酷刑行為受害人獲得補救 (redress)，包括恢復受害者所遭受的所有傷害、賠償和康復，以及旨在確保不再發生侵權的措施，同時並應考量不同個案的狀況。⁸³

賠償義務往往與締約國內的制度息息相關，司法等相關制度對賠償義務的重要性，可用下列兩例說明：在 *Ashim Rakishev and Dmitry Rakishev v. Kazakhstan* 一案，委員會說明司法制度對於賠償義務的重要性，即「民事訴訟應獨立於刑事訴訟；並應為此確定必要的立法和機構」⁸⁴，該案中由於沒有獨立於刑事訴訟的民事訴訟，構成《公約》第 14 條的違反。另外也在 *Déogratias Niyonzima v. Burundi* 一案指出「締約國聲稱，有意履行康復和補救的義務，但

⁸¹ *Supra* note 23. Paras. 10.7-11.

⁸² *Ibid.* Paras. 10.7-11.

⁸³ See for example, *supra* note 32, para. 8.7; *supra* note 29, para. 8.9; *Déogratias Niyonzima v. Burundi* (Communication No. 514/2012), para. 8.6.

⁸⁴ *Supra* note 29. Para. 8.9.

委員會認為，未進行徹底、迅速和公正的調查排除了申訴人行使《公約》第 14 條規定的獲得補救的權利的可能性。」⁸⁵說明徹底、迅速和公正的調查對於賠償義務的重要性。

在 Rached Jaïdane 控訴突尼西亞案中，委員會認為申訴人持續遭受獲醫療證明之嚴重身心後果，但並未受益於任何復健措施，係被剝奪補救和賠償之權利。⁸⁶

第 15 條 酷刑所得證據不援引之義務

委員會在多個案件的審議中均強調，《公約》第 15 條的普遍性 (general nature/generality) 源自禁止酷刑的絕對性 (absolute nature)，因此，國家有義務確定 (ascertain) 是否其管轄範圍內的一切司法程序有供詞係源自酷刑的結果？⁸⁷

委員會強調，特定案件的證據及事實審議是根據締約國國內法院決定而非委員會，除非有拒絕正義、明顯任意性 (clearly arbitrary) 或明顯司法不公，例如審判法官明顯違反他的公正審判的義務 (the trial judge had clearly violated his obligation of impartiality) 的情形，⁸⁸這也意味委員會是在這種情況下，根據締約國提交的資料，特別是國內法院的審議情形來檢視來文是否有《公約》第 15 條之違反，另外，委員會也強調，申訴人必須表明 (demonstrate) 其指控是有根據的 (well-founded)。⁸⁹在 Mikel Kabikoitz Carrera Sarobe v. France 一案中委員會即說明「在本案中，根據提交委員會的證據，委員會無法

⁸⁵ Supra note 33. Para. 8.6.

⁸⁶ Supra note 20. Para. 7.12.

⁸⁷ Supra note 20. Para. 7.13; Mikel Kabikoitz Carrera Sarobe v. France (Communication No. 675/2015), para 10.2; Ms. P.E v. France (Complaint No. 193/2001), para. 6.3; Ms. G. K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219/2002), paras. 6.10.

⁸⁸ Ibid. Ms. P.E v. France (Complaint No. 193/2001), para 6.5; Ms. G. K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219/2002), para. 6.12.

⁸⁹ Ibid. Ms. P.E v. France (Complaint No. 193/2001), para 6.6; Ms. G. K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219/2002), para 6.11.

得出結論，內部程式明顯帶有任意性或司法不公。因此，委員會認為，提交給它的證據不能證明存在違反《公約》第 15 條的情況。」⁹⁰

在 *Rached Jaïdane v. Tunisia* 一案中，因突尼西亞未就是否有《公約》第 15 條的情況進行必要調查且突尼西亞沒有反駁當事人指控司法程序適用酷刑所生口供，因此，構成義務的違反⁹¹；在 *Ms. P.E v. France* 一案中則是認為法國行政與司法當局都檢視申訴人的指控並認為這些指控沒有充分被證實，委員會又考慮來文提交人的指控而認為無法指出締約國違反第 15 條。除此，亦有多案持類似見解⁹²，委員會如此之實踐下，即相當尊重國內法院的審議，除非締約國未履行確定(ascertain)義務，或是提交證據有拒絕正義、明顯恣意或明顯司法不公情形，或申訴人的有根據的指控未被反駁，否則似乎不容易做出締約國違反《公約》第 15 條的結論。

第 16 條 未達酷刑程度之的其它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的行為

《公約》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每一締約國應承擔防止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其他人在該國管轄的任何領土內施加、唆使、同意或默許進行未達第 1 條所述酷刑程度之的其它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的行為。特別是第 10、第 11、第 12 和第 13 條所規定之義務應適用，惟其中酷刑一詞則以其它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等字代替。」⁹³關於後段「特別是

⁹⁰ Mikel Kabikoitz Carrera Sarobe v. France (Communication No. 675/2015), para. 11.

⁹¹ Supra note 20. Para. 7.13.

⁹² Ms. P.E v. France (Complaint No. 193/2001), paras. 6.4-6.7. See for example, supra note 67, paras. 10.3-12; Ms. G. K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219/2002), paras. 6.11-7.

⁹³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16-1: "Each State Party shall undertake to prevent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other acts of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which do not amount to torture as defined in article I, when such acts are committed by or at the instigation of or with the consent or acquiescence of a public official or other person 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In particular, the

第 10、第 11、第 12 和第 13 條所規定之義務應適用」委員會在多個案子表示此並不代表未達酷刑程度之的其它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處罰的行為沒有公約 14 與 15 條等的適用，在 *Sergei Kirsanov v. Russian Federation* 一案即表示：「關於違反《公約》第 14 條和第 15 條的指控，委員會注意到上述條款的適用範圍僅涉及《公約》第 1 條意義上的酷刑，不包括其他形式的虐待。此外，《公約》第 16 條第 1 款雖特別提到第 10、第 11、第 12 和第 13 條，卻沒有提到《公約》第 14 和第 15 條。不過，締約國有義務就違反《公約》第 16 條的行為向受害人提供補救和公平、充分的賠償。源自《公約》第 16 條第一句的積極義務包括有義務就違反《公約》該條的行為向受害人提供補救和賠償。」⁹⁴

二、國家報告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一、美國第一次合併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 摘要

雖然美國的初次國家報告遲交五年，委員會對美國之以下行為表示歡迎：

1. 國內有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之廣泛法律保障，及當局為使其機關和實踐透明所為之努力；
2. 酷刑受害者對賠償有廣泛的法律追訴權；
3. 對防止可能受酷刑的外國人予以遣返引進行政規章；
4. 以行政命令建立跨機關工作小組，確保能協調聯邦努力朝向遵守美國為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的義務；

obligations contained in articles 10, 11, 12 and 13 shall apply with the substitution for references to torture of references to other forms of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⁹⁴ *Sergei Kirsanov v. Russian Federation* (Communication No.478/2011), para.11.4. See for example, *Hajrizi Dzemajl et al. v. Yugoslavia* (Complaint No. 161/2000), para.9.6; *Besim Osmani v. Serbia* (Communication No. 261/2005), para.10.8.

5. 代表團保證無論何時在其境內發現受到指控之酷刑行為人，將承擔普遍刑事管轄權；

6. 對委員會做出確保本公約被遵守之真正保證。

委員會對美國之以下狀況表示關切：

1. 未能以符合本公約第 1 條的規定將酷刑訂為聯邦罪；
2. 對本公約第 16 條提出保留，因會限制本公約之適用已屬違反；
3. 警察虐待平民的案件數量，及監獄發生虐待案，(包括受刑人之間的暴力情況)數量，且上述虐待似乎多出於歧視；
4. 執法人員及監獄人員對女性被羈押者及受刑人性侵及給予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
5. 使用電擊戒具及約束座椅做為約束措施可能違反本公約第 16 條；
6. 監獄超收率過高；
7. 於公眾場合使用長條鐵鍊將受刑人的腳鐐串在一起；
8. 基於《監獄訴訟修訂法》(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受刑人提起法律救濟的訴訟，嚴格限於身體受有傷害之要件；
9. 將未成年(少年犯)與成人受刑人安置於通常監獄人口中。

委員會對美國提出以下建議：

1. 應依本公約第 1 條規定之內容訂定聯邦酷刑罪，並撤回對本公約的保留與基於此保留公約所作解釋與理解；
2. 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對違反本公約之人，進行調查、起訴及處罰，特別是基於歧視目的或性需求；
3. 廢棄電擊束帶及約束椅做為約束被羈押者的方法，其使用實已構成本公約第 16 條之違反；

4.確保未成年犯不被安置於通常監獄人口中。

二、美國第二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 摘要

委員會注意到美國為聯邦制度之國家，且在國際法下負有義務在國內法層面完整實施本公約義務。委員會記得美國在 2001 年 11 月 26 日所通過的聲明，在當中譴責 911 恐怖攻擊對國際和平及安全之恐怖威脅，以及應據聯合國憲章採取所有手段與之戰鬥，委員會議瞭解該攻擊對締約國許多民眾所造的巨大痛苦。委員會也知悉締約國正在一個複雜的法律及政治背景下，從事保護其安全以及其公民的安全及自由的行動。

委員會歡迎美國所做的聲明，聲明表示根據本公約的義務，所有美國政府機構（包括其承包者）的公務員，被禁止在任何時間、任何處所從事酷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亦禁止為殘忍、不人道或貶抑性的待遇或處罰。對於美國聲明其不會將個人移送到其相信很可能遭受酷刑的國家感到滿意，而這同時也做為一個政策被適用在那些被美國所拘留或控制的個人上。

委員會樂見美國之以下法律頒佈：2003 年旨在解決羈押機關中的性侵之《消除監獄內妨害性自主法》(Prison Rape Elimination Act)；禁止對任何身體被締約國所控制的人，為殘忍、不人道及貶抑性待遇及處罰的 2005 年《羈押待遇法》(Detainee Treatment Act)。

委員會亦歡迎美國在 2000 年通過國家拘留標準(National Detention Standards)，對國土安全部之羈押場所制訂最低標準；委員會亦注意到美國有意願制訂新的具普遍適用的軍隊戰場手冊，當中對情報偵訊技巧的規定將確保完全與本公約相符。

雖然，美國聲稱「每個本公約定義的酷刑行為，在現存聯邦或州法下都屬非法」，但倘若美國法(United States Code)第 2340 節與第 2340A 節限制了聯邦對於域外案件中酷刑行為的刑事管轄，委員會

在對前次美國的結論及建議所表示關於欠缺對酷刑罪刑化的聯邦法在本公約第 1 條規定之下表示關切。委員會對於存在對受羈押人在境外施以酷刑之案件，但依境外刑事酷刑的規定卻無任何起訴發動感到遺憾。委員會重申在先前對締約國所提的建議，應制定符合本公約第 1 條對酷刑處以適當刑罰的聯邦刑事法，以履行本公約所規定，預防並消除任何形式會導致嚴重身體及精神疼痛及痛苦行為之義務。締約國應確保本公約所禁止的心理酷刑行為，不限於締約國在批准本公約時所提出聲明中提到的「延長心理傷害」，而是構成一個更廣泛的導致嚴重心理痛苦行為的種類，不論是延長或持續。締約國應依其對域外酷刑行為的聯邦刑法，調查、起訴並處罰加害者。

委員會對於締約國所提出，基於「武裝衝突法是屬於有排他適用之特別法(*les specialis*)」之主張，認為本公約不適用在武裝衝突時間的意見，以及不同條約的重疊將損壞本公約消除酷刑之宗旨的主張表示遺憾。就此，締約國應承認並確保本公約適用在任何時間、地點，不論戰時或武裝衝突，及在任何其所管轄的領域，以及本公約規定的適用，依據本公約第 1 條第 2 項及第 16 條的規定，不損害任何其他國際文件的規定。

委員會注意到本公約許多規定都提到「(締約國的)管轄領域內」。委員會重申過去所提到的觀點，即此概念包括所有締約國事實上有效控制的區域，不論是以軍事或行政當局來行使此控制。委員會對締約國認為，公約規定只限於其法律上所擁有的領土適用的觀點感到遺憾。締約國應承認並確保，本公約之規定適用在其所管轄的領域，以及公約規定所有被締約國當局所有有效控制的個人所享有，不論控制的類型及位在世界什麼地方。

委員會關切地注意到締約國並不總是對在美國以外所管轄領域被羈押之人予以登記，以剝奪其有效免於受酷刑之保障。就此，締約國應將所有在其領域內羈押的人予以登記，以作為預防酷刑的措

施。此登記應包括被羈押人的身份、被羈押日期、時間及地點、執行該羈押政府人員的身份、羈押理由、獲准進入羈押處所的日期及時間、被羈押人獲准羈押時的健康狀態及後續變化、訊問的時間及處所與人員姓名，連同釋放或移轉至其他羈押處所的時間及日期。

委員會對於有人指控美國正在建立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無法進入的秘密羈押設施感到關切。據稱被羈押人被剝奪基本的法律保障，包括關於他們所受待遇的監督機制及關於被羈押的審查程序。委員會亦對有人指控被羈押在這些設施的人之期間可能被延長，並面臨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貶抑性的待遇感到關切。委員會對締約國這些關於秘密羈押設施及其情報活動所採取的「不予置評」政策(“no comment” policy)感到遺憾。就此，締約國應確保沒有任何人被其事實上控制之秘密羈押設施所羈押。將人在這樣的條件下羈押本身，就構成本公約的違反。締約國應調查並揭露所有這一類設施，任何他們已經建立的當局之存在，以及被羈押人被施以如何待遇的資訊。締約國應公開譴責任何秘密羈押之政策。委員會記得，不論情報活動的下令者是誰、性質或地點為何，都屬於締約國之行為且完全會產生其國際責任。

委員會對於關於締約國所涉及強迫失蹤的報告表示關切，並對締約國認為此措施並不構成酷刑形式之一的態度表示遺憾。締約國應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來禁止並預防在其所管轄的所有領域內的強迫失蹤，並起訴及處罰加害者，因為這種實踐本身即構成本公約之違反。

即便締約國曾聲明：在美國法中，對明文的禁止酷刑規定沒有克減(derogation)，以及無論如何對於所犯之酷刑，都不會尋求理由及提出抗辯。委員會對於欠缺明確法律規定，以確保對酷刑之禁止，在任何狀況下都不被克減，尤其是在 911 事件後，持續感到關切。締約國應採取明確的法律規定來實施在國內法中沒有任何可能克減地絕對禁止酷刑原則。對本原則的克減，與本公約第 2 條第 2 項不

一致，並不能限制刑事責任。締約國亦應確保施以酷刑的加害者，適當地被起訴及處罰。締約國應確保任何偵訊規則、指示及方法，對絕對禁止酷刑原則構成克減，並確保國內法不會有規定阻礙酷刑加害者的完全刑事責任。締約國應立即、全面及公正地調查任何以任何方式授權、默許或同意其下屬犯酷刑行為的資深軍事及行政官員之責任。

委員會對於締約國認為本公約第 3 條所規定的不推回義務，不適用在被羈押在其領域外的人上感到關切。委員會對於締約國在沒有任何司法程序下，將嫌疑犯引渡回美國且面臨酷刑風險的作法表示關切。締約國應將不推回的保證，適用在所有被其拘留的被羈押者，尤其是那些被情報機構所拘留的，以及適用在為符合本公約第 3 條義務，面臨真實酷刑風險的國家。締約國應該永遠確保嫌疑犯質疑推回決定的可能性。

委員會對於締約國使用「外交保證」或其他種保證，來確保個人如果被其他國家驅逐、返回、移轉或引渡時不會被施以酷刑感到關切。委員會亦對於這些程序的秘密性感到關切，包括倘若這些保證被遵守時能在適當的地方被使用時，欠缺司法監督及欠缺其他監督。委員會認為在決定依據本公約第 3 條不推回義務的可適用性時，關於未制度上違反本公約規定的國家，以及經完整對每個個案的事實進行審查後，締約國應僅能依據「外交保證」。為獲得此保證，締約國應在適當司法監督機制及有效返回後監督安排下，建立並實施獲得此保證的明確程序。締約國應對委員會提供所有在 911 事件後被給予保證案例之詳細資訊。

委員會注意到對人在欠缺指控下的無限期羈押本身，即構成本公約的違反，因而對於在關達那摩灣被延長期間，且在無充分法律保障且無羈押正當理由之司法監督下的被羈押人感到關切。締約國應停止在關達那摩灣留置任何人，並關閉此羈押設施，允許被羈押人得使用司法程序或盡可能予以釋放，並確保他們不會被返回至那些

他們可能面臨被酷刑風險的國家，以確保與其在本公約下的義務相符。

委員會對於締約國提供給其執法或軍事人員的資訊、教育及訓練不適當，及未聚焦在所有公約條文，特別是在禁止酷刑及避免殘忍、不人道及貶抑性待遇或處罰的不可克減性質。就此，締約國應確保對於執法或軍事人員（尤其是涉及偵訊嫌犯之人員）的教育及資訊，在規律的基礎上進行。並應包括偵訊法則、指示及方法的訓練，以及如何辨認酷刑、殘忍、不人道或貶抑性待遇特徵的特別訓練。這些人員亦應被指示對這些案件予以報告。締約國應定期評估對執法及軍事人員所提供的訓練及教育，並確保對此進行定期及獨立的監督。

委員會對締約國在 2002 年授權使用特定訓練技巧，並因此導致一些受羈押人在偵訊過程中死亡感到關切。委員會對「令人困惑的偵訊規則」以及被模糊地界定的技巧，如對被羈押人造成嚴重虐待的「壓力姿勢」感到遺憾。就此，締約國應在所有他所事實上有效控制的實施羈押的地方，取消任何會構成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貶抑性的待遇或處罰（包括性羞辱、水刑、用短鉤鍊銬在一起或使用犬隻來引發恐懼等），以符合其在本公約之義務。

委員會對於締約國被指控免除一些涉及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貶抑性待遇或處罰執法人員的責任表示關切。委員會注意到關於某些酷刑指控的有限調查及欠缺起訴。締約國應迅速、全面及公政的對所有執法人員所為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貶抑性待遇或處罰的行為進行調查，並將加害者繩之以法，以實現本公約第 12 條之義務。締約國應對委員會提供關於上述案件的調查及起訴資訊。

委員會對一份由締約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軍事或公務人員所犯的酷刑或殘忍、不人道及貶抑性待遇或處罰之可信賴報告感到關切。並對於許多這類案例的調查及起訴感到關切，這些案例往往導致被羈押人的死亡，卻僅給予溫和的刑罰，包括行政性質的處罰或低於

一年的徒刑。締約國應採取立即措施，在任何其管轄的領域，消除軍事或公務人員對被羈押人所為各種形式的酷刑及不當待遇，並立即且全面性地調查這些行為，起訴所有這類行為，並確保行為人依據所犯情節之嚴重性被適當的處罰。

委員會對於 2005 年的《羈押待遇法》(Detainee Treatment Act)表示關切，除了在極為有限的例外狀況下，本法旨在撤回聯邦法院對人身保護令狀或其他代表關達那摩灣被羈押人主張訴請的管轄權。委員會並對於在伊拉克及阿富汗，在國防部控制下的被羈押人表示關切，這些被羈押人的身份及審查，都是由該部的行政程序進行。締約國應如本公約第 13 條所要求的，確保羈押之情況及的身份能由一個獨立、迅速及全面性地程序來審查，且所有被羈押人都能使用此程序。

委員會對於特定受虐待的被害人在獲得救濟及適當補償上所面臨的困難，以及僅有很少數的被羈押人對所受的虐待及不當待遇提出補償的情求之狀況（尤其是在《外國請求法》(Foreign Claims Act)的規定下）表示關切。根據本公約，締約國應確保獲得完全救濟、補償及復原的機制，應對所有由其官員所為酷刑或虐待（包括性暴力）行為的受害者可取得。

委員會對於 1995 年《監獄爭訟改革法》(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第 14 條規定：「監禁中的受刑人未事先證明其身體上傷害前，就其所受心裡及精神上傷害，不得提出聯邦民事訴訟。」感到關切。締約國不應限制受害者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並應修改此規定。

雖然注意到締約國在 2006 年 3 月 24 日所做出的第 10 號指令要求軍事任務不應承認能被做為酷刑證據結果的聲明，委員會對於在此背景下的任務指令的實施狀況，及被羈押人有效申訴權利所生限制感到關切。就此，締約國應確保其在第 13 條與第 15 條之義務在任

何情況下都被實現，包括在軍事任務的狀況下，並應考慮建立一個保障所有被其監禁羈押人權利的獨立機制。

委員會對於有實證指出，締約國對死刑執行會伴隨嚴重疼痛及痛苦感到關切。締約國應審慎審查其執行死刑方式，尤其是注射死刑，以避免嚴重疼痛及痛苦。

委員會對一項可信賴報告所陳述，在締約國經判決的受刑人及在審前及移民受羈押受到性侵的狀況感到關切。委員會亦對許多報告指出在受羈押人間及處於特別弱勢的不同性傾向者間所犯的性暴力狀況感到關切。委員會也就締約國對於這些行為欠缺立即與獨立調查，及打擊這些傷害的適當措施欠缺實施的狀況感到關切。締約國應設計及實施一個在所有羈押中心預防性暴力的適當措施，並確保所有在羈押中心被指控的暴力，被迅速與獨立的調查，且加害者被起訴及適當的處刑，以及受害者能尋求救濟及適當的賠償。

委員對於在締約國受羈押女性之待遇，包括基於性別的羞辱及在分娩時將女性被羈押人戴上鐐銬之狀況感到關切。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來確保受羈押的女性，被符合國際標準地來待遇。

委員會重申在先前建議曾表示的關切，即關於對未成年人羈押的條件，尤其是在審前羈押及判決後監禁階段，未成年人並未完全與成年人隔離的狀況。委員會亦對締約國存在對未成年人處以無期徒刑的數量表示關切。締約國應依國際標準確保受羈押的未成年人在羈押設施中與成年被羈押人隔離，並應解決對未成年人處無期徒刑的問題，因為這可能構成殘忍、不人道或貶抑性的待遇或處罰。

委員會持續對締約國被執法人員廣泛使用電擊工具並曾導致死亡的狀況感到關切。委員會對於這個作法產生可能違反本公約第 16 條的嚴重問題表示關切。締約國應審慎審查電擊工具的使用，嚴格管制其使用，限制其做為致命武器的替代，並消除此工具使用在限制受羈押人上的狀況，因這會構成公約第 16 條的違反。

委員會仍然對在超限監獄(supermaximum prisons)對被羈押人所施加的極端嚴厲起居制度感到關切。對於被羈押人受到可做為處罰目的之延長隔離期間對心理健康所產生的待遇，委員會感到關切，這種狀況可能構成殘忍、不人道或貶抑性的待遇及處罰。締約國應審查這個對於被羈押人在「超限監獄」，特別是延長隔離的作法所實施的起居制度。

委員會對於有報告指出締約國執法人員的殘忍及過度武力使用，以及對於弱勢族群（特別是種族上的少數族群、移民及不同性傾向者）所指施加的不當待遇未被適當的調查感到關切。締約國應確保尤其執法人員對於弱勢族群成員所施加的慘忍及不當待遇，全面、迅速及獨立地被調查，讓加害者被起訴並受適當的處罰。

委員會強烈建議締約國邀請聯合國關於酷刑、殘忍、不人道或貶抑性待遇或處罰特別報告員，至關達那摩灣或任何其所事實上控制的羈押設施進行訪視。並建議締約國重新考慮其不願成為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締約國的意向聲明。

締約國重申其對締約國之建議，撤回在批准本公約時所提出的保留、聲明及瞭解書，並考慮依公約第 22 條承認委員會受理及評議個人通報的權能。

委員會要求締約國提供關於其執法官員所為的酷刑及不當待遇，及關於這類控訴的調查、起訴及紀律訴訟的詳細統計資料。委員會要求締約國提供關於其司法部執行《被收容在公共機關者之公民權利法》(Civil Rights of Institutionalized Persons Act)的統計資料及資訊，尤其是關於預防、調查及起訴在羈押設施中的酷刑、殘忍、不人道或貶抑性待遇或處罰行為，及其所採取施行《消除監獄內妨害性自主法》(Prison Rape Elimination Act)之措施。委員會要求締約國任何提供給受害者補償及恢復原狀之資訊，鼓勵締約國建立一項聯邦資料庫，協助蒐集上述統計及資訊，俾利評估本公約規定之執行及權利被享有的狀況。

三、美國第三至第五次合併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 摘要

繼初次及第 2 次定期報告後，委員會歡迎締約國在涉及公約之立法與司法實踐上有些改變，例如最高法院在 2008 年 *Boumediene v. Bush* 案(553 U.S. 723) 中，確認憲法的人身保護權在域外適用於被軍隊視為敵方戰鬥人員拘禁在關達那摩灣的外國人；最高法院又在 2010 年 *Graham v. Florida* 案，禁止對犯有非殺人罪的兒童判處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並在 2012 年 *Miller v. Alabama* 案，禁止對犯有殺人罪的兒童判處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

委員會還歡迎締約國為實施《公約》而努力修訂各項政策、方案和行政措施，包括：2013 年通過了《移民和海關執行處收容設施有關適當使用隔離監禁命令》(Directive on the appropriate use of segregation in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detention facilities)；移民和海關執行處 2011 年修訂了《績效為準的國家拘禁標準》(Performance-Based National Detention Standards)；於 2012 年根據 2003 年《消除監獄內妨害性自主法》(Prison Rape Elimination Act)頒佈《預防、檢測和回應監禁設施內性侵害國家標準》(Promulg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to Prevent, Detect, and Respond to Sexual Abuse in Confinement Facilities Promulg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to Prevent, Detect, and Respond to Sexual Abuse in Confinement Facilities)；締約國努力確保聯邦、州和地方監禁設施遵守該法，並努力收集關於監禁設施中性暴力問題嚴重程度的數據。

委員會歡迎締約國在武裝衝突期間有關《公約》適用性所持的堅定和有原則的立場，並歡迎締約國的聲明，即戰爭時期不能中止《公約》的實施，即使國家處於武裝衝突中，《公約》繼續適用。

5.對酷刑進行定義和定罪

根據美國法律，各項法規禁止酷刑行為，並可以各種方式起訴此類行為，但委員會感到遺憾的是，在聯邦層級沒有引入專門的酷刑罪。委員會再度建議美國，應在聯邦層級將酷刑定為刑事罪，並確保對酷刑的處罰與罪行的嚴重性相當。委員會建議重新採用《防止執法酷刑法》(Law Enforcement Torture Prevention Act)，其中載有酷刑的定義，並明確將執法人員和其他人以法律名義實施酷刑的行為定為刑事罪。

6.域外實施(Extraterritoriality)

委員會對美國在境外（包括巴格拉姆及關達那摩灣）的拘禁設施，即便該設施不在美國的領土內，仍可被認為是「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委員會並提醒美國注意其在第 2 號一般性意見曾提的，「任何領土」包括締約國根據國際法直接或間接、全部或一部、法律上或事實上所有有效控制的所有地區，且包括在締約國註冊的船舶或飛機上犯下的違反行為，而且也指在軍事佔領或維和行動期間以及在諸如使館、軍事基地、拘禁設施或一國有實際或有效控制下的其他地區。締約國在上述區域，負有實施本公約之義務。

7.反恐措施

委員會對美國中央情報局（中情局）在 2001 年 911 事件後至 2008 年間所進行的非常規引渡、秘密拘禁及偵訊措施表示嚴重關切，當中有許多侵犯人權行為，包括對涉嫌參與恐怖主義相關罪行的人實施酷刑、虐待和強迫失蹤。委員會更表示遺憾的是，美國對於非常規引渡及強迫失蹤，及 CIA 對恐怖嫌疑分子的虐待型偵訊手段(如水刑)的使用範圍並未提供資料予以說明。委員會回顧，《公約》第 2 條第 2 款絕對禁止酷刑，稱：「任何特殊情況，不論為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動盪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狀態，均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的理由」在這方面，委員會請締約國注意委員會第 2 號一般性意見(2007 年)，其中表示，這些特殊情況包括「任何恐怖主義行為或暴力犯罪的威脅以及國際性或非國際性的武裝衝

突」。委員會要求美國應確保沒有人被秘密羈押在其實際有效控制的任何地方，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其行為符合本公約規定（尤其是第 2 條），以及採取有效措施，在法律上及事實上確保從自由被剝奪起，向所有被拘禁者提供法律保障。

4. 對海外酷刑行為指控之調查

委員會表示關切的是，締約國方面仍未對羈押在美國國外的嫌疑人受到酷刑和虐待的指控進行充分調查，數量有限的刑事起訴和定罪即是這方面的證據。在這方面，委員會注意到，在審議期間美國司法部成功起訴了兩宗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在阿富汗的承包商法外殺害被拘禁者的案件。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代表團提供了補充資料，說明美國助理檢察官約翰·達勒姆對被拘禁者在美國海外羈押地點期間受到虐待的指控開展的刑事調查。然而，委員會感到遺憾的是，代表團無法介紹達勒姆先生所採用的調查方法或說明他的團隊可能約談的證人的身份。因此，委員會仍感到關切的是，它收到資料，稱一些以前被中情局羈押在美國國外的拘禁者在調查期間從未被約談，這令人懷疑此次受到高度關注的調查的進行是否得當。因此委員會敦促美國確保對軍事人員實施酷刑和虐待的所有案件進行迅速和公正的調查，對據稱肇事者進行起訴，如判定有罪，應進行適當處罰，並確保為每一名受害者提供有效的救濟，包括應有的賠償；確保酷刑或虐待行為的據稱行為者立即被停職，直至調查結束，特別是在他們可能會重複實施被指控的行為或干預調查的情況下。

5. 關達那摩灣的羈押設施

委員會特別對在關達那摩灣的羈押設施中未經起訴被羈押的人員深表關切，認為雖然美國認為其是因做為「敵方戰鬥人員」被逮捕及拘禁，且依戰爭法可對其羈押至敵對行動結束，但委員會重申，無限期將人拘禁，且不提出任何指控或起訴本身，即構成對本公約的違反(CAT/C/USA/CO2, 第 22 段)。委員會也注意到，關達那摩

灣被羈押者享有人身保護令的憲法特權，但委員會關切的是，有報告表明，聯邦法院駁回了相當多的人身保護令申請。在審議期間，關達那摩發生了9起死亡事件，包括7起自殺。在這方面，另一令人關切的情況是，被羈押者因無限期拘留和拘禁條件而多次企圖自殺並經常進行大規模絕食抗議。就此，委員會認為，對絕食被羈押者強行餵食構成了違反《公約》的虐待行為。此外，委員會注意到被羈押者的律師在法庭上指稱，羈押期間以不必要的殘酷和痛苦方式進行了強迫餵食(第2、第11、第12、第13、第14、第15和第16條)。委員會要求美國應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停止不經起訴或審判即無限期羈押涉嫌參與恐怖主義有關活動的個人；確保指定將遭到起訴的羈押在關塔那摩灣的被拘禁者在普通的聯邦民事法庭進行指控和審判、應立即釋放不會被指控或審判的其他任何被羈押者；調查有關被羈押者受到虐待(包括酷刑和虐待行為)的指控，對應負責的人進行必要的起訴，並確保向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濟、改善被羈押者狀況，並停止強迫餵食。

6. 濫用國家機密條款與司法互助

委員會對利用國家保密條款和豁免來逃避責任感到嚴重關切。雖然委員會注意到代表團聲明，在確立審查根據戰爭法而被拘禁在關達那摩灣的個人的地位的行政程序方面，締約國遵守《公約》第15條規定的義務，但委員會感到特別不安的是，有報告稱，針對高價值囚犯設有一種嚴厲的保密制度，使得其酷刑申訴無法進入公共領域。此外，適用於這些被拘禁者的制度，使他們無法獲得有效補救和賠償，也妨礙其他國家調查侵犯人權行為(第9、第12、第13、第14和第16條)。

委員會要求對酷刑的證據，特別是關達那摩灣被拘禁者關於酷刑的陳述，進行解密。締約國應確保所有酷刑受害者能夠獲得補救途徑並獲得救濟，無論酷刑行為的發生地，也不論加害者或受害者的國籍。

7.對外交保證的依賴

委員會敦促締約國確保被驅逐、遣返、引渡、或遣送出境的個人(包括恐怖主義嫌疑人)，不會面臨遭受酷刑或其他殘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危險。委員會促請締約國，「如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第3條)，不應尋求或依賴外交保證作為遣返的依據。不遣返原則應始終優先於其他保護措施。

8.偵訊技巧

委員會讚賞地注意到締約國消除構成酷刑或虐待的偵訊方法的措施。然而，委員會對2006年9月6日頒佈的《2-22.3號陸軍野戰手冊》(Army Field Manual No. 2-22.3)附錄M「人力情報收集行動」(Human Intelligence Collector Operations)的某些方面感到關切，特別是對一些授權的偵訊方法的描述，如「身體隔離」和「情境模擬隔離」等偵訊手段。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使用有悖於《公約》規定的偵訊方法。締約國應廢除有關「身體隔離手段」的規定，該規定指出，「隔離的使用不得妨礙被拘禁者每24小時獲得4小時的持續睡眠」。這一規定(初次適用期為30天，經批准後可延長)構成了剝奪睡眠(一種虐待形式)，而且與「身體隔離手段」的目的(防止被拘禁者之間進行溝通)無關。締約國應確保被拘禁者對睡眠時間和睡眠條件的需求得到滿足，並且符合《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第10條的要求。同樣，締約國應廢除「情境模擬隔離手段」中的感官剝奪做法，感官剝奪的目的在於通過對被拘留者使用風鏡或眼罩和耳塞，使其產生隔離感，從而延長被捕的衝擊。根據最近的科學發現，長時間的感官剝奪很有可能對被拘留者造成類似精神病的狀態，而這會引發對酷刑及虐待的關切。

9.西南邊境的庇護保護請求

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報告稱，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和美國其他移民機構未能查明許多面臨快速驅逐的人員的身

份並轉介其進行庇護審查面談。此外，進入快速驅逐程序的人員在離開美國前可能一直遭到拘禁。委員會要求締約國應確保充分履行本公約第3條關於不遣返之義務，並應採取具體措施，確保難民認定程序和庇護程序對所有國籍的移徙者都是恰當的；堅持庇護程序應始終保密的原則；對《公約》第3條涵蓋的情況進行徹底的風險評估；審查快速遣返程序，並保障獲得律師協助的機會。

10. 移民收容

委員會關切地注意到，在某些情況下，締約國繼續使用強制性收容，在尋求庇護者和其他移民抵達時，將其羈押在類似監獄的拘禁設施、郡監獄和私人監獄中。委員會雖認可締約國為改革移民收容制度而採取的步驟，但仍感關切的是，有報告稱移民設施的拘禁條件不符合標準，並且使用單獨監禁。委員會還對一些被收容者遭到工作人員和其他被收容者的性暴力的報告感到關切。委員會要求締約國應審查針對某些類別移民使用的強制拘禁的做法；發展和擴大以社區為基礎的移民收容替代辦法，對無伴兒童擴大使用寄養辦法，並停止擴大家庭收容，以期逐步完全消除這種做法；防止移民收容設施中的性侵犯，並確保所有拘禁被收容移民的設施遵守《消除監獄內妨害性自主法》(Prison Rape Elimination Act)規定的標準。

11. 單獨監禁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表明「美國沒有系統地使用單獨監禁」，但委員會仍感關切的是，有報告表明美國監獄和其他拘禁中心為處罰、管教和保護目的，以及與健康有關的原因，廣泛地使用單獨監禁和其他形式的隔離。委員會要求美國應將單獨監禁作為最後手段限制使用，盡可能縮短其時間，進行嚴格監督，並保留司法審查的可能性；禁止對監獄中的青少年、智力或社會心理障礙人士、孕婦、養育嬰兒的婦女和哺乳母親使用單獨監禁；禁止監獄的單獨監禁制度。

12. 保護受刑人免於暴力，包括性侵

委員會感到嚴重關切的是，監獄和其他拘禁場所中普遍存在工作人員和其他受刑人實施的性暴力，包括性侵。委員會還關切地注意到，成年人拘禁設施中的兒童遭受性暴力的比例過高，有精神健康病史的受刑人及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和雙性人受刑人舉報的性傷害事件發生率更高。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加大努力，防止和打擊監獄和拘禁場所的暴力行為，包括執法人員、監獄工作人員和其他受刑人實施的性暴力。具體而言，締約國應：確保所有州都通過並執行根據《消除監獄內妨害性自主法》(Prison Rape Elimination Act)制定的標準或類似標準，並確保所有管理監禁設施的聯邦機構和部門提出並公佈規章；推動建立有效和獨立的機制，負責接收和處理有關監獄暴力，包括性暴力的申訴；確保迅速和公正地調查有關監獄暴力，包括性暴力的所有舉報；為監獄工作人員提供有關防止性暴力的專門培訓；制訂減少受刑人間暴力行為的策略。

13. 對少年犯判處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

委員會發現締約國法官仍有可能對殺人案件(即使兒童在罪行中的作用甚微)做出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的判決，法院也在繼續執行這類判決(第 11 和第 16 條)。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應對 18 歲以下兒童所犯罪行(不論何種罪行)廢除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並允許已被判處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且目前正在服刑的少年犯，要求法院審查其案件，進行重新評估和量刑，以恢復假釋資格，並爭取減刑可能。

14. 死刑

委員會對締約國尚不考慮在聯邦層面廢除死刑表示關切，並就其當中未廢除死刑的州，委員會對其執行死刑的程序，就死囚在執行過程中遭受極度疼痛及長時間痛苦表示關切，尤其是對最近在亞利桑那、俄亥俄、俄克拉何馬州發生的惡劣的死刑執行方式感到特別不安。委員會同樣感到關切的是，申訴程序中持續的拖延，造成被判處死刑的囚犯多年處於痛苦不安的狀況，對於這種面臨即將死亡威脅的狀況，亦構成本公約所理解的酷刑形式之一。委員會要求美

國應審查其死刑執行方式，以防止疼痛和長時間痛苦，並應減少程序性拖延，避免死囚長時間處於牢獄中。委員會鼓勵締約國暫停執行死刑，以期廢除死刑。

15.過度使用武力與警察暴行

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有許多報告稱員警實施暴行和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的，特別對屬於特定種族和族裔群體的人員、移民以及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和雙性人更是如此。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員警和移民辦事處採取種族定性做法，而且治安活動日益軍事化。委員會特別感到關切的是，有報導稱目前芝加哥員警特別針對非裔美國青年和拉丁裔青年實施了暴力行為，據稱芝加哥警察局警官一貫對這些青年實施定性、騷擾和過度武力。委員會還深表關切的是，員警對手無寸鐵的黑人進行射擊或致命追捕頻繁且重複發生。在這方面，委員會注意到，據稱很難追究警官及其雇主濫用職權行為的責任。委員會注意到，雖然有幾位受害者最終被免除潛在罪行，但其中絕大多數受到酷刑的人(多數為非洲裔美國人)並未因其遭受的廣泛傷害而獲得任何補償(第 11、第 12、第 13、第 14 和第 16 條)。委員會認為締約國應：確保由獨立機制對所有關於員警暴行和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的事件進行迅速、有效和公正的調查，調查者和受指控的肇事者之間不得存在任何體制或上下級方面的聯繫；起訴涉嫌實施酷刑或虐待行為的人員；且如判定有罪，則確保根據其行為嚴重程度予以相應處罰；為受害者提供有效補救和康復措施。

16.電擊武器（泰瑟槍）

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員警使用放電武器對付抗拒逮捕或不能立即遵守命令的手無寸鐵個人，逃離輕罪現場的嫌疑犯，甚至未成年人。此外，委員會對使用放電武器導致死亡的報告數量感到震驚。委員會指出，有必要採取更嚴格規定，控制此類武器的使用，並應確保僅在極端和有限的情況——存在現實和立即的生命威脅或嚴重

傷害的危險——下使用放電武器，作為替代致命武器的使用並限由經過培訓的執法人員使用。締約國應當修訂管理這類武器的使用的法規，以為其使用設立高門檻，並明確禁止用於兒童和孕婦。

17. 救濟，包括賠償與復原(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聲稱其法律在聯邦和州一級為酷刑案件中尋求救濟的民事補償，但委員會感到遺憾的是，對於國內和第三國受害者康復方案，以及為支持此類方案所劃撥的資源，代表團只提供了有限的資料。締約國應確保向所有酷刑和虐待受害者提供適當的康復方案，包括醫療和心理援助。締約國還應加強對該國酷刑受害者康復方案的支持和資助。委員會敦促締約國立即採取法律和其他措施，確保所有酷刑和虐待受害者獲得民事補償並擁有可執行的獲得公平和充分賠償的權利，包括儘量完全的康復的手段，特別是遭受員警暴力的受害者、訴稱遭到虐待的恐怖嫌疑人、性別暴力受害者、尋求庇護者、難民和其他受到國際保護的人員。

18. 美國軍隊中的性暴力及性侵

委員會仍感關切的是，性暴力，包括性侵事件高度發生率，且據稱國防部未能充分預防和處理武裝部隊中男女軍人遭到性侵犯的現象。締約國應加大努力，防止和消除軍隊中的性暴力行為，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對所有的性暴力指控進行及時、公正和有效的調查；確保在實踐中，保護申訴人和證人不因其申訴或證詞而遭到各種報復行為，包括恐嚇；確保身為軍隊性侵犯行為倖存者的退伍軍人能夠平等獲得身心障礙賠償。

四、評析

美國做為一個世界強權、聯合國創始締約國、世界人權宣言、兩項人權公約、本公約及許多重要國際人權標準的推動國及草擬國，其在國際人權標準的國內實踐不僅備受關注，亦受到更多的期待。

然而，如同許多國家一樣沒有一個絕對理想的實踐典範，美國在履行本公約上亦有許多值得改善被委員會指出，而值得我國參考。

1.關於對酷刑行為透過有效刑罰來防免，一直是委員會對締約國最關切的事項之一，因此美國雖在個別州有處罰酷刑之刑事法，但在聯邦層級仍沒有將酷刑事為犯罪並處以刑罰的規定，對本公約在美國這個聯邦國家的普遍適用屬一重要欠缺，而在三份結論性意見中持續被委員會督促。

2.而對於施加他人酷刑的加害人，委員會亦特別關注締約國的實踐，發現其未能對加害者即時地起訴，並處以適當的刑罰，而僅是處以輕微的刑罰或行政處罰，此對於本公約最主要的規範目的之落實顯屬不足。

3.關於因為反恐及在戰爭狀態下的履行義務是否可減免？

雖然公約第2條第2項規定：「任何特殊狀況，不論是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動盪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狀態，均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之理由。」然而，在911事件後美國政府以反恐及國家面臨緊急威脅為由，在國內外展開許多打擊恐怖主義行動，在這過程中也逮捕並羈押許多其認為的恐怖份子嫌疑犯（不論其是否為本國籍），並在其他國家領土設立許多其事實上能控制的「境外」羈押設施，並在當中對被羈押人實施許多構成酷刑、殘忍、不人道及貶抑性的待遇或處罰行為，而讓委員會在第2次至第5次的結論性意見中提出數次關切及指正。

對於美國上述行為，委員會基於第2條第2項的意旨清楚的指正美國，就算羈押設施設在境外，但只要是其公務及軍事人員在事實上控制，其仍有履行本公約義務，而且戰爭法不應被視為特別法而排除本公約之適用。針對國家禁止酷刑義務的不得克減性質，在美國與我國皆為義務遵守國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4條第2項已指明，本公約第7條禁止酷刑的義務，就算是在第1項所規定國家面臨生存威脅的緊急狀態下，皆不得被克減，亦是能得到相同的

效果。足見本義務在國際法上已具強刑法地位，並對所有國家生普遍性義務。

4.對於未成年人的特別保障

對於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的特別保障，不僅為兒童權利公約之主要目標，美國在本公約的實踐上有所不足者，在於對未成年人的審前羈押及判決後監禁並未與成年人隔離，而使其身心安全有受不當威脅的可能。另外，美國的司法實踐仍對於未成年人判處終身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對未成年人來說亦屬與本公約規範意旨相悖，而屢受委員會關切。

5.對於仍未全面廢除死刑的美國，針對死刑犯的執行，在本公約的意旨下，不應造成嚴重的疼痛及痛苦，但美國相關州政府所採用的注射死刑，受到委員會屢次的關切，並要求改善。

6.關於不遣返原則之實踐

對於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個國家有受酷刑的風險，締約國就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即便該人不在美國之領域此原則亦適用之。另外，美國對非法移民所實施的快速驅逐程序，可能讓美國違反本原則之義務。委員會亦要求美國對提出違反不遣返異議的外國人，應使其獲得適當機關的審查。

7.對外交保證的濫用

委員會發現美國持續的外交保證實踐，引發規避公約第 3 條不推回原則的關切。由於美國實施外交保證的秘密性、欠缺司法及任何刑事的監督，讓個人能在此保證下被驅逐、返回、移轉或引渡後，仍有受到酷刑的風險，因此屢次受到委員會關切。委員會要求美國應就此程序，建立適當的司法監督程序，並在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將受酷刑危險下，不應在外交保障下讓此人被遣返或引渡，以符公約義務。

8.關於偵訊技巧

委員會對於美國對於被羈押的恐怖份子嫌疑犯所採取的偵訊技巧屢次表示關切，不僅基於在其偵訊下不斷發生導致受羈押人死亡的案例，更針對美國在偵訊上不斷「開發出」，且可能構成酷刑及虐待的新技巧，不論是性羞辱、水刑、以警犬驚嚇、壓力姿勢、剝奪睡眠或情境模擬隔離手段的感官剝奪守法，皆屬與本公約意旨違反的作法。

9. 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

針對美國執法人員的武力使用，在每次結論性意見中，接受到委員會的關注。美國執法人員的武力使用，不僅過度且殘忍，更對特殊弱勢族群有歧視性的針對狀況，例如，針對有色人種、原住民、移民及少數性傾向者。委員會要求美國確保，由獨立的機關對涉案的執法人員進行迅速、有效及公政的調查，如確認實施酷刑及虐待，應根據情節嚴重程度處以相對應的處罰。另外，委員會亦發現美國執法人員並未在自身安全受到極度威脅下，經常對未持有武器的不遵守指令之個人使用向泰瑟槍這一類的放電武器。就此，委員會亦敦促締約國應嚴格管理此類武器之使用，並提高其使用門檻，禁止對孕婦及兒童使用。

10. 對被害人的救濟及賠償

委員會針對締約國的羈押設施，不論是設置在境外或是在國內，應該針對被羈押人所提出的酷刑行為指控，由一個獨立、迅速及全面的程序進行審查，而且要讓所有受羈押人皆得使用此程序。而就確認受到酷刑及虐待的受害者，委員會亦敦促締約國應就其身體及心理上之傷害，提供完整的醫療及康復措施，以及締約國應確保酷刑被害人獲得公平及充分賠償的權利。

(二) 日本第一次國家報告之結論性意見⁹⁵ 摘要

1. 酷刑定義:

酷刑定義並未納入日本刑法中，特別是《公約》定義所規定的「精神酷刑」(mental torture)在刑法第 195 和 196 條中沒有明確的界定並且對於相關的行為，例如恐嚇的處罰太輕。此外，日本的立法並不包括所有類別的政府官員，或代表公權力行使的個人，例如自衛隊的成員和移民局官員。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國內法應納入《公約》第 1 條中關於酷刑的定義，將酷刑定性為特定罪行，包括所有構成要件(constituent elements)，並予以適當刑罰⁹⁶。

2 時效規定:

委員會關切時效制度所造成的阻礙，特別是，日本以時效相關的理由駁回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慰安婦受害者的訴訟，故建議日本應審查其關於時效的規定使其完全符合《公約》義務，對於相當於酷刑和虐待的行為，包括相關試圖、共謀或參與酷刑的行為，都能得到調查、起訴和處罰，不受時效限制。⁹⁷

3 不遣返原則(Non-refoulement)

⁹⁵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report of Japan, U.N. Doc. CAT/C/JPN/CO/1(2007)(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⁹⁶ Ibid. Para. 10.

⁹⁷ Ibid. Para. 12.

委員會對於締約國的國內法中某些條款以及慣例不符合《公約》第3條表示關切，特別是：

(a) 2006年移民控制和難民確認法令沒有明確禁止向存在酷刑風險的國家遣返；而且，審查當局並未系統性調查第3條的適用性；

(b) 沒有獨立的機關審查難民確認申請；

(c) 防止靠岸設施和移民收容中心的條件有許多關於暴力、在驅逐時非法使用限制刑具、虐待、性騷擾、沒有適當的醫療條件的指控。特別是，委員會擔心的是，迄今為止在這類收容中心只有一例被承認為虐待。

(d) 對於移民收容中心和防止靠岸設施沒有獨立的監督機制，特別是沒有一個獨立的機構可以接受被收容人關於移民局工作人員施行暴力指控的投訴。委員會還對於沒有公開宣佈關於任命第三方難民裁決顧問(third-party refugee adjudication counsellors)的條件表示關切；

(e) 鑒於司法部不允許難民確認申請者在申請的第一階段選擇法律代表以及政府的法律援助事實上只限於非居民，因此，缺乏獨立的機構審查移民官員的決定；

(f) 沒有足夠的保證讓所有尋求庇護者獲得司法審查，並有指控指出在行政程序結束後立即就實行驅逐；

(g) 在拒絕庇護申請和驅逐之間庇護尋求者在收容所的時間過長，特別是有關於無限期和長期收容的案子；

(h) 修改後的 2006 年移民法中所採用的臨時居留制度的嚴格性格 (strict character) 和有限性。

該締約國應確保與移民收容和驅逐相關的所有措施和做法都完全符合《公約》第 3 條。特別是，該締約國應明確禁止向有足夠理由相信要被遣返的個人會有酷刑危險的國家遣返，並應設立一個獨立的機構審查庇護申請。該締約國應確保庇護申請和遣返審理要有應有的過程，並應立即設立一個獨立的當局審查關於在移民收容設施中的待遇的投訴。該締約國應確定等待遣返人員的收容時間限度，特別是為弱勢群體，並公佈關於在發出書面驅逐令之後收容要求的資訊。⁹⁸

4. 替代監獄(Daiyo Kangoku)問題

委員會對於普遍與有系統的利用替代監獄(Daiyo Kangoku)制度長期拘留被逮捕的人員，甚至在他們出庭以後也這麼做，並且一直關到定罪，深表關切。這種實踐，加上對被拘禁者的拘禁和偵訊缺乏足夠的程序性保證，增加了對其權利的侵犯的可能性，並導致實際上侵害無罪推定原則、緘默權和辯護權。特別是，委員會嚴重關切：

⁹⁸ Ibid. Para. 14.

- (a) 在調查期間直到定罪被關在警局類設施而不是拘禁中心的人數過多，特別是調查的審問階段；
- (b) 調查權限和拘禁權限之間的區分不夠，從而使調查人員能參與被拘禁人員的轉移，並隨後負責調查其案子；
- (c) 不適當的使用警局進行長期拘留，並對於被警局拘留的人員缺乏適當和及時的醫療護理；
- (d) 在定罪之前在警局的審前拘留(pre-trial detention)時間過長，平均每項指控長達 23 天；
- (e) 法院對於在警局的審前拘留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和審查，這從法院發出的極大數量的羈押令可以看出；
- (f) 沒有定罪前保釋制度；
- (g) 法院任命的律師只限於重罪案子；
- (h) 對於在審前羈押的被羈押人獲得辯護諮詢的機會有限，特別是檢察官對於辯護律師和被拘禁人之間會面指定具體日期和時間有任意行使的權力(arbitrary power)，導致在偵訊過程中沒有辯護律師；
- (i) 法律代表獲得警方記錄中所有相關資料的機會有限，特別是檢察官有權決定在定罪時可以揭露什麼樣的證據；
- (j) 對於關在警局的被拘留人沒有可以利用的獨立有效的檢察和投訴機制；

(k) 在警局拘留所中使用口銜(gags)，然而，這在締約國刑事機構中已經廢除。

委員會建議該締約國應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使審前羈押完全符合最低國際標準(委員會未說明具體標準為何)，特別是，該締約國應修改 2006 年監獄法，以便對審前羈押期間使用警局加以限制。締約國應優先：

(a) 修改立法確保將調查權限和拘留(包括轉移程序)權限完全區分開來，不讓警局拘留官員參加調查，以及不讓調查人員參與和拘留相關的事務；

(b) 對於在警局拘留所被拘留的時間設立上限，使其符合國際最低標準(委員會未說明具體標準為何)；

(c) 確保從被逮捕時刻起所有被拘禁人員都能獲得法律援助，在辯護律師在場以及在定罪後他們能得到警方記錄中所有相關資料，以便使其能為辯護作好準備，並要確保在被警方拘留期間的人員能及時得到適當的醫療護理；

(d) 保證警局拘留外部監督的獨立性，例如:確保縣警察局能從制度上保證由律師協會推薦的一名律師成為員警拘留視察員委員會的成員；

- (e) 建立一個獨立且有效的投訴系統；
- (f) 考慮採取替代審前羈押的其他措施；
- (g) 在警局拘留所中廢除使用口銜。⁹⁹

5 偵訊規則與自白(confessions):

委員會對於在刑事審判中有大量的案子根據自白定罪深表關切，特別是鑒於對使用審前羈押欠缺有效的司法控制並且定罪的數量比宣判無罪高出太多。另外委員會也關切：沒有方法查核警方訊問被拘留者時的情況；偵訊的時間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偵訊期間要有辯護律師在場並不是強制性的；根據日本國內法，不符合《公約》的偵訊而作出的自願自白卻可被法院接受，此已違反《公約》第 15 條。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改善上述情形以符合公約要求，特別是應確保對於被警方拘留的人員或在替代監獄中人員的偵訊能受到不同機制的系統監督，例如對於所有偵訊過程的電子和錄影記錄並將音像錄音資料提供刑事審判使用¹⁰⁰。

6. 刑事機關的拘禁條件:

日本應採取有效措施，改善拘禁場所的條件，使其符合國際最低標準(未提到具體標準為何)，特別是解決拘留所人滿為患的問題並應確

⁹⁹ Ibid. Para. 15.

¹⁰⁰ Ibid. Para. 16.

保對限制性刑具的嚴格監督，特別是防止將其用作處罰手段。(因此委員會關切日本不適當使用“2型皮革手銬”作為處罰刑具)；拘留所應獲得足夠醫療幫助，並建議應考慮將醫療設施和工作人員置於衛生部管轄之下。¹⁰¹

7. 單獨拘禁的使用

委員會對於雖然 2005 年刑事機關和受刑人待遇法令的新條款限制使用單獨監禁，卻仍有關於長期使用單獨監禁的指控深表關切。特別是，委員會對以下方面的關切：¹⁰²

- (a) 由於對 3 個月規則的延長沒有限制，因此事實上單獨監禁沒有時間限制；
- (b) 對於十年以上單獨監禁的人數，其中一例已超過 42 年；
- (c) 對於使用單獨監禁作為處罰手段的指控；
- (d) 對於因精神疾病而單獨監禁的囚犯沒有足夠的篩檢；
- (e) 對於受刑人員進行單獨監禁的決定沒有有效的申訴程序；
- (f) 對於確定是否需要單獨監禁缺乏標準。

8 死刑¹⁰³

¹⁰¹ Ibid. Para. 17.

¹⁰² Ibid. Para. 18.

¹⁰³ Ibid. Paras. 19-20.

(1)委員會注意到日本的立法擴大了死刑犯探視和通信的規定，委員會深切關切在國內法中有若干關於被判處死刑的人的規定可相當於酷刑或虐待，特別是：

- (a) 最後判決之後的單獨監禁，在有些情況下甚至超過 30 年；
- (b) 對於執行時間沒有理由的保密和任意性，據稱是為了尊重囚犯及其家屬的隱私。特別是，委員會對於執行的時期始終不確定而對囚犯及其家屬造成的心理壓力表示遺憾，因為囚犯只是在被執行前幾個小時才得到通知；

該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改善死刑犯的拘禁條件，以便使其符合國際最低標準(未提到標準為何)。

(2)委員會對於死刑犯享受法律保障的限制表示嚴重關切，特別是在以下方面：

- (a) 對於死刑犯在保密情況下接觸其法律代表的限制，包括在上訴要求再審期間不可能要求與他們單獨會晤；缺乏保密通信的替代手段，以及在最後判決宣佈後無法接觸國家辯護律師；
- (b) 對於死刑犯沒有強制上訴(mandatory appeal)制度；
- (c) 再審程序或要求赦免並不能導致暫停執行；
- (d) 沒有一種機制以查明可能患有精神病的死刑犯；
- (e) 在過去 30 年中沒有將死刑減刑的案例。

9 迅速公正的調查，申訴權：

委員會對這些情形感到關切：對於被警察拘留的人沒有一種有效的申訴制度；刑事機關視察員委員會沒有權力調查酷刑或虐待行為案件或指稱的權力；刑事機關受刑人申訴審查和調查小組缺乏獨立性；對於受刑人的申訴權的時效限制，以及辯護律師不可能協助其客戶提出申訴。¹⁰⁴

10 賠償與復原(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1)委員會對於賠償的權利受到限制表示關切，例如時效限制和對於移民的互惠規則(reciprocity rules)，並建議該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酷刑或虐待行為的所有受害者都能充分行使其獲得補償的權利(right to redress)，包括賠償和復原(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¹⁰⁵

(2)其中特別提到慰安婦之問題，即日本的代表承認戰爭時期暴力的倖存者遭受了“無法彌合的創傷”，但由於日本官方對事實的否認、掩蓋或沒有揭露其他事實、沒有對酷刑行為犯有刑事責任的人進行起訴、以及對受害者和倖存者沒有提供充分的賠償而使其繼續

¹⁰⁴ Ibid. Para. 21.

¹⁰⁵ Ibid. Para. 23.

經歷著虐待和反復的折磨。委員會認為官方繼續否認、不起訴、和不提供充分的救濟都會造成該締約國未能履行《公約》下防止酷刑和虐待，包括通過教育和復原措施的義務。委員會建議，該締約國應採取措施提供教育以剷除這一性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暴力的歧視性的根源，並向受害者提供復原措施，包括採取步驟防止有罪不罰的現象。¹⁰⁶

12 基於性別的暴力和人口販運:

(1) 國內法對於強姦的定義過狹，只包括涉及男女性器官的性交行為，不包括其他形式的性虐待和對男性受害者的強姦，委員會建議該締約國應採取預防措施打擊性暴力和對婦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暴力。¹⁰⁷

13 身障人士:

日本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在公私營精神病院中的收容程序有足夠司法監控，以監督其管理、監督收容命令(detention orders)的使用、避免對病人酷刑或虐待行為。¹⁰⁸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委員會鼓勵日本考慮參加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

¹⁰⁶ Ibid. Para. 24.

¹⁰⁷ Ibid. Para. 25.

¹⁰⁸ Ibid. Para. 26.

約。)¹⁰⁹

日本第二次國家報告之結論性意見¹¹⁰ 摘要

1. 酷刑定義:

酷刑定義還是沒有納入日本國內法中，故委員會重申上次結論性意見(第 10 段)的建議並提及 2007 年的第 2 號一般性意見，認為各締約國可按照《公約》命名和界定酷刑罪行並與其他罪行區分，以此直接推動實現《公約》防止酷刑的首要目標。¹¹¹

2. 時效規定:

雖然部分法規已經修改，然而關於酷刑相關的時效規定仍然未修改，故委員會重申其先前所提出的建議(第 12 段)，即，締約國應使其關於時效的規則和規定完全符合《公約》所規定的義務，以便能夠根據《公約》第 4 條規定，依據情節的嚴重程度，對實施酷刑的行為人進行起訴和定罪，不受時效限制。¹¹²

¹⁰⁹ Ibid. Para. 28.

¹¹⁰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second periodic report of Japan, U.N Doc. CAT/C/JPN/CO/2 (2013)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¹¹¹ Ibid. Para. 7.

¹¹² Ibid. Para. 8.

3 不遣返原則和驅逐前收容:

除根據委員會上次的建議外(第 14 段), 另根據**移徙者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在 2011 年訪問日本之行後提出的建議(A/HRC/17/33/Add.3, 第 82 段)**, 日本應:

確保其法規與《公約》第 3 條吻合; 加強移民收容所視察委員會的獨立性、權威性和有效性; 使用驅逐替代辦法; 將收容尋求庇護者作為最後手段; 考慮加入 1954 年《關於無國籍人地位的公約》和 1961 年《減少無國籍狀態公約》。同時, 委員會也對這些情況表示關切: 尋求庇護者實行長期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無限期的收容, 以及缺乏對這類收容決定的獨立審查; 將無人陪伴的兒童收容在兒童諮詢中心, 而這些中心往往人滿為患並缺少用於雇用翻譯的資源, 也提到《移民控制和難民確認法》第 53(3)條禁止將個人移送至其可能會受到酷刑的任何國家, 這與《公約》第 3 條(第 3、11 和 16 條)相符, 僅是未有效落實。¹¹³

4. 替代監獄(Daiyo Kangoku)問題:

雖然委員會已注意到, 警察的調查和拘留權限已按《關於刑事和拘留所以及囚犯和被羈押者待遇法令》正式分離, 但依舊對替代監獄制度內部缺乏保障監督表示嚴重關切, 這會削弱締約國履行《公

¹¹³ Ibid. Para. 9.

約》規定義務的情況。尤其令委員會深感遺憾的是，根據該制度，警局可將嫌疑人拘留長達 23 天，期間會見律師的機會受到限制，特別是在逮捕後 72 小時之內，且不能保釋。缺乏對拘留所審前羈押有效司法控制和缺乏獨立有效的檢察和申訴機制也是一個引發嚴重關切的問題。此外，委員會對締約國所持的沒有必要廢除或改革審前羈押制度此立場(A/HRC/22/14/Add.1, 第 147.116 段)表示遺憾。¹¹⁴

5 偵訊與自白(confessions):

委員會注意到，《憲法》第 38(2)條和《刑事訴訟法》第 319(1)條均規定，通過酷刑和虐待獲取的自白，法院不予接受，還注意到締約國聲稱，定罪並非只依據自白，且偵訊準則確保不得強迫嫌疑人認罪。但委員會仍對以下情況抱有嚴重關切：

(a) 締約國的司法系統在實踐中嚴重依賴自白，而這些自白往往是在替代監獄內無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取得的。委員會現已收到關於在偵訊期間實施毆打、恐嚇、剝奪睡眠和長時間不間斷偵訊等虐待行為的報告；

(b) 並未強制規定在所有偵訊期間必須有辯護律師在場；

(c) 缺乏查核被拘留者在被警方拘留期間所受偵訊之做法是否恰當的手段，特別是，對連續偵訊的持續時間未作嚴格的時間限制；

¹¹⁴ Ibid. Para. 10.

(d) 在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就偵訊向檢察官提起的 141 項申訴中，無一項申訴引發訴訟。¹¹⁵

6. 申訴機制

雖然委員會現已獲得有關根據《關於刑事和拘留所以及囚犯和被羈押者待遇法令》(2007 年)所創建之上訴制度的資訊，但仍感到關切的是，缺乏獨立有效的申訴機制就相關指控展開公正調查並適當處罰加害者，故重申上次結論性意見(第 21 段)建議締約國應考慮建立一個專門、獨立和有效的申訴機構；在實踐中保護申訴人免遭因提起申訴或提供任何證據而招致的任何報復；彙編相關申訴數量的資料，以及關於刑事和紀律處分層面訴訟結果的資料。¹¹⁶

7. 拘禁環境

委員會仍對以下情況表示關切：

- (a) 某些設施內人滿為患，包括女子監獄；
- (b) 拘留所不能提供適當的醫療保健服務，且醫務工作人員嚴重短缺；
- (c) 監獄內精神保健服務供應不足，且有報告表明，患有精神病的囚犯普遍受到單獨監禁，由此導致企圖自殺的風險加大；

¹¹⁵ Ibid. Para. 11.

¹¹⁶ Ibid. Para. 12.

(d) 在使用二類手銬和緊身衣等束縛性工具方面缺乏適當的保障監督和監測機制。

故建議締約國應通過採取以下措施，改善監獄中的拘禁條件，使其符合《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

(a) 降低過度擁擠的高比例，尤其是，鑒於《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東京規則》)和《聯合國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規則》(《曼谷規則》)，擴大非監禁措施作為一種監禁替代辦法的適用範圍；

(b) 向所有被剝奪自由者提供適當的身體和精神保健服務

(c) 嚴格監控二類手銬的使用情況和使用時間，以便締約國履行應盡的《公約》義務，並考慮徹底禁止對拘禁人員使用束縛性工具。¹¹⁷

8. 單獨拘禁的使用：

委員會依舊深感關切的是，締約國內繼續常常不受時間限制地大肆長時間使用單獨監禁，並將隔離被拘禁者的決定權留予典獄長自由裁量。委員會感到遺憾的是，根據《關於刑事和拘留所以及囚犯和被羈押者待遇法令》，監所醫生直接參與對單獨監禁囚犯的定期醫療審查，這類做法可能會導致作為保障受刑人健康狀況主要因素的醫病關係惡化。

¹¹⁷ Ibid. Para. 13.

考慮到《公約》和《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委員會建議：日本應修改現行法，確保單獨監禁確保單獨監禁僅可用作最後手段且須在嚴格監督下使用，並儘量縮短使用時間，同時保留對此進行司法審查的可能性並就隔離決定制定明確具體的標準；建立單獨監禁期間對被拘禁者生理和精神健康狀況進行定期監測和審查制度；即便在單獨監禁期間亦應增加有益於其心理健康的社會接觸。

118

9 死刑：

(1) 委員會對締約國內死刑犯的拘禁條件深表關切，特別是在以下方面：

(a) 關於死刑犯的執行，存在不必要的保密和不確定性。誠如**法外處決、立即處決或任意處決問題特別報告員**所述，拒絕提前向被告及其家庭成員通知執行日期和時間明顯屬於侵犯人權行為

(E/CN.4/2006/53/Add.3, 第 32 段)；

(b) 被判處死刑者經常受到較長時間的單獨監禁，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超過 30 年，期間與外界的接觸受到限制；

(c) 獲得法律顧問援助的權利受到干預，包括在保密情況下接觸律師的機會受到限制；

¹¹⁸ Ibid. Para. 14.

(d) 鑒於有越來越多的被告人在行使上訴權的情況下被定罪且被判處死刑，且缺乏死刑案件強制上訴制度；

(e) 自 2007 年起，停止使用赦免權，且尋求赦免、減刑或緩刑的程序缺乏透明度；

(f) 有報告稱，即便是在法院已裁定犯罪者患有精神病的情況下，犯罪者仍被執行，如 Seiha Fujima 案，這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 479(1)條，該條禁止執行處於精神錯亂狀態的被拘禁者(第 2、11 和 16 條)。

(2)鑒於委員會(19、20 段)又根據和人權委員會(CCPR/C/GC/32, 第 38 段)先前所提出的建議，以及法外處決、立即處決或任意處決問題特別報告員的來文(A/HRC/14/24/ Add.1, 第 515 段及以後各段)作出建議，敦促締約國通過採取措施，確保向死刑犯提供《公約》規定的一切法律保障和保護，其中特別包括:考慮廢除死刑的可能性。¹¹⁹

10.培訓

締約國並未向所有移民官員提供關於《公約》的培訓，且未將《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有效調查和檔記錄手冊》(《伊斯坦堡議定書》)納入培訓方案。故建議應確保培訓方

¹¹⁹ Ibid. Para.15.

案，使所有官員，特別是法官和執法人員和監所和移民官員對《公約》的規定形成一定認識；

將《伊斯坦堡議定書》納入培訓方案；鼓勵非政府組織參與對執法官員的培訓；評估培訓方案對於預防和絕對禁止包括性別暴力和虐待在內的酷刑產生的效力和影響力。¹²⁰

11 救濟，包括賠償與復原

上次結論性意見所闡述問題仍然未改進，另外委員會關於《公約》第 14 條的第 3(2012)號一般性意見闡釋了締約國負有向酷刑受害者提供充分賠償的義務的內容和範圍。委員會提及該意見，建議締約國確保所有遭受酷刑或虐待的受害者均能充分行使其救濟權，包括獲得公正和充分的賠償和儘量使其復原，以及瞭解真相的權利。¹²¹

12. 慰安婦問題:

(1)雖然締約國已向委員會提供相關資料，說明已採取某些步驟，以承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慰安婦」實施暴行，但委員會仍對締約國在解決該問題時未能履行其應盡的《公約》義務深表關切，特別是：

¹²⁰ Ibid. Para. 17.

¹²¹ Ibid. Para. 18.

(a) 沒有向受害者提供充分賠償和使其復原；賠償資金來自私人捐助，而非公共資金，額度不足且力度不夠；

(b) 沒有起訴實施這類酷刑行為的犯罪者。委員會回顧，鑒於酷刑所造成的影響具有持續性，不應適用訴訟時效規則，受害者會因此無法獲得補償、賠償和復原；

(c) 掩蓋或沒有揭露相關事實和材料；

(d) 國家和地方級高級別官員和政治人士等官方人員，包括若干國會議員，繼續否認相關事實，讓受害者再度受創；

(e) 沒有實行有效的教育措施，以便預防基於性別的違反《公約》行為，其中特別是，學校歷史教科書中述及該問題的內容減少即為證明；

(2)除了指出日本仍然持續的種種缺失，亦提到締約國拒絕普遍定期審議(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期間關於該問題的若干建議

(A/HRC/22/ 14/Add.1, 第 147.145 段及以後各段) 這些建議類似於委員會(第 24 段)和很多其他聯合國人權機制，特別是人權事務委員會**(CCPR/C/JPN/CO/5, 第 22 段)**、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

(CEDAW/C/JPN/CO/6, 第 38 段)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

(E/C.12/JPN/CO/3, 第 26 段)和人權理事會若干特別程序任務負責人所提的建議。

(3)憶及第3號一般性意見，委員會敦促締約國立即採取有效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就「慰安婦」問題找到以受害者為本的解決辦法，特別是，起訴加害者並處適當刑罰；承認與調查相關事實；使受害者充分與有效的救濟與賠償，包括損害賠償，補足義務與盡可能完全復原的方法；就該問題對公眾開展教育，並將這些事件寫入所有歷史教科書，以此為手段，防止締約國進一步違反應盡的《公約》義務。¹²²

13 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和性別暴力：

有報告稱，性別暴力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家庭暴力、亂倫和妨害性自主(包括配偶間妨害性自主)，就這類案件提起的申訴、調查、起訴和定罪數量也很少，且對受害者的法律保護不夠充分。鑒於委員會(第25段)和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CEDAW/C/JPN/CO/6, 第31-34段)先前的建議，日本應加強努力以預防和起訴一切形式的性別虐待，包括家庭暴力、亂倫(incest)和妨害性自主(包括配偶間妨害性自主)。¹²³

15 精神衛生：

委員會依然對非自願且經常長期入住精神衛生機構的心理和智力方

¹²² Ibid. Para. 19.

¹²³ Ibid. Para. 20.

面的精神病患者人數居高不下表示關切。委員會另指出，單獨監禁、限制和頻繁強迫用藥，這些行動可構成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委員會建議：對非自願治療和安置實行有效的司法控制，以及建立有效的上訴機制；並加強相關申訴管道與法律保障，包括受害者調查與救濟；發展門診和社區服務，並減少長期生活在精神醫療照護機構的患者的數量；將限制措施和單獨監禁的醫療行為作為最後手段；獨立監測機構定期對所有精神機構進行視察。¹²⁴

16. 體罰

雖然委員會已注意到《預防虐待兒童法》第3條嚴禁虐待兒童，但委員會和兒童權利委員會抱有同樣的關切(CRC/C/JPN/CO/3, 第47段)，法律未明確禁止在家中和替代照護場所(alternative care settings)的體罰，且《民法》和《預防虐待兒童法》還允許採用適當的管教方式，對於在某些情形中是否可允許體罰也未作出明確規定。日本應通過法律明文禁止在所有環境中體罰兒童和實施一切形式有辱人格的待遇。¹²⁵

(另外，日本已於2007年10月1日批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¹²⁶)

¹²⁴ Ibid. Para. 22.

¹²⁵ Ibid. Para. 23.

¹²⁶ Ibid. Para. 4.

評析：

對於日本之國家報告，迄今委員會做成兩份結論性意見，從這兩份結論性意見可以觀察出委員會相當重視國內相關程序的設計，如：替代監獄、精神病院、移民收容所、單獨拘禁、死刑的程序等等，相關刑事訴訟程序或行政程序的設計不全會增加酷刑發生的可能性及阻礙公約的實現，特別是《公約》第 12 條主動調查、第 13 條申訴後調查、第 14 條補償，而這些程序的設計大致有幾個重點，即：監督的獨立性(監督與被監督者必須區分)、有效的法律保障、武器平等(辯護權、律師在場權等)、比例原則、救濟的有效性等等。實體面而言，特別值得注意者，在兒童體罰的議題與性別虐待的議題上也含括了家暴或家中的暴力，這說明了在某些情況，國家對水平的私人間亦有監督與預防酷刑和虐待的義務。

日本的實踐方面，其中相當值得注意為因日本的歷史而產生的慰安婦的問題，以及死刑的問題，特別是未事先通知死刑執行時間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也可能構成酷刑或虐待，而整體議題而言，觀諸兩次結論性意見，可以發現日本所改善的部分極為有限，不論是制度的缺失或是缺乏有效實踐，而許多缺失都是落在相關程序設計的不足。另外，在日本第二次結論性意見，委員會特別提到許多國際公約或國際文件以輔助公約的執行甚至建議日本批准，這或許就是說

明了人權的互補與一體性，在執行《公約》時亦須注意其他的國際公約與國際文件，此外，就兩份結論性意見多處所提及之國際標準為何？似乎有待商榷，而仍需從其他國家報告之結論性意見或者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報告、個人申訴及聯合國其他國際文件去抽絲剝繭。

(三) 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簡稱香港)第三次結論性意見摘要¹²⁷

一、委員會關切的問題

1. 可以用「合法許可權、理由或解釋」為被控犯有酷刑行為的人辯護以及《刑事罪行(酷刑)條例》第 427 章中關於公職人員的定義並不完全與《公約》第 1 條相符。¹²⁸
- 2 雖然引起委員會注意的情況證明有理由加以起訴，但尚未依據《刑事罪行(酷刑)條例》作出過起訴。¹²⁹
3. 《刑事罪行(酷刑)條例》並未包含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所有情況。¹³⁰
4. 香港有關難民的做法可能並不完全符合《公約》第 3 條。¹³¹

¹²⁷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U.N. Doc. A/55/44(SUPP) (2000) paras.106-145. 而前兩次之結論性意見則在英國之結論性意見中，本計畫僅就香港併入中國時期開始研究，另外，關於用語方面，在第三次結論性意見與第四次結論性意見均稱香港為「香港特別行政區」(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第五次結論性意見開始則稱「中國香港」(Hong Kong, China)，本文為行文通順，一律簡稱為「香港」，合先敘明。

¹²⁸ Ibid. Para. 138.

¹²⁹ Ibid. Para. 139.

¹³⁰ Ibid. Para. 140.

¹³¹ Ibid. Para. 141.

二、委員會建議

- 1.採取必要步驟以確保《公約》第1條所界定的酷刑受到有效起訴和恰當的制裁，並努力按照《公約》的條款防止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行為。¹³²
- 2.繼續努力使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成為一個法定機構並擴大其權限。¹³³
- 3.繼續並強化預防措施，其中包括對執法人員進行培訓。¹³⁴
- 4.使有關難民的法律和實踐完全符合《公約》第3條的規定。¹³⁵

香港第四次結論性意見摘要¹³⁶

一、積極面向

1. 委員會歡迎:

- (a)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條文納入香港法當中。

¹³² Ibid. Para. 142.

¹³³ Ibid. Para. 143.

¹³⁴ Ibid. Para. 144.

¹³⁵ Ibid. Para. 145.

¹³⁶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 Doc. CAT/C/HKG/CO/4(2009)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b) 於 2008 年 7 月 12 號所訂定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Ordinance)，其規定委員會將於 2009 年以法定機構形式開始運作。

(c) 警方從 2008 年 7 月 1 號開始適用搜索被拘禁人士(Searching of Detained Persons)的新準則，旨在確保在尊重個人的隱私與尊嚴前提下進行搜索。

(d) 處理家暴的措施，包含加強幫助受害者的服務與 2008 年 6 月通過的家暴修正法案。¹³⁷

2. 委員會注意到香港正採取必要步驟使《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Optional Protocol on the sale of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ornography)的條文生效，以擴大其適用範圍至香港。¹³⁸

二、委員會關切與建議

1. 酷刑的定義

(1) 委員會重申前次結論性意見所表達的關切，香港對於《刑事罪行(酷刑)條例》第 2 節(1)的「公職人員」定義過於狹隘，會阻礙起訴

¹³⁷ Ibid. Para. 3.

¹³⁸ Ibid. Para. 4.

酷刑罪行與造成實踐上的漏洞。¹³⁹

委員會建議香港宜考慮對於酷刑定義下的公職人員採取更包容性的定義以清楚包含所有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行為，委員會更進一步建議香港確保其定義包括《公約》第 1 條所載所有要素，包含一切形式的歧視。¹⁴⁰

(2) 委員會重申前次結論性意見所表達的關切，強調《公約》並不授權對於酷刑行為的任何可能例外。香港應考慮廢除《刑事罪行(酷刑)條例》第 3 節(4)的「合法權限、理由或解釋」的免責辯護條款，為此目的，締約國可以像《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一樣，將《公約》第 1 條納入其基本法。¹⁴¹

2. 難民與不遣返原則

委員會關切香港並未有關於難民的法律制度也未建立公平有效的難民地位決定程序，亦關切沒有計劃將 1951 年《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 1967 年議定書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¹⁴²

香港應

(a) 將《公約》第 3 條納入《刑事罪行(酷刑)條例》。

¹³⁹ Ibid. Para. 5.

¹⁴⁰ Ibid.

¹⁴¹ Ibid. Para. 6.

¹⁴² Ibid. Para. 7.

(b)考慮採用關於庇護的法律制度，建立一個全面有效的程序，在確定其根據《公約》第3條承擔的義務的適用性時，徹底審查每個案件的案情。

(c)確保有為被遣返、驅逐或引渡的個人制定適當審查決定機制。

(d)加強對被人口販運者，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的保護，包括復原和重返社會，這些人應被視為受害者而不是被定罪。

(e)確保有效的返回後監督安排。

(f)考慮將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及其1967年議定書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¹⁴³

3.移交逃犯與被判刑人士

委員會注意到香港與中國大陸間有關移交逃犯與被判刑人士的安排與死刑保障的討論已經包含在安排草案。¹⁴⁴

如果在移交逃犯與被判刑人士時訴諸於「有關死刑的保障」，香港應在下次報告提供委員會下列資料：在報告期間所發生關於適用保障或保證的移交或遣返案件數資訊；香港對於這些保障的最低要求的資訊；香港在這些案件的後續監督措施與這些保障的法律可執行

¹⁴³ Ibid.

¹⁴⁴ Ibid. Para. 8.

性。¹⁴⁵

4. 培訓

委員會歡迎《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有效調查和檔記錄手冊》(《伊斯坦堡議定書》)(Manual on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Istanbul Protocol)分發於相關專業人士當中。委員會注意到衛生保健專業人士普遍意識到有關虐待甚至酷刑跡象的資訊，委員會強調為醫生與其他保健專業人士設計更加具體的培訓方案的重要性以查明與紀錄酷刑的跡象並在司法與醫療機構增加對性別敏感治療(gender sensitive treatment)的培訓。香港應確保衛生保健專業人士具有必要的培訓與資訊以識別與查明可能指出發生酷刑的跡象與特徵並提供在司法與醫療機構中提供性別敏感治療。¹⁴⁶

5. 脫衣搜身和身體檢查

委員會歡迎在新修正的準則的程序中，指派的官員必須根據客觀與可識別標準(objective and identifiable criteria)以正當化搜索的範圍

¹⁴⁵ Ibid.

¹⁴⁶ Ibid. Para. 9.

與行為。¹⁴⁷

委員會關切:

(a) 警察局長決定每個被員警拘留的人每次進入拘留設施時都必須被搜索，不論是否有任何客觀正當化的理由都要被自動搜索。

(b) 關於濫用脫身搜索的指控，包括入境事務處與香港懲教署。

(c) 關於對進入監獄的人進行例行性身體檢查的指控。¹⁴⁸

香港應:

(a) 確保警方在有合理和清晰理據的情況下才可以對被拘留人士進行脫衣搜身。如進行脫衣搜身，應以侵擾程度最低的方式進行，並應完全符合《公約》第 16 條的規定，亦應提供獨立機制，當被拘留人士提出要求時，監督該等搜索。

(b) 制定明確及嚴謹的準則，管制所有執法人員(包括入境事務處和懲教署的人員)進行脫衣搜身。如已制定該等準則，執法人員應嚴格遵守，當局亦應不斷監督執法人員是否有遵守準則，所有搜索應記錄在案，如有任何濫權情況，應徹底調查，而如濫權個案屬實，應受到處罰。

(C) 尋求使用替代方法為囚犯進行例行檢查，以取代體腔檢查，只

¹⁴⁷ Ibid. Para. 10.

¹⁴⁸ Ibid.

有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才可進行身體檢查，且應由曾受訓練的醫護人員進行，並須適當顧及被搜索人士的隱私和尊嚴。¹⁴⁹

6. 警方行動

委員會歡迎 2007 年審查與修正的關於性交易犯罪中從事警務行動官員的行為準則，然而，委員會關切在這些行動期間警方例行濫權的指控。香港當局應徹底調查所有聲稱警方在採取行動打擊與性交易有關罪行時濫用職權的指控。如指控屬實，應按情況作出起訴及懲處。香港亦應透過培訓及提高意識等活動，糾正任何現時認為該等濫權行為可予縱容的看法。¹⁵⁰

7 對於警方不當行為的獨立調查

委員會歡迎香港依照前次委員會建議將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轉化成法定機關。然而，委員會關切，雖然法定框架加強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的獨立性，其僅具有監督與審查員警投訴課的活動之諮詢性與監督功能，員警投訴課事實上仍然是處理與調查警方不當行為投訴的機關。委員會亦關切儘管有對員警投訴課投訴的可觀案件量，當中僅少數被視為屬實，且僅有一案的官員以

¹⁴⁹ Ibid.

¹⁵⁰ Ibid. Para. 11.

刑事犯罪被起訴。¹⁵¹

香港應繼續採取步驟，設立完全獨立的機制，接受及調查有關警方不當行為的投訴。該機構應具備所需的人力及財政資源，並擁有行政權力，就有關投訴的調查及所得結果 制定具約束力的建議，以符合《公約》第 12 條的要求。¹⁵²

8 家庭暴力

委員會關切香港關於家暴的高發生率，香港應

- (a) 徹底調查所有有關家庭暴力的指控。如屬實，應按情況起訴與處罰。
- (b) 透過立法、政策及社會措施加強努力，遏止家庭暴力問題。
- (c) 推行公共資訊及提高意識的活動，並啟發市民多作討論，以期糾正可能導致婦女受到暴力對待的看法及刻板印象。
- (d) 在下次定期報告提供更多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包括經由將予加強的家庭暴力資料庫取得的進度資料。¹⁵³

9.最後委員會鼓勵香港完成使《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書》(Optional Protocol on the sale of

¹⁵¹ Ibid. Para. 12.

¹⁵² Ibid.

¹⁵³ Ibid. Para. 13.

children, child prostitution and child pornography)生效的程序以擴大適用範圍至香港。¹⁵⁴

香港第五次結論性意見¹⁵⁵

一、積極面向

1. 委員會歡迎香港在與《公約》相關的領域採取以下立法措施：

(a) 通過《2012年入境(修訂)條例》(2012年第23號條例)，建立了《公約》第3條免遣返保護聲請的法定程序；

(b) 2008年和2010年修訂《家庭暴力條例》，將其保護延伸至前配偶、前同居情侶、同性同居情侶和前同性同居情侶。¹⁵⁶

2. 委員會還歡迎為實施《公約》而採取措施或修訂政策和行政措施，包括：

(a) 接待中心自2012年起逐漸引進低放射性X光人體掃描器，以取代身體搜檢。

(b) 2014年通過行政辦法(即所謂「統一審核機制」)，把免遣返保護延伸到：(a)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三條，以酷刑、殘忍、不人道

¹⁵⁴ Ibid. Para. 14.

¹⁵⁵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fifth periodic report of China with respect to Hong Kong, China, U.N. Doc. CAT/C/CHN-HKG/CO/5 (2016)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¹⁵⁶ Ibid. Para. 4.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為由提出聲請；以及(b)根據 1951 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以免遣返原則所指的「迫害」為由提出聲請。

(c) 向醫療專業人員和入境處職員組織關於《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有效調查和檔記錄手冊》(《伊斯坦堡議定書》)的專門培訓方案。

(d) 2013 年修訂《檢察守則》(prosecution code)，規定了檢察官處理強迫勞動案件的指導意見。

(e) 成立了一個獨立的性別承認問題工作組，研究香港保障變性人士的權利所須的法例和相關行政措施。¹⁵⁷

二、委員會關切與建議

1. 前一報告週期遺留的後續問題

(1) 委員會關切，根據香港提供的資料，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5 月共有 6,628 份不遣返聲請，其中僅有 32 份被認為有事實依據，這表示給予保護的門檻極高。委員會還考慮到，有報告稱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不公佈相關決定，聲請人在設法瞭解這些決定時面臨困難，因而妨礙對其案件進行有效準備。此外，委員會還關注有計劃打算採取加快系統的辦法，處理大量積壓的未決聲請(目前有 10,000 多件)，因為這一措施可能對審核程序的公平性和透明性造成負面影

¹⁵⁷ Ibid. Para. 5.

響。委員會關切香港的立場是，延伸適用 1951 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會導致我們的入境制度遭到濫用，從而有損公眾利益」，這個立場給人的表面印象是把所有需要保護的聲請人描述成濫用制度的人。在這方面，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除非聲請人超過簽證期限而正式成為「非法」人員，否則其不遣返聲請就得不到理會，迫使潛在的酷刑受害者一直等到簽證期滿，才能在統一審核機制登記，獲得復原和人道主義援助的機會。委員會還關切，由於統一審核機制的聲請人得不到難民地位，他們也就沒有合法工作的機會，從而迫使他們長期在貧困線以下靠物資援助生活(第 3 條)。¹⁵⁸

(2) 委員會呼籲香港審查不遣返聲請審核程序，從而確保需要國際保護的人，包括逃離肆意暴力侵害的人，得到充分保護，不被遣返。

159

香港應：

(a) 確保所有希望聲請保護的個人，無論其移徙身份如何，均可不受阻撓地求助於統一審核機制。

(b) 確保審核程序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措施包括：確保不遣返聲請得到透徹的逐案審查；允許聲請人有充足的時間充分表達聲請理由、

¹⁵⁸ Ibid. Para. 6.

¹⁵⁹ Ibid. Para. 7.

獲取和出示關鍵性證據，如自己醫生的專家證據；將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的決定作刪節後予以公佈，等等。

(c) 建立若干機制，使酷刑受害者得到儘早識別、優先進入統一審核機制，並立即得到補救。

(d) 給予難民和有事實依據的統一審核程序聲請人某種替代移徙地位，使他們在程序結束前能夠合法留在香港，並方便其獲得合法工作，從而避免貧困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e) 考慮適用 1951 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 1967 年《議定書》。¹⁶⁰

(3) 委員會回顧之前的建議(見 CAT/C/HKG/CO/4, 第 12 段)，表示繼續關切仍在由作為警方單獨部門之一的投訴員警課調查對員警的投訴。委員會亦關切，對於投訴員警課調查活動，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仍是一個自己沒有調查權的諮詢和監督機構。委員會表示遺憾的是，香港沒有提供完整的統計數據，說明投訴員警課在報告所述期間收到的酷刑或虐待投訴的數量(包括濫用員警權力的投訴)，以及這些投訴的結果。委員會還關切，缺乏獨立有效的投訴機制，無法在警務處、入境事務處或懲教署管理的拘留設施內提起投訴而不用擔心報復(第 12 條和第 13 條)。¹⁶¹

¹⁶⁰ Ibid.

¹⁶¹ Ibid. Para. 8.

(4) 委員會重申之前的建議：香港應考慮建立一個完全獨立的機制，有權受理和調查對所有官員的投訴，並確保該特定機構的調查人員與構成投訴理由的行為的嫌疑人之間不存在機構關係或級別關係。

¹⁶² 委員會還促請香港：

(a) 確保檢察官辦公室被妥善告知該特定機構受理的所有酷刑或虐待的指控，並在有合理理由相信發生了酷刑和虐待行為時自主啟動調查。

(b) 在遵守無罪推定原則的前提下，確保被指稱的酷刑和虐待行為人立即停職，並在調查期間維持停職狀態。

(c) 在所有拘留場所設立保密的投訴機制，以便利酷刑和虐待的受害者向調查機構提交投訴，包括獲得醫務證據以支持其指控，並確保在實踐中保護投訴人，不因投訴或出具任何證據而受到報復。

(d) 確保所涉行為的嫌疑人依法得到起訴和審判，如被定罪，應以與行為嚴重程度相稱的方式予以懲處。¹⁶³

2. 酷刑的定義

(1) 委員會仍然關切的是，公職人員一詞缺乏一個適用範圍更廣的定義。此外，香港沒有採取行動廢除《刑事罪行(酷刑)條例》第 3(4)

¹⁶² Ibid. Para. 9.

¹⁶³ Ibid.

條可作為香港法律下或非法行為發生地法律下的免責辯護依據的

「合法許可權、理由或解釋」。委員會重申，禁止酷刑是絕無例外，不允許任何可能的免責辯護理由。「合法許可權、理由或解釋」這種辯護依據的範圍寬於《公約》第 1(1)條，因而會導致違背《公約》(第 1 條和第 4 條)。¹⁶⁴

(2). 委員會重申之前的建議，香港應修訂立法，在其中納入完全符合《公約》、涵蓋第 1 條所載全部要素的酷刑定義。為此，香港應再次考慮：

(a) 對公職人員一詞採用適用範圍更廣的定義，從而確保可以因酷刑行為起訴所有公職人員或以公職身份行事的其他任何人；

(b) 廢除《刑事犯罪(酷刑)條例》第 3(4)條所載的免責辯護條款。關於執行《公約》第 2 條的第 2 號一般性意見(2007 年)，其中特別寫明，禁止酷刑這一點是絕無例外的；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況作為酷刑行為的辯護理由(第 5 段)。委員會還提醒，《公約》中的定義若與國內法中納入的定義有重大差距，就會出現實際或可能的漏洞，從而導致有罪不罰(第 9 段)。¹⁶⁵

3. 拘留問題與基本法律保障

¹⁶⁴ Ibid. Para. 10.

¹⁶⁵ Ibid. Para. 11.

(1) 委員會表示關切的是，持續有報告稱示威活動中的人員受到大規模拘留，以及據稱被拘留者的法律保障受到限制。據香港提供的資料，511 人因與 2014 年 7 月 1 日年度遊行後的集會相關而被捕；委員會表示關切的是，拘留期間僅有 39 名律師與被拘留者會面(第 2 條和第 16 條)。¹⁶⁶

(2). 香港應在實踐中確保所有被拘留者從自由被剝奪之時起就獲得所有基本法律保障，包括有權毫不遲延地獲得律師協助、立即獲得獨立醫生的檢查和治療而無須官員的許可、被告知逮捕的原因以及所受任何指控的性質、在拘留場所得登記、迅速把被捕情況通知近親屬或協力廠商，並被毫不遲延地見到法官。香港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遵守法定逮捕程序，並監督公職人員遵守法律保障措施的情況，還應確保涉嫌不遵守法律保障措施或無合理理由便逮捕他人的人受到調查，如被定有罪，應依法受到制裁。¹⁶⁷

4. 控制示威時過度使用武力

(1) 委員會表示關切的是：持續有報告說，2014 年為期 79 天的所謂“雨傘”運動或“占中”運動期間曾對示威者過度使用催淚瓦斯、警棍和噴霧；警方對 1,300 多人使用了暴力，約 500 人隨後入醫

¹⁶⁶ Ibid. Para. 12.

¹⁶⁷ Ibid. Para. 13.

院；有指控稱，示威者聽從指示離開現場時受到警方的性暴力威脅和攻擊威脅；反示威者(counter-demonstrators)實施的多起暴力事件；對於投訴員警課在抗議期間收到的投訴及其調查情況，共有 2,078 名投訴人提起 527 宗投訴，其中只有 172 宗投訴被認為「須彙報」(reportable)。在這 172 宗須彙報的投訴中，投訴員警課把 151 宗的調查報告提交給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投訴課認為這些投訴無事實依據。投訴委員會認可了投訴課對 104 宗投訴的結論；缺乏資料說明投訴委員會沒有認可的 47 宗投訴的結果(第 12 條、第 13 條和第 16 條)。¹⁶⁸

(2)香港應：

- (a) 對 2014 年所謂雨傘運動或佔中運動抗議期間警方和反示威者過度使用武力的指控開展獨立調查。
- (b) 依法起訴受到被指控的行為人，包括共同參與這些行為或允許其發生的警官，確保被認定有罪的人被定罪並處以適足刑罰；
- (c) 對受害者提供全面救濟，包括公平和適足的賠償。
- (d) 公佈警方的一般命令和使用武力的相關準則，確保其符合國際標準。
- (e) 加強對所有執法人員的持續培訓，內容包括：絕對禁止酷刑，使

¹⁶⁸ Ibid. Para. 14.

用武力的國際標準，以及執法人員對過度使用武力事件的責任。

169

5. 監督和視察拘留場所

(1) 香港提供的資料說明警方的每個拘留設施都指定了值日官，負責對拘留條件的日常檢查，委員會表示關切的是，缺乏資料說明其任務的獨立性和報告義務。關於行政長官任命的巡獄治安官(舊譯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委員會感到遺憾的是缺乏資料說明他們建議的有效性。香港也沒有提供資料說明入境事務處管理的設施內有哪些現有的監督機制(第 11 條、第 13 條和第 16 條)。¹⁷⁰

(2) 香港應授權治安官對所有拘留場所進行監督和訪問，否則應設立一個獨立機構，負責對警務處、懲教署和入境事務處管理的所有拘留場所進行有效的突擊訪問。這一機構的建議應及時、透明地予以公佈，香港當局應根據其調查結果採取行動。¹⁷¹

6. 單獨監禁和使用約束手段

(1) 代表團提供的資料表明，2014 年，因紀律處分而受到單獨監禁的平均期限是 7.45 天；但委員會仍然表示關切的是，根據《監獄規則》第 63(1)(b)條，這一措施的施用最長可達 28 天。委員會還表示

¹⁶⁹ Ibid. Para. 15.

¹⁷⁰ Ibid. Para. 16.

¹⁷¹ Ibid. Para. 17.

關切的是，可以基於模糊的理由實施《監獄規則》第 68B 條所載的「中止與其他囚犯的交往」措施，例如「為維持秩序或紀律，或為任何囚犯的利益」，起初為期不超過 72 小時，以後可按月作出該命令，沒有上限。對於機械約束(mechanical restraints)手段，委員會表示遺憾的是，儘管委員會有具體要求，但香港沒有提供資料說明使用機械約束手段的種類、平均期限和頻率(第 16 條)。¹⁷²

(2)香港應：

- (a) 按照國際標準，縮短單獨監禁的最長期限，限定單獨監禁用作最後措施，盡可能縮短其時間，加以嚴格監督，並保留司法審查的可能性。香港應在法規中制訂作出單獨監禁決定的清晰、具體標準，說明相關的行為、種類和最長期限；
- (b) 禁止對監獄中的智力或社會心理殘疾人士、青少年、孕婦、養育嬰兒的婦女和哺乳母親使用單獨監禁。
- (c) 確保在對被拘留者實行單獨監禁時的正當程序權利，例如獨立聽審的權利和上訴權。
- (d) 盡可能避免使用約束手段，或者侵犯性較輕的替代辦法無效時，才將其用作最後措施，且時間應盡可能短；

¹⁷² Ibid. Para. 18.

(e) 彙編並定期公佈有關單獨監禁的使用(包括相關的自殺未遂和自傷情況)的全面分列資料。¹⁷³

7.人口販運和強迫家事工作勞動

(1)雖然《檢察守則》作出修訂，把強迫勞動納入人口販運的定義中，但委員會關切，尚未對立法框架作出同步變更。

在此方面，委員會對許多報告外籍移工遭到剝削的案件表示關切。

委員會還表示遺憾的是，香港繼續維持可能助長強迫勞動風險的移民政策，例如關於在雇主家庭的「留宿規定」，以及「兩星期規

則」，根據這一規則外傭必須在契約終止後兩星期內離境。雖然被確

定為販運行為受害者的人有可能獲准免於因非法入境而被起訴，但

委員會表示關切的是，這種可能性取決於警務處、入境處和勞工處

的自由裁量，販運行為或強迫勞動的受害者仍然因非法逗留而受到

起訴(第 2 條、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和第 16 條)¹⁷⁴。

(2)香港應：

(a) 進行必要的修法，以採用《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

防止、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

(the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¹⁷³ Ibid. Para. 19.

¹⁷⁴ Ibid. Para. 20.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關於販運行為的定義。

(b) 廢除「兩星期規則」並允許自住安排(live-out arrangements)，從而避免外籍移工受到酷刑和虐待。

(c) 修訂立法，禁止同職業介紹所和融資公司作出與債務奴役相關的資金安排，消除關於必須把職業介紹所用作仲介的強制要求，並且降低過高收費。

(d) 大力實施相關立法框架，開展迅速、透徹、有效和公正的調查，在起訴和定罪的案件中，對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的犯罪行為人包括對涉案官員和機構應處以適當刑罰。

(e) 對在一線接觸人口販運的人員提供識別販運行為受害者的專門培訓，特別是因性交易或入境違規而被捕的婦女，對此類受害者立即提供復原和援助。

(f) 向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的所有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濟，不論其是否有能力在針對販運者的法律訴訟中提供合作，均保證其獲得及時且適足的心理支持、醫護、社會福利、適足的庇護所和工作許可；

(g) 加強雙邊、區域和國際合作，防止販運行為和強迫勞動，尤其與外籍移工的派遣國合作，從而根除事實上的債務奴役契約、條件嚴

苛的貸款協議和過高的仲介收費。¹⁷⁵

8. 移交逃犯與被判刑人士

(1). 委員會注意到，代表團的立場是，與中國大陸就移交逃犯和被判刑人士的安排進行的協商是內部事務，對這些安排不可視為《公約》第 3 條和第 8 條下的引渡協議。然而，委員會認為，香港有義務預防被移交的罪犯或被判刑人士回到中國大陸或經由中國澳門移交後在被拘留或入獄期間面臨酷刑或虐待的風險

(第 2 條和第 3 條)。¹⁷⁶

(2). 委員會促請香港，確保關於把罪犯或被判刑人士從香港或經由中國澳門移交給中國大陸的任何協議符合《公約》義務，並且含有充足的法律保障措施、適當的司法監督機制，以及移交後的有效監督安排，從而保護逃犯在返回或間接移交後不受酷刑或虐待。如果有重大理由相信逃犯在回國或間接通過中國澳門移交後有受到酷刑或虐待的危險，香港不應將該逃犯移交給中國大陸。¹⁷⁷

9. 培訓

¹⁷⁵ Ibid. Para. 21.

¹⁷⁶ Ibid. Para. 22.

¹⁷⁷ Ibid. Para. 23.

(1). 雖香港努力向衛生專業人員和入境處官員提供關於《伊斯坦堡議定書》的培訓，但委員會表示遺憾的是，缺乏資料說明制訂要求在實踐中運用該議定書的準則的情況、亦缺乏資料說明接受過關於《公約》規定和關於預防酷刑培訓的人員的比例(第 10 條)。¹⁷⁸

(2). 香港應為所有參與處理和拘禁被剝奪自由者的官員提供關於《伊斯坦堡議定書》的培訓，並制訂要求工作人員在實踐中運用該議定書的準則或規章，還應確保為所有官員以定期和強制方式組織關於《公約》規定和關於《伊斯坦堡議定書》的培訓，輔以執行準則，並制訂評估這些教育和培訓方案有效性的方法。¹⁷⁹

10 補償和復原

(1) 委員會表示遺憾的是，缺乏資料說明是否存在一個可依法執行的請求復原權利，是否存在一個向酷刑受害者提供這些服務的具體機制(第 14 條)。¹⁸⁰

(2) 委員會回顧關於締約國對第 14 條的執行的第 3 號一般性意見(2013 年)，促請香港：

¹⁷⁸ Ibid. Para. 24.

¹⁷⁹ Ibid. Para. 25.

¹⁸⁰ Ibid. Para. 26.

- (a) 採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保障酷刑和虐待的受害者獲益於於一切形式的補救，包括恢復原狀、賠償、復原、滿足和保障不再犯。
- (b) 全面評估酷刑受害者的需要，確保具備專門、整體的復原服務，並且可以不受歧視地及時加以利用。¹⁸¹

11. 跨性別人士和雙性人士(Transgender and intersex persons)

(1). 有報告稱跨性別人士為了獲得對其性別認同的法律承認，必須完成性別再造手術，其中包括去除生殖器官、絕育和生殖器再造術。委員會還表示關切的是，雙性兒童為確定性別必須在年幼時就接受不必要且不可逆的手術。委員會還對這些做法造成的長期身心創傷表示關切(第 10 條、第 12 條、第 14 條和第 16 條)。¹⁸²

(2). 香港應：

- (a) 採取必要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保障尊重跨性別人士和雙性人的自主和身心完整，包括取消關於跨性別人士性別認同法律承認的侮辱性前提條件，例如絕育。
- (b) 保障為所有雙性兒童及其父母提供公正的諮詢服務，以便向他們告知為決定兒童性別而接受不必要和非緊迫手術和其他醫治的後

¹⁸¹ Ibid. Para. 27.

¹⁸² Ibid. Para. 28.

果，並向他們告知將這種治療或手術的決定推遲到當事人具備自主決定能力之時的可能性。

(c) 保障在與雙性人的醫治和手術治療相關的方面做到充分、自由和知情同意(full,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把非緊迫、不可逆的醫學干預推遲到兒童足夠成熟，能參與決定並能作出充分、自由和知情同意。

(d) 為這些做法對一些雙性人造成的身心創傷提供適足補救。¹⁸³

評析

1. 首先，最重要者為酷刑之定義，這也是許多國家難以跨過的關卡，香港方面則是在公職人員的定義無法達到委員會的要求，且遲未廢除關於酷刑的例外條款，或許正是因為酷刑或其他不人道待遇對人權的侵害性重大，故在保護方面不能有任何例外。

2. 香港的結論性意見中較為特別及有趣的是，即使將相關囚犯等移交回中國大陸或澳門亦可能違反《公約》第3條義務。詳言之，雖然代表團認為關於與中國大陸就移交逃犯和被判刑人士的安排進行的協商是內部事務，對這些安排不可視為《公約》第3條和第8條下的引渡協議。然而，委員會認為，香港有義務預防被移交的罪犯或被判刑人士回到中國大陸或經由中國澳門移交後在被拘留或入獄

¹⁸³ Ibid. Para. 29.

期間面臨酷刑或虐待的風險，如果有重大理由相信逃犯在回國或間接通過中國澳門移交後有受到酷刑或虐待的危險，香港不應將該逃犯移交給中國大陸。¹⁸⁴

3.外籍移工的剝削甚至強迫勞動亦為委員會所關切，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除了應修訂對剝削受害者不利的移民政策，還需修改仲介等相關法律，甚至提供心理支持、醫護、社會福利、適足的庇護所和工作許可等，並為了根除此一現象，加強雙邊、區域和國際合作，防止販運行為和強迫勞動，尤其與外籍移工的派遣國合作。¹⁸⁵

這顯示打擊酷刑或類似行為除了應預防公權力施加於人民的酷刑等行為，亦是要避免水平私人之間的酷刑等行為¹⁸⁶並避免其處於更不利的地位，亦強調治本與提供相關協助，這都顯示政府防止酷刑所做相關措施必須是建立於積極性與有效性的出發點，亦即政府在此應主動積極保護人民，並提供相關協助，而非只是消極地避免酷刑等行為，從而使任何人實質上免於酷刑等行為的侵擾，另外，台灣亦有許多外籍移工，應可認為值得參照委員會的相關意見。

4.委員會提及許多國際公約、國際文件、國際標準，這或許就是說明了人權的互補與一體性，在執行《公約》時亦須注意其他的國際

¹⁸⁴ Supra note 50-51.

¹⁸⁵ Supra note 49.

¹⁸⁶ 委員會關注的家庭暴力問題亦為一例。

公約與國際文件，惟確切之國際標準為何？尚須搭配其他文件研讀才可以清楚知道委員會所指國際標準為何？

5. 香港在立法或行政上已做了相當改進，委員會關切之處，除了立法與行政許多有待改進的部分，亦包括實踐部分，例如：警察投訴的處理狀況、警察執法時濫用武力的情況，故除了需要關注法規範的改進外，亦須注意實踐上的落實。

(四) 法國第二次結論性意見摘要¹⁸⁷

一、積極方面

委員會高興地注意到以下積極方面：

(a) 法國政府顯然決心禁止酷刑，新的《刑法》第 221-1、222-1 和 432-4 至 432-6 條的有關規定可特別說明這一點。

(b) 對立法和目前做法有一些計畫中的改進，如設立最高道德委員會；起草實際道德手冊供警察部隊使用；有關監獄監測的準則；重新恢復最高監獄行政委員會；對多數犯罪，拘留一開始就應有律師在場的原則以及限制審判前拘留的時間。

(c) 宣佈為聯合國酷刑受害者自願基金更多捐款。¹⁸⁸

二、妨礙《公約》條款實施的因素和困難

¹⁸⁷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U.N. Doc. A/53/44(SUPP) paras. 137-148(1998)

¹⁸⁸ Ibid. Para. 141.

委員會注意到對於在法國實施《公約》沒有特別的障礙。¹⁸⁹

三、關切問題

1. 委員會關切下列問題:

- (a) 在法國的成文法中沒有符合《公約》第 1 條。
- (b) 「適當起訴」(appropriateness of prosecution)的制度使公訴人可以決定不起訴犯有酷刑行為者,甚至可以不下令進行調查,這顯然與《公約》第 12 條的規定相抵觸。
- (c) 有些取證程序並不明確禁止承認使用酷刑取得的證據,這違背《公約》第 15 條。
- (d) 儘管法國法院宣佈這種做法非法,警方仍將一些人交給別國的警方,這種做法違反《公約》第 3 條。
- (e) 有一些零星的指控,說警察和憲兵在逮捕嫌犯和審問期間使用暴力。¹⁹⁰

2. 建議

- (1) 應考慮將《公約》第 1 條的對酷刑的定義納入刑法。¹⁹¹

¹⁸⁹ Ibid. Para. 142.

¹⁹⁰ Ibid. Para. 143.

¹⁹¹ Ibid. Para. 144.

(2)《公約》第3條的規定，這些條款同樣適用於驅逐和引渡，如若干非政府組織所要求和全國人權問題諮詢委員會所提議，因被拒絕入境而被驅逐者，應當可以提出一項暫緩執行上訴(suspensive appeal)。¹⁹²

(3)應特別注意有關警察部隊成員使用暴力的指控,以鼓勵進行公正的調查，如果證據確鑿，應給予適當的處罰。¹⁹³

(4)為了遵守《公約》第12條的文字和精神,締約國應考慮廢除現行的「適當起訴」制度,以排除有關對主管當局義務的一切疑問，這些當局都應對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在其管轄境內的任何地方所發生的一切酷刑案件，進行系統和主動的公正調查。¹⁹⁴

法國第三次結論性意見摘要¹⁹⁵

一、積極面向

(a)2000年6月所創設的國家安全道德準則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Security Ethics, CNDS)，提供關於警察行為的全面報告。

¹⁹² Ibid. Para. 145.

¹⁹³ Ibid. Para. 146.

¹⁹⁴ Ibid. Para. 147.

¹⁹⁵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 FRANCE, U.N. Doc CAT/C/FRA/CO/3(2006)(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b)根據 2003 年 11 月監督拘留中心和設施及等待區的國家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Monitoring of Holding Centres and Facilities and Waiting Areas)條例，確保「被安置或被拘留的外國人的權利被尊重」和「尊重此類設施中管制衛生，環境衛生，便利設施與裝置的規則」，如締約國所表明，其委員會即將開始運作。

(c)衛生部與迫害流亡受害者協會 (Association for the Victims of Repression in Exile, AVRE)所出版的手冊幫助醫護人員辨認酷刑的後遺症。

(d) 2003 年 12 月的法律對那些不符合 1951 年《難民地位公約》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的難民要件」以及「那些在其母國可能會暴露在死刑或酷刑或不人道、有辱人格待遇與處罰的嚴重風險」的任何人給予輔助保護。

(e)締約國從 1982 年對聯合國援助酷刑受害者自願基金 (United Nations Voluntary Fund for Victims of Torture)的持續援助及其對基金大幅增加捐助。

(f)即使相關行為發生在法國境外，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也得以獲得賠償的機制。

(g) 締約國簽署《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任擇議定書》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且正在採取步驟批准。

(h)締約國在2000年6月批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並採取相關措施將其國內法化。¹⁹⁶

二、委員會關切與建議

1. 酷刑定義

雖然注意到締約國在立法層面對於應為酷刑行為負責者的起訴與處罰的規定，委員會仍然關切法國刑法沒有符合《公約》第1條的酷刑定義的條文。委員會重申其建議(A/53/44,para.144)，締約國應考慮將酷刑定義納入其刑法中以嚴格符合《公約》第1條的定義，以區分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事的任何其他人、或在其唆使或同意或默示之下所犯的酷刑行為和非國家行為方所犯的廣義暴力行為。此外並建議，應將酷刑定為不受時效限制的罪行。¹⁹⁷

2. 不遣返

(1)委員會對締約國的庇護程序感到關切，因為他們目前沒有區分基

¹⁹⁶ Ibid. Para. 4.

¹⁹⁷ Ibid. Para. 5.

於《公約》第3條的庇護申請和其他種類的庇護申請，從而增加了某些人將回到一個有遭受酷刑風險的國家。委員會還對在優先程序下對於行政收容中心或邊境提出的申請的審查的速決本質表示關切，這種程序不能評估《公約》第3條所涵蓋的風險。¹⁹⁸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應考慮採用一種程序，以區分根據《公約》第3條和其他種類的庇護申請，以確保若個人返回第三國，對任何有可能遭受酷刑風險的人提供絕對保護。委員會還建議，應根據第3條的規定，對《公約》第3條所涵蓋的情況進行更徹底的風險評估，包括系統性的個別訪談以更好地評估個人風險、提供免費口譯服務。¹⁹⁹

(2) 關於臨時暫緩執行令(interim suspension order)或臨時禁制令(interim injunction)，委員會關注的是這些程序並不具暫緩執行性質(non-suspensive)，因為在提出上訴後法官做出暫緩遣返令(suspension of the removal order)決定之前，行政當局可以依職權強制執行拒絕入境的決定。²⁰⁰

委員會重申其建議(A/53/44，第145段)，涉及遣返令的遣返決定(拒絕入境)應允許當事人提起在上訴的那刻開始生效的暫緩

¹⁹⁸ Ibid. Para. 6.

¹⁹⁹ Ibid.

²⁰⁰ Ibid. Para. 7.

遣返上訴(suspensive appeal)。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採取必要措施，確保遭處以遣返令的個人能夠獲得所有現有救濟，包括根據《公約》第 22 條將其案件移交禁止酷刑委員會。²⁰¹

(3)委員會關切的是，由於 2003 年 11 月生效的法令，任何被遣返(拒絕入境)之人在決定執行之前不再自動被允許停留完整一天，而需要明確地要求，若要求未果，個人將被立即遣返。(第 3 條)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被遣返(拒絕入境)的個人自動享有停留完整一天的權利(即在這完整的一天不會被驅逐與遣返等)，並以他們可以理解的語言通知此項權利。²⁰²

(4)委員會關切 2003 年 12 月引進「內部庇護」(internal asylum)「安全原籍國」(safe country of origin)的概念，卻未保證個人在另一國有遭受酷刑的風險時有絕對性的保護。委員會疑惑締約國將《關於歐洲逮捕令和成員國之間移交程序的框架決定》(the Framework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European arrest warrant and the surrender procedures between member States)(No. 2002/584/JHA of 13 June 2002)納入國內法時卻未納入其中關於「任何人在另一國家有遭受酷刑、死刑、或其他不人

²⁰¹ Ibid.

²⁰² Ibid. Para. 8.

道、有辱人格待遇與處罰的重大風險時，不得被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的」規定(第 3 條)。²⁰³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關於「內部庇護」「安全原籍國」的相關申請，適當考量申請人的個人狀況並完全符合《公約》第 3 與 22 條。建議應採取立法措施納入「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的規定。²⁰⁴

(5)關於法國許多城市的暴動，內政部長曾表示要求行政長官立即驅逐在暴動期間被判有罪之相關個人，無論其行政地位如何，委員會對此言論深表關切。委員會擔心，針對這一言論所採取的行動可能會產生歧視性效果，因它不僅針對沒有適當文件的外國國民，而且針對因裁判剝奪其國籍的歸化法國公民和合法居住在法國的外國人。²⁰⁵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保證若個人返回第三國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不得將該人驅逐至該國，亦強調不應將驅逐當作處罰性的措施，並建議確保有關個人有公平審判權。²⁰⁶

(6)委員會注意到，在 Ricardo Barrientos 先生和 Mariame Geto Hagos 先生於 2002 年被強行遣返期間去世後，隨後在 2003 年 6 月即發布

²⁰³ Ibid. Para. 9.

²⁰⁴ Ibid.

²⁰⁵ Ibid. Para. 10.

²⁰⁶ Ibid.

了關於遣返缺乏適當文件的外國人的新指示，禁止任何形式的口腔堵塞(gagging)、壓迫胸部、彎曲軀幹並將肢體綁在一起，僅授權指示中所規定並符合醫療規章的專業技術。(第 3 條)²⁰⁷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有效執行這些指示。締約國應授權在經由空運強制遣返期間有人權觀察者或獨立醫生在現場，並應系統性允許在這些遣返之前與試圖遣返失敗後的情況進行醫療檢查。²⁰⁸

3. 普遍管轄權

(1) 委員會關切，關於適應於《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立法草案，將普遍管轄的範圍限於非締約國的國民，且只有公共檢察官辦公室才能提出起訴。(第 5 條)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在其管轄權下的任何領土應繼續起訴與審判涉嫌酷刑的犯罪人，不論其國籍為何。建議締約國應有效保證受害人獲得有效救濟的權利，特別是藉由刑事訴訟提起公訴與任何使締約國更有效遵守《公約》第 5、6、7、13 條的措施。²⁰⁹

(2) 委員會歡迎法國的法院在 2005 年將茅利塔尼亞籍 Ely Ould Dah 在缺席審判情況下，就其酷刑罪行判處 10 年有期徒刑，委員會仍然

²⁰⁷ Ibid. Para. 11.

²⁰⁸ Ibid.

²⁰⁹ Ibid. Para. 13.

關切他在 1999 年被逮捕，在上訴法院決定在法院監督下釋放他後他在 2000 年得以離開法國領土，委員會遺憾締約國並未採取必要步驟使 Ely Ould Dah 留在其領土範圍並確保他出席審判，以符合《公約》第 6 條的義務。²¹⁰

委員會建議在締約國對酷刑行為具管轄權的案子中，應確保在其管轄領土涉案人士被拘留或確保其在場，以符合《公約》第 6 條的義務。²¹¹

4. 警察培訓

委員會關切執法人員虐待被拘留者等的指控的數量與嚴重性。(第 10 條)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改善警察培訓的相關改革迅速施行並擴及到所有執法人員。²¹²

5. 有關被捕、被拘留和被拘禁人員的羈押和待遇的規定

(1) 委員會對 2004 年 3 月法令的修正案仍表關切。該修正案規定，適用於不法行為(delinquency)和有組織犯罪的特別程序中，被拘留者見律師的時間延至至警方拘留後 72 小時。這些規定可能導致違反《公約》第 11 條，因為被捕後的幾小時內酷刑風險

²¹⁰ Ibid. Para. 14.

²¹¹ Ibid.

²¹² Ibid. Para. 15.

最大，特別是被捕者受到隔離羈押(incommunicado)。另外委員會仍關切的是，這種拘留期間經常使用審前拘留(第 11 條)。²¹³

委員會建議，根據《公約》第 11 條，締約國應採取適當立法措施保證在拘留的前幾小時可以接觸律師，避免酷刑的任何風險。應採取措施降低審前拘留的使用頻率與時間長度。²¹⁴

(2)雖然注意到締約國採取措施處理監獄過度擁擠問題，包括蓋新的監獄與考慮拘禁的替代方案，委員會依舊關切監獄的不良拘留條件，特別是 Loos and Toulon 短期拘禁監獄與行政收容中心。委員會特別關切內部檢查的不足；破舊與不適宜的建築與不佳的衛生條件，此外並關切被拘留者間的暴力行為與自殺案件。²¹⁵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盡快批准《公約》的任擇議定書並設立國家機制進行定期訪問(periodic visits) 拘禁場所以預防酷刑與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²¹⁶

(3)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採取措施改善收容區域的生活條件，特別是 Roissy Charles de Gaulle 機場，然而，關切關於收容區域中的警察暴力事件，包含酷刑與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特別是針對非西方人士(第 11 條與 16 條)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使

²¹³ Ibid. Para. 16.

²¹⁴ Ibid.

²¹⁵ Ibid. Para. 17.

²¹⁶ Ibid.

監督拘留中心和設施及等待區的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Monitoring of Holding Centres and Facilities and Waiting Areas)迅速開始作業，確保這些建議被有效執行。²¹⁷

(4)委員會關切締約國所提關於單獨監禁的法令草案，然而系爭草案並未設立任何時間限制，2年以內的單獨監禁不需要特別的正當理由。委員會擔心拘禁者將因此被單獨監禁數年儘管對於其身心有可能的危害。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單獨監禁根據國際標準，為有時間限制的例外措施。²¹⁸

6.公正的調查

(1)委員會關切起訴裁量制度，使國家檢察官可選擇不起訴酷刑或虐待的的犯罪者(其中涉及警察)，或甚至沒有下令調查，這明顯違反《公約》第12條。²¹⁹

委員會重申其建議(A/53/44, para. 147)，為了遵守《公約》第12條的文字和精神，締約國應考慮廢除起訴裁量制度，以在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在其管轄境內的任何地方所發生的一切酷刑案件，進行系統性和主動的公正調查，這是根據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建議的精神((CCPR/C/79/Add.80, para. 15))，其呼籲締約國採取適當措施以完全

²¹⁷ Ibid. Para. 18.

²¹⁸ Ibid. Para. 19.

²¹⁹ Ibid. Para. 20.

保證所有調查與起訴完全遵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第 3 項、第 9 條、第 14 條。²²⁰

(2) 委員會關切儘管有締約國違反《歐洲人權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第 3 條的 *Selmouni v. France* 案判決，巴黎上訴法院對涉案警察僅判處較輕微的刑罰。(第 12 條)²²¹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每個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所犯下酷刑行為者，應被起訴並獲得相當於其行為嚴重性的處罰。²²²

7. 申訴權

委員會表示關切向國家保安道德準則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Security Ethics, CNDS))提交案件的方式。該委員會不能受理遭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者直接提交的申訴，只受理議員、總理或兒童事務監察員提交的申訴(第 13 條)。委員會建議國家保安道德準則委員會應採取必要措施以允許其接受任何直接提交的申訴以符合《公約》第 13 條。²²³

²²⁰ Ibid.

²²¹ Ibid. Para. 21.

²²² Ibid.

²²³ Ibid. Para. 22.

法國第四至第六次合併定期報告結論性意見摘要²²⁴

一、積極面向

1. 委員會滿意地注意到：

(a) 締約國批准了公約任擇議定書，並根據 2007 年 10 月的法案設立了「剝奪自由場所」監察長，這一職位構成了《任擇議定書》意義內的國家預防機制。

(b) 締約國於 2007 年 10 月 2 日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項任擇議定書》，該議定書旨在廢除死刑。

(c) 締約國於 2008 年 9 月 23 日批准了《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

(d) 締約國於 2010 年 2 月 18 日批准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²²⁵

2. 委員會還滿意地注意到：

²²⁴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 FRANCE, U.N. Doc CAT/C/FRA/CO/4-6 (2010)(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²²⁵ Ibid. Para. 4.

(a) 根據 2007 年 11 月的法案，對拒絕在邊境提交庇護申請者入境的所有決定具有自動中止效力。

(b) 通過了 2006 年 4 月 4 日法案，加強了對暴力侵害配偶和暴力侵害兒童案件的預防和懲處，加重了對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處罰。²²⁶

3. 委員會歡迎正在開展的大力加強監獄能力的建設專案。²²⁷

4. 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採取了積極措施，讓更多已被定罪者能夠以替代方式服刑，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 2009 年 11 月 24 日的《監獄法》允許使用有電子監控的軟禁替代審前拘留。²²⁸

5. 委員會滿意地注意到 2009 年司法部預防獄中自殺的行動計畫，並歡迎就其實施，包括在海外領土的實施定期更新資料。²²⁹

6. 委員會關注地注意到締約國制定了一項程序，允許新設立的國家憲警監察長辦公室在不事先通知的情況下訪問警方羈押場所，並監督社區警所的申訴接待機構。²³⁰

7. 委員會歡迎締約國於 2007 年 8 月 16 日廢除了監獄「安全輪換」(security rotation)這一反復轉移囚犯的制度。委員會還注意到 Khider 訴法國一案(歐洲人權法院 2009 年 7 月 9 日的判決)3 月被列入了部長委員會議程。²³¹

²²⁶ Ibid. Para. 5.

²²⁷ Ibid. Para. 6.

²²⁸ Ibid. Para. 7.

²²⁹ Ibid. Para. 8.

²³⁰ Ibid. Para. 9.

²³¹ Ibid. Para. 10.

8. 委員會滿意地注意到締約國開通了兩個熱線電話，用於報告虐待及暴力侵害配偶和暴力侵害兒童的行為(分別為 3977 和 3919)。委員會對締約國在《刑法》中引入精神暴力這一概念表示讚賞。²³²

9. 委員會還滿意地注意到締約國宣佈正在考慮立法改革，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撤銷涉嫌違反《公約》或其他嚴重違反國際法行為者的頭銜。²³³

二、委員會關切

1. 酷刑的定義

委員會承認締約國的刑法規定對酷刑和野蠻行為(acts of barbarity and violence)予以懲處；注意到委員會收到的關於處罰酷刑行為的判決，但仍關切法國《刑法典》中未列入嚴格符合《公約》第 1 條的酷刑定義(第 1 條)。委員會重申早先提出的建議(CAT/C/FRA/CO/3, 第 5 段)，建議締約國在刑法中納入嚴格符合《公約》第 1 條的酷刑定義。委員會重申其建議，即將酷刑定為不受時效限制的罪行。²³⁴

2. 不遣返

²³² Ibid. Para. 11.

²³³ Ibid. Para. 12.

²³⁴ Ibid. Para. 13.

(1)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提供的資料顯示，相關數字自 2008 年以來有所下降。但仍關切有報告稱，2009 年提交的庇護申請有 22%按優先程序處理，在該程序下無法對法國保護難民和無國籍者辦事處初審拒絕的申請提出暫緩遣返上訴。因此，國家庇護權利法院(National Court on the Right of Asylum)受理申請人的保護請求之前，申請人就可能被遣返至某一國家，並在該國面臨酷刑風險。由於沒有統計資料可以瞭解以面臨酷刑風險為由反對驅逐令的訴求或行政法院根據第 3 條撤銷驅逐令的情況，所以委員會不能確信優先程序提供了足夠保障，使面臨酷刑風險者免遭驅逐(第 3 條)。²³⁵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對在優先程序下處理的庇護申請實行暫緩遣返上訴制度，並對《公約》第 3 條涵蓋的情況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特別是確保對法官進行適當培訓，讓他們瞭解接收國的酷刑風險，並自動進行單獨談話，以便評估申請人個人面臨的風險。²³⁶

(2)委員會滿意地注意到，2007 年 11 月的法案生效後，身在邊境的尋求庇護者目前有權就拒絕為庇護目的入境的決定提出暫緩遣返上訴。但委員會關切的是，需要在很短期限內(48 小時)提出此種上訴，上訴必須用法語，且行政法官可能用法院命令駁回上訴，使申請人無法進行聽證為其案件辯護，也無法獲得請翻譯和律師等程序

²³⁵ Ibid. Para. 14.

²³⁶ Ibid.

保障(第3條)。委員會建議，有關在邊境提交的庇護申請的任何上訴都應進行聽證，讓受到驅逐威脅的申請人可以有效地陳述意見，並且上訴應得到所有的基本程序保障，包括請翻譯和顧問的權利。²³⁷

(3)委員會還特別關切在拘留中心等剝奪自由場所的尋求庇護者面臨的困難。根據《外國人入境和居留及庇護權利法》的要求，這些尋求庇護者在獲知有權提交申請後需在五天內提交申請。這一期限無法滿足申請人的需要。申請人需要提交可信的申請，證明遭遣返後可能面臨的風險，為此他們需要在原籍國收集證據、證詞及其他材料(第3條)。²³⁸

與歐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and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CPT)2006年訪問法國之後一樣，委員會也建議締約國向拘留在行政收容中心的庇護申請者提供充足的時間及一切必需的程序保障，而且不要因此而延長收容時間。²³⁹

(4)委員會仍關切2003年12月法案提出的「內部庇護」(internal asylum)和「安全原籍國」(safe countries of origin)的概念，這些概念無法保障被遣返者絕對不會被遣返至有酷刑風險的國家。例如：沒有準確資料說明擬定安全原籍國清單所用的檔來源及清單更新的頻

²³⁷ Ibid. Para. 15.

²³⁸ Ibid. Para. 16.

²³⁹ Ibid.

率。(第3條)。委員會重申其建議締約國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在審查來自「內部庇護」和「安全原籍國」適用概念國家的庇護申請人的申請時，應充分考慮其個人處境，並完全遵守《公約》第3條的規定。²⁴⁰

(5)委員會感到遺憾的是，它收到了一些關於將個人遣返到可能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的國家，或者被遣返回原籍國的人入境時遭到逮捕和虐待的指控，儘管委員會或歐洲人權法院命令發出了臨時保護措施請求，但仍有這種情況發生(第3條)。委員會重申它建議締約國採取必要步驟，確保無論何時都不應遣返任何人至有可能遭受酷刑的第三國。²⁴¹

3. 普遍管轄權

委員會仍關切的是，該法對普遍管轄權的範圍有所限制，特別是要求嫌犯在法國居住。委員會重申它建議締約國根據《公約》第5條，確保因違反《公約》行為的受害者獲得有效救濟的權利，特別是對其境內的嫌犯所犯的任何罪行確立管轄權。委員會還建議，按照第6條，將要求犯罪者為普通居民改為僅要求犯罪者身處法國境內。²⁴²

²⁴⁰ Ibid. Para. 17.

²⁴¹ Ibid. Para. 18.

²⁴² Ibid. Para. 19.

4. 執法人員培訓

(1)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就新的官員和警員初級培訓課程提供的資料，還注意到 2009 年 11 月的《監獄法》規定了監獄服務《道德準則》，但仍關切的是，締約國沒有說明就人權文書開展的初級和在職培訓的內容。委員會尤其希望瞭解詳細的培訓課程及隨後對培訓的評估(第 10 條)。²⁴³

委員會希望更多地瞭解締約國對警察、監方人員和醫務人員培訓的評估情況，並提供具體指標。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將《伊斯坦堡爾議定書》(即《有效調查和記錄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手冊》) Istanbul Protocol (Manual on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納入人員培訓。委員會還希望締約國詳細介紹對締約國在國內外使用的私人保全企業進行培訓的情況。²⁴⁴

(2) 委員會仍特別關切的是，不斷收到指控稱執法人員虐待被拘留者和其管理之下的其他人員(第 16 條)。締約國應採取步驟，確保開展

²⁴³ Ibid. Para. 20.

²⁴⁴ Ibid.

透明、獨立的問訊，及時調查執法官員的虐待行為舉報，並確保犯罪者得到適當處罰。²⁴⁵

有關被捕、被拘押和被監禁人員的羈押和待遇的規定

5. 警方拘留

委員會對 2004 年 3 月法案的修正案仍表關切。該修正案規定，適用於恐怖主義和組織犯罪的特別程序中，被拘留者見律師的時間延後至警方拘留後 72 小時。這些規定可能導致違反《公約》第 11 條的規定，因為被捕後的幾小時內酷刑風險最大，被捕者受到隔離拘留時尤其如此。另外委員會仍關切的是，這種拘留期間經常使用審前拘留(第 2 和第 11 條)。²⁴⁶

委員會重申它建議締約國採取適當法律措施，保障被拘留者在警方羈押期間能夠立即見律師，以符合《公約》第 11 條的規定。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採取步驟，減少使用審前拘留並縮短審前拘留時間。²⁴⁷

6. 審問

委員會滿意地注意到，締約國 2007 年 3 月的法案規定，除輕罪案件之外，警方或法官的審問必須進行影像錄影。但委員會注意

²⁴⁵ Ibid. Para. 21.

²⁴⁶ Ibid. Para. 22.

²⁴⁷ Ibid.

到，如果沒有公共檢察官或預審調查法官授權(Public Prosecutor or investigating judge)，該法不適用於受到恐怖主義和組織犯罪指控的人員。此外，該法並未規定在警察局和憲兵隊的所有區域，包括過道等可能的拘留場所安裝監視錄影器(第 11 和第 16 條)。²⁴⁸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審問所有人員都要將影像錄影定為標準程序，並在警察局和憲兵隊各處安裝監視錄影器，以擴大並加強對受到警方拘留的被拘留人員的保護。²⁴⁹

7. 監獄條件和刑事政策

委員會歡迎締約國根據 2007 年 10 月法案在剝奪自由場所設立了總監察長(Inspector-General)這一職位，並採取步驟，特別是建造新的監獄設施，包括海外領土，以解決監獄人滿為患這一關鍵問題。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就更廣泛地使用拘禁之外的其他措施的可能性進行研究，但仍嚴重關切的是監獄人滿為患的程度，有些監獄情況已大幅改善，但仍令人擔憂，特別是海外領土上的監獄。²⁵⁰

委員會看到，締約國就司法部 2009 年 6 月的行動計畫提供了資料，但仍對報告的自殺率及被拘留者中發生暴力事件的頻率感到關切(第 11 和第 16 條)。²⁵¹

²⁴⁸ Ibid. Para. 23.

²⁴⁹ Ibid.

²⁵⁰ Ibid. Para. 24

²⁵¹ Ibid.

除締約國對監獄基礎設施進行的必要擴建之外，鑒於近期大量刑事立法旨在加重處罰、減少累犯，將直接導致更多地判處監禁，委員會請締約國根據第 11 和第 16 條，對近期刑事政策對監獄人滿為患問題的影響進行一次較大的審查。²⁵²

特別是，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努力擴大使用非拘禁手段代替目前的監禁徒刑。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提供詳細資料，說明定期採取哪些具體行動，包括對於有精神障礙的被拘留者，以實施剝奪自由場所總監察員訪問後提出的建議。²⁵³

8. 等候區 (Waiting areas)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努力改善等候區，包括機場等候區的整體條件，為此成立了部長工作組，處理等候區內的未成年人問題。但委員會仍深表關切的是，締約國宣佈，根據 2010 年 3 月的移民、融入和國籍法案，將在所有邊境設外籍人員入境等候區。等候區設在邊檢站之外，這意味著用於所有此類等候入境者的制度不提供該區域外適用的程序保障，特別是看醫生、見律師和請翻譯的權利(第 11 和第 16 條)。²⁵⁴

²⁵² Ibid.

²⁵³ Ibid.

²⁵⁴ Ibid. Para. 25.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步驟，確保等候區的生活條件符合《公約》第 11 和第 16 條的要求，特別是將未成年人和成人嚴格分開，以確保未成年人免遭暴力行為侵害；嚴格執行各項規定，包括為所有未成年人指定專門監護人，所有驅逐程序都必須確保未成年人的安全，同時考慮到其脆弱性並充分尊重其個人。此外，鼓勵締約國不要擴大現有等候區，並特別關注剝奪自由場所監察長訪問現有等候區後提出的建議的落實及後續行動。²⁵⁵

9. 拘禁期間自殺

委員會深表關切的是，據稱締約國是獄中自殺人數最多的歐洲國家之一。此外，2009 年自殺的囚犯中超過 15% 當時拘禁在紀律區 (disciplinary blocks)(第 16 條)。²⁵⁶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預防拘禁期間自殺。此外，締約國應在公共檢察官的監督下採取措施，確保單獨監禁只作為例外措施，設立單獨監禁時間限制，以符合國際標準。²⁵⁷

10. 實行有區別的拘禁制度

委員會關切地注意到，2009 年 11 月的《監獄法》第 89 條似乎授予獄方廣泛裁量權，使其有權將囚犯按性格或危險程度等主觀標準

²⁵⁵ Ibid.

²⁵⁶ Ibid. Para. 26.

²⁵⁷ Ibid.

分類，並在此基礎上對其使用不同的拘禁規則。這種制度本身就可能導致囚犯在服刑期間遭受任意對待。例如：羈押期間反復地且無正當理由或任意地對囚犯進行紀律處罰或不讓其行使某些權利，可能構成《公約》第 16 條規定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第 16 條)。²⁵⁸

委員會鼓勵締約國採取適當步驟，監督獄方的廣泛裁量權以及相應的任意行為。監督的方式應為現有獨立監督機制進行定期訪問，如有任何違規行為或可視為任意措施的行為，特別是涉及單獨監禁的措施，該機制應立即向主管司法機關報告。²⁵⁹

11. 搜身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提交的資料顯示，目前適用的 2009 年 11 月的《監獄法》規定的搜查程序比原來的程序限制更多。但鑒於歐洲人權法院的兩個判決(Khider 訴法國和 Fré rot 訴法國)，委員會仍關切的是，搜身具有侵擾和侮辱的特點，內部搜身尤其如此；規範獄中搜身頻率和方法的程序由獄方自己決定。²⁶⁰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嚴格監督搜身程序，尤其是搜全身和內部搜身。為此應確保搜身所用的方法侵擾最小、最尊重人身安全，且無

²⁵⁸ Ibid. Para. 27.

²⁵⁹ Ibid.

²⁶⁰ Ibid. Para. 28.

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應符合《公約》條款。委員會還建議，實施締約國公佈的電子監控手段，並廣泛使用這些機制，以便完全取消搜身的做法。²⁶¹

12. 安全拘留(Secure detention)

委員會深表關切關於安全拘留的第 2008-174 號法律規定的所謂安全拘留；締約國宣佈有精神疾病者免於承擔刑事責任；2010 年 3 月第 2010-242 號法律又加以補充，尋求減少累犯風險，並設立了刑事程序方面的各種規定。安全拘留措施除了對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則構成挑戰，此外，由於缺乏可以客觀上確定、預期的實質標準，可能的處罰和罪行之間缺乏因果關係且可以追溯適用，這一似乎並未規定拘留期限的措施也可能引發與第 16 條相關的問題(第 16 條)。²⁶²

委員會強烈建議締約國考慮廢止這一規定，該規定明顯違反了刑法中合法性這一根本原則，並有可能與第 16 條相衝突。²⁶³

13. 拘留期間使用射能設備(conducted energy devices)

委員會特別關切的是，締約國宣佈決定在拘留場所測試射能設備(泰瑟槍)。委員會注意到，行政法院在 2009 年 9 月 2 日的決定

²⁶¹ Ibid.

²⁶² Ibid. Para. 29.

²⁶³ Ibid.

中廢止了授權地方警察使用泰瑟槍的指令。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沒有詳細資料說明泰瑟槍的使用、使用過泰瑟槍的人員的情況及有關人員的培訓和監督等專門預防措施(第 2 和第 16 條)。²⁶⁴

委員會重申它表示關切這些武器的使用可能造成巨大的痛苦，構成一種形式的酷刑，有時甚至可能導致死亡。委員會歡迎締約國提供最新資料，說明這種武器在拘留場所的使用情況。²⁶⁵

14. 公正的調查

(1) 委員會表示關切起訴裁量制度，該制度允許國家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有執法人員涉案的酷刑和虐待行為，或甚至決定不下令調查，這顯然違反《公約》第 12 條。²⁶⁶

委員會重申它建議(CAT/C/FRA/CO/3, 第 20 段)締約國為遵守《公約》第 12 條，需要廢除起訴裁量制度，主管當局只要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在其管轄境內的任何地方發生了酷刑行為，就有義務主動開展系統的公正調查，以便有效確保此類罪行的犯罪者不能免於處罰。²⁶⁷

(2) 除了國家檢察官有裁量起訴這一限制自行調查可能性的原則，委員會還對 2009 年 9 月《Lé ger 報告》的影響感到關切。報告的研究

²⁶⁴ Ibid. Para. 30.

²⁶⁵ Ibid.

²⁶⁶ Ibid. Para. 31.

²⁶⁷ Ibid.

結果如獲議會批准，將最終導致撤銷調查法官，這意味著一切調查都將由公共檢察官辦公室主持，這將嚴重影響調查的獨立性(第 2、第 12、和第 13 條)。²⁶⁸

委員會請締約國採取一切步驟，確保司法程序及現有獨立監督機制開展的調查的獨立和公正，特別是應允許直接提交案件，並向它們提供有關手段，使之能夠獨立、公正、透明地執行監督任務。²⁶⁹

15. 申訴權

(1) 委員會表示關切向國家保安道德準則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Security Ethics, CNDS)提交案件的方式。該委員會不能受理遭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者直接提交的申訴，只受理議員、總理或兒童事務監察員提交的申訴(第 13 條)。²⁷⁰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步驟，根據《公約》第 13 條，允許國家保安道德準則委員會受理直接提交的申訴。²⁷¹

(2) 委員會表示關切作為 2008 年憲法改革一部分設立「權利維護機構」(Defender of Rights)(Défenseur des droits)產生的影響。根據組織法草案，該機構將共和國監察員、兒童事務監察員和國家保安道

²⁶⁸ Ibid. Para. 32.

²⁶⁹ Ibid.

²⁷⁰ Ibid. Para. 33.

²⁷¹ Ibid.

德準則委員會的任務合併在一起，似乎還包括最終將取消的剝奪自由場所監察長的任務，其職責將一併納入這一新成立的機構(第 13 條)。²⁷²

委員會請締約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根據公約任擇議定書設立的監督機制(即剝奪自由場所總監察員)及其他補充獨立機構有效工作，不受干擾。這些機構除具有調解作用外，還在權利監督方面發揮關鍵作用，能夠在各自的專業領域確保《公約》的執行。²⁷³

15. 臨時保護措施(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ction)

委員會表示關切的是，締約國認為並非必須回應委員會就臨時保護措施提出的請求(見第 195/2002 號來文，Brada 訴法國，及第 300/2006 號來文，Tebourski 訴法國)。²⁷⁴

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108 條旨在規定《公約》第 3 和第 22 條的意義和範圍，否則聲稱面臨重大酷刑風險的尋求庇護者將只能從中得到理論上的保護。因此，委員會促請締約國審查這方面的政策，為此應根據《公約》第 3 和第 22 條規定的義務，認真考慮臨時保護措施的請求。²⁷⁵

²⁷² Ibid. Para. 34.

²⁷³ Ibid.

²⁷⁴ Ibid. Para. 35.

²⁷⁵ Ibid.

16. 販運人口

委員會關切的是，締約國未就販運人口和性剝削問題提供資料。關於這些問題的普遍程度以及締約國為打擊境內販運婦女和兒童而採取的措施，委員會尚未獲得足夠資料(第 2 和第 16 條)。²⁷⁶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通過關於打擊一切形式的販運婦女和兒童的國家計畫，計畫應包括起訴販運者的刑事司法措施，也應包括受害者保護和復原措施。為此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加強與原籍國、販運國和過境國的國際合作，並確保為該領域的政策和方案分配充足的資源。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及時向委員會通報這方面的進展。²⁷⁷

法國第七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摘要²⁷⁸

一、積極面向

1. 委員會滿意地注意到，自審議上一次報告以來，締約國批准了：

《歐洲委員會預防和打擊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及家庭暴力公約》，
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²⁷⁹

²⁷⁶ Ibid. Para. 36.

²⁷⁷ Ibid.

²⁷⁸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h periodic report of France, U.N. Doc CAT/C/FRA/CO/7 (2016)(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²⁷⁹ Ibid. Para 4.

2. 委員會歡迎締約國繼續努力修正其立法，以充分落實委員會先前的建議，特別是通過：

(a) 關於剝奪自由場所總監察長的 2014 年 5 月 26 日法律，加強了該辦公室的權力；

(b) 關於庇護改革的 2015 年 7 月 29 日法律，當尋求庇護者的請求被法國難民與無國籍者保護局在快速程序下拒絕時，該法規定向國家庇護權法院(National Court on the Right of Asylum)提出的上訴具有中止效力。²⁸⁰

3. 委員會歡迎全國人權諮詢委員會、剝奪自由場所總監察長和非政府組織部門在審議締約國第七次定期報告期間的參與和貢獻。²⁸¹

二、關切及建議

1. 上一報告週期中尚待落實的問題

委員會已注意到締約國在 2011 年 6 月 22 日提供的關於先前的結論性意見(CAT/C/FRA/CO/4-6)第 21、24 和 28 段所載建議的落實情況的資料，但委員會感到遺憾的是，締約國沒有採取充分措施來解決所提出的全部關切問題。²⁸²

²⁸⁰ Ibid. Para. 5.

²⁸¹ Ibid. Para. 6.

²⁸² Ibid. Para. 7.

2. 酷刑的定義和不受時效限制性

(1) 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儘管有以往的建議(見 CAT/C/FRA/CO/4-6, 第 13 段)，締約國仍然認為，其《刑法》第 222-1 條條款將法院所解釋的所有「酷刑和野蠻行為」列為罪行，符合《公約》第 1 條所規定的定義要求。委員會認為，第 222-1 條沒有規定酷刑的定義，並且它感到遺憾的是，締約國沒有將這一定義納入其刑事立法。委員會注意到最高上訴法院在 2016 年 4 月 21 日的裁決，該法院在其中承認，《刑法》沒有對被列為罪行的酷刑和野蠻行為進行定義，並簡要提及了《公約》第 1 條。但委員會認為，不能由此推斷《刑法》符合《公約》第 1 條。儘管代表團提供了解釋，委員會感到遺憾的是，締約國未將酷刑列為一項不受時效限制的罪行(第 1 條)。²⁸³

(2) 委員會重申先前的建議，即締約國在刑事立法中對酷刑的定義應包括《公約》第 1 條所規定的全部內容，且建議締約國將酷刑列為一項不受時效限制的罪行。²⁸⁴

3. 基本法律保障

(1) 委員會注意到，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法》第 63-3-1 條，個人有權自被警方拘留之時起得到律師協助，但委員會仍然感到關切的是，

²⁸³ Ibid. Para. 8.

²⁸⁴ Ibid. Para. 9.

在涉及恐怖主義或有組織犯罪的案件時，獲得律師協助所需的時間最多可被推遲達 72 小時，並且對這一措施不得上訴(第 2 和 11 條)。

285

(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修改其《刑事訴訟程序法》，以保證被警方拘留的人自被拘留之時起在一切情形下都能獲得律師協助。²⁸⁶

4. 緊急狀態

(1) 委員會注意到，作為反恐怖主義的一部分，締約國制定了立法和行政措施，以擴大當局的權力，尤其是在 2015 年 11 月 14 日宣佈緊急狀態，隨後由立法予以延長。但委員會回顧酷刑絕無例外，因此關切的是，有報告稱警察在一些搜查行動中過度使用武力，有時導致有關人員出現了心理後遺症。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在緊急狀態下使用某些措施可能構成對受《公約》保障的權利的侵犯。(第 2、11、14 和 16 條)。²⁸⁷

(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措施，確保在實踐中，反恐措施不侵犯對受《公約》保護的權利的行使。尤其是，締約國應確保在開展所有搜查行動時嚴格遵守《公約》。委員會進一步建議，締約國應確保搜查行動中過度使用武力行為的任何受害人均可提出申訴，締約國

²⁸⁵ Ibid. Para. 10.

²⁸⁶ Ibid. Para. 11.

²⁸⁷ Ibid. Para. 12.

應確保對申訴展開調查、酌情提起公訴並處罰犯罪人。²⁸⁸

5. 保護被邊緣化個人和群體免受以仇恨為動機的暴力行為之害

(1) 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有報告稱，締約國中針對特定弱勢個人和群體(包括羅姆人、穆斯林、猶太人和移民者)的以仇恨為動機的暴力和犯罪行為有所增加，尤其是最近幾次迫使締約國宣佈緊急狀態的恐怖主義襲擊之後，更是如此(第 2 和 16 條)。²⁸⁹

(2) 委員會憶及，保護面臨被虐待風險的弱勢個人或群體，是締約國應參照委員會關於締約國對執行第 2 條的第 2 號一般性意見所採取的保護措施之一。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加緊努力，防止源於仇恨和不容忍的暴力和犯罪行為，並起訴此種行為的責任者。²⁹⁰

6. 據稱警察和憲兵過度使用武力

(1) 委員會對關於警察和憲兵過度使用武力的指控感到關切，此種行為在某些情況下已導致嚴重傷害或死亡。並同樣關注：(a) 有報告稱，受害人在提出申訴時遇到問題；(b) 缺乏關於所提申訴的統計資料，無法比較已啟動的調查和已起訴的案件；(c) 缺乏關於對警察和憲兵的定罪和判決的詳細資料；以及(d) 有報告稱，大量案件被撤銷

²⁸⁸ Ibid. Para. 13.

²⁸⁹ Ibid. Para. 14.

²⁹⁰ Ibid. Para. 15.

或終止，輕度行政制裁與行動嚴重程度不相稱，法院極少下令對警察和憲兵施加處罰。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有指控稱對尋求庇護者和移民者實施暴力，以及他們在加來及周邊地區的處境艱難(第 2、12 和 13 條)。²⁹¹

(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加強努力，防止任何警察和憲兵過度使用武力，並確保：

(a) 採取必要措施保證警察暴力的受害人能夠實際提出申訴，對申訴進行登記，並且適當為申訴人提供保護，使其免受任何被報復的風險；

(b) 以公正、獨立和透明的方式，在合理時限內及時調查提請其注意的案件；

(c) 對案件提起訴訟，如果定罪，所判決的處罰與行動的嚴重程度相稱；

(d) 保留關於以下方面的完整的分類統計資料：針對暴力行為或過度使用武力提出的申訴和收到的報告、針對警察或憲兵行動啟動的行政或司法調查、已啟動的訴訟程序、已宣佈的定罪和處罰、已撤銷或終止的案件訴訟程序。²⁹²

²⁹¹ Ibid. Para. 16.

²⁹² Ibid. Para. 17.

(3) 委員會請締約國提供關於(a) 向監察員提交的申訴和(b) 針對尋求庇護者和移徙者遭受警察暴力的指控以及他們在加來及周邊地區的處境所採取的後續行動的資料。²⁹³

7. 不遣返

(1)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提供的解釋，但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關於外國人入境和居住以及庇護權利的法律》第 L 723-2 條中確立的諸多標準，例如來自「安全的」原籍國等，其使用可導致在快速程序下審核的庇護請求數量大幅升高(據締約國稱，占總體需求的 25% 至 30%)，並且可能缺少適當的預先評估。委員會認為，庇護請求的審核時間之短，再加上快速程序下審核的請求數量之多，可能會導致法國難民與無國籍者保護草率或不完整地評估尋求庇護者如果被驅逐出境將面臨的風險，包括酷刑或虐待風險。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允許包括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在內的尋求庇護者準備其請求的時間——被收容在等候區的尋求庇護者有 48 小時時間，被收容在行政收容中心的尋求庇護者有 5 天時間——太短，以致他們無法充分利用法律或口譯援助來為自己的請求進行辯護，進而可能面臨被驅逐出境後的一系列風險(第 3 條)。²⁹⁴

²⁹³ Ibid. Para. 18.

²⁹⁴ Ibid. Para. 19.

(2)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用於決定某請求(尤其是來自一個「安全的」原籍國的請求)可否經快速程序審核的標準不會導致請求被自動或系統地分配至快速程序。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確保在使用此程序的案件中，徹底評估每個尋求庇護者所面臨的風險。最後，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在所有情況下，尋求庇護者能夠有效獲得法律、口譯和其他援助，以使他們能夠適當準備和辯護自己的案件。委員會請締約國重新審視在等候區和行政收容中心的尋求庇護者向難民權益國家法院提交案件的時限。²⁹⁵

8.拘留條件

(1)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採取的措施，但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監獄過度擁擠的程度很高，2014年的佔用率為116%，包括馬賽(147%)、尼姆(219%)和波利尼西亞(294%)監獄在內的一些監獄的佔用率更高。對於殘破建築，以及缺乏個人衛生和環境衛生條件，委員會感到遺憾。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持續的囚犯之間的暴力和受監獄工作人員虐待的指控。委員會進一步感到關切的是，一些囚犯在向行

²⁹⁵ Ibid. Para. 20.

政或司法當局或向剝奪自由場所總監察長提出暴力案件申訴時所遇到的問題(第 11 和 16 條)。²⁹⁶

(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作為緊急事項，通過執行剝奪自由場所總監察長的建議，繼續努力改善拘留條件，尤其包括：

(a) 更好地根據《聯合國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標準規則》(東京規則)(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Non-custodial Measures) (the Tokyo Rules)和《聯合國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規則》(曼谷規則)(United Nations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Women Prisoners and Non-custodial Measures for Women Offenders) (the Bangkok Rules)使用非拘禁措施，以有效緩解監獄的過度擁擠。

(b) 改善拘留場所的物質條件。

(c) 確保提請有關當局注意在監獄設施中的所有暴力行為，並對此等暴力行為進行徹底和公正的調查。

(d) 加強締約國的打擊監獄暴力國家行動計畫。

(e) 確保囚犯能夠切實向剝奪自由場所總監察長提出申訴，而不必擔心遭到報復。²⁹⁷

9. 在監獄內獲得精神衛生服務

²⁹⁶ Ibid. Para. 21.

²⁹⁷ Ibid. Para. 22.

(1) 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有報告稱：(a) 監獄提供的精神衛生服務不足；(b) 監獄醫務室缺乏提供精神衛生服務的醫務人員；和(c) 經常單獨囚禁患有精神健康障礙的囚犯，並且拘留場所的物質條件不適合這些囚犯。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當患有精神健康障礙的囚犯被轉移到外部轉診醫院時，往往被安置在隔離室或禁閉牢房(第 11 和 16 條)。²⁹⁸

(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適當措施，以便：(a) 改善監獄內精神衛生服務的可得性，並增強訓練有素的專業醫務人員的配置；和(b) 監督在監獄醫務室和外部轉診醫院中對隔離安排的使用。²⁹⁹

10. 監獄內的自殺

(1)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提供的資料，但仍對法國監獄內的高自殺率感到關切，儘管該國已根據旨在防止監獄內自殺的 2009 年國家行動計畫採取了措施。委員會與剝奪自由場所總監察長(Inspector General of Places of Deprivation of Liberty)一樣對促成自殺風險的一些因素(例如被安置在紀律區)以及使用防止自殺的緊急保護措施和安全牢房表示關切(第 11 和 16 條)。³⁰⁰

²⁹⁸ Ibid. Para. 23.

²⁹⁹ Ibid. Para. 24.

³⁰⁰ Ibid. Para. 25.

(2)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加強防止監獄內自殺的政策，尤其是通過：(a) 減少風險因素；(b) 僅在特殊情況下才將有自殺風險的囚犯安置在紀律區；和(c) 當一名囚犯被置於緊急保護措施之下或安全牢房之中時，加強監督和支持。委員會請締約國評估旨在防止自殺的國家行動計畫並向委員會報告評估結果。³⁰¹

11. 搜身

(1)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提供的解釋，但委員會仍感關切的是，有報告稱一些拘禁設施中經常甚或系統地使用全身搜查。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儘管締約國已通過了2009年《監獄法》和2013年11月備忘錄，不尊重囚犯人身安全的極具侵入性的方法仍在繼續使用，並且全身搜查的例外做法似乎並未遵循必要性和相稱性原則(第11和16條)。³⁰²

(2)委員會建議締約國確保僅在確有必要且與預期目標相稱時進行全身搜查，並確保嚴格監測2009年《監獄法》和2013年11月備忘錄中確立的規則。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繼續努力培訓工作人員，向囚犯提供關於搜身規則的資料，並根據剝奪自由場所總監察長的建議，在所有拘留設施中採取標準的方法，以防止在開展搜查方面出

³⁰¹ Ibid. Para. 26.

³⁰² Ibid. Para. 27.

現任意決策的風險。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確保此類被認為絕對必要的搜身尊重囚犯的尊嚴。³⁰³

12. 精神病院

(1) 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a) 某些精神病院的病人拘留物質條件低於標準；(b) 經常進行多天有束縛或無束縛的隔離；(c) 缺乏 2016 年 1 月 26 日頒佈的法律所要求的關於使用隔離和束縛的登記冊；(d) 未能一貫根據相同標準或相同期限使用機械束縛手段(mechanical restraint)；和(e) 將病人隔離安置或束縛之前，未能系統地告知病人其權利以及如何對此等決定進行上訴。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對所採取措施的解釋，但特別關切的是，剝奪自由場所監察長關於安省精神治療中心內使用隔離和束縛以及此處病人羈押場所物質條件的調查結果(第 11 和 16 條)。³⁰⁴

(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

- (a) 改善被安置在精神病院內囚犯的拘留環境；
- (b) 確保不會系統地或過度地頻繁使用隔離和束縛；
- (c) 加強對精神病院工作人員的培訓
- (d) 確保在所有非自願住院的案件中，妥善執行於 2013 年 9 月

³⁰³ Ibid. Para. 28.

³⁰⁴ Ibid. Para. 29.

修正的法律，同時對此等非自願住院進行監督，並確保病人已被告知自己的權利以及對此等決定提出上訴的管道。³⁰⁵

(3)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為改變安省精神治療中心的狀況所採取的措施，委員會呼籲締約國作為緊急事項落實剝奪自由場所監察長為該中心提出的建議。³⁰⁶

13. 在中非共和國發生的性虐待行為

(1) 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對法國士兵在中非共和國執行紅蝴蝶行動——經安全理事會第 2127 號決議(2013 年)授權的行動——的過程中對兒童實施性虐待的大量指控以及最近在相同背景下發生的類似案件。委員會注意到關於法國當局曾於 2014 年和 2015 年展開調查的資訊，但委員會仍感到關切的是，至今尚無審判，也沒有定罪和判刑(第 2、12 和 16 條)。³⁰⁷

(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繼續確保立即適當勤勉地調查關於法國士兵在中非共和國對兒童實施性虐待的所有指控，並儘快將犯罪人繩之以法，根據罪行嚴重程度給予相應處罰。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確保為受害人提供社會和心理援助以及補償，並向受害人提供案件調查進展的最新情況。委員會進一步建議締約國加強措施，防止今後發生

³⁰⁵ Ibid. Para. 30.

³⁰⁶ Ibid. Para. 31.

³⁰⁷ Ibid. Para. 32.

此類事件。³⁰⁸

14. 雙性人士

(1) 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有報告稱，在未經雙性兒童或其親屬事先知情同意且未向其解釋各種可能備案的情況下，對其進行不必要的且有時是不可逆轉的外科手術。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這些據稱會造成身體和心理痛苦的手術尚未受到任何調查或制裁，也未因此作出賠償。委員會感到遺憾的是，締約國沒有提供資料說明確立雙性人地位的具體立法和行政措施(第 2、12、14 和 16 條)。³⁰⁹

(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

(a) 採取必要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確保尊重雙性人的身體完整，以保證任何人在童年期不遭受意在確定其性別的非緊急醫療或外科手術；

(b) 確保有關人員及其父母或近親免費得到公正的諮詢服務和心理及社會支援；

(c) 確保在未經有關人員完全、自由且事先知情的同意且未告知有關人員及其父母或近親可選方案的情況下，包括可以將關於不必

³⁰⁸ Ibid. Para. 33.

³⁰⁹ Ibid. Para. 34.

要治療的決定推遲到他們能夠自主決定之後，不對有關人員實施外科手術或醫學治療；

(d) 安排對據稱未經雙性人知情同意對其實施手術或其他醫學治療的案件進行調查，並採取措施為所有受害人提供包括適足賠償在內的補償；

(e) 對此議題進行相關研究，以更好地理解 and 處理這一問題。³¹⁰

15. 培訓

(1)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提供的資料，但仍感到關切的是，為某些類別的警察(契約制執法人員和警察)和憲兵(軍士和志願役副憲兵)提供的培訓更多的是涉及道德操守和行為守則(ethics and codes of conduct)，而非人權和《公約》的條款。委員會還感到關切的是，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有效調查和檔記錄手冊》(《伊斯坦堡議定書》)不是上述培訓的一部分，也不是對平民及參與監管和治療已被捕或被監禁者的醫療人員培訓的一部分。(第 10 條)。³¹¹

(2) 委員會建議締約國加強為契約制執法人員、警察、軍士和志願役副憲兵提供的人權和《公約》培訓課程，並確保私營保全公司的人

³¹⁰ Ibid. Para. 35.

³¹¹ Ibid. Para. 36.

員也接受這種培訓。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系統地將《伊斯坦堡議定書》納入所有的警察和憲兵隊成員培訓之中，以及平民及參與監管和治療任何已被捕或被監禁者的醫療人員培訓之中。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確立用於評估其關於絕對禁止酷刑和虐待的培訓方案成果的具體方法。³¹²

16. 補償和復原 (Redress and rehabilitation)

(1) 委員會還注意到締約國為確認和應對尋求庇護者的特殊脆弱性而採取的措施，為庇護程序的一部分。

然而，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

- (a) 收到的資料表明，締約國缺乏針對酷刑受害人復原的政策，並且在利用設施方面也存在問題；
- (b) 沒有儘早地在庇護過程中系統地評估脆弱性；
- (c) 為包括尋求庇護者在內的酷刑受害人提供治療和照顧的協會及其他實體的可用資源短缺；
- (d) 缺乏在確認和照顧此等人員方面受過充分培訓的專業人員；和(e) 缺乏關於由法院下令為酷刑受害人提供的救濟和復原措施的統計資

³¹² Ibid. Para. 37.

料，以及受益於此等措施的尋求庇護者數量的統計資料(第 2 和 13 條)。³¹³

(2)考慮到關於締約國執行第 14 條的第 3 號一般性意見(2012 年)，委員會建議締約國：

(a)為酷刑受害人的復原和促進復原設施的可獲取性實施政策；

(b)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和安排，以儘早發現和照顧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尋求庇護者。

(c) 提供充分的培訓和充足數量的專業人員，提高對此類人口群體照顧的可得性，並確保為服務於酷刑受害人的協會和其他實體分配必要資源。³¹⁴

17.委員會鼓勵締約國考慮批准《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³¹⁵

評析：

1.關於酷刑的定義，法國在這幾次報告都未符合委員會的要求，並堅持，其《刑法》第 222-1 條條款將法院所解釋的所有「酷刑和野

³¹³ Ibid. Para. 38.

³¹⁴ Ibid. Para. 39.

³¹⁵ Ibid. Para. 41.

蠻行為」列為罪行，符合《公約》第 1 條所規定的定義要求。³¹⁶

但是委員會並不這麼認為，不斷重申法國要嚴格遵守《公約》第 1 條的要求，並訂為不受時效限制之罪。

2.或許是國情與移民政策關係，委員會花不少篇幅關注在法國對於《公約》第 3 條實踐的問題，例如：暫緩執行上訴、優先程序、正當權利保障等，若對照法國前後的實踐，特別是暫緩執行之上訴的制度，可發現法國已作相當改善。

3.法國為了打擊恐怖主義而使得反酷刑出現許多漏洞，例如：輕罪以外之罪警方或法官的審問必須進行影像錄影，但如果沒有公共檢察官或預審調查法官授權(Public Prosecutor or investigating judge)，該法不適用於受到恐怖主義和組織犯罪指控的人員³¹⁷；在涉及恐怖主義或有組織犯罪的案件時，獲得律師協助所需的時間最多可被推遲達 72 小時，並且對這一措施不得上訴³¹⁸；作為反恐怖主義的一部分，法國訂定措施宣佈緊急狀態，但委員會認為酷刑絕無例外³¹⁹。簡言之，反酷刑不應有任何例外，這仍然是法國需要改進之處。

4.值得注意的是，法國有歧視性執法的現象例如：內政部長曾表示要求行政長官立即驅逐在暴動期間被判有罪之相關個人，無論其行政

³¹⁶ Supra note 97.

³¹⁷ Supra note 62.

³¹⁸ Supra note 99.

³¹⁹ Supra note 101.

地位如何，委員會擔心，針對這一言論所採取的行動可能會產生歧視性效果，因它不僅針對沒有適當文件的外國國民，而且針對因裁判剝奪其國籍的歸化法國公民和合法居住在法國外國人；³²⁰在收容區域中的警察暴力事件，會特別針對非西方人士³²¹。此等歧視性的想法可能導致酷刑的行為的發生。

5.委員會提及許多國際公約、國際文件、國際標準，這或許就是說明了人權的互補與一體性，在執行《公約》時亦須注意其他的國際公約與國際文件，惟確切之國際標準為何？尚須搭配其他文件研讀才可以清楚知道委員會所指國際標準為何，值得注意的是委員會在此亦參照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

6.培訓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委員會要求私人保全也要納進培訓的範圍；委員會強調培訓需要按照人權和《公約》的條款而非僅是道德操守和行為守則(ethics and codes of conduct)³²²，其中最重要的文件為，《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有效調查和檔記錄手冊》(《伊斯坦堡議定書》)。

³²⁰ Supra note 19.

³²¹ Supra note 31.

³²² Supra notes 125-126.

柒、 國家人權報告撰寫準則

國家人權報告共同準則(摘要)

一、前言

報告準則解釋的報告制度旨在提出一個統一的框架，以便締約國在這個框架內按照一套協調精簡的程序完成其批准或加入的國際人權條約規定的報告義務。

報告程序是一國持續不斷承諾致力於尊重、保護和履行其批准或加入的條約所規定的各項權利過程中的一項關鍵內容。

締約國應把編寫報告、提交條約機構的過程看成不僅僅是履行其國際義務的一個面向，而且也是一個為規劃落實政策而估量其管轄範圍內人權保護情況的機會。因此，報告編寫過程讓每個締約國都有機會：

(a)全面檢查為使國內法律和政策與有關的國際人權條約的規定協調一致而採取的措施；

(b)監測在全面增進人權的情況下，促進條約所規定的各項權利的享有方面取得的進展情況；

(c)確定在其履行條約的方法方面存在的問題和缺點；

(d)計畫和發展達成此等目標的政策。

在國際面向，報告程序為國家和條約機構進行建設性對話創造了基礎。條約機構提共報告準則意欲強調的是其在強化國家執行國際人權文件上的支持作用。

提交的報告將包含兩部分：共同核心檔案和條約專要檔案。

二、報告方式

凡是締約國認為有助於條約機構瞭解其國內情況的資料，應該簡明扼要、條理清晰。報告不應過長。共同核心檔案如有可能不應超過 60 至 80 頁，初次條約專要文件不應超過 60 頁，其後的定期文件則應限於 40 頁之內。每頁格式應按 A4 號紙頁面尺寸、1.5 倍行距、12 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編排。報告應以電子形式(即軟碟、光碟或電子郵件)提交，並附一份列印本。

締約國報告中提到的主要立法、司法、行政和其他文件，如有有關委員會的工作語文本，不妨另行提交。這些文件不會印製作一般分發，但會送交有關委員會供查閱。

報告應對文中所用的一切縮略語都作詳盡說明，特別是締約國以外不可能輕易明白的國家機構、組織、法律等名稱的簡稱用語。

報告應用聯合國的一種正式語文提交，即：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或西班牙文。報告在提交秘書長時應精確、易懂。

三、報告內容

共同核心檔案和條約專要檔案是每個國家報告的組成部分。報告所載資料應足以使各有關條約機構全面瞭解締約國執行有關條約的情況。

報告應說明各國在法律和事實上履行其加入的條約條款的情況。報告不應只限於羅列或介紹締約國近年來所通過的法律文件，而應說明這些法律文件如何實際反映在締約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現實之中，如何體現在國內目前的一般狀況之中。

報告應按性別、年齡和人口分類提供相關統計資料，可以表格形式集中附在報告後面。此類資料應可與以往資料作比較，並應注明資料出處。報告國應努力從與條約義務履行情況有關的角度分析此種資料。

共同核心文件應載有一般性和事實性資料，介紹報告國履行其加入的條約的情況。

初次編寫共同核心檔的國家如果以前已向條約機構提交過報告，不妨將這些報告所載的資料納入共同檔，只要這些資料仍未過時。

條約專要檔案應載有資料說明相關委員會負責監測的條約的執行情況。具體而言，條約專要檔案應包含影響該條約所規定之權利的享有的法律和實踐的最近動態以及—除條約專要初次檔以外—對委員會結論性意見或一般性意見中提出的問題的答覆。

報告第一部分：共同核心檔案

為方便起見，共同核心檔篇章結構應按照本報告準則採用第 1 至 3 節所列標題編排。共同核心檔應包含下列資料。

1. 介紹報告國一般情況的資料

這一節應提出一般性事實和統計資料，協助各委員會瞭解該有關報告國落實人權的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文化背景。

A. 報告國的人口、經濟、社會和文化特色

報告國可提供介紹本國國家特色的背景資料。報告國應避免詳述歷史；只須酌情簡要介紹一些關鍵歷史事實，足以幫助條約機構瞭解該國執行條約的環境即可。報告國應參照到附錄 3「人口統計指標」一節所載的一系列指標，提供確切的資料，介紹本國及其人民的主要人口統計和族裔特點。報告國應考慮到附錄 3「社會、

經濟、文化指標」一節所載的一系列指標，準確地闡明其人口的不同階層的生活水準。

B. 報告國的憲法、政治、法律結構

報告國應介紹該國的憲法結構以及政治、法律架構，包括政府的類型、選舉制度、以及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組成等。報告國如有存在的任何習慣法系或宗教法系，亦應提出。

報告國應提供資料介紹非政府組織獲得應有承認的主要辦法，包括在已存在註冊法律和程序的情況下通過註冊、稅收方面給予非盈利地位，或通過其他類似手段予以承認。

報告國應提供有關司法情況的資料，其中應載有犯罪數據的確切資料，主要包括對犯罪作案人和受害人的分析、以及判決及其執行情況的有關資料。依本節提交的資料應參照附錄3中的「政治制度指標」和「犯罪與司法指標」兩節所載的一系列指標。

2. 保護和增進人權的一般框架

C. 接受國際人權標準的情況

報告國應提供有關所有主要國際人權條約情況的資料。這種資料應以圖表的形式列出，其中應包括：

(a) 主要國際人權文件的批准情況。

(b) 保留和聲明。如果締約國對其參加的條約中任何一個曾提出保留，則共同核心檔案應提供資料說明：

1. 保留的性質和範圍：

2.為何認為這種保留有必要並予維持的理由；

3.每一保留對國內法律和政策的確切影響；

4.世界人權會議和其他類似會議鼓勵各國考慮重新審核已作的任何保留，以期撤銷這種保留， 本著這一精神，說明是否有計劃限制這種保留的作用、而且最終在一定的時限內予以撤銷。

(c)減免、限制或界限。報告國的法律對已加入的條約的任何條款規定作過限制、界限或減免，共同核心檔案應列入資料說明減免、限制或界限的範圍；有理由作出減免、限制或界限的具體情況、以及預計予以撤銷的時間。

報告國不妨也列入資料說明其接受其他的國際人權標準的情況，特別是如果此種資料與每個報告國落實主要國際人權條約規定的情況直接有關。具體而言，請報告國注意來自下列有關方面的資料：

(a)批准聯合國其他人權條約及相關條約的情況。報告國可說明是否加入了附錄 2 的 B 節所列聯合國其他有關人權的公約。

(b)批准其他有關國際公約的情況。鼓勵報告國說明是否參加了附錄 2 的 C 至 F 節所列的涉及人權保護和人道主義法律的國際公約。

(c)批准區域人權公約的情況。報告國應說明是否參加了任何區域人權公約。

在國家層級增進人權的法律框架

報告國應列述為增進國內對人權的尊重所作出的種種努力。此類努力可包括政府官員、立法部門、地方議會、國家人權機構等採取的行動，同時加上公民社會相關角色發揮的作用。報告國可提供

有關資料，介紹諸如資料傳播、教育與培訓、宣傳和預算資源配置等各種措施。共同核心檔在闡述這些情況時應注意能否獲得宣傳材料和人權文書的問題，包括是否用一切有關的國家通用文字、方言、少數民族文字或原住民族文字提供這些資料的情況。報告國應提供資料介紹：

(a)國家和地方議會。說明國家議會和國家以下之地區、省或市級的議會或主管部門增進和保護人權，包括增進和保護國際人權條約所載人權的角色與活動；

(b)國家人權機構。為了保護和增進人權而設立的任何全國性機構，包括具體負責人人享有性別平等、種族關係和兒童權利的機構、其確切任務、組成、經費資源和活動情況，以及這種機構是否獨立的問題；

(c)散發人權文書。報告國所加入的國際人權文件中每一種的翻譯、出版並在國內散發的情況；

(d)提高政府官員及其他專業人員的人權意識。是否採取任何措施確保負責實施法律的人員受到適足的人權教育和培訓，這類人員有：政府官員、員警、移民官員、檢察官、法官、律師、監獄管理人員、軍隊官兵、邊境警衛人員、以及教師、醫生、保健人員和社會工作者；

(e)通過教育方案和政府主辦的宣傳運動提高人權意識。是否採取任何措施，通過教育和培訓、包括政府主辦的宣傳運動增強公民對人權的尊重。各級(公立或私立、世俗或宗教)學校開展人權教育的程度應作詳細說明；

(f)通過大眾傳媒提高人權意識。報紙、電臺、電視及互聯網等大眾新聞媒體宣傳人權，包括宣傳國際人權文書的作用；

(g)包括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公民社會的作用。公民社會、特別是
非政府組織參與國內增進和保護人權活動的程度，政府採取了什麼
措施鼓勵和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以確保人權得到增進和保護；

(h)預算撥款額和趨勢。現有的按性別和年齡分列的用於履行報
告國人權義務的預算撥款額和趨向預算額、在國家和區域預算及國
內生產總值(內產值)中所占百分比、以及任何有關的預算影響評估
結果；

(i)發展合作和援助。報告國從發展合作或支援增進人權的其他
援助，預算撥款中受益的程度。報告國向其他國家提供發展合作和
援助，用於增進這些國家人權的工作情況。

報告國可說明任何影響或阻礙在國家一級落實國際人權義務的
一般性的因素或困難。

國家層級的報告程序

報告國應提供資料說明編寫報告兩個部分(共同核心檔案和條
約專要檔案)所用的程序，包括說明：

(a)是否有負責條約報告的全國協調機構；

(b)中央，地區和地方各級政府(有的情況下則是聯邦和省級政
府)的各部門、機構和官員的參與情況；

(c)報告提交條約監測機構之前，是否發給國內法機構或由其審
查；

(d)政府以外的各實體或相關獨立機構在報告編寫過程或其後續
工作的各階段的參與性質，包括監測、對報告草稿的公開辯論、翻
譯、傳播或出版、或解釋報告或條約機構的結論性意見的其他活
動。此類參與方可包括(國家級或其它)人權機構、非政府組織或民

間社會的其他相關角色，包括最受條約相關規定影響的人員和群體；

(e)舉行過的各種活動，諸如：議會辯論、政府會議、講習班、研討會、電臺或電視廣播、以及解釋本報告的出版物、或任何其他在報告期內進行的類似活動。

禁止酷刑公約初次報告的形式和內容準則 (摘要)

根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公約》第 19 條，締約國承諾提交關於其為履行公約義務所採取措施之報告。初次報告應在《公約》對有關締約國生效後一年內提交，隨後每四年提交一次報告，除非委員會要求提交其他報告。為了協助締約國履行第 19 條義務，委員會通過有關初次報告形式和內容之一般準則。

一、一般資訊

A. 導言

3. 在報告導言部分中，應提到有關一般資訊的擴大的核心文件，如一般政治結構、保護人權的一般法律架構等。在初次報告正文中，無需重複這些資訊。

4. 這一節中應列入有關編撰報告之程序的資訊。委員會認為，報告的草擬應可受益於廣泛協商。因此，委員會歡迎締約國提供關於政府內部、以及與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組織可能進行之任何相關協商的資訊。

B.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一般法律架構

5. 在這一節中，委員會預期收到核心文件所無之關於公約實施情況的具體資訊，特別是：

- 簡要說明關於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憲法、刑法和行政規定；

- 報告國批准加入之其它涉及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問題的國際條約；

- 公約在國內法律體系中的位階，例如相對於憲法和普通立法的地位；

- 國內法如何確保關於禁止任何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之規定的不可減免；

- 能否在法院援引並由法院或行政機關直接執行《公約》規定，這些規定是否必須納入國內法或行政規章後方能由相關主管機關執行。如果要求須納入國內法，報告應當提供關於將《公約》納入國內法律體系的立法法案的資訊；

- 管轄/有權機關涵蓋《公約》所涉事項的司法、行政或其他主管機關，如憲法法院、最高法院、普通法院和軍事法院、檢察官、紀律檢查機構、負責員警和監獄管理的行政主管機關、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等。提供《公約》在該國聯邦、中央、地區和地方各級實際執行的概況，並列出可能影響報告國履行《公約》義務的任何因素和困難。報告應列入關於此種情況下《公約》執行情況的具體資訊。歡迎主管機關或其他私人或公共機構收集的相關文件。

二、關於《公約》各實體性條款的資訊

6. 作為一般規則，報告涉及每一條款內容時應包括下列資訊：

- 落實有關規定的立法、司法、行政等措施；

- 執行落實有關規定措施的具體案例和情況，包括任何相關統計資料；

- 違反《公約》之案例或情況，此種違反情事的原因與為補救有關情況所採取措施。重要的是，委員會不僅要清楚地瞭解法律情況，而且要清楚地瞭解實際情況。

第 1 條

7. 該條規定《公約》關於酷刑的定義。在該條之下，報告應列入：

- 國內法中關於酷刑定義的資訊，包括說明此定義是否完全符合《公約》的定義；

- 若國內法欠缺符合《公約》規定之酷刑定義，應說明涵蓋所有酷刑案件的刑事或立法規定的資訊；

- 關於載有或可能載有更寬廣適用範圍之任何國際文書或國家立法的資訊。

第 2 條第 1 項

8. 該項規定，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有效措施防止酷刑行為。報告應規定下列資訊：

- 為防止所有酷刑行為而採取之有效措施之相關資訊，諸如關於：員警可裁處拘禁的期限、單獨拘留、關於被逮捕者聘請律師、得到醫療檢查和與家人聯繫等權利的規定、可能限制對被拘禁者的各種保障的緊急狀態或反恐立法。

9. 委員會歡迎報告國對有關防止酷刑措施效力的評估，包括確保將責任人繩之以法的措施。

第 2 條第 2 項

10. 報告應列入關於確保任何特殊情況均不得被援引為由之各種有效措施的資訊，特別是：

- 是否存在法律和行政措施，保障任何人不受酷刑對待的國家義務即使在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動盪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狀態期間也不受減損；

第 2 條第 3 項

11. 報告應表明：

- 是否存在禁止援引上級命令--包括軍事當局命令--為施行酷刑之理由的立法和判例法；如果有，應提供關於其實際執行情況的資訊；
- 是否有任何允許下級可以合法違抗施行酷刑命令的情況，他或她可以求助的程序和關於可能發生的任何這種情況的資訊；
- 作為一個刑法上辯護理由，公共主管機關有關「正當服從」概念的立場是否對有效實施這項禁止造成任何影響。

第 3 條

12. 該條禁止將一個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今其可能遭受酷刑的國家。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關於此種禁止的國內立法；
- 國家可能通過或採用之有關恐怖主義、緊急情況、國家安全或其他理由的立法和做法是否對有效實施這項禁止造成任何影響；

- 由何主管機關根據哪些標準確定引渡、驅逐、遣送或送回個人；
- 關於這一問題的決定是否能夠得到覆審，如果能夠，由哪機關進行覆審，所適用程序為何，此種程序是否具有停職的效力；
- 有關第 3 條案件的決定及這些決定中所適用之標準，有關決定所依據之資訊與資訊來源；
- 為處理驅逐、遣返或引渡外國人的官員提供之培訓項目。

第 4 條

13. 該條規定的報告義務指國家應當頒布立法，以與第 1 條定義相符的用語將酷刑定為罪行。委員會一貫認為，酷刑罪性質不同於現有各種形式的殺人和攻擊，因此應當單獨界定為一項罪行。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關於這些罪行和相關處罰的普通刑法和軍事刑法規定；
- 各種限制法規是否適用於此種罪行；
- 適用這些法律規定的案件數和性質及有關案件的結果，特別是定罪判決的刑罰和開釋理由；
- 與實施第 4 條相關的判決書樣本；
- 關於在調查指稱酷刑案期間所採取之針對酷刑行為負責的執法人員要求的紀律措施之立法(例如停職)；
- 關於現有刑罰如何考慮酷刑之嚴重性的資訊。

第 5 條

14. 第 5 條涉及締約國對第 4 條所述罪行確立管轄權之法律責任。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在第 1 項(a)、(b)和(c)款所涉案件中，為確定管轄權而採取之措施。還應包括適用(b)和(c)款規定的案例；
- 在指稱犯罪者於報告國境內而該國不將其引渡到對有關罪行具有管轄權之國家的案件，為確定管轄權而採取的措施。應當提供(a)款准予引渡和(b)款拒絕引渡之案例。

第 6 條

15. 第 6 條涉及締約國行使管轄權，特別是涉及調查身處其領土內被控有第 4 條所述罪行者的問題。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國內有關法律規定，特別是有關拘押該人或確保在場之措施；該人獲得領事協助的權利；報告國通知可能也對被拘押者具有管轄權之其他國家的義務；有關拘留的情況和締約國是否打算行使管轄權；
- 負責實施第 6 條各個方面的主管機關；
- 適用上述國內規定的任何案件。

第 7 條

16. 本條規定關於締約國除非將指稱的犯罪人引渡否則應對其管轄範圍內的酷刑行為予以起訴的義務。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確保指稱犯罪者在訴訟的所有階段都得到公平待遇的措施，包括得到法律諮詢的權利、在被證明有罪之前被推定無罪的權利、在法院面前平等的權利等；

- 確保起訴和定罪所要求之證據標準在指稱犯罪者為在國外犯下酷刑行為的外國人案件中一體適用；

- 實際執行上述措施的案例。

第 8 條

17. 根據《公約》第 8 條，締約國須承認酷刑為可引渡的罪行，以便於引渡涉嫌犯有酷刑行為和/或相關酷刑未遂罪行及共謀和參與酷刑罪者。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酷刑和相關罪行是否被報告國視為可引渡的罪行；
- 報告國是否以條約的存在為引渡的條件；
- 報告國是否將《公約》視為就有關上述罪行實施引渡的法律根據；
- 報告國與《公約》其他締約國之間將酷刑列為可引渡罪行之引渡條約；
- 報告國准予引渡指稱犯有上述任何罪行者的案例。

第 9 條

18. 根據本條，締約國須在所有涉及酷刑罪及相關酷刑未遂罪、共謀和參與酷刑罪的刑事訴訟事項中相互提供司法協助。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有關涉及上述罪行案件中相互提供司法協助的法律規定，包括任何條約；
- 報告國要求或被要求相互協助之涉及酷刑罪的案例，包括有關要求的結果。

第 10 條

19. 根據本條及相關之第 16 條，締約國有義務就禁止酷刑、殘忍、不人道和侮辱之處遇與處罰事項，培訓參與拘押、審訊或處理在國家或官方控制之下之人的執法人員、司法官員和其他人員。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就上述問題對擔任《公約》第 10 條所列各項職務者的培訓方案；
- 關於處理被拘留者或尋求庇護者問題之醫務人員的培訓，以發現揭露酷刑的生理和心理痕跡，以及對司法和其他官員的培訓的資訊；
- 有關授課和培訓的性質和頻率；
- 關於確保適當地和尊重地對待婦女、青少年、以及族裔、宗教或其他各種群體之任何培訓的資訊，特別是有關不當影響這些群體之各種形式酷刑；
- 各種方案的效力。

第 11 條

20. 根據本條與相關之第 16 條，各國有義務經常檢討對遭到任何形式逮捕、拘留或監禁者進行審訊的規則、指示，方法和慣例，以及對其拘押和處遇的安排，以防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有關被剝奪自由者待遇的法律、規章和指示；
- 關於要求迅速通知和接觸律師、醫生、家庭成員，以及在外國國民的案件中要求通知領事諸措施的資訊；

- 國內法和國家實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下列規則和原則：《受刑人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受刑人待遇基本規則》；《維護所有遭受任何刑事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關於醫務人員、特別是醫生在保護被監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方面的任務的醫療道德原則》；和《執法人員行為守則》；

- 為檢查監獄和其他拘留地點、監督對男子和婦女進行之所有形式的暴力--包括對男子和婦女的各種形式之性暴力以及受刑人之間所有形式暴力--而設立之任何獨立機構或機制，包括授權國際監督或非政府組織進行檢查；

- 關於確保所有此類地點均為官方確認與不允許任何單獨拘留之規定的資訊；

- 審查負責審訊和拘押被拘留和監禁者的執法人員行為的機制，和此種審查的結果，以及任何合格或重新合格的程序；

- 關於保護承受特別風險者之任何保障的資訊。

第 12 條

21. 根據本條和相關之第 16 條，當有理由認為其管轄下已發生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行為時，各國必須保證其主管機關立即進行公正調查；報告應說明：

- 在刑事和紀律層面上啟動和展開調查的主管機關；

- 相關適用程序，包括是否可立即近用醫療檢查和法醫判讀之措施；

- 指稱之酷刑或虐待行為者是否在調查期間立刻被停止職務和/或被禁止進一步與指稱的受害者接觸；

- 相關案件的起訴情況和處罰結果。

第 13 條

22. 根據本條和相關之第 16 條，締約國必須保證，任何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個人有權申訴並有權要求案件得到迅速和公正的調查，並保證申訴人和證人不受虐待或恐嚇。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所稱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行為之受害人可使用的救濟辦法；
- 在主管機關拒絕調查其案件的情況下，申訴人可使用的救濟辦法；
- 保護申訴人和證人免遭任何恐嚇或虐待的機制；
- 按性別、年齡、罪行和向國內主管機關申訴酷刑和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申訴人所在地點和人數等分列之統計資料，及有關調查的結果。還應當列出被控犯有酷刑和/或其他形式虐待者所屬機關；
- 關於任何申訴人獲得獨立和公正的司法救濟的資訊，包括是否有妨礙人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之任何歧視；任何有效防止騷擾或二度傷害受害者之任何規定或措施的資訊；
- 關於為處理涉及對婦女和特特殊族裔、宗教或其他少數群體之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性之處遇案件而接受專門訓練的員警和檢察機關或類似權責機構的相關資訊；
- 關於任何此類措施效力的資訊。

第 14 條

23. 本條涉及酷刑受害者獲得補償、及取得公平和充分賠償和康復之權利。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酷刑受害者及其家屬獲得賠償之現有程序，這些程序是否已經法制化；
- 有關國家是否在法律上對犯罪者行為負責，從而有賠償受害者之責任；
- 關於下令賠償之主管機關所作決定的統計資料，報告中至少須提供有關案例，並說明此種決定是否得到執行，包括有關酷刑性質、受害者地位和身份及其取得賠償或其他補償數額之資訊；
- 有關國家針對酷刑受害者的現今康復方案；
- 除賠償外，關於恢復與尊重受害者尊嚴、安全和健康保護之措施，以及防止加害者再犯和協助受害者康復及重新融入社區之任何措施的資訊。

第 15 條

24. 根據本條規定，國家必須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採納以酷刑取得之口供作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為證明施用酷刑者逼供的證據。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關於禁止將通過酷刑所獲取之口供作為證據之法律規定；
- 適用此類規定的相關案例；
- 如果適用，締約國法律系統中是否允許衍生證據等資訊。

第 16 條

25.本條規定各國有義務禁止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行為。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締約國在何種程度上將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行為定為非法；關於國內法是否定義或以其他方式處理這些行為的資訊；

- 締約國採取之防止此類行為的措施；

- 員警拘留中心和監獄的生活條件，包括女子和未成年人監獄，說明他們是否與男性/成年人分開。特別應當說明與監獄超收人犯、受刑人間暴力、對受刑人的紀律措施、醫療和衛生條件、監獄最常見的疾病及其治療、受刑人獲得食品及未成年人拘留條件相關之問題。

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下稱禁止酷刑公約)旨在直接防止並處罰世界各地有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行為，國際社會已公認禁止酷刑為國際法秩序中具有強行法性質之習慣國際法規範。國家即使處於戰爭或危及國家安全之緊急情況，亦不得延宕、擱置或減免本公約之義務；其任擇議定書(下稱議定書)則具體規定應於國家層級設置獨立防制酷刑機制，用以確保政府各機關具體落實本公約規範義務並提供救濟管道。

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行為不僅嚴重侵害受害者之尊嚴，也使加害者喪失人性，最終使任何在明知的情況下如還容忍這種行為，

人類社會就會完全喪失人性。酷刑及虐待會造成持久的創傷，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所有聯繫，給整個社群造成嚴重損害。

1998 年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 7 條規定，有系統地或廣泛地實施酷刑和其他類似性質的不人道行為構成危害人類罪，如與武裝衝突有關而實施此等行為，則構成戰爭罪(第 8 條)。酷刑與所有其他形式的虐待行為，已不只是禁止酷刑公約明確規範的嚴重犯罪行為，性質上是國際犯罪。

雖然國際人權法，如各項人權條約與宣言為各國規定酷刑規範與禁止義務，例如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第 5 條，1966 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1950 年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1969 年美洲人權公約第 5 條、1981 年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利憲章第 5 條、2004 年阿拉伯人權憲章第 8 條、1989 年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1990 年保護所有移徙工作者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第 10 條和 2006 年身障人權公約第 15 條，2012 年東協人權宣言第 14 條等。並將酷刑和虐待界定為國家官員參與的行為，但國際刑法或國際人道法並沒有規定將國家參與作為認定酷刑或虐待的條件。酷刑和虐待的形式不勝枚舉，無窮無盡，因此無法詳盡地進行編目歸類，它們從員警暴力、恐嚇和羞辱到逼供，從剝奪聯繫家人或接受醫療的權利到將藥物戒斷症狀作為手段加以利用，從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拘禁到長期任意拘禁或濫用單獨囚禁，甚至於死刑等。雖然酷刑和虐待的多種表現形式不一定涉及同樣的嚴重性、故意性和有目的地作為手段致人疼痛或痛苦，但它們都涉及有悖於人性尊嚴的嚴重侵害身心健全的行為。

本研究案針對「禁止酷刑公約之國際標準與實踐」經爬梳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所有與酷刑有關之報告，條約機構如反酷刑委員會，人權事務委員會與經濟社會文化委員會有關酷刑之一般性意見，所有與酷刑有關軟法文件以及其他涉及酷刑規範之人權條約，摘要整理出一些重要國際標準，進行研究並依禁止酷刑公約第 1 條至第

16 條有關實體規範逐一臚列後發現，關於酷刑與其他形式虐待行為之標準，內容相當繁複，未來禁止酷刑公約國內法化後，依公約第 1 條第 2 項規定：本條規定並不妨礙載有或可能載有適用範圍較廣規定之任何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因此，未來在實踐上如何於立法中確立國家義務之履行基準，參酌此等相關標準實屬必要。

關於國家義務之內涵，以逐條注釋方式說明其具體要素，對於建構酷刑指標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禁止酷刑公約實踐上，有關國家報告之研析，選定美國，加拿大，法國，日本與香港做為研究標的，係考量進步國家與有特殊背景環境之香港於公約義務之履行是否有顯著之困難以做為我國未來實踐上或立法上特殊議題事項之參考。香港部分的研究所見的問題非常值得我們參考，特別是關於外籍移工的管理，警察申訴機制與不遣返原則等問題。日本與美國籍法國在酷刑罪定義上，同樣地都受到委員會的關注與建議應符合公約第 1 條之定義，此外美國的監獄管理與性侵害問題都是值得我國注意的問題。法國為了打擊恐怖主義而使得反酷刑出現許多漏洞，例如：輕罪以外之罪警方或法官的審問必須進行影像錄影，但如果沒有公共檢察官或預審調查法官授權(Public Prosecutor or investigating judge)，該法不適用於受到恐怖主義和組織犯罪指控的人員。反酷刑不應有任何例外，法國顯然已違反公約。培訓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委員會要求私人保全也要納入培訓的範圍。

總結禁止酷刑公約之義務，包含於實體法條款者，計有 16 條，明定國家應尊重，保護與履行絕對禁止酷刑與其他各種形式之虐待行為之義務，此外另有應遵守之附加程序條款。與其他人權條約相較而言，禁止酷刑公約並不是規定如何履行條款之條約，而是刻意並鼓勵國家發展自己的法律，政策，實踐與在符合國家個別特殊環境與特性下能履行公約義務之機制。

公約的主要義務大致上可歸納成五個項目：禁止，防止，處罰，救濟與報告。分別說明如下。

禁止：絕對禁止酷刑與其他形式之虐待行為屬於不可減免之國際法強行規範。禁止的內涵包括不只國家有義務不得為酷刑(第 1 條)，更有相關義務不得將任何人遣送至將受到酷刑之任何國家或地方(第 3 條)，而且有義務不使用以酷刑取得之消息於任何司法程序中做為證據(第 15 條)。

國家必須確保絕對禁止酷刑與其他形式之虐待確實反映在國內法律秩序中(第 2 條)，而且包含於所有有關國家主體之訓練教材中(第 10 條)。

國家應明確宣示禁止酷刑的絕對性，因此，遵守上級命令之抗辯基於公約永遠是無效的。不論是武裝衝突，緊急狀態，國內政治變動或任何危及國家之情形，都不得作為酷刑之合法抗辯。

關於第 1 條末段規定合法制裁條款(The lawful sanctions clause)之例外解釋，係指合乎國內法與國際標準的制裁使稱為合法始有其例外之適用。應採嚴格解釋以保護有遭受酷刑或虐待危險的任何人確保所受處罰限為國家權力之合法行使。³²³ 紐西蘭刑法規定合法制裁

³²³ Rodley and Pollard, *Criminalisation of torture: State obliga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2006), pp. 120 and 121

條款必須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規定，因而不包含任何作為或不作為完全出自，或固有，或附帶於任何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條款的合法制裁。³²⁴

防止：國家應採取有效之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以防止酷刑(第 2 條與 11 條)及其他虐待發生(第 16 條)。

禁止酷刑公約並未具體規定國家應採取之措施內容，僅要求有關措施必須是有效的措施。制度性保障防止酷刑，如於初期即提供律師之使用與獨立檢視拘禁場所都是特別報告員以及其他專家特別建議為有效防止酷刑之措施。

處罰：所有酷刑行為必須為調查並起訴。國家應確保其國內法中有明確之酷刑罪(第 4 條)，而且所有申訴與懷疑都應獲得調查(第 5 至 9 條及第 12，13 條)。有合理懷疑酷刑已經發生，受指控之行為人應加以起訴。

關於第 16 條虐待行為是否也應以刑事罪處罰之問題，基於酷刑與虐待分別規定於不同條款，本條制定本公約時故意之設計。因此，第 4 條規定應於國內法以刑事罪處罰酷刑之義務，並不適用於第 16 條之虐待。但國家仍得於其他罪章中規定虐待之刑事責任。委員會於

³²⁴ New Zealand, Crimes of Torture Act of 1989, Act No.106 (13 November 1989), section 2(1)(b), available at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89/0106/latest/whole.html>

其對德國報告之結論性意見中表示，國家如立法以刑事罪處罰虐待行為，應對虐待與酷刑二者之犯罪概念加以區別。³²⁵另一方面，由於公約本身對於虐待並無明確定義，因此，國家得於立法中以更明確之方式與內容加以規定。

公約第 2 條規定國家有義務通過立法防止酷刑發生於其領域內。第 4 條規定國家有義務對於此等犯罪(指酷刑罪)考量其危險性處以相當之刑罰。委員會建議酷刑罪之處罰至少應為 6 年。委員會指出，公約定義與組成國內法定義之間的嚴重落差是造成免除刑罰的實際或潛在漏洞。³²⁶

第 4 條規定國家應立法規定意圖施加酷刑，共謀與其參與方式分別負擔必要刑事責任。因此國家有義務處罰不同之犯罪態樣，如同第 1 條所示，不只施加酷刑，更及於教唆，或同意或默許等。

關於酷刑罪之構成要件，公約第 1 條明定為：

- 1) 故意對他人之肉體或精神施以劇烈疼痛或痛苦之任何行為；
- 2) 目的為自特定人或第三人取得情報或供詞，為處罰特定人或第三者所作之行為或涉嫌之行為，或為恐嚇、威脅特定人或第三人，或以任何理由為任何方式之歧視，

³²⁵ CAT,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Germany (12 December 2011), UN Doc. CAT/C/DEU/CO/5, para. 9.

³²⁶ CAT, General Comment No. 2, supra note 1, para. 9.

3) 此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其他行使公權力人所施加，或基於其教唆，或取得其同意或默許。

4) 但純粹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的疼痛或痛苦不在限。

基於此，本公約之酷刑行為，係為具體目的，如為取得供詞、獲取情報、進行處罰、侮辱、歧視，行為主體必須有公職人員的參與，不論直接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或基於官方授權行使公權力的其他人，故意使某人遭受在肉體或精神上劇烈疼痛或痛苦的行為。

痛苦的嚴重程度雖無客觀標準，因此要符合酷刑條件之嚴重性，一般認為應基於每個案件之情況為解釋，考量每個受害人的特殊情形，與發生酷刑行為的情境。

故意是酷刑罪的構成要件，因此，不處罰過失犯。至於不作為犯是否也是犯罪態樣，公約雖未規定，依委員會第3號一般性意見之說明，本罪應包含作為犯與不作為犯。³²⁷

然而第1條規定之目的，只是例示性規定，因此其他類似之目的亦有本條之適用。至於目的或意圖要件之意義，解釋上，並非是對行為者之動機做主觀上的調查，而是考量所有情況下的客觀認定。³²⁸

因此，故意施加劇烈的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如其目的與國家或其機關之政策或利益有關，此所稱有關，指有直接之行為與目的之連結關係，例如基於反恐、仇外等國家政策或利益之目的，即屬之。非有直接之行為與目的間之連結關係，例如嚴酷之軍事訓練，其目的由於不屬於第1條指涉之處罰，雖有間接之國家利益與政策之目的，仍無本條之適用。

³²⁷ CAT, General Comment No. 3: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14 by States Parties (13 December 2012), UN Doc. CAT/C/GC/3, §§ 3, 23 and 37.

³²⁸ CAT, General Comment No. 2, supra note 1, § 9.

故意施加劇烈的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主體必須有公職人員的參與，不論直接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或基於官方授權行使公權力的其他人，因此，第 1 條之定義不包含與國家無任何連結之私人行為。雖然如此，公職人員的解釋卻不得過於狹隘，非國家或私人行為主體的暴行，如果公職人員或有合理理由相信非國家或私人行為主體正在施行暴行，卻未採取應有之注意(due diligence)加以防止，調查，起訴或處罰此等非國家或私人行為主體時，有關公務員應視為共謀，同意或默許而應負其罪責。³²⁹委員會還解釋，「基於公權力之行為」(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用語，包含事實上當權者(de facto authorities)，例如，叛亂團體與交戰團體當他們已能行使相當於合法政府通常行使統治權之情形。³³⁰

救濟：酷刑與其他形式之虐待都應能獲得救濟，而且享有能執行獲得公平與適足賠償之權利，包括盡可能完全復原之方法(第 14 條)。國家應通過立法提供受害人有效之救濟與有權獲得適足與適當之賠償。此等救濟必須是可用以對抗國家，而非只能對行為人的民事主張，而且是實際上有效的。

報告：所有國家必須向反酷刑委員會提出定期報告說明其已採取實踐公約之步驟。依據公約第 19 條規定，國家應於批准後一年內提出初次報告。定期報告為初次報告後每四年提出。

³²⁹ CAT, General Comment No. 2, supra note 1, § 18

³³⁰ CAT, Elmi v. Australia (25 May 1999), UN Doc.CAT/C/22/D/120/1998, § 6.5.

二、建議

1、法律架構之建置

除了正式承認在禁止和防制酷刑和虐待的國際法律義務外，無論是源自條約文書、習慣國際法還是一般法律原則，國家必須透過立法、行政監督、有效程序和實際措施，在管轄區域內，特別是在拘禁處所以在警察執法、警務行政、移民管控與所有人其自主能力受到限制之各種機構，防止各種形式的暴力。

(1) 刑事定罪

為了防止酷刑和虐待，必須依照國家法律對酷刑與所有其他形式之虐待行為施以適當的刑事定罪和有效起訴。³³¹觀諸許多國家的刑法仍然不承認酷刑是一種特殊罪行，和對該罪行採用過於狹隘的定義，或者僅僅因為公職人員的同意或默許而未能對其施以刑事定罪。顯然已違反公約義務之結論，建議我國宜直接以公約第 1 條規定訂定酷刑罪專章。

公約要求締約國對於酷刑定為個別與特別之刑事罪。這是公約最基本的義務。此義務明定於第 4 條：每個國家應確保所有酷刑行為是其刑法中之罪行。在反酷刑委員會的第 2 號見書中，委員會特別強調

³³¹ 《禁止酷刑公約》第 2 條和第 4 至 7 條。

酷刑必須訂為特殊之犯罪，只有如此才能直接促進公約整體的目的。³³²

關於酷刑罪之定義，公約義務要求最低限度應採納公約第 1 條之規定之所有要件。委員會幾乎在所有的結論性意見都建議國家應於國內立法中對於酷刑罪之定義應符合公約或包含第 1 條之所有要件。國家在國內法化酷刑罪立法例中，直接以公約第 1 條定義之要件規定於其刑法者不在少數。例如加拿大³³³，愛爾蘭³³⁴，盧森堡³³⁵，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³³⁶，紐西蘭³³⁷與菲律賓³³⁸之刑法。

此外第 4 條規定國家有義務對於此等犯罪(指酷刑罪)考量其危險性處以相當之刑罰。委員會建議酷刑罪之處罰至少應為 6 年。委員會指

³³² CAT, General Comment No. 2: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2 by States Parties (24 January 2008) UN Doc. CAT/C/GC/2, § 11.

³³³ Canada Criminal Code, R.S., c. C-34, s.1, article 269.1(2), “torture means any act or omission by which severe pain or suffering, whether physical or mental, is intentionally inflicted on a person (a) for a purpose including (i) obtaining from the person or from a third person information or a statement, (ii) punishing the person for an act that the person or a third person has committed or is suspected of having committed, and (iii) intimidating or coercing the person or a third person, or (b) for any reason based on discrimination of any kind, but does not include any act or omission arising only from, inherent in or incidental to lawful sanctions.” Available at <http://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46/>

³³⁴ Ireland, Criminal Justic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ct of 2000 (Act No.11, 2000), section 1, “Torture means an act or omission by which severe pain or suffering, whether physical or mental, is intentionally inflicted on a person (a) for such purposes as (i) obtaining from that person, or from another person, information or a confession, (ii) punishing that person for an act which the person concerned or a third person has committed or is suspected of having committed, or (iii) intimidating or coercing that person or a third person, or (b) for any reason that is based on any form of discrimination, but does not include any such act that arises solely from, or is inherent in or incidental to, lawful sanct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eli/2000/act/11/enacted/en/print.html>

³³⁵ Luxembourg criminal code 1879, as amended by Law of 24 April 2000, article 260-1, available at http://www.legilux.public.lu/leg/textescoordonnes/codes/code_penal/codepenal.pdf

³³⁶ Bosnia-Herzegovina, Penal Code of 2003, as last amended in 2015, article 190, available at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country/40>

³³⁷ New Zealand, Crimes of Torture Act of 1989, supra note 7, section 2.

³³⁸ Philippines’ Anti-Torture Act of 2009, Republic Act No. 9745 (10 November 2009), section 3, available at http://www.congress.gov.ph/download/ra_14/RA09745.pdf

出，公約定義與組成國內法定義之間的嚴重落差是造成免除刑罰的實際或潛在漏洞。³³⁹

國家立法如未能就施加酷刑的嚴重性規定相當的制裁、履行普遍管轄義務或對於施加酷刑和虐待行為人，不論本國人或外國人，或任何其他理由給予豁免都是公約義務之違反。

(2) 調查、課責、救濟與康復

國家有責任調查酷刑和虐待指控，並在發生侵犯行為時提供課責、賠償和康復的機會，³⁴⁰這對確保正義、和解和法治以及防止未來出現類似侵犯行為至關重要。立法上應能充分保障這些權利，排除尋求救濟上可能的法律障礙，例如時效期限和豁免，或是在申訴與救濟程序中歧視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法律地位或資格。

此外應設置專門機構協助酷刑受害者獲得康復。

(3) 預防性保障措施

拘禁或監禁的最初幾個小時和單獨拘禁期間遭遇酷刑和虐待的風險最大。³⁴¹ 因此，必須在逮捕後立即實施預防性保障措施，包括通知有關機關，與律師和醫生取得聯繫，向被拘禁者提供有關其權利、現有補救措施和逮捕理由的資訊。為此目的，國家應對執法人員和

³³⁹ CAT, General Comment No. 2, supra note 1, para. 9.

³⁴⁰ 《禁止酷刑公約》第 12 至 14 條。

³⁴¹ Richard Carver and Lisa Handley, eds., *Does Torture Prevention Work?* (Liverpool, United Kingdom,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6)。

調查人員開展適當培訓，使他們具備適當的能力，從而確保其使用非脅迫性詢問技巧，避免在拘禁場所以及在廣泛的執法行動中過度使用武力。³⁴² 考慮使用新型設備和技術有助於防止酷刑和虐待以及追究加害者的責任。

應當特別注意所謂不致致命的一些武器，包括泰瑟槍和電擊腰帶等電擊裝置，這種裝置的過度或不當使用，已有抵觸公約之虞。

(4) 排除規則

任何透過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獲取的消息或資訊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在國家的任何訴訟程序中都不得採為證據。³⁴³ 否則即無法有效保障禁止實施酷刑和虐待。³⁴⁴

(5) 不遣返原則

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時，不得將該人員驅逐、移交或遣返該國。³⁴⁵ 雖然難民法規定的不遣返保護僅限於具有難民身份的人，並允許存在基於國家或公共安全考慮的例外情況，但在驅逐、移交或遣返將使有關人員面臨真正的酷刑或

³⁴² 《禁止酷刑公約》第 10 條。

³⁴³ 見反酷刑委員會，關於締約國執行第 2 條的第 2(2008)號一般性意見(第 6 段)，和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第 14 條—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的第 32(2007)號一般性意見(第 41 段)。

³⁴⁴ 《禁止酷刑公約》第 15 條。

³⁴⁵ 《禁止酷刑公約》第 3 條。

虐待風險的情況下，仍應遵守公約不遣返之原則與不允許任何限制或例外情況。

(6) 非國家行為主體

各種私人行為主體正越來越多地實施暴力和虐待，這些私人行為主體不僅包括有組織犯罪分子和有組織武裝團體，還包括在國家官員的教唆或同意、默許下行事的公司行為主體、私營承包商或公民個人。關於此，國家應立法防止此類暴力，保護潛在受害者，特別是在家庭暴力、性暴力和虐待兒童等，消除起訴與處罰私人主體的法律障礙

二、健全國家體制

要有效執行禁止酷刑和虐待規定，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體制架構，以便促進適用、監督和執行相關規範和標準。

(1) 刑事司法和申訴機制

國家應設置有效且獨立的申訴和調查機制，包括能夠裁定侵犯行為以及起訴和懲處加害者的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

(2) 防制機制

設置獨立的防制機制定期對拘禁場所開展獨立監測是防止酷刑和虐待的最有效的保障措施之一。因此，要確保監督的獨立性與透明。

(3) 廣泛之人權環境的建構

在缺乏強而有力的體制性人權環境下，酷刑和虐待很難有效完全消除甚而持續存在。因此，建立擁有必要的獨立性和資源的防制機構始能有助於防範酷刑與虐待。此外更應賦予民間社會團體和人權維護者享有安全的環境始能更有助於保護人權，特別是防止酷刑和虐待。

(4) 政治意願

國家要有效執行禁止酷刑和虐待規範的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具有強烈的政治意願以制定有關政策以及改變體制文化和有關程序以使此項規範具體可行。缺乏資源和支持，即使是最具示範性的法律架構與體制也不會產生效果。

基於此，容忍貪腐、有組織犯罪和為酷刑與虐待提供有利環境的類似結構性因素與消除酷刑和虐待的真誠的政治意願是彼此矛盾，互不相容的。貪腐具有決定性的效果影響到當局調查和裁判酷刑和虐待指控、或提供賠償和康復服務的意願。

此外，國家在處理涉及跨國政策上，對禁止酷刑和虐待具有重大負面影響的一個問題是，對非法移民的處罰性和歧視性政策與措施可能構成公約義務之違反。例如違反不遣回原則。其他如強制性長期或無限期刑事或行政拘禁，亦將使非法移民面臨遭受酷刑或虐待的重大風險。

國家如有真誠意願將禁止酷刑和虐待納入所有執法人員之文化中，不僅可大大降低過度使用武力和其他形式的酷刑和虐待的風險，而且會增加人民的信任與合作意願，從而使警務與所有執法工作更有效，並能促進法治。

玖、附件

附件一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 罰公約(正體中文版)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約》

本公約締約各國，

鑒於根據聯合國憲章宣布之原則，承認人類大家庭一切成員
具有平等與不可剝奪之權利是世界自由、公正與和平之基礎，

確認上述權利起源於人之固有尊嚴，

鑒於根據憲章尤其是第 55 條之規定，各國有義務促進對人
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

顧及世界人權宣言第 5 條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
均規定不允許對任何人施行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
遇或處罰，

並顧及大會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通過之保護人人不受
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宣言，

冀以在全世界能更有效地反擊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爰議定如下：

第一部分

第一條

1. 為本公約目的，「酷刑」指為自特定人或第三人取得情資或供詞，為處罰特定人或第三人所作之行為或涉嫌之行為，或為恐嚇、威脅特定人或第三人，或基於任何方式為歧視之任何理由，故意對其肉體或精神施以劇烈疼痛或痛苦之任何行為。此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其他行使公權力人所施予，或基於其教唆，或取得其同意或默許。但純粹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之疼痛或痛苦，不在此限。

2. 本條規定並不妨礙載有或可能載有適用範圍較廣規定之任何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

第二條

1. 締約國應採取有效之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出現酷刑之行為。

2. 任何特殊情況，不論為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動盪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狀態，均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之理由。

3. 上級長官或政府機關之命令不得援引為施行酷刑之理由。

第三條

1. 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之危險，任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

2. 為確定此等理由是否存在，有關機關應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在通常情況下，該國家境內是否存在一貫重大、明顯或大規模侵犯人權之情況。

第四條

1. 締約國應確保將一切酷刑行為定為刑事犯罪。該項規定也應適用於意圖施行酷刑以及任何人共謀或參與酷刑之行為。

2. 締約國應考量前項犯罪之嚴重程度，處以適當刑罰。

第五條

1. 締約國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在下列情況下對第 4 條所述之犯罪有管轄權：

(a) 犯罪發生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或在該國註冊之船舶或航空器上。

(b) 被控罪犯為該國國民。

(c) 受害人為該國國民，而該國認為應予管轄。

2.締約國也應採取必要措施，確定該國對被控罪犯在其領域內，且該國並未依據第 8 條規定引渡至本條第 1 項所述之任何國家時，行使管轄權。

3.本公約不排除依照國內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轄權。

第六條

1.任何締約國管轄之領域內如有被控違反第 4 條所述犯罪之人，該國應於檢視所獲情資根據情況確認有其必要時，將此人拘束，或採取其他法律措施確保此人留在當地。拘禁及其他法律措施應合乎該國法律之規定，但留置期間只限於進行任何刑事訴訟或引渡程序所需。

2.該締約國應立即對事實進行初步調查。

3.按照本條第 1 項被拘束者，應予協助，立即與最近之所屬國家代表聯繫。如為無國籍人，則與其通常居住國之代表聯繫。

4.任何國家依據本條將某人拘束時，應立即將此人已被拘束及構成拘禁理由通知第 5 條第 1 項所指之國家。進行本條第 2 項之初步調查之國家，應迅速將調查結果告知上述國家，並徵詢其是否有意行使管轄權。

第七條

1.締約國如在其管轄領域內發現有被控違犯第 4 條所述任何犯罪之人，在第 5 條所指情況下，如不引渡，則應將該案移送各主管機關進行追訴。

2.各主管機關應根據該國法律，比照情節嚴重之犯罪案件處理。對第 5 條第 2 項所指之情況，起訴及定罪所需證據之標準絕不應寬於第 5 條第 1 項所指情況之適用標準。

3.任何人因第 4 條規定之犯罪而被起訴時，應確保其在訴訟所有階段皆可享有公平之待遇。

第八條

1.第 4 條所述各種犯罪應視為締約各國間現有之任何引渡條約所列可引渡犯罪。締約各國承諾將此種犯罪作為可引渡犯罪並列入將來相互間締結之引渡條約。

2.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之締約國，如收到未與其簽訂引渡條約之另一締約國之引渡請求，可將本公約視為引渡此犯罪之法律依據。引渡必須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定之其他條件。

3.不以訂有條約為引渡條件之締約國，應在相互之間承認此種犯罪為可引渡犯罪，但引渡須符合被請求國法律規定之條件。

4.基於締約國間進行引渡之目的，應將此種犯罪視為不僅發生在行為地，而且發生在依據第 5 條第 1 項必須確定管轄權之國家領域內。

第九條

1.締約各國就第 4 條所規定之任何犯罪提出刑事追訴時，應儘量相互協助，包括提供為追訴而掌握之所有必要證據。

2.締約各國應依照相互間司法互助之條約，履行本條第 1 項規定之義務。

第十條

1.締約國應確保將禁止酷刑之教育課程與資料納入所有可能參與拘束、偵訊或處理任何形式之逮捕、拘禁或監禁者之一般或軍事執法人員、醫務人員、公職人員及其他人員之訓練中。

2.締約國在發給前項人員之職務規則或相關指示中，應納入禁止酷刑規定。

第十一條

締約國應經常有系統的審查在其管轄領域內對遭受任何形式之逮捕、拘禁或監禁之人進行審訊之規則、指示、方法及慣例以及對他們拘束及待遇之安排，以避免發生任何酷刑事件。

第十二條

締約國應確保有合理理由確信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已發生酷刑行為時，其主管機關立即進行公正之調查。

第十三條

締約國應確保聲稱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域內遭到酷刑之個人有權向該國主管機關申訴，該國主管機關對其案件應進行迅速而公正之調查，並應採取步驟確保申訴人與證人不因提出申訴或提供證據而遭受任何不當處遇或恐嚇。

第十四條

1. 締約國應在其法律體制內確保酷刑受害者獲得救濟，並享有獲得公平及充分賠償之強制執行權利，包括儘量使其完全復原之方式。如果受害者因受酷刑致死，其受撫養人應有權獲得賠償。

2. 本條規定不影響受害者或其他人依據國家法律可獲得賠償之任何權利。

第十五條

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以酷刑取得之供詞為證據，但其供詞作為指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之證據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1. 締約國應承諾在該國管轄之領域內防止公職人員或任何行使公權力人員施加、教唆、同意或默許進行未達第 1 條所定義酷刑程度之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之行為。特別是包含於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及第 13 條涉及酷刑之義務，亦適用於其他形式之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2. 本公約各項規定不妨礙其他國際文書或國家法律有關禁止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或有關引渡或驅逐之規定。

第二部分

第十七條

1. 應設立「禁止酷刑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履行下列所規定之職責。委員會應由具有崇高道德地位與在人權領域公認具有專長之十名專家組成，他們應以個人身分任職。專家應由締約

國選舉產生，且應考慮區域公平分配及延聘具有法律經驗者參加之效益。

2. 委員會成員應從締約國提名之名單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每一締約國可從該國國民中提名一人。締約國應謹記從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成立之「人權事務委員會」委員中提名願意擔任「禁止酷刑委員會」成員者之效益。

3. 委員會成員選舉應於聯合國秘書長召開兩年一期之締約國會議中進行。會議以締約國數三分之二出席為法定人數，得票最多且獲得出席並參加表決之締約國代表所投票數之絕對多數者，即當選為委員會成員。

4. 委員會之第一次選舉應在本公約生效之日起六個月內進行。聯合國秘書長至遲在每屆委員會選舉日四個月前，應以書面邀請本公約締約國於三個月內提出委員會成員候選人名單。秘書長應將所有被提名者按字母順序列出名單，註明提名之締約國，並將名單送交本公約締約國。

5. 委員會成員任期四年。如經再度提名，連選得連任。首次當選之成員中有五名成員之任期為兩年，首次選舉後，本條第3項所指會議之主席應即以抽籤方式選定此五名成員。

6. 委員會成員如因死亡、辭職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委員會之職責，提名之締約國應從其國民中任命另一名專家，其任期至被繼任者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其任命須獲得過半數締約國之同意。在聯合國秘書長通知該任命之六個星期內，如無半數或半數以上締約國表示反對，任命應視為已獲同意。

7. 締約各國應負擔委員會成員履行委員會職責時之費用。

第十八條

1. 委員會應選舉其主席團，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

2. 委員會應制定議事規則，該規則應特別規定事項：

(a) 法定人數為六人；

(b) 委員會之決議應以出席成員多數決。

3. 聯合國秘書長應提供必要之人員及設施，供委員會有效履行本公約規定之職責。

4. 聯合國秘書長應召開委員會之首次會議。首次會議以後，委員會應依其議事規則規定之時間開會。

5. 締約國應負責支付締約國以及委員會舉行會議之費用，包括支付聯合國依據本條第 3 項提供人員及設施等任何費用。

第十九條

1.締約國應於本公約對其生效後一年內，經由聯合國秘書長向委員會提交關於履行公約義務所採措施之報告。其後，締約國應每四年提交關於其所採任何履行公約之新措施之補充報告及委員會要求之其他報告。

2.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此等報告送交所有締約國。

3.每份報告應由委員會加以審議，委員會得對報告提出適當之一般性評論，並將其轉交有關締約國。該締約國得向委員會提出說明。

4.委員會得依其裁量將依據本條第 3 項所作之評論，及有關締約國之說明，載入其依照第 24 條所編寫之年度報告。為應有關締約國之請求，亦得附載依據本條第 1 項提交之報告。

第二十條

1.如果委員會收到可靠之情資，認為其中有確實跡象顯示在某一締約國境內經常實施酷刑，委員會應請該締約國合作檢視，並就有關情資提出說明。

2.鑒於有關締約國可能提出之任何說明及為獲得其他有關情資，如有正當理由，委員會得指派一名或數名成員進行秘密調查並立即向委員會提出報告。

3.依據本條第 2 項進行之調查，委員會應尋求有關締約國之合作。在該締約國同意下，得到該國境內訪查。

4.委員會審查依本條第 2 項之調查結果後，應將結果連同適當之任何意見或建議一併轉交該有關締約國。

5.本條第 1 項至第 4 項之一切程序均應保密，各階段均應尋求締約國之合作。依照第 2 項所進行之調查程序完成後，經委員會與有關締約國協商，得將處理結果摘要載入依第 24 條所編寫之年度報告。

第二十一條

1.本公約締約國得隨時依據本條，聲明承認委員會有權接受及審議某一締約國聲稱另一締約國未履行本公約所規定義務之文件。提出此種文件之締約國須已聲明承認委員會有受理之權限，委員會方得按照本條規定程序接受並審議。如該文件涉及未曾作出上開聲明之締約國，則委員會不得依據本條規定處理。依據本條規定所接受之文件應按下列程序處理：

(a)某一締約國如認為另一締約國未實行本公約之規定，得以書面通知提請後者注意。收文國在收到通知後三個月內應以書面向發文國提出解釋或以任何其他聲明予以澄清，並應儘量適當提出已經採取、將要採取或可以採取之國內措施及救濟方式；

(b)收文國自最初收到來文之時起六個月內，未能以雙方均感滿意之方式處理此一問題，任何一方均有權以通知方式將此事提交委員會，並通知另一方；

(c)委員會對依據本條提交之事項，僅在已查明該事項已依公認之國際法原則援引及用盡一切國內救濟方式時，方得予以處理。但救濟方式之施行如有不當稽延，或使違反本公約行為之受害者無法得到有效救濟，則此一規則不適用；

(d)委員會依據本條審查文件時，應舉行非公開會議；

(e)在不違反(c)款之情況下，委員會應對相關締約國提供調解，以本公約所規定之義務為基礎，妥善解決。為此，委員會得適時設立特別調解委員會；

(f)委員會對依據本條提交之事項，均得依照(b)款要求有關締約國提供資料；

(g)委員會進行審議時，(b)款所指相關締約國應有權指派代表出席並提出口頭及(或)書面意見；

(h)委員會應在收到(b)款通知之日起十二個月內提出報告：

(i)如按(e)款規定解決，委員會之報告應限於簡要敘述事實及解決辦法；

(ii)如不能按(e)款規定解決，委員會之報告應限於簡要敘述事實；並將相關締約國之書面意見及口頭意見紀錄，附於報告之後。

上述各項報告均應送交相關締約國。

2.在本公約五個締約國根據本條第 1 項作出聲明後，本條規定即行生效。締約國應將此聲明存放於聯合國秘書長，秘書長應將聲明副本分送其他締約國。此類聲明得隨時通知秘書長予以撤銷。撤銷時不得妨礙依據本條已在審議中之任何事項。秘書長在收到締約國通知撤銷之聲明後，不應再接受其依據本條所發之其他文件，除非相關締約國已再重新聲明。

第二十二條

1.本公約締約國得隨時依據本條，聲明承認委員會有權接受及審議在該國管轄下聲稱因該締約國違反本公約條款而受害者或其代表所送交文件。如為未曾聲明之締約國，則委員會應不予受理。

2.依據本條提出之任何文件如採取匿名方式或經委員會認為濫用此項權利或與本公約規定不符，委員會應視為不受理。

3.在不違反第 2 項規定之前提下，對於依據本條提交委員會之任何文件，委員會應依據第 1 項作出聲明並提請遭指違反本公

約規定之締約國注意。收文國應在六個月內向委員會提出書面解釋或聲明以澄清問題，如已採取任何救濟方式，也應加以說明。

4. 委員會應參照個人或其代表以及有關締約國所提供之一切資料，審議依據本條所收到之文件。

5. 委員會除非已查明下述情況，否則不應審議個人根據本條提交之文件；

(a) 同一事項於過去及現在均未受到另一國際調查程序或解決辦法之審查；

(b) 個人已用盡一切國內救濟方式；但救濟方式之施行如造成不當稽延，或致使違反本公約行為之受害者不能得到有效救濟，則不適用；

6. 委員會根據本條審查文件時，應舉行非公開會議。

7. 委員會應將審查意見告知有關締約國及個人。

8. 在本公約五個締約國根據本條第 1 項作出聲明後，本條規定立即生效。締約國應將此聲明存放於聯合國秘書長，秘書長應將聲明副本分送其他締約國。此類聲明得隨時通知秘書長予以撤銷。撤銷時不得妨礙依據本條已在審議中之任何事項。秘書長在收到締約國通知撤銷之聲明後，不應再接受個人或其代表依據本條所發之其他文件，除非相關締約國已再重新聲明。

第二十三條

委員會成員及依據第 21 條第 1 項(e)款任命之特設調解委員會成員，依據聯合國特權及豁免公約有關章節之規定，應享有為聯合國執行任務之專家之便利、特權及豁免。

第二十四條

委員會應依據本公約向締約國及聯合國大會提交關於其活動之年度報告。

第三部分

第二十五條

1. 本公約對所有國家開放簽署。
2. 本公約需經批准。批准書應存放於聯合國秘書長。

第二十六條

本公約對所有國家開放加入。加入書一旦存放於聯合國秘書長，加入立即生效。

第二十七條

1. 本公約在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於聯合國秘書長之日起第三十天開始生效。

2.在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後，其後批准或加入本公約之國家，本公約在其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之日起第三十天對該國開始生效。

第二十八條

1.各國在簽署或批准本公約或在加入本公約時，得聲明不承認第 20 條所規定之委員會之職權。

2.按照本條第 1 項作出保留之任何締約國，得隨時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撤銷其保留。

第二十九條

1.本公約任何締約國均得提出修正案，並送交聯合國秘書長。由秘書長將此提案轉交締約各國，並要求通知秘書長是否同意舉行締約國會議以審理及決議此提案。如在發文日起四個月內有三分之一以上之締約國同意召開會議，秘書長應在聯合國協助下召開此會議。經出席會議並參加表決之締約國過半數通過之修正案，應由秘書長提請所有締約國同意。

2.當本公約三分之二之締約國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已依照該國之憲法程序同意此修正案時，按照本條第 1 項通過之修正案生效。

3.修正案一經生效，即應對同意修正案之締約國具有拘束力，其他締約國則仍受本公約條款或以前經其同意之修正案拘束。

第三十條

1.二以上締約國之間有關本公約之解釋或適用之任何爭議，如不能透過談判解決，在其中一方要求下，應提交仲裁。自要求仲裁之日起六個月內各方不能就仲裁之組成達成一致意見，任何一方均得依照國際法院規約要求將此爭議提交國際法院。

2.各國均得在簽署或批准本公約或加入本公約時，聲明本條第1項對其無拘束力。其他締約國與上開國家有任何爭議時，亦不受本條第1項之拘束。

3.依照本條第2項作出保留之任何締約國，得隨時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撤銷其保留。

第三十一條

1.締約國得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退出公約。秘書長於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年後，退約即行生效。

2.退約不具有解除締約國關於退約生效日前發生之任何行為或不行為在本公約下所承擔義務之效果。退約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委員會繼續審理在退約生效前已進行審議之任何問題。

3.自締約國退約生效之日起，委員會不得開始審議有關該國之任何新案。

第三十二條

聯合國秘書長應將下列事項通知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及本公約所有簽署國或加入國：

- (a) 依據第 25 條及第 26 條進行之簽署、批准及加入情況；
- (b) 依據第 27 條本公約之生效日期；依據第 29 條任何修正案之生效日期；
- (c) 依據第 31 條退約情況。

第三十三條

1.本公約之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文本均同一作準，應存放於聯合國秘書長。

2.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本公約之認證副本轉交給所有國家。

附件二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dopted and opened for signature, ratification and accession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9/46 of 10 December 1984
entry into force 26 June 1987,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7 (1)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is Convention,

Considering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proclaimed in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cognition of the equal and inalienable righ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is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world,

Recognizing that those rights derive from the inherent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

Considering the obligation of States under the Charter, in particular Article 55, to promote universal respect for, and observance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Having regard to article 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article 7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both of which provide that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to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Having regard also to the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Being Subjected to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9 December 1975,

Desiring to make more effective the struggle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Have agreed as follows:

PART I

Article 1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the term "torture" means any act by which severe pain or suffering, whether physical or mental, is intentionally inflicted on a person for such purposes as obtaining from him or a third person information or a confession, punishing him for an act he or a third person has committed or is suspected of having committed, or intimidating or coercing him or a third person, or for any reason based on discrimination of any kind, when such pain or suffering is inflicted by or at the instigation of or with the consent or acquiescence of a public official or other person 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It does not include pain or suffering arising only from, inherent in or incidental to lawful sanctions.

2. This article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or national legislation which does or may contain provisions of wider application.

Article 2

1. Each State Party shall take effective legislative, administrative, judicial or other measures to prevent acts of torture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2. No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whatsoever, whether a state of war or a threat of war, intern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or any other public emergency, may be invoked as a justification of torture.

3. An order from a superior officer or a public authority may not be invoked as a justification of torture.

Article 3

1. No State Party shall expel, return ("refouler") or extradite a person to another State where there are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he would be in danger of being subjected to torture.

2.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here are such grounds,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where applicable, the existence in the State concerned of a consistent pattern of gross, flagrant or ma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rticle 4

1. Each State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all acts of torture are offences under its criminal law. The same shall apply to an attempt to commit torture and to an act by any person which constitutes complicity or participation in torture. 2. Each State Party shall make these offences punishable by appropriate penalties which take into account their grave nature.

Article 5

1. Each State Party shall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establish its jurisdiction over the offenc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 in the following cases:

(a) When the offences are committed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or on board a ship or aircraft registered in that State;

(b) When the alleged offender is a national of that State;

(c) When the victim is a national of that State if that State considers it appropriate.

2. Each State Party shall likewise take such measure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establish its jurisdiction over such offences in cases where the alleged offender is present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and it does not extradite him pursuant to article 8 to any of the State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I of this article.

3. This Convention does not exclude any criminal jurisdiction exercis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l law.

Article 6

1. Upon being satisfied, after an exa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t, that the circumstances so warrant, any State Party in whose territory a

person alleged to have committed any offenc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 is present shall take him into custody or take other legal measures to ensure his presence. The custody and other legal measures shall be as provided in the law of that State but may be continued only for such time as is necessary to enable any criminal or extradition proceedings to be instituted.

2. Such State shall immediately mak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facts.

3. Any person in custody pursuant to paragraph I of this article shall be assisted in communicating immediately with the nearest appropriat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ate of which he is a national, or, if he is a stateless person,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ate where he usually resides.

4. When a State,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has taken a person into custody, it shall immediately notify the Stat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 paragraph 1, of the fact that such person is in custody and of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warrant his detention. The State which makes the preliminary inquiry contemplated in 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shall promptly report its findings to the said States and shall indicate whether it intends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Article 7

1. The State Party in the territory under whose jurisdiction a person alleged to have committed any offenc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 is found shall in the cases contemplated in article 5, if it does not extradite him, submit the case to its competent author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secution.

2. These authorities shall take their decision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the case of any ordinary offence of a serious nature under the law of that State. In the cas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 paragraph 2, the standards of evidence required for prosecution and conviction shall in no way be less stringent than those which apply in the cas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 paragraph 1.

3. Any person regarding whom proceedings are brought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f the offenc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 shall be guaranteed fair treatment at all stages of the proceedings.

Article 8

1. The offenc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luded as extraditable offences in any extradition treaty existing between States Parties. States Parties undertake to include such offences as extraditable offences in every extradition treaty to be concluded between them.

2. If a State Party which makes extradition conditional on the existence of a treaty receives a request for extradition from another State Party with which it has no extradition treaty, it may consider this Convention as the legal basis for extradition in respect of such offences. Extradition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other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law of the requested State.

3. States Parties which do not make extradition conditional on the existence of a treaty shall recognize such offences as extraditable offences between themselves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law of the requested State.

4. Such offences shall be treated, for the purpose of extradition between States Parties, as if they had been committed not only in the place in which they occurred but also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States required to establish their jurisdi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5, paragraph 1.

Article 9

1. States Parties shall afford one another the greatest measure of assistance in connection with criminal proceedings brought in respect of any of the offence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 including the supply of all evidence at their disposal necessary for the proceedings.

2. States Parties shall carry ou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paragraph I of this article in conformity with any treaties on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that may exist between them.

Article 10

1. Each State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orture are fully included in the training of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civil or military, medical personnel, public officials and other persons who may be involved in the custody, interrogation or treatment of any individual subjected to any form of arrest,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2. Each State Party shall include this prohibition in the rules or instructions issued in regard to the duties and functions of any such person.

Article 11

Each State Party shall keep under systematic review interrogation rules, instructions, methods and practices as well as arrangements for the custody and treatment of persons subjected to any form of arrest,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with a view to preventing any cases of torture.

Article 12

Each State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its competent authorities proceed to a prompt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wherever there is reasonable ground to believe that an act of torture has been committed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Article 13

Each State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any individual who alleges he has been subjected to torture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has the right to complain to, and to have his case promptly and impartially examined by, its competent authorities. Steps shall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the complainant and witnesses are protected against all ill-treatment or intimida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his complaint or any evidence given.

Article 14

1. Each State Party shall ensure in its legal system that the victim of an act of torture obtains redress and has an enforceable right to fair and

adequate compensation, including the means for as full rehabilitation as possible. In the event of the death of the victim as a result of an act of torture, his dependants shall be entitled to compensation.

2. Nothing in this article shall affect any right of the victim or other persons to compensation which may exist under national law.

Article 15

Each State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any statement which is established to have been made as a result of torture shall not be invoked as evidence in any proceedings, except against a person accused of torture as evidence that the statement was made.

Article 16

1. Each State Party shall undertake to prevent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other acts of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which do not amount to torture as defined in article I, when such acts are committed by or at the instigation of or with the consent or acquiescence of a public official or other person 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In particular, the obligations contained in articles 10, 11, 12 and 13 shall apply with the substitution for references to torture of references to other forms of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2.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are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any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or national law which prohibits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or which relates to extradition or expulsion.

PART II

Article 17

1. There shall be established a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mittee) which shall carry out the functions hereinafter provided. The Committee shall consist of ten experts of high moral standing and recognized competence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 who shall serve in their personal capacity. The experts shall be elected by

the States Parties, consideration being given to equitabl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to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some persons having legal experience.

2.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shall be elected by secret ballot from a list of persons nominated by States Parties. Each State Party may nominate one person from among its own nationals. States Parties shall bear in mind the usefulness of nominating persons who are also members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established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nd who are willing to serve on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3. Election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shall be held at biennial meetings of States Parties conven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ose meetings, for which two thirds of the States Parties shall constitute a quorum, the persons elected to the Committee shall be those who obtain the largest number of votes and an absolute majority of the vote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States Parties present and voting.

4. The initial election shall be held no later than six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Convention. At least four months before the date of each election,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shall address a letter to the States Parties inviting them to submit their nominations within three months. The Secretary-General shall prepare a list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all persons thus nominated, indicating the States Parties which have nominated them, and shall submit it to the States Parties.

5.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shall be elected for a term of four years. They shall be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if renominated. However, the term of five of the members elected at the first election shall expire at the end of two years;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st election the names of these five members shall be chosen by lo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3 of this article.

6. If a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dies or resigns or for any other cause can no longer perform his Committee duties, the State Party which

nominated him shall appoint another expert from among its nationals to serve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term,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majority of the States Parties. The approval shall be considered given unless half or more of the States Parties respond negatively within six weeks after having been inform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 the proposed appointment.

7. States Partie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expens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while they are in performance of Committee duties.

Article 18

1. The Committee shall elect its officers for a term of two years. They may be re-elected.

2. The Committee shall establish its own rules of procedure, but these rules shall provide, *inter alia*, that:

(a) Six members shall constitute a quorum;

(b)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shall be made by a majority vote of the members present.

3.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sha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staff and facilities for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Committee under this Convention.

4.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shall convene the initia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After its initial meeting, the Committee shall meet at such times as shall be provided in its rules of procedure.

5. The States Partie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expenses incur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holding of meetings of the States Parties and of the Committee, including reimburse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any expenses, such as the cost of staff and facilities, incurr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pursuant to paragraph 3 of this article.

Article 19

1. The States Parties shall submit to the Committee, throug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ports on the measures they have taken to give effect to their undertakings under this Convention, within one year after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Thereafter the States Parties shall submit supplementary reports every four years on any new measures taken and such other reports as the Committee may request.
2.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shall transmit the reports to all States Parties.
3. Each report shall be considered by the Committee which may make such general comments on the report as it may consider appropriate and shall forward these to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That State Party may respond with any observations it chooses to the Committee.
4. The Committee may, at its discretion, decide to include any comments made by it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3 of this article, together with the observations thereon received from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in its annual report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4. If so requested by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the Committee may also include a copy of the report submitted under paragraph I of this article.

Article 20

1. If the Committee receives reliable information which appears to it to contain well-founded indications that torture is being systematically practised in the territory of a State Party, the Committee shall invite that State Party to co-operate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o this end to submit observ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information concerned.
2. Taking into account any observations which may have been submitted by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as well as any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t, the Committee may, if it decides that this is warranted, designate one or more of its members to make a confidential inquiry and to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urgently.

3. If an inquiry is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the Committee shall seek the co-operation of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In agreement with that State Party, such an inquiry may include a visit to its territory.

4. After examining the findings of its member or members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the Commission shall transmit these findings to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together with any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which seem appropriate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5. All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s 1 to 4 of this article shall be confidential, and at all stages of the proceeding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State Party shall be sought. After such proceedings have been completed with regard to an inquiry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the Committee may, after consultations with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decide to include a summary account of the results of the proceedings in its annual report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4.

Article 21

1. A State Party to this Convention may at any time declare under this article that it recognizes the competence of the Committee to receive and consider communications to the effect that a State Party claims that another State Party is not fulfilling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Convention. Such communications may be received and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s laid down in this article only if submitted by a State Party which has made a declaration recognizing in regard to itself the competence of the Committee. No communication shall be dealt with by the Committee under this article if it concerns a State Party which has not made such a declaration. Communications received under this article shall b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a) If a State Party considers that another State Party is not giving eff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it may, by written communication, bring the matter to the attention of that State Party.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communication the receiving State shall afford the State which sent the communication an explanation or any other statement in writing clarifying the matter, which should include, to the

extent possible and pertinent, reference to domestic procedures and remedies taken, pending or available in the matter;

(b) If the matter is not adjust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both States Parties concerned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the receipt by the receiving State of the initial communication, either Stat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fer the matter to the Committee, by notice given to the Committee and to the other State;

(c) The Committee shall deal with a matter referred to it under this article only after it has ascertained that all domestic remedies have been invoked and exhausted in the matter, in conformity with the generally recogniz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is shall not be the rule whe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medies is unreasonably prolonged or is unlikely to bring effective relief to the person who is the victim of the viol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d) The Committee shall hold closed meetings when examining communications under this article; (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ubparagraph

(e), the Committee shall make available its good offices to the States Parties concerned with a view to a friendly solution of the matter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or the obligations provided for in this Convention. For this purpose, the Committee may, when appropriate, set up an ad hoc conciliation commission;

(f) In any matter referred to it under this article, the Committee may call upon the States Parties concerned,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b), to supply any relevant information;

(g) The States Parties concerned,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b),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represented when the matter is being considered by the Committee and to make submissions orally and/or in writing;

(h) The Committee shall, within twelve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receipt of notice under subparagraph (b), submit a report:

(i) If a solution within the terms of subparagraph (e) is reached, the Committee shall confine its report to a brief statement of the facts and of the solution reached;

(ii) If a solution within the terms of subparagraph (e) is not reached, the Committee shall confine its report to a brief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he written submissions and record of the oral submissions made by the States Parties concerned shall be attached to the report.

In every matter, the report shall be communicated to the States Parties concerned.

2.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shall come into force when five States Parties to this Convention have made declarations under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Such declarations shall be deposited by the States Parties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o shall transmit copies thereof to the other States Parties. A declaration may be withdrawn at any time by notificati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Such a withdrawal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consideration of any matter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a communication already transmitted under this article; no further communication by any State Party shall be received under this article after the notification of withdrawal of the declaration has been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unless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has made a new declaration.

Article 22

1. A State Party to this Convention may at any time declare under this article that it recognizes the competence of the Committee to receive and consider communications from or on behalf of individuals subject to its jurisdiction who claim to be victims of a violation by a State Part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No communication shall be received by the Committee if it concerns a State Party which has not made such a declaration.

2. The Committee shall consider inadmissible any communication under this article which is anonymous or which it considers to be an abuse of

the right of submission of such communications or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3.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 2, the Committee shall bring any communications submitted to it under this articl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State Party to this Convention which has made a declaration under paragraph I and is alleged to be violating any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Within six months, the receiving State shall submit to the Committee written explanations or statements clarifying the matter and the remedy, if any, that may have been taken by that State.

4. The Committee shall consider communications received under this article in the light of all information made available to it by or on behalf of the individual and by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5. The Committee shall not consider any communications from an individual under this article unless it has ascertained that:

(a) The same matter has not been, and is not being, examined under another procedur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or settlement;

(b) The individual has exhausted all available domestic remedies; this shall not be the rule whe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medies is unreasonably prolonged or is unlikely to bring effective relief to the person who is the victim of the viol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6. The Committee shall hold closed meetings when examining communications under this article.

7. The Committee shall forward its views to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and to the individual.

8.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shall come into force when five States Parties to this Convention have made declarations under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Such declarations shall be deposited by the States Parties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o shall transmit copies thereof to the other States Parties. A declaration may be withdrawn at any time by notificati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Such a withdrawal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consideration of any matter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a

communication already transmitted under this article; no further communication by or on behalf of an individual shall be received under this article after the notification of withdrawal of the declaration has been receiv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unless the State Party has made a new declaration.

Article 23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and of the ad hoc conciliation commissions which may be appointed under article 21, paragraph I (e),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facilitie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experts on mission for the United Nations as laid down in the relevant sections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24

The Committee shall submit an annual report on its activities under this Convention to the States Parties an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PART III

Article 25

1. This Convention is open for signature by all States. 2. This Convention is subject to ratification. Instruments of ratification shall be deposited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26

This Convention is open to accession by all States. Accession shall be effected by the deposit of an instrument of accession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27

1. This Convention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thirtieth day after the date of the deposit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 the twentieth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2. For each State ratifying this Convention or acceding to it after the deposit of the twentieth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the Convention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thirtieth day after the date of the deposit of its own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or accession.

Article 28

1. Each State may, at the time of signature or ratif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or accession thereto, declare that it does not recognize the competence of the Committee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0.

2. Any State Party having made a reserv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I of this article may, at any time, withdraw this reservation by notificati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29

1. Any State Party to this Convention may propose an amendment and file it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ecretary-General shall thereupon communicate the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e States Parties with a request that they notify him whether they favour a conference of States Parties for the purpose of considering and voting upon the proposal. In the event that within four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such communication at least one third of the States Parties favours such a conference, the Secretary-General shall convene the conference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y amendment adopted by a majority of the States Parties present and voting at the conference shall be submit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all the States Parties for acceptance.

2. An amendment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I of this article shall enter into force when two thirds of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is Convention have notified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they have accepted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constitutional processes.

3. When amendments enter into force, they shall be binding on those States Parties which have accepted them, other States Parties still being

boun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and any earlier amendments which they have accepted.

Article 30

1. Any d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States Partie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which cannot be settled through negotiation shall, at the request of one of them, be submitted to arbitration. If within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the request for arbitration the Parties are unable to agree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any one of those Parties may refer the disp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y reques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tatute of the Court.

2. Each State may, at the time of signature or ratif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or accession thereto, declare that it does not consider itself bound by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The other States Parties shall not be bound by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with respect to any State Party having made such a reservation.

3. Any State Party having made a reserv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may at any time withdraw this reservation by notificati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31

1. A State Party may denounce this Convention by written notification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nunciation becomes effective one year after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notification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

2. Such a denunciation shall not have the effect of releasing the State Party from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Convention in regard to any act or omission which occurs prior to the date at which the denunciation becomes effective, nor shall denunciation prejudice in any way the continued consideration of any matter which is already under consideration by the Committee prior to the date at which the denunciation becomes effective.

3. Following the date at which the denunciation of a State Party becomes effective, the Committee shall not commence consideration of any new matter regarding that State.

Article 32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shall inform all States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ll States which have signed this Convention or acceded to it of the following:

- (a) Signatures, ratifications and accessions under articles 25 and 26;
- (b)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Convention under article 27 and the date of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any amendments under article 29;
- (c) Denunciations under article 31.

Article 33

1. This Convention, of which the Arabic, Chinese, English, French, Russian and Spanish texts are equally authentic, shall be deposited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2.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shall transmit certified copies of this Convention to all States.

附件三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GENERAL COMMENT No. 2**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2 by States parties

1. This general comment addresses the three parts of article 2, each of which identifies distinct interrelated and essential principles that undergird the Convention's absolute prohibition against torture.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the absolute and non-derogable character of this prohibition has become accepted as a matter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2 reinforce this peremptory jus cogens norm against torture and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ittee's authority to implement effective means of preven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ose measures contained in the subsequent articles 3 to 16, in response to evolving threats, issues, and practices.

2. Article 2, paragraph 1, obliges each State party to take actions that will reinforce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orture through legislative, administrative, judicial, or other actions that must, in the end, b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it. To ensure that measures are in fact taken that are known to prevent or punish any acts of torture, the Convention outlines in subsequent articles obligations for the State party to take measures specified therein.

3. The obligation to prevent torture in article 2 is wide-ranging. The obligations to preven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hereinafter "ill-treatment") under article 16, paragraph 1, are indivisible,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related. The obligation to prevent ill-treatment in practice overlaps with and is largely congruent with the obligation to prevent torture. Article 16, identifying the means of prevention of ill-treatment, emphasizes "in particular" the measures outlined in articles 10 to 13, but does not limit effective prevention to these articles, as the Committee has explained, for example, with respect to compensation in article 14. In practice, the definitional threshold between ill-treatment and torture is often not clear.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nditions that give rise to ill-treatment frequently facilitate torture and therefore the measures required to prevent torture must be applied to prevent ill-treatment. Accordingly, the Committee has considered the prohibition of ill-treatment to be likewise non-derogable under the Convention and its prevention to be an effective and non-derogable measure.

4. States parties are obligated to eliminate any legal or other obstacles that impede the eradication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and to take positive effectiv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such conduct and any recurrences thereof are effectively prevented. States parties also have the obligation continually to keep under review and improve their national laws and performance under the Conven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ittee'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nd views adopted on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s. If th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State party fail to accomplish the purpose of eradicating acts of torture, the Convention requires that they be revised and/or that new, more effective measures be adopted. Likewise, the Committee's understanding of and recommendations in respect of effective measures are in a process of continual evolution, as, unfortunately, are the method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II. Absolute prohibition

5. Article 2, paragraph 2, provides that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orture is absolute and non-derogable. It emphasizes that no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whatsoever may be invoked by a State Party to justify acts of torture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The Convention identifies as among such circumstances a state of war or threat thereof, intern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or any other public emergency. This includes any threat of terrorist acts or violent crime as well as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 non-international. The Committee is deeply concerned at and rejects absolutely any efforts by States to justify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as a means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or avert emergencies in these and all other situations. Similarly, it rejects any religious or traditional justification that would violate this absolute prohibition.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amnesties or other impediments which preclude or indicate unwillingness to provide prompt and fair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 of perpetrator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non-derogability.

6. The Committee reminds all States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f the non-derogable nature of the obligations undertaken by them in ratifying the Conven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ttacks of 11 September 2001, the Committee specified that the obligations in articles 2 (whereby “no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whatsoever...may be invoked as a justification of torture”), 15 (prohibiting confessions extorted by torture being admitted in evidence, except against the torturer), and 16 (prohibiting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e three such provisions that “must be observed in all circumstances” .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articles 3 to 15 are likewise obligatory as applied to both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The Committee recognizes that States parties may choose the measures through which they fulfill these obligations, so long as they are effective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object and purpose of the Convention.

7. The Committee also understands that the concept of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linked as it is with the principle of non-derogability, includes any territory or facilities and must be applied to protect any person, citizen or non-citizen without discrimination subject to the de jure or de facto control of a State party.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the State’s obligation to prevent torture also applies to all persons who act, de jure or de facto, in the name of, in conjunction with, or at the behest of the State party. It is a matter of urgency that each State party should closely monitor its officials and those acting on its behalf and should identify and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any incident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as a consequence of anti-terrorism measures, among others, and the measures taken to investigate, punish, and prevent further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in the futur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both the direct perpetrators and officials in the chain of command, whether by acts of instigation, consent or acquiescence.

III. Content of the obligation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torture

8. States parties must make the offence of torture punishable as an offence under its criminal law, in accordance, at a minimum, with the

elements of torture as defined in article 1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4.

9. Serious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Convention's definition and that incorporated into domestic law create actual or potential loopholes for impunity. In some cases, although similar language may be used, its meaning may be qualified by domestic law or by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thus the Committee calls upon each State party to ensure that all parts of its Government adhere to the definition set forth in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fining the obligations of the Stat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ittee recognizes that broader domestic definitions also advance the object and purpose of this Convention so long as they contain and are appl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s of the Convention, at a minimum. In particular,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elements of intent and purpose in article 1 do not involve a subjective inquiry into the motivations of the perpetrators, but rather must be objective determination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t is essential to investigate and establish the responsibility of persons in the chain of command as well as that of the direct perpetrator(s).

10. The Committee recognizes that most States parties identify or define certain conduct as ill-treatment in their criminal codes. In comparison to torture, ill-treatment may differ in the severity of pain and suffering and does not require proof of impermissible purposes.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it would be a vio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to prosecute conduct solely as ill-treatment where the elements of torture are also present.

11. By defining the offence of torture as distinct from common assault or other crimes,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States parties will directly advance the Convention's overarching aim of preventing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Naming and defining this crime will promote the Convention's aim, inter alia, by alerting everyone, including perpetrators, victims, and the public, to the special gravity of the crime of torture. Codifying this crime will also (a) emphasize the need for appropriate punishment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gravity of the offence, (b) strengthen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the prohibition itself, (c) enhance the ability of responsible officials to track the specific crime of torture and (d) enable and empower

the public to monitor and, when required, to challenge State action as well as State inaction that violates the Convention.

12. Through review of successive reports from States parties, the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s, and monitoring of developments, the Committee has, in it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articulated its understanding of what constitute effective measures, highlights of which we set forth here. In terms of both the principle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of article 2 and developments that build upon specific articles of the Convention, the Committee has recommended specific actions designed to enhance each State party's ability swiftly and effectively to implement measure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to prevent act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and thereby assist States parties in bringing their law and practice into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Convention.

13. Certain basic guarantees apply to all person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Some of these are specified in the Convention, and the Committee consistently calls upon States parties to use them. The Committee's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effective measures aim to clarify the current baseline and are not exhaustive. Such guarantees include, *inter alia*, maintaining an official register of detainees, the right of detainees to be informed of their rights, the right promptly to receive independent legal assistance, independent medical assistance, and to contact relatives, the need to establish impartial mechanisms for inspecting and visiting places of detention and confinement, and the availability to detainees and persons at risk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of judicial and other remedies that will allow them to have their complaints promptly and impartially examined, to defend their rights, and to challenge the legality of their detention or treatment.

14. Experience since the Convention came into force has enhanced the Committe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orture, of the methodologies of torture, of the contexts and consequences in which it occurs, as well as of evolv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it in different contexts. For example, the Committee ha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ame sex guards when privacy is involved. As new methods of prevention (e.g. videotaping all interrogations, utilizing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such as the Istanbul

Protocol of 1999 , or new approaches to public education or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are discovered, tested and found effective, article 2 provides authority to build upon the remaining articles and to expand the scope of measures required to prevent torture.

IV. Scope of State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y

15. The Convention imposes obligations on States parties and not on individuals. States bea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ts and omissions of their officials and others, including agents, private contractors, and others acting in official capacity or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Stat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tate, under its direction or control, or otherwise under colour of law. Accordingly, each State party should prohibit, prevent and redress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in all contexts of custody or control, for example, in prisons, hospitals, schools, institutions that engage in the care of children, the aged, the mentally ill or disabled, in military service,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contexts where the failure of the State to intervene encourages and enhances the danger of privately inflicted harm. The Convention does not, however, limit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at States or individuals can incur for perpetrating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under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and other treaties.

16. Article 2, paragraph 1, requires that each State party shall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acts of torture not only in its sovereign territory but also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The Committee has recognized that “any territory” includes all areas where the State party exercis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whole or in part, de jure or de facto effective contro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he reference to “any territory” in article 2, like that in articles 5, 11, 12, 13 and 16, refers to prohibited acts committed not only on board a ship or aircraft registered by a State party, but also during military occupation o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in such places as embassies, military bases, detention facilities, or other areas over which a State exercises factual or effective control. The Committee notes that this interpretation reinforces article 5, paragraph 1 (b), which requires that a State party must take measures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when the alleged offender is a national of the State.”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the scope of “territory” under

article 2 must also include situations where a State party exercis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e facto or de jure control over persons in detention.

17. The Committee observes that States parties are obligated to adopt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public authorities and other persons 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from directly committing, instigating, inciting, encouraging, acquiescing in or otherwise participating or being complicit in acts of torture as defined in the Convention. Thus, States parties should adopt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such authorities or others 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or under colour of law, from consenting to or acquiescing in any acts of torture. The Committee has concluded that States parties are in vio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when they fail to fulfil these obligations. For example, where detention centres are privately owned or run,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personnel are 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on account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carrying out the State function without derogation of the obligation of State officials to monitor and take all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18. The Committee has made clear that where State authorities or others acting in official capacity or under colour of law, know or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act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are being committed by non-State officials or private actors and they fail to exercise due diligence to prevent, investigate, prosecute and punish such non-State officials or private actors consistently with the Convention, the State bears responsibility and its official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uthors, complicit or otherwise responsible under the Convention for consenting to or acquiescing in such impermissible acts. Since the failure of the State to exercise due diligence to intervene to stop, sanction and provide remedies to victims of torture facilitates and enables non-State actors to commit acts impermissible under the Convention with impunity, the State's indifference or inaction provides a form of encouragement and/or de facto permission. The Committee has applied this principle to States parties' failure to prevent and protect victims from gender-based violence, such as rape, domestic violence,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nd trafficking.

19. Additionally, if a person is to be transferred or sent to the custody or control of an individual or institution known to have engaged in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or has not implemented adequate safeguards, the State is responsible, and its officials subject to punishment for ordering, permitting or participating in this transfer contrary to the State's obligation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tortur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 paragraph 1. The Committee has expressed its concern when States parties send persons to such places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as required by articles 2 and 3.

V. Protection for individuals and groups made vulnerable by discrimination or marginalization

20.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is a basic and general principle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Non-discrimination is included within the definition of torture itself in article 1, paragraph 1, of the Convention, which explicitly prohibits specified acts when carried out for "any reason based on discrimination of any kind...".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the discriminatory use of mental or physical violence or abus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ct constitutes torture.

21. The protection of certain minority or marginalized individuals or populations especially at risk of torture is a part of the obligation to prevent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States parties must ensure that, insofar as the obligations arising under the Convention are concerned, their laws are in practice applied to all persons, regardless of race, colour, ethnicity, age, religious belief or affiliat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transgender identity, mental or other disability, health status, economic or indigenous status, reason for which the person is detained, including persons accused of political offences or terrorist acts, asylum-seekers, refugees or others unde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r any other status or adverse distinction. States parties should, therefore,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members of groups especially at risk of being tortured, by fully prosecuting and punishing all acts of violence and abuse against these individuals and ensuring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positive measures of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ose outlined above.

22. State reports frequently lack specific and sufficient inform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with respect to women.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gender is a key factor. Being female intersects with other identifying characteristics or status of the person such as race, nationality, religion, sexual orientation, age, immigrant status etc. to determine the ways that women and girls are subject to or at risk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and the consequences thereof. The contexts in which females are at risk include deprivation of liberty, medical treatment, particularly involving reproductive decisions, and violence by private actors in communities and homes. Men are also subject to certain gendered violations of the Convention such as rape or sexual violence and abuse. Both men and women and boys and girls may be subject to violations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basis of their actual or perceived non-conformity with socially determined gender roles. States parties are requested to identify these situations and the measures taken to punish and prevent them in their reports.

23. Continual evaluation is therefore a crucial component of effective measures. The Committee has consistently recommended that States parties provide data disaggregated by age, gender and other key factors in their reports to enable the Committee to adequately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Disaggregated data permits the States parties and the Committee to identify, compare and take steps to remedy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that may otherwise go unnoticed and unaddressed. States parties are requested to describe, as far as possibl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cidence and prevention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in preventing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against specific relevant sectors of the population, such as minorities, victims of torture, children and wom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general and particular forms that such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may take.

24. Eliminating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conducting ongoing sensitization training in contexts where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is likely to be committed is also key to preventing such violations and building a culture of respect for women and minorities. States are encouraged to promote the hiring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minority groups and women, particularly in the medical, educational, prison/detention, law

enforcement, judicial and legal fields, within State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private sector. States parties should include in their reports information on their progress in these matters, disaggregated by gender, race, national origin, and other relevant status.

VI. Other preventive measures required by the Convention

25. Articles 3 to 15 of the Convention constitute specific preventive measures that the States parties deemed essential to prevent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particularly in custody or detention.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the obligation to take effective preventive measures transcends the items enumerated specifically in the Convention or the demands of this general comment. For example,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general population be educated on the history, scope, and necessity of the non-derogable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as well as that law enforcement and other personnel receive education on recognizing and preventing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Similarly, in light of its long experience in reviewing and assessing State reports on officially inflicted or sanctioned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the Committee acknowledges the importance of adapting the concept of monitoring conditions to prevent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to situations where violence is inflicted privately. States parties should specifically include in their reports to the Committe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preventive measures, disaggregated by relevant status.

VII. Superior orders

26. The non-derogability of the prohibition of torture is underscored by the long-standing principle embodied in article 2, paragraph 3, that an order of a superior or public authority can never be invoked as a justification of torture. Thus, subordinates may not seek refuge in superior authority and should be held to account individually. At the same time, those exercising superior authority - including public officials - cannot avoid accountability or escap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committed by subordinates where they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that such impermissible conduct was occurring, or was likely to occur, and they failed to take reasonable and necessary preventive measures.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it essential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y superior officials, whether for direct instigation or encouragement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or for consent or acquiescence therein, be fully investigated through competent,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prosecutorial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Persons who resist what they view as unlawful orders or who cooperat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including by superior officials, should be protected against retaliation of any kind.

27. The Committee reiterates that this general comment has to be considered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higher degree of protection contained in any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or national law, as long as they contain, as a minimum, the standards of the Convention.

附件四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31. Corporal punishment, punishment by placing in a dark cell, and all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punishments shall be completely prohibited as punishments for disciplinary offences.

32. (1) Punishment by close confinement or reduction of diet shall never be inflicted unless the medical officer has examined the prisoner and certified in writing that he is fit to sustain it.

(2) The same shall apply to any other punishment that may be prejudicial to the physical or mental health of a prisoner. In no case may such punishment be contrary to or depart from the principle stated in rule 31.

(3) The medical officer shall visit daily prisoners undergoing such punishments and shall advise the director if he considers the termination or alteration of the punishment necessary on grounds of physical or mental health.

33. Instruments of restraint, such as handcuffs, chains, irons and strait-jackets, shall never be applied as a punishment. Furthermore, chains or irons shall not be used as restraints. Other instruments of restraint shall not be used except in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a) As a precaution against escape during a transfer, provided that they shall be removed when the prisoner appears before a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b) On medical grounds by direction of the medical officer;

(c) By order of the director, if other methods of control fail, in order to prevent a prisoner from injuring himself or others or from damaging property; in such instances the director shall at once consult the medical officer and report to the higher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附件五

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Principle 1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shall be treated in a humane manner and with respect for the inherent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

Principle 6

No person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shall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to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1 No circumstance whatever may be invoked as a justification for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Principle 21

1. It shall be prohibited to take undu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of a detained or imprisoned person for the purpose of compelling him to confess, to incriminate himself otherwise or to testify against any other person.

2. No detained person while being interrogated shall be subject to violence, threats or methods of interrogation which impair his capacity of decision or his judgement.

Principle 22

No detained or imprisoned person shall, even with his consent, be subjected to any medical or scientific experimentation which may be detrimental to his health.

附件六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7. Efforts addressed to the abolition of solitary confinement as a punishment, or to the restriction of its use, should be undertaken and encouraged.

附件七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4.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in carrying out their duty, shall, as far as possible, apply non-violent means before resorting to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They may use force and firearms only if other means remain ineffective or without any promise of achieving the intended result.

9.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shall not use firearms against persons except in self-defence or defence of others against the imminent threat of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to prevent the perpetration of a particularly serious crime involving grave threat to life, to arrest a person presenting such a danger and resisting their authority, or to prevent his or her escape, and only when less extreme means are insufficient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In any event, intentional lethal use of firearms may only be made when strictly unavoidable in order to protect life.

13. In the dispersal of assemblies that are unlawful but non-violent,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shall avoid the use of force or, where that is not practicable, shall restrict such force to the minimum extent necessary.

16.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persons in custody or detention, shall not use firearms, except in self-defence or in the defence of others against the immediate threat of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or when strictly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escape of a person in custody or detention presenting the danger referred to in principle 9.

24. Governments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hall ensure that superior officers are held responsible if they know, or should have known, that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under their command are resorting, or have resorted, to the unlawful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and they did not take all measures in their power to prevent, suppress or report such use.

26. Obedience to superior orders shall be no defence if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knew that an order to use force and firearms resulting in the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of a person was manifestly unlawful and had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refuse to follow it. In any case, responsibility also rests on the superiors who gave the unlawful orders.

**General comment No. 35- Article 9: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34. The individual must be brought to appear physically before the judge or other officer authorized by law to exercise judicial power. The physical presence of detainees at the hearing gives the opportunity for inquiry into the treatment that they received in custody and facilitates immediate transfer to a remand detention centre if continued detention is ordered. It thus serves as a safeguard for the right to security of person and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In the hearing that ensues, and in subsequent hearings at which the judge assesses the legality or necessity of the detention, the individual is entitled to legal assistance, which should in principle be by counsel of choice.

57. Returning an individual to a country where there are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 individual faces a real risk of a severe violation of liberty or security of person such as prolonged arbitrary detention may amount to inhuman treatment prohibited by article 7 of the Covenant.

58. Several safeguards that are essential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are also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in any form of detention against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security. The following examples are non-exhaustive. Detainees should be held only in facilities officially acknowledged as places of detention. A centralized official register should be kept of the names and places of detention, and times of arrival and departure, as well as of the names of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their detention, and made readily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to those concerned, including relatives. Prompt and regular access should be given to independent medical personnel and lawyers and, under appropriate supervision when the legitimate purpose of the detention so requires, to family members. Detainees should be promptly informed of their rights, in a language they underst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leaflets in the appropriate language, including in Braille, may often assist the detainee in retaining the information. Detained foreign nationals

should be informed of their righ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consular authorities, or, in the case of asylum seekers, with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mechanis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visiting and inspecting all places of detention, including mental-health institutions.

附件九

**General comment No. 4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3 of the
Conv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22 ,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5. Article 3 (1) of the Convention provides that no State party shall expel, return (refouler) or extradite a person to another State where there are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 person would be in danger of being subjected to torture.
8. The Committee recalls that the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s defined in article 1 of the Convention, is absolute. Article 2 (2) of the Convention provides that “no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whatsoever, whether a state of war or a threat of war, intern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or any other public emergency, may be invoked as a justification of torture”. The Committee further recalls that other acts of ill-treatment are equally prohibited and that the prohibition of ill-treatment is likewise non-derogable.
9.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of persons to another State where there are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y would be in danger of being subjected to torture is similarly absolute.
10. Each State party must apply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or any area under its control or authority, or on board a ship or aircraft registered in the State party, to any person, including persons requesting or in need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without any form of discrimination and regardless of the nationality or statelessness or the legal,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status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under ordinary or emergency law. As the Committee noted in paragraph 7 of its general comment No. 2, the concept of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includes any territory or facilities and must be applied to protect any person, citizen or non-citizen without discrimination subject to the de jure or de facto control of a State party.
11. The non-refoulement obligation in article 3 of the Convention exists whenever there are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 person concerned would be in danger of being subjected to torture in a State to which the person is facing deportation, either as an individual or as a

member of a group that may be at risk of being tortured in the State of destination. The Committee's practice has been to determine that "substantial grounds" exist whenever the risk of torture is "foreseeable, personal, present and real".

12. Any person found to be at risk of torture if deported to a given State should be allowed to remain in the territor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control or authority of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so long as the risk persists. The person in question should not be detained without proper legal justification and safeguards. Detention should always be an exceptional measure based on an individual assessment and subject to regular review. Furthermore, the person at risk should never be deported to another State from which the person may subsequently face deportation to a third State in which there are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 person would be in danger of being subjected to torture.

13. Each case should be examined individually, impartially and independently by the State party through competent administrative and/or judicial authorities, in conformity with essential procedural safeguards, notably the guarantee of a prompt and transparent process, a review of the deportation decision and a suspensive effect of the appeal. In each case, the person concerned should be informed of the intended deport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Collective deportation, without an objective exami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cases with regard to personal risk,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14. States parties should not adopt dissuasive measures or policies, such as detention in poor conditions for indefinite periods, refusing to process claims for asylum or prolonging them unduly, or cutting funds for assistance programmes for asylum seekers, which would compel persons in need of protection under article 3 of the Convention to return to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in spite of their personal risk of being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there.

15. Article 16 of the Convention provides for the duty of States parties to prevent acts of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ill-

treatment), which do not amount to torture as defined in article 1 of the Convention.

16. States parties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nature of the other forms of ill-treatment that a person facing deportation is at risk of experiencing could likely change so as to constitute torture, before making an assessment on each case relat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17.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severe pain or suffering cannot always be assessed objectively. It depends on the negative physical and/or mental repercussions that the infliction of violent or abusive acts has on each individual,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the treatment, the sex, age and state of health and vulnerability of the victim and any other status or factors.

23. States parties may find that a conflict arises between the obligations they have undertaken under article 3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obligations they have undertaken under a 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extradition treaty, especially when the treaty was concluded before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with a State which is not a party to the Convention and, therefore, when not yet bound by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3. In this case, the relevant extradition treaty should be appl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30. Equally, States parties should refrain from deporting individuals to another State where there are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y would be in danger of being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other ill-treatment at the hands of non-State entities, including groups that are unlawfully exercising actions that inflict severe pain or suffering for purposes prohibited by the Convention, and over which the receiving State has no or only partial de facto control, or whose acts it is unable to prevent or whose impunity it is unable to counter.

附件十

**General Comment No.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Art. 12,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8. The right to health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as a right to be healthy. The right to health contains both freedoms and entitlements. The freedoms include the right to control one's health and body, includ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freedom, and 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interference, such as 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torture, non-consensual medical treatment and experimentation.

**The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1. Governments shall prohibit by law all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and shall ensure that any such executions are recognized as offences under their criminal laws, and are punishable by appropriate penalties which take into account the seriousness of such offences.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a state of war or threat of war, intern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or any other public emergency may not be invoked as a justification of such executions. Such executions shall not be carried out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ituations of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excessive or illegal use of force by a public official or other person acting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or by a person acting at the instigation, or with the consent or acquiescence of such person, and situations in which deaths occur in custody. This prohibition shall prevail over decrees issued by governmental authority.

2. In order to prevent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Governments shall ensure strict control, including a clear chain of command over all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apprehension, arrest, detention, custody and imprisonment, as well as those officials authorized by law to use force and firearms.

3. Governments shall prohibit orders from superior officers or public authorities authorizing or inciting other persons to carry out any such extra-legal, arbitrary or summary executions. All persons shall have the right and the duty to defy such orders. Training of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shall emphasize the above provisions.

5. No one shall be involuntarily returned or extradited to a country where there are substantial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he or she may become a victim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or summary execution in that country.

19. Without prejudice to principle 3 above, an order from a superior officer or a public authority may not be invoked as a justification for extra-legal, arbitrary or summary executions. Superiors, officers or other

public officials may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cts committed by officials under their authority if they had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prevent such acts. In no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a state of war, siege or other public emergency, shall blanket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be granted to any person allegedly involved in extra-legal, arbitrary or summary executions.

附件十二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rticle 5

No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 may inflict, instigate or tolerate any act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nor may an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 invoke superior orders or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a state of war or a threat of war, a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or any other public emergency as a justification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Guidelin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ors

11. Prosecutors shall perform an active rol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cluding institution of prosecution and, where authorized by law or consistent with local practic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crime, supervision over the legality of these investigations, supervision of the execution of court decisions and the exercise of other functions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ublic interest.

15. Prosecutors shall give due attention to the prosecution of crimes committed by public officials, particularly corruption, abuse of power, grave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other crimes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law and, where authorized by law or consistent with local practice, the investigation of such offences.

16. When prosecutors come into possession of evidence against suspects that they know or believe on reasonable grounds was obtained through recourse to unlawful methods, which constitute a grave violation of the suspect's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involving torture o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or other abuses of human rights, they shall refuse to use such evidence against anyone other than those who used such methods, or inform the Court accordingly, and shall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ensure that those responsible for using such methods are brought to justice.

附件十四

Principles of Medical Ethics relevant to the Role of Health Personnel, particularly Physicians, in the Protection of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Principle 3

It is a contravention of medical ethics for health personnel, particularly physicians, to be involved in any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with prisoners or detainees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not solely to evaluate, protect or improv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inciple 4

It is a contravention of medical ethics for health personnel, particularly physicians:

- (a)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order to assist in the interrogation of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in a manner that may adversely affect the physical or mental health or condition of such prisoners or detainees and which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2
- (b) To certify, or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 fitness of prisoners or detainees for any form of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that may adversely affect their physical or mental health and which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or to participate in any way in the infliction of any such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which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Principle 6

There may be no derogation from the foregoing principles on any ground whatsoever, including public emergency.

附件十五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rticle 4

States should condem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should not invoke any custom, tradition or religious consideration to avoid their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its elimination. States should pursue by all appropriate means and without delay a policy of elimin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o this end, should:

(d) Develop penal, civil, labour and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in domestic legislation to punish and redress the wrongs caused to women who are subjected to violence; women who are subjected to violence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access to the mechanisms of justice and, as provided for by national legislation, to just and effective remedies for the harm that they have suffered; States should also inform women of their rights in seeking redress through such mechanisms;

(f) Develop, in a comprehensive way, preventive approaches and all those measures of a legal,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and cultural nature that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gainst any form of violence, and ensure that the re-victimization of women does not occur because of laws insensitive to gender considerations, enforcement practices or other interventions;

(k) Promote research, collect data and compile statistics, especially concerning domestic violence, relating to the prevalence of different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encourage research on the causes, nature, seriousness and consequence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easures implemented to prevent and redres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ose statistics and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will be made public;

General Comment No. 20 - Prohibition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icle 7

9. In the view of the Committee, States parties must not expose individuals to the danger of torture o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upon return to another country by way of their extradition, expulsion or refoulement. States parties should indicate in their reports what measures they have adopted to that end.

10. The Committee should be informed how States parties disseminate, to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relevan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ban on torture and the treatment prohibited by article 7. Enforcement personnel, medical personnel, police officers and any other persons involved in the custody or treatment of any individual subjected to any form of arrest,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must receive appropriate instruction and training. States parties should inform the Committee of the instruction and training given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prohibition of article 7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operational rules and ethical standards to be followed by such persons.

13. States parties should indicate when presenting their reports the provisions of their criminal law which penalize torture and cruel, 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specifying the penalties applicable to such acts, whether committed by public officials or other persons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State, or by private persons. Those who violate article 7, whether by encouraging, ordering, tolerating or perpetrating prohibited acts, must be held responsible. Consequently, those who have refused to obey orders must not be punished or subjected to any adverse treatment.

14. Article 7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article 2, paragraph 3, of the Covenant. In their reports, States parties should indicate how their legal system effectively guarantees the immediate termination of all the acts prohibited by article 7 as well as appropriate redress. The right to lodge complaints against maltreatment prohibited by article 7 must be recognized in the domestic law. Complaints must be investigated

promptly and impartially by competent authorities so as to make the remedy effective. The reports of States parties should provide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the remedies available to victims of maltreatment and the procedure that complainants must follow, and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and how they have been dealt with.

15. The Committee has noted that some States have granted amnesty in respect of acts of torture. Amnesties are general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duty of States to investigate such acts; to guarantee freedom from such act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and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occur in the future. States may not deprive individuals of the 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including compensation and such full rehabilitation as may be possible.

附件十七

General Comment No. 21 - Humane treatment of person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Article 10

7. Furthermore, the Committee recalls that reports should indicate whether the various applicable provisions for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instruc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personnel who have authority over person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and whether they are strictly adhered to by such personnel in the discharge of their duties. It would also be appropriate to specify whether arrested or detained persons have access to such information and have effective legal means enabling them to ensure that those rules are respected, to complain if the rules are ignored and to obtain adequate compensation in the event of a violation.

附件十八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1. The purposes of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hereinafter "torture or other ill-treatment") include the following:

(a) Clarification of the facts and establishment and acknowledgement of individual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b) Identification of measures needed to prevent recurrence;

(c) Facilitation of prosecution and/or, as appropriate, disciplinary sanctions for those indicated by the investigation as being responsible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need for full reparation and redress from the State, including fair and adequat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and provision of the means for medical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2.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complaints and report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are promptly and effectively investigated.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 express complaint, an investigation shall be undertaken if there are other indications that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might have occurred. The investigators, who shall be independent of the suspected perpetrators and the agency they serve, shall be competent and impartial. They shall have access to, or be empowered to commission investigations by, impartial medical or other experts. The methods used to carry out such investigations shall meet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the findings shall be made public.

5. (a) In cases in which the established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are inadequate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expertise or suspected bias, or because of the apparent existence of a pattern of abuse or for other substantial reasons,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investigations are undertaken through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or similar procedure. Members of such a commission shall be chosen for their recognized impartiality,

competence and independence as individuals. In particular, they shall be independent of any suspected perpetrators and the institutions or agencies they may serve. The commission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obtain all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the inquiry and shall conduct the inquiry as provided for under these Principles.

(b) A written report, made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shall include the scope of the inquiry, procedures and methods used to evaluate evidence as well a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findings of fact and on applicable law. Upon completion, the report shall be made public. It shall also describe in detail specific events that were found to have occurred and the evidence upon which such findings were based and list the names of witnesses who testifi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whose identities have been withheld for their own protection. The State shall,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reply to the report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as appropriate, indicate steps to be taken in response.

General comment No. 3 -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14 by States parties

5.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to provide redress under article 14 are two-fold: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To satisfy their procedural obligations, States parties shall enact legislation and establish complaints mechanisms, investigation bodies and institutions, including independent judicial bodies, capable of determining the right to and awarding redress for a victim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and ensure that such mechanisms and bodies are effective and accessible to all victims. At the substantive level, States parties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obtain full and effective redress and reparation, including compensation and the means for as full rehabilitation as possible.

6. As stated in paragraph 2 above, redres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ive forms of reparation: restitution, compensation, rehabilitation, satisfaction and guarantees of non- repetition. The Committee recognizes the elements of full redres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as outlined in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the Right to a Remedy and Reparation for Victims of Gros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Seri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Basic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¹ Reparation must be adequate, eff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States parties are reminded that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redress and reparative measures provided or awarded to a victim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the specificities and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redress should be tailored to the particular needs of the victim and be proportionate to the gravity of the violations committed against them.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the provision of reparation has an inherent preventive and deterrent effect in relation to future violations.

7. Where State authorities or others acting in their official capacity have committed, know or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act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have been committed by non-State officials or private actors and failed to exercise due diligence to prevent, investigate, prosecute and punish such non-State officials or private ac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vention, the State bears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redress for the victims (general comment No. 2).

8. Restitution is a form of redress designed to re-establish the victim's situation before the vio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was committe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pecificities of each case. The preventive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require States parties to ensure that a victim receiving such restitution is not placed in a position where he or she is at risk of repetition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In certain cases, the victim may consider that restitution is not possible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violation; however the State shall provide the victim with full access to redress. For restitution to be effectiv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ddress any structural causes of the violation, including any kind of discrimination related to, for example,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disability,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ethnicity, age and religion, and all other grounds of discrimination.

9.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monetary compensation alone may not be sufficient redress for a victim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The Committee affirms that the provision of monetary compensation only is inadequate for a State party to comply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14.

10. The right to prompt, fair and adequate compensation for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under article 14 is multi-layered and compensation awarded to a victim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for any economically assessable damage resulting from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whether pecuniary or non-pecuniary. This may include: reimbursement of medical expenses paid and provision of funds to cover future medical or rehabilitative services needed by the victim to ensure as full rehabilitation as possible; pecuniary and non-pecuniary damage resulting from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arm caused; loss of earnings and earning potential due to disabilities caused by the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and lost opportunities such as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In addition, adequate compensation awarded by States parties to a victim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should provide for legal or specialist assistance, and other costs associated with bringing a claim for redress.

11. The Committee affirms that the provision of means for as full rehabilitation as possible for anyone who has suffered harm as a result of a vio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should be holistic and include 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care as well as legal and social services. Rehabilita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general comment, refers to the restoration of function or the acquisition of new skills required as a result of the changed circumstances of a victim in the aftermath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It seeks to enable the maximum possible self-sufficiency and function for the individual concerned, and may involve adjustments to the person's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Rehabilitation for victims should aim to restore, as far as possible, their independence, physical, mental, social and vocational ability; and full inclus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ety.

12.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the obligation of States parties to provide the means for "as full rehabilitation as possible" refers to the need to restore and repair the harm suffered by a victim whose life situation, including dignity, health and self-sufficiency may never be fully recovered as a result of the pervasive effect of torture. The obligation does not relate to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of States parties and may not be postponed.

13. In order to fulfil its obligations to provide a victim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with the means for as full rehabilitation as possible, each State party should adopt a long-term, integrated approach and ensure that specialist services for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ppropriate and readily accessible. These should include: a procedure for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individuals' therapeutic and other needs, based on, inter alia, the Manual on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The Istanbul Protocol); and may include a wide range of inter-disciplinary measures, such as medic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ve services; re-integrative and social services; community and family-oriented assistance and services; vocational training; education etc. A holistic approach to rehabilitation which also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of the victim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Furthermore, victims may be at risk of re-traumatization and have a valid fear of acts which remind them of the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they have endured. Consequently, a high priority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need to create a context of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which assistance can be provided. Confidential services should be provided as required.

14. The requirement in the Convention to provide these forms of rehabilitative services does not extinguish the need to provide medical and psychosocial services for victims in the direct aftermath of torture, nor does such initial care represent the fulfilment of the obligation to provide the means for as full rehabilitation as possible.

15. States parties shall ensure that effective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and programmes are established in the State, taking into account a victim's culture, personality, history and background and are accessible to all victim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and regardless of a victim's identity or status within a marginalized or vulnerable group, as illustrated in paragraph 32, including asylum seekers and refugees. States parties' legislation should establish concrete mechanisms and programmes for providing rehabilitation to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Torture victims should be provided access to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as soon as possible following an assessment by qualified independent medical professionals. Access to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should not depend on the victim pursuing judicial remedies. The obligation in article 14 to provide for the means for as full rehabilitation as possible can be fulfilled through the direct provision of rehabilitative services by the State, or through the funding of private medical, legal and other facilities, including those administer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in which case the State shall ensure that no reprisals or intimidation are directed at them. The victim's participation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service provider is essential. Services should be available in relevant languages. States parties are encouraged to establish systems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and services, including by using appropriate indicators and benchmarks.

16. Satisfaction should include, by way of and in addition to the obligations of investigation and criminal prosecution under articles 12 and 13 of the Convention, any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remedies: effective measures aimed at the cessation of continuing violations; verification of

the facts and full and public disclosure of the truth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disclosure does not cause further harm or threaten the safety and interests of the victim, the victim's relatives, witnesses, or persons who have intervened to assist the victim or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further violations; the search for the whereabouts of the disappeared, for the identities of the children abducted, and for the bodies of those killed, and assistance in the recovery, identification, and reburial of victims' bod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pressed or presumed wish of the victims or affected families; an official declaration or judicial decision restoring the dignity, the reputation and the rights of the victim and of person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victim;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against persons liable for the violations; public apologies, including acknowledgement of the facts and 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 commemorations and tributes to the victims.

17. A State's failure to investigate, criminally prosecute, or to allow civil proceedings related to allegations of acts of torture in a prompt manner, may constitute a de facto denial of redress and thus constitute a violation of the State's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14.

18. Articles 1 to 16 of the Convention constitute specific preventive measures that the States parties deemed essential to prevent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To guarantee non-repetition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States parties should undertake measures to combat impunity for violations of the Convention. Such measures include issuing effective, clear instructions to public officials 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especially the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torture. Other measures should include any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civilian oversight of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ensuring that all judicial proceedings abide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due process, fairness and impartiality; strengthen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legal, health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who assist torture victims; establishing systems for regular and independent monitoring of all places of detention; providing, on a priority and continued basis, training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as well as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on human rights law that includes the specific needs of marginalized and vulnerable populations and specific training on the Istanbul Protocol for health and legal professionals and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promoting the observanc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codes of conduct by public servants, including law enforcement, correctional, med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service and military personnel; reviewing and reforming laws contributing to or allowing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article 3 of the Convention prohibiting refoulement; ensuring the availability of temporary services for individuals or groups of individuals, such as shelters for victims of gender-related or other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The Committee notes that by taking measures such as those listed herein, States parties may also be fulfilling their obligations to prevent acts of torture under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Additionally, guarantees of non-repetition offer important potential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at may be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violence and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amending relevant laws, fighting impunity, and taking effective preventative and deterrent measures.

19. Under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States parties shall enact “effective legislative, administrative, judicial or other measures to prevent acts of torture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As clarified by the Committee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2, “States parties must make the offence of torture punishable as an offence under its criminal law, in accordance, at a minimum, with the elements of torture as defined in article 1 of the Conven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4.” The failure of States parties to enact legislation that clearly incorporates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and criminalizes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and the resulting absence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as criminal offences, obstructs the victim’s capacity to access and enjoy his or her rights guaranteed under article 14.

20. To give effect to article 14, States parties shall enact legislation specifically providing a victim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with an effective remedy and the right to obtain adequate and appropriate redress, including compensation and as full rehabilitation as possible. Such legislation must allow for individuals to exercise this right and ensure their access to a judicial remedy. While collective repar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paration programmes may be acceptable as a form of redress, such programmes may not render ineffective the individual right to a remedy and to obtain redress.

21. States parties should ensure that their domestic laws provide that a victim who has suffered violence or trauma should benefit from adequate care and protection to avoid his or her re-traumatization in the course of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designed to provide justice and reparation.

22. Under the Convention, States parties are required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 alleged perpetrators of torture when they are found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and to adopt the necessary legislation to make this possible.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4 is not limited to victims who were harm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tate party or by or against nationals of the State party. The Committee has commended the efforts of States parties for providing civil remedies for victims who wer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outside their territory.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hen a victim is unable to exercise the rights guaranteed under article 14 in the territory where the violation took place. Indeed, article 14 requires States parties to ensure that all victim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are able to access remedy and obtain redress.

23. The Committee has, in its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identified other State obligations that shall be me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article 14 rights of a victim are fully respected. In this regard, the Committee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s parties' fulfilment of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12 and 13, and their obligation under article 14. According to article 12, States parties shall undertake prompt, effective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ions, wherever there is reasonable ground to believe that an act of torture has been committed in any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as the result of its actions or omissions and, as set out in article 13 and affirmed by the Committee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2, ensure that impartial and effective complaints mechanisms are established. Full redress cannot be obtained if the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s 12 and 13 are not guaranteed. Complaints mechanisms shall be made known and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including to persons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whether in detention, psychiatric facilities, or elsewhere, via, for example, telephone hotlines or confidential complaints boxes in detention facilities, and to persons

belonging to vulnerable or marginalized groups, including those who may have limited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24. At the procedural level, States parties shall ensure the existence of institutions competent to render enforceable final decisions through a procedure established by law to enable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to secure redress, including adequate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25. Securing the victim's right to redress requires that a State party's competent authorities promptly, effectively and impartially investigate and examine the case of any individual who alleges that she or he has been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Such an investigation should include as a standard measure an independent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forensic examination as provided for in the Istanbul Protocol. Undue delays in initiating or concluding legal investigations into complaint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compromise victims' rights under article 14 to obtain redress, including fair and adequate compensation and the means for as full rehabilitation as possible.

26. Notwithstanding the evidentiary benefits to victims afforded by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 civil proceeding and the victim's claim for reparation should not be dependent on the conclusion of a criminal proceeding.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compensation should not be unduly delayed until criminal liability has been established. Civil liability should be available independently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the necessary legislation and institutions for such purpose should be in place. If criminal proceedings are required by domestic legislation to take place before civil compensation can be sought, then the absence of or undue delay in those criminal proceedings constitutes a failure on the part of the State party to fulfil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Disciplinary action alone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remedy within the meaning of article 14.

27. Under article 14, a State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victims of any act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under its jurisdiction obtain redress. States parties have an obligation to take all necessary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all victims of such acts obtain redress. This obligation includes an obligation for State parties to promptly initiate a process to ensure that

victims obtain redres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 complaint, when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has taken place.

28. The Committee strongly encourages States parties to recognize the Committee's competence to consider individual complaints under article 22 to allow victims to submit communications and seek the views of the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furthermore encourages States parties to ratify or accede to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preventive measures against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29. The Committee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ate party affirmatively ensuring that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adequately informed of their right to pursue redress. In this regard, the procedures for seeking reparation should be transparent. The State party should moreover provid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to minimize the hardship to complainant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Civil proceedings, or other proceedings, should not impose a financial burden upon victims that would prevent or discourage them from seeking redress. Where existing civil proceedings are unable to provide adequate redress to victims, the Committee recommends implementing mechanisms that are readily accessible to victim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fund to provide redress for victims of torture. Special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to ensure access by persons belonging to groups which have been marginalized or made vulnerable.

30. Judicial remedies must always be available to victims, irrespective of what other remedies may be available, and should enable victim participation. States parties should provide adequate legal aid to those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lacking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to bring complaints and to make claims for redress. States parties shall also make readily available to the victims all evidence concerning act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upon the request of victims, their legal counsel, or a judge. A State party's failure to provide evidence and information, such as records of medical evaluations or treatment, can unduly impair victims' ability to lodge complaints and to seek redress,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31. The State party should also take measures to prevent interference with victims' privacy and to protect victims, their families and witnesses and others who have intervened on their behalf against intimidation and retaliation at all tim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or other proceedings that affect the interests of victims. Failure to provide protection stands in the way of victims filing complaints and thereby violates the right to seek and obtain redress and remedy.

32.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is a basic and general principle i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States parties shall ensure that access to justice and to mechanisms for seeking and obtaining redress are readily available and that positive measures ensure that redress is equally accessible to all persons regardless of race, colour, ethnicity, age, religious belief or affiliat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mental or other disability, health status, economic or indigenous status, reason for which the person is detained, including persons accused of political offences or terrorist acts, asylum-seekers, refugees or others unde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r any other status or adverse distinction, and including those marginalized or made vulnerable on bases such as those above. Culturally sensitive collective reparation measures shall be available for groups with shared identity, such as minority groups, indigenous groups, and others. The Committee notes that collective measures do not exclude the individual right to redress.

33. Judicial and non-judicial proceedings shall apply gender-sensitive procedures which avoid re-victimization and stigmatization of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With respect to sexual or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access to due process and an impartial judiciary, the Committee emphasizes that in any proceedings, civil or criminal, to determine the victim's right to redress, including compensation, rules of evidence and procedure in relation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must afford equal weight to the testimony of women and girls, as should be the case for all other victims, and prevent the introduction of discriminatory evidence and harassment of victims and witnesses.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complaints mechanisms and investigations require specific positive measures which take into account gender aspect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victims of abuses such as sexual violence and abuse, rape, marital rape, domestic violence,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nd trafficking are able to come forward and seek and obtain redress.

34. To avoid re-victimization and stigmatization of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the protections outli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equally apply to any person marginalized or made vulnerable on the basis of identities and groups such as those examples listed under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in paragraph 32. In judicial and non-judicial proceedings sensitivity must be exercised toward any such person. Accordingly, the Committee notes that judicial personnel must receive specific training on the various impact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including those on victims from marginalized and vulnerable groups, and on how to exercise sensitivity towards victim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including in the form of sexual or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re-victimization and stigmatization.

35.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e training of relevant police, prison staff, medical personnel, judicial personnel and immigration personnel, including training on the Istanbul Protocol, to be fundamental to ensuring effective investigations. Furthermore, officials and personnel involved in efforts to obtain redress should receive methodological training in order to prevent re-traumatization of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This training should include, for health and medical personnel, the need to inform victims of gender-based and sexual violence and all other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of the availability of emergency medical procedures, bot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he Committee also urges States parties to establish human rights offices within police forces, and units of officers specifically trained to handle cases of gender-based and sexual violence, including sexual violence perpetrated against men and boys, and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nd ethnic, religious, national or other minorities and other marginalized or vulnerable groups.

36. The Committee furthermore underlines the importance of appropriate procedures being made available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childr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nd the child's right to express his or her views freely in all matters affecting him or her, including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and of the views of the child

being given due wei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e and maturity of the child. States parties should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of child-sensitive measures for reparation which foster the health and dignity of the child.

37.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right to redress is the clear acknowledgement by the State party concerned that the reparative measures provided or awarded to a victim are for violations of the Convention, by action or omission. The Committee is therefore of the view that a State party may not implement development measures or provid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s a substitute for redress for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The failure of a State party to provide the individual victim of torture with redress may not be justified by invoking a State's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 Committee recalls that subsequent governments as well as successor States still have the obligation to guarantee access to the right of redress.

38. States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have an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right to redress is effective. Specific obstacles that impede the enjoyment of the right to redress and preven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14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inadequate national legislation, discrimination with regard to accessing complaints and investigation mechanisms and procedures for remedy and redress; inadequate measures for securing the custody of alleged perpetrators, State secrecy laws, evidential burdens and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that interfere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ight to redress; statutes of limitations, amnesties and immunities; the failure to provide sufficient legal aid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victims and witnesses;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stigma, and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other related effect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In addition, the failure of a State party to execute judgements providing reparative measures for a victim of torture, handed down by national, international or regional courts,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impediment to the right to redress. States parties should develop coordinated mechanisms to enable victims to execute judgements across State lines, including recognizing the validity of court orders from other States parties and assisting in locating the assets of perpetrators.

39. With regard to the obligations in article 14, States parties shall ensure both de jure and de facto access to timely and effective redress

mechanisms for members of groups marginalized and/or made vulnerable, avoid measures that impede the ability of members of such groups to seek and obtain redress, and address formal or informal obstacles that they may face in obtaining redress. These may include, for example, inadequate judicial or other procedures for quantifying damages which may have a negative disparate impact on such individuals in accessing or keeping money. As the Committee has emphasized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2, “gender is a key factor. Being female intersects with other identifying characteristics or status of the person...to determine the ways that women and girls are subject to or at risk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States parties shall ensure due attention to gender in providing all the elements cited above in the process of ensuring that everybody, in particular members of groups made vulnerable, including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 people, must be treated fairly and equally and obtain fair and adequate compensation, rehabilitation and other reparative measures which respond to their specific needs.

40. On account of the continuous nature of the effects of torture, statutes of limitations should not be applicable as these deprive victims of the redress,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due to them. For many victims, passage of time does not attenuate the harm and in some cases the harm may increase as a resul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that requires med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upport, which is often inaccessible to those who have not received redress. States parties shall ensure that all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regardless of when the violation occurred or whether it was carried out by or with the acquiescence of a former regime, are able to access their rights to remedy and to obtain redress.

41. The Committee has consistently held that amnesties for the crime of torture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under the Convention, including under article 14. As was pointed out in general comment No. 2, “amnesties or other impediments which preclude or indicate unwillingness to provide prompt and fair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 of perpetrator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non-derogability.”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amnesties for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pose impermissible obstacles to a victim in his or her efforts to obtain redress and contribute to a climate of impunity. The

Committee therefore calls on States parties to remove any amnesties for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42. Similarly, granting immunity,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any State or its agents or to non-State actors for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is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obligation of providing redress to victims. When impunity is allowed by law or exists de facto, it bars victims from seeking full redress as it allows the violators to go unpunished and denies victims full assurance of their rights under article 14. The Committee affirms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may argu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be used to deny redress for victims.

43.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reservations which seek to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4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object and purpose of the Convention. States parties are therefore encouraged to consider withdrawing any reservations to article 14 that limit its applica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all victims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have access to redress and remedy.

附件二十

禁止酷刑公約初次報告的形式和內容準則 (摘要)—對照美國初次報告

告

根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公約》第 19 條，締約國承諾提交關於其為履行公約義務所採取措施之報告。初次報告應在《公約》對有關締約國生效後一年內提交，隨後每四年提交一次報告，除非委員會要求提交其他報告。為了協助締約國履行第 19 條義務，委員會通過有關初次報告形式和內容之一般準則。

一、一般資訊

A. 導言

3. 在報告導言部分中，應提到有關一般資訊的擴大的核心文件，如一般政治結構、保護人權的一般法律架構等。在初次報告正文中，無需重複這些資訊。

4. 這一節中應列入有關編撰報告之程序的資訊。委員會認為，報告的草擬應可受益於廣泛協商。因此，委員會歡迎締約國提供關於

政府內部、以及與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組織可能進行之任何相關協商的資訊。

2. This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ith extensive assistanc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were also solicited and received from interes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cademics and private citizens. The report covers the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asures taken to give effect to the Convention through September 1999.

B.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一般法律架構

5. 在這一節中，委員會預期收到核心文件所無之關於公約實施情況的具體資訊，特別是：

- 簡要說明關於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憲法、刑法和行政規定；

45. There i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 single statute, authority or mechanism by which basic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re guaranteed or enforced. Instead, the essenti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s afforded by the various guarantees set forth i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statutes as well as in the constitutions, statutes and law of the several states and other constituent units. Responsible authorities thus include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those with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legislators and judges, among others. This diffuse structure provides extensive legal protections and a wide variety of enforcement and remedial possibilities, ranging from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 civil damage suits,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46. In consequenc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fundamental freedoms, including freedom from torture, is shared by the various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President is responsible for enforcing the law. His chief assistant in this task is the Attorney-General.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Civil Rights Division bears princip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s, the Criminal Division and regional U.S. Attorneys Offices for prosecuting most federal crimes, and the Bureau of Prisons for the oversight and management of federal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At the state level, the elected Governor and/or Attorney-General may share responsibility with 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many local jurisdictions, including most large cities, also have such bodies. At all level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exists to guarantee fundamental rights, including freedom from torture,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equal protection and due process, and a fair trial. Finally, the large and active community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ks constantly to ensure that abuses that occur are brought to light and that government is responsive to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press (including print and electronic media) serve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regard.

47. In 1994, Congress enacted a new federal law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relating to acts of torture committed outside United States territory. This law, which is codified at 18 U.S.C. § 2340 et seq., extends United States criminal jurisdiction over any act of (or attempt to commit) tortu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by a United States national or by an alleged offender pres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nationality. The statute adopts the Convention's definition of torture, consistent with the terms of United States ratification. It permits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alleged torturers in federal courts in specified circumstances.

48. Any act falling within the Convention's definition is clearly illegal and prosecutable everywhere in the country. Because existing criminal law was determined to be adequate to fulfil the Convention's prohibitory obligations, and in deference to the federal-state relationship, it was decided at the time of ratification not to propose enactment of an omnibus

implementing statute for the Convention or to adopt a single federal crime of torture.

49. Torture has always been proscribed by the Eigh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hich prohibits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This Amendment is directly applicable to action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rough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ose of the constituent states. See *Robinson v. California*, 370 U.S. 660, reh’g den. 371 U.S. 905 (1962); *Estelle v. Gamble*, 429 U.S. 97 (1976). While the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law of the individual states in some cases offers more extensive or more specific protections, the protections of the right to life and liberty, personal freedom and physical integrity found in the Fourth, Fifth and Eighth Amendme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provide a nationwide standard of treatment beneath which no governmental entity may fall. The constitutional nature of this protection means that it applies to the actions of official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ll individuals enjoy protec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regardless of nationality or citizenship.

- 報告國批准加入之其它涉及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問題的國際條約；

In 1992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a part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ome provisions of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to have wider application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The initial United States report under the Covenant, which provides gener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with and implementation of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venant, was submitted to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n July 1994 (see HRI/CORE/1/Add.49 and CCPR/C/81/Add.4). The United States also ratifi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as it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In February 1995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 公約在國內法律體系中的位階，例如相對於憲法和普通立法的地位；

For this reason it was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condition United States ratif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upon an understanding reflecting the respective competencies of the various governmental units in regard to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The understanding (full text at annex I) states that United States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shall be implement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the extent of its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jurisdiction, and otherwise by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With respect to those provisions which most significantly implicate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y (arts. 10-14 and 16), the Federal Government expressly committed itself to taking measures “appropriate to the Federal system” so that, in turn,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constituent units “may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for the fulfilment of the Convention”. The intent was to make clear that steps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at are necessary to effect compliance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 wi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federal structure of the domestic governmental arrangements.

- 國內法如何確保關於禁止任何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之規定的不可減損性；

Torture does not occur in the United States except in aberrational situations and never as a matter of policy. When it does, it constitutes a serious criminal offence, subjecting the perpetrators to prosecution and entitling the victims to various remedies, including rehabilitation and compensation. Although there is no federal law criminalizing torture per se, any act falling within the Convention’s definition of torture is clearly illegal and prosecutable everywhere in the country, for example as an assault or battery, murder or manslaughter, kidnapping or abduction, false arrest or imprisonment, sexual abuse, or violation of civil rights.

- 能否在法院援引並由法院或行政機關直接執行《公約》規定，這些規定是否必須納入國內法或行政規章後方能由相關主管機關執行。如果要求須納入國內法，報告應當提供關於將《公約》納入國內法律體系的立法法案的資訊；

- 管轄/有權機關涵蓋《公約》所涉事項的司法、行政或其他主管機關，如憲法法院、最高法院、普通法院和軍事法院、檢察官、紀律檢查機構、負責員警和監獄管理的行政主管機關、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等。提供《公約》在該國聯邦、中央、地區和地方各級實際執行的概況，並列出可能影響報告國履行《公約》義務的任何因素和困難。報告應列入關於此種情況下《公約》執行情況的具體資訊。歡迎主管機關或其他私人或公共機構收集的相關文件。

二、關於《公約》各實體性條款的資訊

6.作為一般規則，報告涉及每一條款內容時應包括下列資訊：

- 落實有關規定的立法、司法、行政等措施；
- 執行落實有關規定措施的具體案例和情況，包括任何相關統計資料；

- 違反《公約》之案例或情況，此種違反情事的原因與為補救有關情況所採取措施。重要的是，委員會不僅要清楚地瞭解法律情況，而且要清楚地瞭解實際情況。

第 1 條

7. 該條規定《公約》關於酷刑的定義。在該條之下，報告應列入：

- 國內法中關於酷刑定義的資訊，包括說明此定義是否完全符合《公約》的定義；

94.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ing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orture” and to delineate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with the greater precision required under United States domestic law, the United States conditioned its ratification upon several understandings related to article 1. The full text of these understandings is at annex I. In essence, they provide that:

95. The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pain and suffering is appropriately included in the definition of “torture” to reflect the increasing and deplorable use by States of various psychological forms of torture and ill treatment, such as mock executions, sensory deprivations, use of drugs, and confinement to mental hospitals. As all legal systems recognize, however, assessment of mental pain and suffering can be a very subjective undertaking. There was some concer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criminal justice community that in this respect the Convention’s definition regrettably fell short of the constitutionally required precision for defining criminal offences. To provide the requisite clarity for purposes of domestic law,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conditioned its ratification upon an understanding that, in order to constitute torture, an act must be specifically intended to inflict severe physical or mental pain or suffering and that mental pain or suffering refers to prolonged mental harm caused by or resulting from: (1) the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r

threatened infliction of severe physical pain or suffering; (2) the administration or application, or threatened administration or application, of mind-altering substances or other procedures calculated to disrupt profoundly the senses or the personality; (3) the threat of imminent death; or (4) the threat that another person will imminently be subjected to death, severe physical pain or suffering, or the administration or application of mind-altering substances or other procedures calculated to disrupt profoundly the senses or the personality.

96. For similar reasons of clarity and specificity, United States adherence was conditioned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definition of “torture” in article 1 is intended to apply “only to acts directed against persons in the offender’s custody or physical control”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nvention to normal military and law enforcement operations.

- 若國內法欠缺符合《公約》規定之酷刑定義，應說明涵蓋所有酷刑案件的刑事或立法規定的資訊；

- 關於載有或可能載有更寬廣適用範圍之任何國際文書或國家立法的資訊。

第 2 條第 1 項

8. 該項規定，締約國有義務採取有效措施防止酷刑行為。報告應規定下列資訊：

- 為防止所有酷刑行為而採取之有效措施之相關資訊，諸如關於：員警可裁處拘禁的期限、單獨拘留、關於被逮捕者聘請律師、得到

醫療檢查和與家人聯繫等權利的規定、可能限制對被拘禁者的各種保障的緊急狀態或反恐立法。

100. Every act of tortur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Convention is illegal under existing federal and state law, and any individual who commits such an act is subject to penal sanctions as specified in criminal statutes. Such prosecutions do in fact occur in appropriate circumstances. Torture cannot be justified by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nor can it be excused on the basis of an order from a superior officer.

101. United States law recognizes and protects the fundamental right of everyone to life, liberty and inviolability of his or her person. Every system of criminal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clearly and categorically prohibits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the person, whether physical or mental,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n act of torture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Convention. Such acts may be prosecuted, for example, as assault, battery or mayhem in cases of physical injury; as homicide, murder or manslaughter when a killing results; as kidnapping, false imprisonment or abduction where an unlawful detention is concerned; as rape, sodomy, or molestation; or as part of an attempt or a conspiracy, an act of racketeering, or a criminal violation of an individual's civil rights. While the specific legal nomenclature and definitions vary from jurisdiction to jurisdiction, it is clear that any act of torture falling within the Convention would in fact be criminally prosecutable in every jurisdic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103. Eighth Amendment. Perhaps the strongest and clearest protection against torture is afforded by the Eigh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hich prohibits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106. The Eighth Amendment has also been interpreted to apply to (1) inadequate conditions of confinement resulting from an official's "deliberate indifference" to identifiable human needs (such as continuous deprivation of food, warmth, and exercise), *Wilson v. Seiter*, 501 U.S. 294 (1991), and possibly overcrowding of facilities, *Rhodes v. Chapman*, 452

U.S. 337 (1981); (2) excessive use of force by prison officials, as well as failure to protect inmates from physical attacks by other inmates, and inadequate training or screening of guards, *Whitley v. Albers*, 475 U.S. 312 (1986); and (3) inadequate provision of medical, dental and psychiatric care, including an official's deliberate indifference to an inmate's serious medical needs which exceeds simple medical malpractice, *Estelle v. Gamble*, 429 U.S. 97 (1976), and *Farmer v. Brennan*, 511 U.S. 825 (1993) (prison officials have a duty under the Eighth Amendment to provide humane conditions of confinement).

112. Other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Because the Eighth Amendment by its terms applies to "punishments", courts have looked to other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in particular the Fourth Amendment's protection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and the due process requirements of the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to preclude the abuse or ill-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in other custodial circumstances. Thes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are applicable and enforced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113. The Fourth Amendment provides that all persons shall be free from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and that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114.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provides that "[n]o State [shall]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The Fifth Amendment applie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similarly provides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provides a broad and flexible measure of protection against abuse of state power. The due process clauses of the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may reach actions that are technically outside Eighth Amendment purview, such as excessive use of force by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during the investigative or pre trial stages. Denial of pre trial release by itself may implicate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due process concerns. *United States v. Salerno*, 481 U.S. 739 (1987).

115. Although the Eighth Amendment does not apply to “pre trial detainees”, i.e., persons lawfully arrested but not yet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the courts have ruled that such individuals enjoy equivalent protection und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with regard to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121. Habeas corpus. Of principal significance is the constitutionally recognized right of habeas corpus, which affords individuals in custody the right to an immediate judicial hearing on the legality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confinement and an order directing the detaining official to release them, if appropriate. In particular, a person in custody who has not been formally arrested and provided a preliminary hearing as required by law may seek immediate release by filing an application for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in state or federal court. The writ can also be used to seek review of a final conviction, to challenge execution of a sentence, or to contest the legality of an order of confinement not resulting from a criminal sentence, for example a commitment to custody for mental incompetence or for extradition reasons. This right ensures, for example, that suspe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not be held “incommunicado”.

122. Arrest and detention. United States law imposes strict rules regarding arrest and detention of suspects by agents of the state and effectively protects individuals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and detention.

127. Right to counsel. The right to counsel in criminal cases is guaranteed by the Six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is right is binding on the states via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In addition, the right is also guaranteed by similar or analogous language in every state constitution (except that of Virginia). The Sixth Amendment provides that “[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for his defense”. While primarily reflecting the need for legal representation at trial, this right has been interpreted to apply whenever adversarial judicial proceedings have begun, whether or not the individual is in custody. See *Massiah v. United States*, 377 U.S. 201 (1964) (government attempts deliberately to elicit confession or incriminating statements after the initiation of formal

charges may interfere with the right to counsel and therefore render such statements inadmissible as evidence).

128. The right to counsel applies at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stage, at arraignment, and at the post-trial (sentencing) phase. See *Coleman v. Alatan*, 339 U.S. 1 (1990); *Michigan v. Jackson*, 475 U.S. 625 (1986); and *Mempa v. Rhay*, 389 U.S. 128 (1967). It can also apply to custodial interrogations. In *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 (1964),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was excluded ("suppressed") because the police had violated his Sixth Amendment rights by telling him incorrectly at the time of interrogation that his attorney did not want to see him.

129. Inability to afford representation cannot deprive an accused of his or her right to counsel. In *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S. 335 (1962), the U.S. Supreme Court found that the Sixth Amendment mandated state-paid counsel for the trial of indigent felony defendants. The right was extended to all cases including misdemeanors in which imprisonment is imposed. *Scott v. Illinois*, 440 U.S. 367 (1979); *Argersinger v. Hamlin*, 407 U.S. 25 (1972). Hence, no state can sentence an indigent convicted defendant to a term of imprisonment unless it has afforded him or her the right to assistance of appointed counsel. Constitutional notions of due process also require provision of counsel in appeals as of right. *Evitts v. Lucey*, 469 U.S. 387 (1985).

9. 委員會歡迎報告國對有關防止酷刑措施效力的評估，包括確保將責任人繩之以法的措施。

第 2 條第 2 項

10. 報告應列入關於確保任何特殊情況均不得被援引為由之各種有效措施的資訊，特別是：

- 是否存在法律和行政措施，保障任何人不受酷刑對待的國家義務即使在戰爭狀態、戰爭威脅、國內政局動盪或任何其他社會緊急狀態期間也不受減損；

第 2 條第 3 項

11. 報告應表明：

- 是否存在禁止援引上級命令--包括軍事當局命令--為施行酷刑之理由的立法和判例法；如果有，應提供關於其實際執行情況的資訊；
- 是否有任何允許下級可以合法違抗施行酷刑命令的情況，他或她可以求助的程序和關於可能發生的任何這種情況的資訊；
- 作為一個刑法上辯護理由，公共主管機關有關「正當服從」概念的立場是否對有效實施這項禁止造成任何影響。

第 3 條

12. 該條禁止將一個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令其可能遭受酷刑的國家。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關於此種禁止的國內立法；

(1)公約第 3 條國內法化:Foreign Affairs Reform and Restructuring Act of 1998 授權相關行政機關訂定行政命令執行，在此的相關權責

機關為移民及歸化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INS))與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

168. Legislation. On 21 October 1998, President Clinton signed into law a bill which required “[n]ot later than 12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enactment of this Act, the heads of appropriate agencies [to] prescribe regulations to implement the oblig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Article 3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Forms of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subject to any reservations, understandings, declarations, and provisos contai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resolution of ratif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Section 2242, Foreign Affairs Reform and Restructuring Act of 1998, Public Law 105-277 (21 October 1998). Accordingly, the INS and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each promulgated regulations to implement article 3, consistent with United States reservations, understanding and declarations,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2)根據前述母法訂定之相關性行政命令

移民歸化局之行政命令，有兩種保護，一種為新形式的暫緩遣返，

二為推遲遣返(deferral of removal,)

169. INS Regulations. On 19 February 1999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published an interim rule prescribing regulations that implement formally, as directed by the Congress, United States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The interim rule became effective on 22 March 1999. (A full text of the rule is at annex IV.)

170. Under the regulations, at 8 C.F.R. Parts 3, 103, 208, 235, 238, 240, 241 and 253, claims for article 3 protection generally are determined by Immigration Judges (IJs) of the Executive Office for Immigration Review (EOIR). The regulations permit aliens to raise article 3 claims during the course of regular immigration removal proceedings,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y for prompt and fair consideration. IJ decisions are subject to review by the Board of Immigration Appeals, also a part of EOIR.

171. The regulations create two types of article 3 protection. The first is a new form of withholding of removal. The second protection is deferral of removal, a more temporary form of protection, which is to be granted to aliens who would more likely than not face torture, but who are ineligible for withholding of removal - for example, certain criminals, terrorists and persecutors. Deferral of removal is more easily and quickly terminated if the individual is no longer likely to be tortured in the country of removal. A deferral order would not alter INS authority to detain an individual subject to detention. Neither provision alters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remove the individual to a third country where he or she would not be tortured. Both, however, would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cardinal obligation of article 3, not to return the person to the likelihood of torture.

國務院之行政命令：將過去之實踐法典化，確保美國不引渡個人回可能遭受酷刑之國家

176. Department of State regulations. On 26 February 1999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shed a final rule, as directed by the Congress, issuing regulations implementing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in extradition cases. The rule became effective immediately. (A full text of the rule is in annex V.)

177.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at 22 C.F.R. Part 95,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has essentially codified its pre-existing practice, see above, for ensur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extradite a person to a country where 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he will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其他相關國內立法:政治庇護條款(asylum)(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 § 208)與暫緩遣返條款(withholding of removal)(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 § 241 (b) (3))(難民公約第 33 條的國內法化)，雖然這兩種救濟的程序與效果均不同，然而這兩個救濟均強調是否存有外國人基於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

群體的社員資格或政治意見而面臨遭受迫害的風險。這兩種救濟與公約第3條有3點不同，其一，政治庇護條款與暫緩遣返條款會排除某些適用的主體，如因為恐怖主義或會對美國造成安全威脅…等而不適用，公約第3條卻無此等例外；其二，政治庇護與暫緩遣返條款僅適用於外國人基於條文所列舉的特定特徵(specific characteristics)所遭受迫害的風險，公約第3條無此限制；其三，公約酷刑的定義並未涵蓋所有可能構成政治庇護或暫緩遣返條款下的迫害的所有類型傷害。

- 國家可能通過或採用之有關恐怖主義、緊急情況、國家安全或其他理由的立法和做法是否對有效實施這項禁止造成任何影響

如前所述，政治庇護條款與暫緩遣返條款排除特定恐怖份子與對美國造成危險的個人之適用。而在移民歸化局的行政命令則說明在推遲遣返的情況則依舊適用於那些恐怖份子等情況，另外恐怖份子或造成國家安全危險疑慮等個人依舊適用行政規則的特別遣返程序(special removal procedures)，除此之外並未特別說明相關立法或作法影響之狀況。

- 由何主管機關根據哪些標準確定引渡、驅逐、遣送或送回個人；
- 關於這一問題的決定是否能夠得到覆審，如果能夠，由哪機關進行覆審，所適用程序為何，此種程序是否具有停職的效力；
- 有關第 3 條案件的決定及這些決定中所適用之標準，有關決定所依據之資訊與資訊來源；
- 為處理驅逐、遣返或引渡外國人的官員提供之培訓項目。

第 4 條

13. 該條規定的報告義務指國家應當頒布立法，以與第 1 條定義相符的用語將酷刑定為罪行。委員會一貫認為，酷刑罪性質不同於現有各種形式的殺人和攻擊，因此應當單獨界定為一項罪行。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關於這些罪行和相關處罰的普通刑法和軍事刑法規定

美國並未在聯邦法將酷刑列為一項單獨的罪刑，其認為當時的現行法的規定如：殺人、過失致死、重傷…等已足夠涵蓋酷刑(如下)。然而，爾後委員會的報告則指出：「締約國未能以符合《公約》第 1 條

的規定將酷刑定為一項聯邦罪」 「儘管已採取許多措施確保遵守

《公約》的條款，但還須按照《公約》第 1 條的規定將酷刑定為一項聯邦罪行，並撤銷與《公約》有關的保留、解釋和理解」

178.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its territories and possessions, all acts constituting torture are criminal offences, punishable by appropriately severe penalties. Additionally, acts constituting attempts, “complicity”, “participation” and conspiracy to torture are likewise criminal offences. No single federal statute specifically defines or prohibits torture or directly implements the central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Nonetheless, at the time of ratification, it was determined that existing state and federal law was sufficient to implement article 4, except to reach torture occurring outside United States jurisdiction, as discussed below under article 5.

179. Where acts constituting torture under the Convention are subject to federal jurisdiction, they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such criminal offences as assault, maiming, murder, manslaughter, attempt to commit murder or manslaughter, or rape. See 18 U.S.C. §§ 113, 114, 1111, 1113, 2031. Conspiracy to commit these crimes, and being an accessory after the fact, are also crimes. See 18 U.S.C. §§ 3, 371 and 1117. Where such acts are committed within the “special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located within a state, federal law incorporates criminal defences as defined by state law. See 18 U.S.C. §§ 7, 13.

180. Conduct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nvention will often constitute criminal violations of the federal civil rights statutes. For example, violations of 18 U.S.C. §§ 241 and 242 carry a maximum of 10 years in jail or, if the victim dies, the death penalty. Section 241 penalizes conspiracies to deprive an individual of “the free exercise or enjoyment of a right of privilege secu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tion 242 addresses wilful deprivation of such rights “under color of law”

州刑法規定

182. Even where a specific act constituting torture is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se federal statutes, or is outside the protections afforded by the Fourth, Fifth, Eigh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it will be found in violation of state criminal law. Every state criminalizes deliberate acts of bodily injury as well as abuses of authority on the part of state agents, whether as common assault and battery, homicide, rape, etc., as well as conspiracies, attempts, complicity, solicitation, etc. Twenty-two states have “official oppression” statutes, many of which are patterned after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s Model Penal Code section 243.1, which provides that a person acting or purporting to act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commits a crime if he or she knowingly subjects another to arrest, detention, search, seizure, ill-treatment, dispossession, assessment, lien or other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or property rights or denies or impedes another in the exercise or enjoyment of any right, privilege, power or immunity. The Oregon CAT/C/28/Add.5 page 43 state penal code, for example, includes a specific crime of official misconduct. See also, Alaska Stat. 11.56.850 (1997) (“official misconduct”); Col. Crim. Code C.R.S. 18-8-403 (1996); Georgia OCGA 45-11-3 (1997); N. Dak. Cent. Code 12.1-14-01 (1997); Oreg. Stat. 163.205 (2) (1997); Tenn. Code Ann. 8-18-101 (1997).

- 各種限制法規是否適用於此種罪行

並未提及

- 適用這些法律規定的案件數和性質及有關案件的結果，特別是定

罪判決的刑罰和開釋理由；

並未提及

- 與實施第 4 條相關的判決書樣本

181. It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that these statutes apply to official misuse of authority and force. In the notorious Rodney King case, two officers of the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were convicted of violating § 242 by beating Mr. King repeatedly with batons during an arrest. Each was sentenced to 30 months' imprisonment for criminal violations of the civil rights statutes. This case began as a local prosecution of the four police officers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 they were acquitted of the charges after the defence convinced the jury that their conduct was not unreasonable under all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The subsequent federal criminal prosecution was successful in convincing a federal jury that the principal actor used unreasonable force, and his supervising sergeant had permitted him to do so. See *United States v. Koon*, 518 U.S. 81 (1996).

- 關於在調查指稱酷刑案期間所採取之針對酷刑行為負責的執法人員要求的紀律措施之立法(例如停職)

並未提及

- 關於現有刑罰如何考慮酷刑之嚴重性的資訊。

並未提及

第 5 條

14. 第 5 條涉及締約國對第 4 條所述罪行確立管轄權之法律責任。

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在第 1 項(a)、(b)和(c)款所涉案件中，為確定管轄權而採取之措施。還應(should)包括適用(b)和(c)款規定的案例；

公約第 5 條第一項(a) 「罪行發生在其管轄之任何領土內，或在該國註冊之船舶或飛機上」

183. As a general matter, criminal jurisdiction under federal and state law is territorial. It encompasses crimes committed by any perso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relevant subordinate jurisdiction) regardless of the nationality or citizenship of the offender or victim.

184. In relatively few instances, the definition of “territory” has been specifically crafted to apply to acts taking place outside United States geographical territory. For example,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apply within the “special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 U.S.C. § 7), which includes, *inter alia*, vessels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ircraft belong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y place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any nation with respect to an offence by or against a nation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law also defines the “special aircraft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nclude extraterritorial offences against aircraft in specified instances. See 49 U.S.C. § 46501 (2).

185. For instance, United States criminal jurisdiction extends beyond th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following conduct:

- criminal acts which occur on a vessel belonging to a United States individual or corporation located on the high seas. 18 U.S.C. § 7 (1).
- criminal acts which occur on an aircraft belonging to a United States individual or corporation flying over the high seas. 18 U.S.C. § 7 (5).
- criminal acts performed by or against a United States national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any country. 18 U.S.C. § 7 (7).
- criminal acts which occur on any foreign vessel with a scheduled departure or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iminal act is performed by or against a United States national. 18 U.S.C. § 7 (8).
- criminal acts performed on an aircraft with its next scheduled destination or last place of depar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it next la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49 U.S.C. § 46501 (2) (D) (i).

– criminal acts performed on an aircraft leased (without a crew) to a United States lessee with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49 U.S.C. § 46501 (2) (E).

公約第 5 條第一項(b) 「被控罪犯為該國國民」之相關管轄權措施
(當時尚未有相關案例)

188.....This statute, which is codified at Chapter 113B of Title 18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 (copy in annex II) provides feder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over an extraterritorial act or attempted act of torture if (1) the alleged offender is a nation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2) if the alleged offender is pres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rrespective of the nationality of the victim or alleged offender. See 18 U.S.C. §§ 2340 and 2340A, Pub. L. 103-236, Title V, § 506 (a), as amended by Pub. L. 103-322, Title VI, § 60020, Pub. L. 103-415, § 1 (k), and Pub. L. 103-429, § 2 (2).....

• 在指稱犯罪者於報告國境內而該國不將其引渡到對有關罪行具有管轄權之國家的案件，為確定管轄權而採取的措施。應當提供(a)款准予引渡和(b)款拒絕引渡之案例。

為了符合公約規定，美國採取新的立法，惟在國家報告撰寫當時尚未有根據這些立法起訴的案例

187. Extraterritoriality. At the time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neither federal nor state law was sufficiently far-reaching to satisfy the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5 concerning jurisdiction over acts of torture by United States nationals wherever committed or over such offences committed elsewhere by alleged

offenders present in United States territory whom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extradite.

188. To correct this deficiency before ratifi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enacted a new provision of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in 1994. This statute, which is codified at Chapter 113B of Title 18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 (copy in annex II) provides feder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over an extraterritorial act or attempted act of torture if (1) the alleged offender is a nation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2) if the alleged offender is pres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rrespective of the nationality of the victim or alleged offender. See 18 U.S.C. §§ 2340 and 2340A, Pub. L. 103-236, Title V, § 506 (a), as amended by Pub. L. 103-322, Title VI, § 60020, Pub. L. 103-415, § 1 (k), and Pub. L. 103-429, § 2 (2). The statute defines “torture” in a manner compatibl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ffences are punishable by fines or imprisonment up to 20 years (or, if death results from the prohibited conduct, by death or imprisonment for any term of years or life). This statute does not displace or preclude application of state or local law.

189. This statute took effect on 21 October 1994; no prosecutions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is provision to date.

第 6 條

15. 第 6 條涉及締約國行使管轄權，特別是涉及調查身處其領土內被控有第 4 條所述罪行者的問題。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國內有關法律規定，特別是有關拘押該人或確保在場之措施；該人獲得領事協助的權利；報告國通知可能也對被拘押者具有管轄權之其他國家的義務；有關拘留的情況和締約國是否打算行使管轄權；

190. Federal law and bilateral extradition treaties authorize officers to take an alleged or suspected offender into custody and hold him until extradition proceedings are under way as required by article 6.

191. Ordinarily, the apprehension and detention of a suspected torturer for purposes of extradition requires issuance of an arrest warrant by a federal district court judge or magistrate judge. In exigent circumstances (e.g., when a suspect is identified trying to enter or leave the country at a port of entry) an arrest may be made without a warrant and the suspect de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normal procedure. The ordinary requirements for an initial appearance before a magistrate apply in such a situation; however, as a general matter, in United States practice bail is not granted to persons pending extradition. The detainee may of course seek judicial review of the detention by petitioning for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此情況亦適用通知領事的一般規則

192.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6 (3), ordinary rules of consular notification apply.

- 負責實施第 6 條各個方面的主管機關；

並未提及

- 適用上述國內規定的任何案件。

並未提及

第 7 條

16. 本條規定關於締約國除非將指稱的犯罪人引渡否則應對其管轄範圍內的酷刑行為予以起訴的義務。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確保指稱犯罪者在訴訟的所有階段都得到公平待遇的措施，包括得到法律諮詢的權利、在被證明有罪之前被推定無罪的權利、在法院面前平等的權利等；
- 確保起訴和定罪所要求之證據標準在指稱犯罪者為在國外犯下酷刑行為的外國人案件中一體適用；
- 實際執行上述措施的案例。

僅說明此情況之起訴法源基礎並總結可符合公約義務一語帶過，除此之外並未特別說明相關法律保障與案例等。

第 8 條

17. 根據《公約》第 8 條，締約國須承認酷刑為可引渡的罪行，以便於引渡涉嫌犯有酷刑行為和/或相關酷刑未遂罪行及共謀和參與酷刑罪者。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酷刑和相關罪行是否被報告國視為可引渡的罪行；

美國相關法律與引渡條約將酷刑視為可引渡罪刑

- 報告國是否以條約的存在為引渡的條件；
- 報告國是否將《公約》視為就有關上述罪行實施引渡的法律根據；

美國普遍需要引渡條約才能引渡，故不將公約本身作為引渡的法律基礎

196. International extradition is a matter of federal law. See 18 U.S.C. §§ 3181-3196. As discussed above, under United States law the United States generally cannot extradite in the absence of an extradition treaty. For this reas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avail itself of the permissive provision in article 8 (2) to consider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itself as the legal basis for extradition

- 報告國與《公約》其他締約國之間將酷刑列為可引渡罪行之引渡

條約

未提及特定條約

- 報告國准予引渡指稱犯有上述任何罪行者的案例。

當時未有酷刑罪行相關引渡案例

第 9 條

18. 根據本條，締約國須在所有涉及酷刑罪及相關酷刑未遂罪、共謀和參與酷刑罪的刑事訴訟事項中相互提供司法協助。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有關涉及上述罪行案件中相互提供司法協助的法律規定，包括任

何條約

201. United States law permits both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and the courts to request and to provide many forms of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cases cover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The forms of possible assistance include the service of documents, the taking of testimony, provision of documents, execution of requests for searches and seizures, transfer of persons in custody, and forfeiture of assets, to name a few.

202. Statutory author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act upon such request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s codified at 28 U.S.C. section 1782. As amended in 1996, U.S. law authorizes the appropriate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to order a person to give testimony or provide documents for use in “a proceeding in a foreign or international tribunal, includ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efore formal accusation”. United States law does not prohibit voluntary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criminal proceedings. A person may not, however, be compelled to give testimony or produce a document in violation of any legally applicable privilege.

203. As of the end of 1998, the United States had entered into 22 bilateral treaties and dozens of bilateral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establish closer and more effective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nd to increase the availability of admissible evidence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and proceedings. An additional 19 bilateral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ies were ratified by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December 1998 and January 1999. Some of these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require dual criminality in the subject offences, others do not; but all cover a wide range of criminal offences, and all would permit the sharing of evidence and other forms of assistance in respect of the crimes covered by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Such treaties are considered self-executing and supersede any inconsistent pre-existing statutory domestic law. In re Erato, 2 F.3d 11 (2d Cir. 1993)

204. The United States has signed the 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which was transmitted to the Senate for its advice and consent to ratification in 1997. Since that Convention is not yet in for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no requests for mutual assistance have been executed pursuant to its terms.

205. Also on the multilateral level, the United States played a substantial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by the United Nations of the two ad hoc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and for Rwanda) and has provided significant operational support to their activities. In 1996,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statute (§ 1782) was amended to authorize assistance to the Tribunals and to foreign countries in gathering evidence for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 as well as for prosecutions. The amendment ensured that several earlier federal court of appeals decisions limiting the use of that provision in preliminary stages of foreign investigations woul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bligation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Tribunals.

- 報告國要求或被要求相互協助之涉及酷刑罪的案例，包括有關要求的結果。

報告並未提及任何案例

第 10 條

19. 根據本條及相關之第 16 條，締約國有義務就禁止酷刑、殘忍、不人道和侮辱之處遇與處罰事項，培訓參與拘押、審訊或處理在國家或官方控制之下之人的執法人員、司法官員和其他人員。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就上述問題對擔任《公約》第 10 條所列各項職務者的培訓方案；

209. Training. All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corrections officers receive mandatory training in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in custody, which includes specific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orture, excessive use of force, impermissibl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interrogation and restraint, 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diversity, and other issues relevant to compliance with the Convention.

215. Local governments and police officers may be liable as a matter of federal law for failing adequately to train officers on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on the use of force. *City of Canton v. Harris*, 489 U.S. 378 (1989). In *Davis v. Mason Co.*, 927 F.2d 1473 (9th Cir. 1991), for example, four plaintiffs alleged that they had been the victims of police brutality when each was individually detained for supposed traffic violations. In each case, officers used excessive force while searching the victims. The appellate court affirmed judgement in favour of the plaintiffs, holding specifically that the trial court had been correct in instructing the jury that they could find the county government and the sheriff liable under 42 U.S.C. § 1983 for failure to train the sheriff's deputies properly.

216. During the basic training course provided to all Border Patrol Agents, the Border Patrol Academy provides a two-hour course in ethics and conduct. This course instructs Agents of their obligations toward individuals they arrest and the rights of those who are arrested. The Academy also has a four-hour course in constitutional law that instructs Agents on the civil rights of those individuals that they encounter. The Academy also provides 23 hours of instruction on statutory authority under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INA). Part of this course informs Agents of the limitations on their authority and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INA when making arrests. Finally, the Academy provides three hours of instruction on officer integrity. This course provides instruction on an Agent's responsibilities in dealing with members of the public.

217. In the refugee context, the U.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has established a separate corps of asylum adjudicators, all of whom are given extensive training on issues relating to torture in order to sensitize them to the unique humanitarian aspects involved in claims for

refugee status based on allegations of torture. All asylum officers are required to attend the Asylum Officer Basic Training Course (AOBTC) as well as on-going in-service training. The AOBTC is approximately four weeks in length and includes, inter alia, training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United States asylum and refugee law, interviewing techniques, and decision making skills. Incorporated into this course is training on interviewing survivors of torture and other severe trauma. Experts instruct the officers about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orture,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view, and stress/burnout that the asylum officer may experience as a result of continually interviewing individuals who may be survivors of torture.

218. In the military context, all personnel involved in custody, interrogation, or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subjected to any form of arrest,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receive appropriate training regarding the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nd related maltreatment. This training is given to military police, interrogators, inspectors general and psychiatric hospital staff.

219.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Training Assistance Program (ICITAP),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works with la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s in various foreign countries to build democratically-based police forces which operate under the rule of law. Among the components of the ICITAP programme are a training course entitled “Human Dignity in Poli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oversight mechanism (such as an Inspector General’s Office) to provide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of alleged police abuses, and training courses in techniques for interviewing witnesses and suspects, appropriate uses of force, and proper techniques for arrest and humane handling of detainees and prisoners.

- 關於處理被拘留者或尋求庇護者問題之醫務人員的培訓，以發現揭露酷刑的生理和心理痕跡，以及對司法和其他官員的培訓的資訊；

211. Man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rely on screening techniques to identify applicants and officers/agents who may be disposed to, or are at risk of, using excessive force through psychological methods; many also employ psychologists in order to monitor, train, counsel, evaluate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in an effort to prevent abuses before they occur and to address the institutional or organizational factor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incidents of ill treatment or excess.

220. Medical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e principles of medical ethics and “standards of care” is normally a required element of the curriculum for medical doctors and other health care personnel. All health care personnel are trained in the basic obligations of the physicians’ oaths (such as the Hippocratic Oath,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Medical Ethics, and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of Medical Ethics relevant to the Role of Health Personnel, particularly Physicians, in the Protection of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The Code of Medical Ethics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 has guided medical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over 150 years and is the generally recognized ethical standard; the AMA promotes professional discussion and exchanges of views on ethical matters, e.g., through its Institute for Ethics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to perform research in a range of biomedical ethics (end-of-life care, genetics, managed care and professionalism). Other codes exist; for example,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Emergency Physicians established a new code of ethics in 1997.

221. To instruct students in this field, medic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use such textbooks as Beauchamp and Childress,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4th ed., 1994); Beauchamp and Walter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Bioethics* (4th ed., 1994); Crigger, *Cases in Bioethics* (2nd ed., 1993); and Levine, *Taking Sides* (5th ed., 1993).

222. At the federal level there exists a National Center for Clinical Ethics, which was established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in 1991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bioethics programme to promote high ethical standards in health care for veterans.

223. Within the legal commun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a growing emphasis on medical/ethical issues. For example, specialized programmes in health law and bioethics are now widespread, including academic programmes to train medical clinicians to practice ethics consultation as a speciality as well as to prepare lawyers to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health law.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such as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Law, Medicine and Ethics and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 Section on Law,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also promote the study of bioethics.

- 有關授課和培訓的性質和頻率；

210. The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requires each new permanent employee (and certain designated temporary employees) to complete two weeks of familiarization training in proper correctional practices. In addition, each new permanent employee must complete a 120 hour (three week) course denominated "Introduction to Correctional Techniques" at the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Training Center in Glynco, Georgia. This training includes review and testing in Bureau of Prisons policy, firearms proficiency and self-defence. Each employee stationed at a Bureau institution must receive 40 hours of refresher training in these subjects each year.

211. Man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rely on screening techniques to identify applicants and officers/agents who may be disposed to, or are at risk of, using excessive force through psychological methods; many also employ psychologists in order to monitor, train, counsel, evaluate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in an effort to prevent abuses before they occur and to address the institutional or organizational factor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incidents of ill treatment or excess.

212. State and loc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have independent programmes for the training of law enforcement and corrections officers, which also cover such subjects as proper techniques of search, interrogation, use of force, and mental health issues. State police officers, for example, receive an average of over 800 hours (20 weeks) of required training. For nearly two years, all states have had "peace officer standards and training" commissions.

213. At the state and local level, correctional training and staff development programmes are supplemented by the resourc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agencies, local police academies, private indust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libraries.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Corrections,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others provide managerial, specialized and advanced training for state and local corrections officials.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irectors of Law Enforcement Standards and Training (IADLEST) provides a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of law enforcement and correctional personnel, including model minimum state standards.

- 關於確保適當地和尊重地對待婦女、青少年、以及族裔、宗教或其他各種群體之任何培訓的資訊，特別是有關不當影響這些群體之各種形式酷刑；

214. The American Corrections Association, a privat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the improvement in management of American correctional agenc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has developed a voluntary accreditation programme and nation-wide standards for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These criteria, which apply to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state departments of corrections and youth services, as well as to facilities operated by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quire all new full-time employees to receive 40 hours of initial orientation training, which should include at a minimum orientation to the purposes, goal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institution and parent agency; working conditions and regulations; employee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an overview of the correctional field. This training is in addition to the first year training and on-going training required in various job categories.

- 各種方案的效力。

第 11 條

20. 根據本條與相關之第 16 條，各國有義務經常檢討對遭到任何形式逮捕、拘留或監禁者進行審訊的規則、指示，方法和慣例，以及對其拘押和處遇的安排，以防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有關被剝奪自由者待遇的法律、規章和指示；

227.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e interrogation of a criminal suspect is strictly regulated by court-made rules based on constitutional law.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are instructed in these rules as well as i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failure to follow them. As a result, the methods and practices of interroga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as well as the arrangements for the custody and treatment of persons subjected to arrest,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are consistently under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vision.

228. In the first instance, United States law circumscribes the power of the police and other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to detain or arrest individuals for any reason, including for purposes of interrogation. The Fourth Amendment not only requires “probable cause” for an arrest but prohibits the use of excessive force during an arrest, investigatory stop, or other “seizure” of a person. See *Graham v. Connor*, 490 U.S. 386 (1989).

- 關於要求迅速通知和接觸律師、醫生、家庭成員，以及在外國國民的案件中要求通知領事諸措施的資訊；

- 國內法和國家實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下列規則和原則：《受刑人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受刑人待遇基本規則》；《維護所有遭受

任何刑事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關於醫務人員、特別是醫生在保護被監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方面的任務的醫療道德原則》；和《執法人員行為守則》；

- 為檢查監獄和其他拘留地點、監督對男子和婦女進行之所有形式的暴力--包括對男子和婦女的各種形式之性暴力以及受刑人之間所有形式暴力--而設立之任何獨立機構或機制，包括授權國際監督或非政府組織進行檢查；
- 關於確保所有此類地點均為官方確認與不允許任何單獨拘留之規定的資訊；
- 審查負責審訊和拘押被拘留和監禁者的執法人員行為的機制，和此種審查的結果，以及任何合格或重新合格的程序；
- 關於保護承受特別風險者之任何保障的資訊。

第 12 條

21. 根據本條和相關之第 16 條，當有理由認為其管轄下已發生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行為時，各國必須保證其主管機關立即進行公正調查；報告應說明：

231. As a matter of law,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should proceed with a thorough, prompt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whenever they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n act of torture has been committed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While such

investigations are frequently instigated by complaints from alleged victims and/or by independent press stories, the authorities in each jurisdiction have a clear and independent responsibility to monitor and correct abuses on their own. Investigations of torture and other types of physical, sexual, or emotional abuse are initiated as they would be for any other serious offence, based upon the existence of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the abuse took place.

- 在刑事和紀律層面上啟動和展開調查的主管機關；

232. Several mechanisms exist for this purpose. Virtually all major la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s and agencies now have an internal review mechanism (such as an inspector general or internal affairs section) and/or some form of permanent, independent oversight body (a citizens' review board or governing commission) to which complaints of ill-treatment, excessive use of force, or other irregularities can be made. The touchstone is independence of review and investigation.

234. In all cases, complaints may also be made to the appropriate prosecutorial authorities, who are independent of the police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forces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system. Prosecutors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frequently on the basis of complaints, about initiating investigations and filing criminal charges.

235. In the most significant cas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y have jurisdiction over allegations of misconduct at the state, county or local law enforcement levels. Jurisdiction can be based on criminal violations of the various civil rights statutes or on specifically tailored legislation such as the Civil Rights of Institutionalized Persons Act, which permits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institute civil lawsuits against state institutions regarding the civil rights of their residents, includ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confinement and use of excessive force.

- 相關適用程序，包括是否可立即近用醫療檢查和法醫判讀之措施；

- 指稱之酷刑或虐待行為者是否在調查期間立刻被停止職務和/或被禁止進一步與指稱的受害者接觸；

- 相關案件的起訴情況和處罰結果。

236. In addi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y institute civil actions pursuant to the Pattern or Practice of Police Misconduct provision of the Crime Bill of 1994, which prohibit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from engaging in a pattern or practice of violating people's civil rights. By way of example, the statute allows the Civil Rights Division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investigate and seek to remedy patterns or practices of excessive force, false arrests, improper searches and seizures, and discriminatory traffic stops or pedestrian stops.

237. The Civil Rights Division has filed two "pattern or practice" lawsuits, against the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and Steubenville, Ohio Police Departments and entered into consent decrees in both cases. These decrees require comprehensive reforms in those departments' methods of supervising, training, and disciplining officers, as well as investigating the public's complaints of police misconduct.

238. Two other "pattern or practice" lawsuits, against the Columbus, Ohio Division of Police and the New Jersey State Police, have been announced but not yet filed as the Civil Rights Division and the affected jurisdictions are seeking to negotiate settlements that would be filed contemporaneously with the lawsuits. Numerous other civil "pattern or practice" investigations of police departments and sheriff's offices are ongoing. Among those that have been publicly reported are investigations of the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for, among other things, the Louima case), the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and the New Orleans Police Department.

第 13 條

22. 根據本條和相關之第 16 條，締約國必須保證，任何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個人有權申訴並有權要求案件得到迅速和公正的調查，並保證申訴人和證人不受虐待或恐嚇。

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所稱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行為之受害人

可使用的救濟辦法；

239. In all situations, all victims of tor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he right to bring a complaint and to have their case promptly and impartially examined by competent authorities. When a victim alleges that he or she has been abused by an official, the avenues of redress include the right to complain to a competent official to initiate an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No restrictions on who can bring such a complaint (e.g., citizens, nationals, foreigners, illegal aliens). Such complaints do not need to await a criminal verdict, nor a verdict of acquittal in the case of a person charged with a crime. The alleged failure of a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to provide inmates with an adequate administrative remedial mechanism for dealing with complaints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federal litigation.

240. Initially,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may involve an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 For prisoners in the custody of the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the initial route for filing a complaint or grievance is to file a complaint regarding the conditions of confinement or against a staff member with the Bureau's Administrative Remedy Program. Through this programme, a prisoner may present and appeal an issue at three levels, starting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proceeding through the regional level to the Central Office. See 28 C.F.R. Part 542. The Bureau of Prisons reports that, during calendar year 1998, 17,269 administrative complaints were filed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13.3 per cent granted); 11,106 at the regional level (6.7 per cent granted); and 4,535 at the Central Office (0.8 per cent granted).

241. Habeas corpus.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all detained individuals the right to petition for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This writ enables the independent judiciary to provide effective relief to any individual wrongfully detained in governmental custody, whether as a result of criminal or civil proceedings. In most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petitions allege some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standards of due process.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may also be used to complain of un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confinement, including torture or ill-

treatment. Although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does not foreclose statutory substitution of an alternative to habeas corpus review, that alternative must provide independent scrutiny of governmental detention., e.g.,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Reform and Immigration Responsibility Act, Pub. L. 104-208, 110 Stat. 3546 (Sept. 30, 1996). State habeas corpus provisions generally follow the same guidelines.

- 在主管機關拒絕調查其案件的情況下，申訴人可使用的救濟辦

法；

- 保護申訴人和證人免遭任何恐嚇或虐待的機制；

245. Victims' Rights.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community is currently debating whether new legislation (or possibly an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should be adopted to recognize and expand the rights of victims of crimes, particularly violent crimes, including inter alia the right to be present and to be heard at any public proceeding involving an offender's release from custody, the right to have the safety of the victim considered in determining any conditional release from custody relating to the crime.

- 按性別、年齡、罪行和向國內主管機關申訴酷刑和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申訴人所在地點和人數等分列之統計資料，及有關調查的結果。還應當列出被控犯有酷刑和/或其他形式虐待者所屬機關；

- 關於任何申訴人獲得獨立和公正的司法救濟的資訊，包括是否有妨礙人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之任何歧視；任何有效防止騷擾或二度傷害受害者之任何規定或措施的資訊；

- 關於為處理涉及對婦女和特特殊族裔、宗教或其他少數群體之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性之處遇案件而接受專門訓練的員警和檢察機關或類似權責機構的相關資訊；

248. Special protection is afforded to minor victims and witnesses under 18 U.S.C. section 3509, including protections of confidentiality, support of an adult attendant, services of a guardian ad litem, alternatives to live testimony, and issues of competency.

249. Domestic Assistance to Victims of Torture. In April 1997,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d United States Senator Paul D. Wellstone co-sponsored a conference entitled “Survivors of Torture: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at which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human rights, refugee, and medical communities discussed treatment of the survivors of torture. In additio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has made available \$1.5 million in funding for research for survivors of torture and related trauma. Indeed, the President has requested from Congress \$7.5 million for services and rehabilitation for victims of torture in his FY 2000 budget. Also, as noted above,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lead the world in its sup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Voluntary Fund For Victims of Torture.

250. For three years, the Office of Refugee Resettlement (ORR)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as been awarding funds to assist torture victims. Beginning in 1996, ORR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support and currently funds 10 organizations at a total of \$1.7 million in Denver, San Francisco, San Jose, Dallas, Boston, Minneapolis and New York City. These programmes identify torture survivors among refugee communities and help to make survivors comfortable with obtaining help.

251. The activities funded by ORR include: training refugee resettlement staff,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volunteers and community services staff so that torture survivors can be identified and be referred to the services they need; orienting refugees to the help available from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orienting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effectively serve refugees across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ORR is also continually working with a network of non profit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country whose mission is to serve the needs of torture victims. The services needed by torture survivors are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spiritual healing, psychological help and other social services. Some examples are: the Center for Victims of Torture in Minnesota has established a training programme for school teachers with students who are themselves victims of torture or whose families have suffered; Survivors International of San Francisco has established peer support groups and a community centre to offer survivors a path out of iso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Boston is training mental health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New England to treat torture survivors; and Solace in New York City helps survivors of torture reunite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obtain services such as employment and housing.

- 關於任何此類措施效力的資訊。

第 14 條

23. 本條涉及酷刑受害者獲得補償、及取得公平和充分賠償和康復之權利。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酷刑受害者及其家屬獲得賠償之現有程序，這些程序是否已經法制化；

269. Compensation. At the federal level, the principal avenues are administrative tort claims and civil litigation. Existing United States law establishes private rights of action for damages in several forms. Such suits could take the form of a common law tort action for assault, battery or wrongful death, a civil action for violations of federally protected civil rights, or a suit based on federal constitutional torts. Under the Equal Access to Justice Act, 28 U.S.C. § 2412, a federal court may award costs and reasonable attorney's fees and expenses to a plaintiff who prevails in a suit based on a for violation of his or her civil rights.

270. These mechanisms offer ample possibility for recovery of “adequate reparation” and generally are not constrained by limits on awardable compensation. Survivors of a victim killed by torture have under common law a right to seek compensation for the victim’s “wrongful death”.

271. Section 1983. The most common method by which prisoners seek redress (monetary damages as well as equitable or declaratory relief) against state and municipal officials is by means of a civil law suit for violations of fundamental rights pursuant to 42 U.S.C. section 1983 (initially enacted as section 1 of the Federal Civil Rights Act of 1871). This provision states:

“Every person who, under colour of any statute, ordinance, regulation, custom, or usage, of any State or Territory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subjects, or causes to be subjected, any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ther person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to the deprivation of any rights,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secur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shall be liable to the party injured in an action at law, suit in equity, or other proper proceeding for redress.”

281. Torture Victims Protection Act. The remedies available under the Alien Tort Claims Act have recently been supplemented by the 1992 Torture Victims Protection Act, Pub. L. 105-256, 12 March 1992, 106 Stat. 73 (28 U.S.C. § 1350 note). While the Alien Tort Claims Act only provides a remedy to foreign nationals, the 1992 Torture Victims Protection Act allows both foreign nationals and United States citizens to claim damages against any individual who engages in torture or extrajudicial killing under “actual or apparent authority, or under colour of law of any foreign nation”. The two statutes also differ in that the latter only allows suits for redress for torture or extrajudicial killings perpetrated by officials of foreign governments. While only aliens may sue under the Alien Tort Claims Act, that act does not expressly require that the defendant be either an official or foreign.

282. In some cas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adopted statutory schemes of compensation for past wrongs to broad categories of

individuals who do not have individual causes of action, even where the circumstances did not rise to the level of tortu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nvention. For example, under section 105 of the Civil Liberties Act of 1988, 50 U.S.C. App. § 1989b-4,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redress to United States citizens and permanent resident aliens of Japanese ancestry who were forcibly evacuated, relocated, and inter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283. Additional support for rehabilitation and treatment for victims of torture has been provided through passage into law of the Torture Victims Relief Act of 1998 (discussed above), which authorizes various forms of assistance for victims of tor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 有關國家是否在法律上對犯罪者行為負責，從而有賠償受害者之責任；

“State actions”, i.e., actions by state or local officials, may give rise to a suit under section 1983. Through such a suit, an individual may seek redress for an officer’s violation of his or her Fourth Amendment rights during the course of an arrest, or a guard’s violation of his or her Eighth Amendment rights by the infliction of cruel or inhuman punishment. Section 1983 actions are also available to individuals who claim they have been subjected to discipline or excessive force by prison officials without due process - a violation of the prisoner’s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 rights.

275. Other statutory tort claims. Another federal civil remedy is provided by the statutory grant of jurisdiction to su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negligence or malfeasance. For example, the Federal Tort Claims Act, 28 U.S.C. §§ 1346(b) and 2671 et seq., waives the sovereign immun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torts and gives the U.S. District Courts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civil action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for money damages for personal injury or loss of property caused by a negligent or wrongful act or omission of a government employee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or her office or employment. This provision may be used by federal inmates, *U.S. v. Munoz*, 374 U.S. 150 (1963), and may be used to sue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for intentional torts, including, inter alia, assault, battery, and false arrest. See, e.g., *Sami v. United States*, 617 F.2d 755 (D.C. Cir. 1979).

276. State law. All states permit civil tort suits for negligence against state officials. See, e.g., Kansas Tort Claims Act, K.S.A. § 75-6104. Some states permit action for intentional torts against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See, e.g., New Mexico Tort Claims Act, N.M Stat. Ann. 41-4-12.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ates now permit the award of damages for violations of state constitutional rights. For example, in *Brown v. State of New York*, 89 N.Y.2d 172, 652 N.Y.S.2d 223 (1996), the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 permitted a class action on behalf of some 300 citizens (non-white males) who had been systematically stopped and examined by local police after an elderly woman had been assaulted at knife point. Because the victim could only identify her assailant as an African-American man who may have cut his hand during the attack, the police questioned every black student enrolled at the local branch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and eventually every black male in the area. Claimants argued that the police action had been racially motivated and based their claims on the equal protection provisions of the New York State Constitution, since New York has no enabling statute similar to the federal civil rights statute. In upholding their cause of action, the court stated:

“[T]he State is appropriately held answerable for the acts of its officers and employees because it can avoid such misconduct by adequate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and avoid its repetition by discharging or disciplining negligent or incompetent employees ... A damage remedy for constitutional torts depriving individuals of their liberty interests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deterring police misconduct ...” *Id.* at 194, 196.

- 關於下令賠償之主管機關所作決定的統計資料，報告中至少須提供有關案例，並說明此種決定是否得到執行，包括有關酷刑性質、受害者地位和身份及其取得賠償或其他補償數額之資訊；

272. While such suits can be filed in state courts, most are presented to the federal judiciary. The volume is substantial, approximately 58,000 cases in 1994 alone. While the statute was initially adopted to permit citizens to su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s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fell below constitutional standards, it has come to be used primarily by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challeng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confinement. Typically, such cases claim that state officials have deprived prisoners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such as access to adequate medical treatment, *Estelle v. Gamble*, 429 U.S. 97 (1976), protection against excessive force by correctional officers, *Hudson v. McMillian*, 512 U.S. 995 (1992), violence by other inmates, *Farmer v. Brennan*, 114 U.S. 1970 (1994), or claiming denials of access to courts, law libraries and lawyers, *Bounds v. Smith*, 430 U.S. 817 (1977). Prisoners also frequently claim compensation for e.g.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in violation of the Eighth Amendment (inadequate living conditions, failure to protect against inmates with AIDS, exposure to tobacco smoke), for denial of equal protection under the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and for violations of due process (e.g. improprieties in the conduct of disciplinary hearings, classifications, administrative segregation).

273. Section 1983 applies to state officers who act under colour of state law. *Monroe v. Pape*, 365 U.S. 167 (1961). It also extends to municipalities and encompasses suits in which “the action that is alleged to be unconstitutional implements or executes a policy statement, ordinance, regulation, or decision officially adopted or promulgated by those whose conduct or acts may fairly be said to represent official policy”. *Monell v. Dept. of Social Services*, 436 U.S. 651, 690-691 (1978).

- 有關國家針對酷刑受害者的現今康復方案；

284.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In addition to monetary compensation, states should of course take steps to make available other forms of remedial benefits to victims of torture, including medical and psychiatric treatment.

285.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a haven for victims of persecution in foreign lands. Indeed, many recent arrivals are torture victims. Some estimates place the number of such refugees and asylees now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between 200,000 and 400,000. Various private facilities now ex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treatment of victims of torture. The Center for Victims of Torture in Minneapolis, Minnesota, established in 1985, is the nation's pre-eminent comprehensive torture treatment centre. Other facilities also exist, including the Marjorie Kovler Center for the Treatment of Survivors of Torture in Chicago, Illinois; Survivors International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nd other centres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New York, New York, and Tucson, Arizona. In addition, a number of academic medical institutions (e.g., the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re conducting clinical research in this field. Othe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re also active in this field, including OMCT/SOS-Torture, Human Rights Watch,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Group, the Lawyers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and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286. As indicated above, as of July 1999,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tributed over \$12.6 mill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Voluntary Fund for the Victims of Torture, and has been authorized by Congress to contribute an additional \$3 million to the Fund in FY 2000.

- 除賠償外，關於恢復與尊重受害者尊嚴、安全和健康保護之措施，以及防止加害者再犯和協助受害者康復及重新融入社區之任何措施的資訊。

第 15 條

24. 根據本條規定，國家必須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採納以酷刑取得之口供作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為證明施用酷刑者逼供的證據。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關於禁止將通過酷刑所獲取之口供作為證據之法律規定；

230. Exclusionary rule. A confession or statement obtained by an officer who fails to follow these rules normally may not be used as evidence against the person who made the statemen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Similarly, evidence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the police taking advantage of such a statement may not be used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State rules may provide more stringent restrictions for state and loc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291. Exclusionary rule. If a criminal defendant's statement is obtained by methods which constitute coercion, the trial court must exclude the statement to prevent a violation of the Fifth Amendment. Hence, a statement made under coercion as the result of torture likely will be deemed inadmissible as evidence in a criminal proceeding, unless it is used against a person accused of torture, in which case it may be admissible only for limited purposes (e.g., as evidence that the statement was made, but not for the statement's truth). The specific legal grounds for exclusion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facts of the given case. In a criminal proceeding, an incriminating statement by the defendant may be excluded as an involuntary confession, as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or as a violation of his constitutional rights.

295. Illegal search and seizure. Finally, a coerced statement may be held inadmissible because it was obtained improperly or illegally. The basis for this rule lies in the Fourth Amendment's prohibition of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and its requirement of due process. Evidence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ordinarily must be excluded from the prosecution's case. This rule, established with respect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Weeks v. United States*, 232 U.S. 383 (1914), was made applicable to the states in *Wolf v. Colorado*, 338

U.S. 25 (1949). In *Mapp v. Ohio*, 367 U.S. 643 (1961), it was held to b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Fifth as well as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s.

- 適用此類規定的相關案例；

288. Constitutional privilege.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provides that no one can be compelled in a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 or herself. The Fifth Amendment protection applies only when the witness can cite a reasonable fear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Zicarelli v. New Jersey State Commission of Investigation*, 406 U.S. 472, 480 (1972). The Fifth Amendment also permits an individual to refuse to answer official questions put to him or her in any other proceeding, either civil or criminal, formal or informal, where the answers might be incriminating in future criminal proceedings. *Baxter v. Palmigiano*, 425 U.S. 308, 316 (1976). However, concern with foreign prosecution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Self-incrimination Clause of the Fifth Amendment. *United States v. Balsys*, 524 U.S. 666, 118 S.Ct. 2218 (1998).

289. The Fifth Amendment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the U.S. Supreme Court to require the provision of warnings to persons in custody, including their rights to remain silent and to have an attorney, and that statements they might make can be used against them in court. *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1966). Since 1964, this privilege has been applicable to the states as well a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lloy v. Hogan*, 378 U.S. 1 (1964).

290. In all states, the same or a similar privilege (e.g. no person may be compelled “to give evidence against himself”) is also recognized as a matter of state constitutional law in some states, and the privilege is reiterated in statutes and court rules. Some states, such as Connecticut, Florida and Oregon, have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d “Miranda” rules on the basis of state constitutional law. The Supreme Court of Wyoming has recognized a stat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silence at all tim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arrest as well as before the “Miranda” warnings have been given); see *Totolito v. State*, 901 P.2d 387 (WY 1995).

292. A confession given during custodial law enforcement interrogation is subject to specific, indeed rigid, self-incrimination protections under *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1966), which has come to dominate the law of exclusi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Miranda* requires adequate warnings to protect constitutional rights; particularly, notification of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at statements by the suspect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him or her in court, and of the right to consult a lawyer and to have the lawyer present during interrogation; if he or she cannot afford one, a lawyer can be appointed prior to questioning. The *Miranda* rule ordinarily requires the exclusion of a statement taken in violation of its precepts even when no violation of the Fifth Amendment is proven.

293. These rights are, of course, subject to the suspect's "voluntary" and "intelligent" waiver; however, a confession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these requirements may, under the Supreme Court's *Miranda* jurisprudence, be excluded from evidence even if the confession could be deemed "voluntary". Much litigation has taken place over what constitutes custodial interrogation, but it has been held to include words or acts that the police should know are reasonably likely to elicit a confession or incriminating response from the suspect.

294. A statement coerced by torture may also be excludable as an involuntary out-of-court confession. Voluntariness has long been a constitutional prerequisite to the admissibility of confessions, applicable to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under the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respectively. See *Hopt v. Utah*, 110 U.S. 574 (1884); *Brown v. Mississippi*, 297 U.S. 278 (1936) (a state court conviction resting on a confession extorted by brutality and violence violates the accused's right to due process guaranteed und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his rule is also rooted in the Fifth Amendment, and it applies whether or not formal criminal charges have been filed.

296. One of the best known examples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in operation is the U.S.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Rochin v. California*, 342 U.S. 165 (1952), in which the Court prohibited use of evidence obtained in manner which "shocks the conscience". In *Rochin*, use of stomach pumping to obtain two swallowed morphine tablets without a warrant was held to violate the Due Process Clause. More recently, an

Ohio state appellate court held that it offended the concept of due process under the state and federal constitutions for a violent suspect shackled to a hospital bed to be held down by six people while a medical technician extracted a blood sample. *State v. Sisler*, 114 Ohio App.3d 337, 683 N.E.2d 106 (2d Dist. Clark Co. 1995).

297. The Fourth Amendment, by virtu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pplies to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stitutes a standard below which state law may not fall. In addition, the constitutions of some two thirds of the states hav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search and seizure” prohibitions; indeed,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as modelled after article 14 of the Massachusetts Constitution of 1780. In some states,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of “privacy” may serve the same purpose as the Fourth Amendment or even offer broader protection. See, e.g., Alaska Const. art. 1, § 22; Calif. Const. art 1, § 13; Mont. Const. art 2, § 10. As indicated elsewhere, some states have exclusionary rules based on state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law, see *Duncan v. State*, 278 Ala. 145, 176 So.2d 849 (1965), *Dolliver v. State*, 598 N.E.2d 525 (Ind. 1992), while others do not have their own rule and therefore must follow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standard, see *State v. Greer*, 114 Ohio App. 3d 299, 683 N.E.2d 82 (1996).

298. Confessional statements may also be deemed inadmissible for other reasons, for example when the custodians have failed to comply with statutory requirements for prompt presentation of arrested persons before magistrates, e.g., under the so-called McNabb-Mallory rule, or as the “poisoned fruit” of an illegal arrest or detention; see *Wong Sun v. United States*, 371 U.S. 471 (1963).

- 如果適用，締約國法律系統中是否允許衍生證據等資訊。

25.本條規定各國有義務禁止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的行為。報告應提供下列資訊：

- 締約國在何種程度上將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與處罰行為定為非法；關於國內法是否定義或以其他方式處理這些行為的資訊；

304. Federal Constitution. As indicated above,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has been amended and interpreted to provide extensive protections against cruel and inhuman punishment, and these protections reach much of the conduct and practice to which article 16 is in fact addressed.

305. State constitutions. The constitutions of almost 30 of the constituent states use language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21 say “cruel or unusual” as compared to 6 which say only “cruel”; Maryland uses both. State constitutional prohibitions against cruel and/or unusual punishment have been held to extend to “greatly disproportionate” sentences as well as to those exceeding any legitimate penal aim. *Workman v. Commonwealth*, 429 S.W. 2d 374 (KY 1968), *Steen v. State*, 85 Wisc.2d 663, 271 N.W.2d 396 (Wisc. 1978) and to conditions at a county prison, *Commonwealth ex. rel. Bryant v. Hendrick*, 444 Pa. 83, 280 A.2d 110 (Penna. 1971).

306. Police brutality. The excessive use of force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violates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s well as federal law. It also violates the laws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 incident occurs. Both federal and state laws provide victims of such abuses several methods for seeking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s well as grounds for punishing those who have used excessive force.

309. Prison conditions. Although a significant percentage of the nation’s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are relatively new, many are not, and in recent years virtually all have been subject to the pressures of overcrowding and the lack of adequate funding. As a result, the conditions in the nation’s prisons have continued to be a matter of concern.

315. Segregation and separation. As a general matter, only in limited circumstances may convicted prisoners be subjected to special security measures such as segregation or separation from the general prison population in specially constructed cells. Such measures may be employed for punitive reasons or as a means of maintaining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inmates and staff in the institution as well as of the general public. No condition of confinement, including segregation, may violate the Eighth Amendment's proscription against cruel or unusual punishment, nor may it violate the prisoner's rights to due process and access to the courts under the Fif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Decisions to place prisoners in administrative segregation can be challenged in court by writ of habeas corpus, see *Presier v. Rodriguez*, 411 U.S. 475 (1973), or under section 1983, see *Hech v. Humphrey*, 512 U.S. 477 (1994); see also *Brown v. Plaut*, 131 F.3d 163 (D.C. Cir. 1997) (holding that a section 1983 action could be brought for damages arising from a decision to place an inmate in administrative segregation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 締約國採取之防止此類行為的措施；

307. Although the Eighth Amendment's protections again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apply only to those subject to "punishment" within the Amendment's meaning, the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s all individuals against unreasonable intrusions upon their bodily integri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In *Graham v. Connor*, 490 U.S. 386 (1989), the U.S.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an arrestee's claims that arresting officers used excessive force resulting in injury or death implicated the Fourth Amendment: "all claims that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have used excessive force - deadly or not - in the course of an arrest, investigatory stop, or other 'seizure' of a free citizen should be analysed under the Fourth Amendment and its 'reasonableness' standard, rather than under a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standard". *Id.* at 395. Excessive force in effecting an arrest may violate the individual's Fourth Amendment right even where probable cause for arrest exists. *Tennessee v. Garner*, 471 U.S. 1 (1985).

308. The civil rights statutes also provide a basis for challenging alleged police brutality. For instance, in *Chew v. Gates*, 27 F.3d 1432 (9th Cir.

1994), cert. denied, 513 U.S. 1148 (1995), an arrestee sued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its police chief, and various police officers under section 1983, alleging a violation of his constitutional rights when he was injured by a police dog during an arrest. The Federal District Court granted the defendant summary judgement, relieving the officers and the city of li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however, the decision was overturned on appeal, and the city eventually settled the case for \$100,000.

313.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lays a central enforcement role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prison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Department may file lawsuits and obtain relief either by court order or through negotiated settlements. The Department also may investigate and issue letters of findings, which often result in the jurisdictions taking the necessary remedial measures, but which also may be followed by the Department filing a lawsuit.

- 員警拘留中心和監獄的生活條件，包括女子和未成年人監獄，說明他們是否與男性/成年人分開。特別應當說明與監獄超收人犯、受刑人間暴力、對受刑人的紀律措施、醫療和衛生條件、監獄最常見的疾病及其治療、受刑人獲得食品及未成年人拘留條件相關之問題。

316. All correctional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ose codes of conduct on inmate behaviour which include provisions for imposing disciplinary sanctions when inmates violate the code. These disciplinary systems are essential to ensuring the security and good order of institutions. Inmates receive a copy of the code of conduct immediately upon their arrival. The disciplinary process is administered internally but must incorporate important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s to guarantee that prisoners are not disciplined without due process.

317. As the U.S. Supreme Court stated in *Wolff v. McDonnell*, 418 U.S. 539 (1974), “though his rights may be diminished by the needs and exigencies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 prisoner is not wholly

stripped of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when he is imprisoned for a crime”. In that case, the Court recognized the inmate’s right to due process preceding the imposition of disciplinary measures.

318. Similarly, a U.S. District Court found that conditions in the special housing unit at California’s Pelican Bay State Prison constituted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for the mentally ill among the prison population. *Madrid v. Gomez*, 889 F. Supp. 1146 (N.D. Cal. 1995). This case involved a class action brought by prisoners under the section 1983 to challenge their conditions of confinement. The court found a pattern of excessive force (including assaults, beatings, and confinement in outdoor cages during inclement weather) which violated the Eighth Amendment’s restraint on excessive force, as well as systematic deficiencies in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care and various violations of due process, notably in the procedures by which inmates were assigned to the special housing unit.

319. Sexual abuse of women in prison. Federal law prohibits sexual conduct between correctional staff and inmates regardless of gender. See 18 U.S.C. §§ 2241-44. Most states have similar rules.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policy (set forth in Program Statement 5324.02, Sexual Abuse/Assault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s) is aimed at preventing sexual assault on inmates, providing for the safety and treatment needs of inmates who have been assaulted, and disciplining and prosecuting those who sexually assault inmates. As part of the 1998 Annual Refresher Training Program, all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 staff are required to attend a session on managing staff/inmate relationships. Staff will be trained to recognize the physical, behavioural, and emotional signs of sexual assault, to understand the referral process when a sexual assault occurs, and to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techniques.

320.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 provides training and assistance to state and local prison and jail administrators in developing effective, humane and constitutionally correct facilities. It also funds technical assistance requests from the states in such areas as sex offender programmes and prevention/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sexual abuse in prisons. As part of its accreditation programme, the 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 promulgates standards regarding appropriate train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323. Juveniles in detention. Concern is frequently voiced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minors (individuals of less than 18 years) are detained in prisons and jail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n the whole, the correctional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standard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dheres to the various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Under federal law juveniles must be separated from adult offenders by sight and sound.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may be found in the 1997 repor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s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entitled "Juveniles in Federal Custody".

324. Despite a general policy and practice of segregating juvenile offenders separately from adults and according them treatment appropriate to their age and status (see article 10 (3) of the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n actuality these goals are not always possible to achieve because of overcrowding, under funding, and similar practical limitations.

325.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authority under several statutes to file suit when it determines that juvenile offenders are not being afforded treatment appropriate to their age and status in vio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or federal laws. Lawsuits have been fi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cerning juvenile facilities in Georgia, Kentucky, Puerto Rico, Essex County, New Jersey and Louisiana, and settlements have been obtained with Georgia, Kentucky, Puerto Rico, and Essex County. The U.S. Attorney General has circulated the Georgia settlement to all State Attorneys General as a model of appropriate practices for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incarcerated juvenile offenders.

327. Abuse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Under the Civil Rights of Institutionalized Persons Act (CRIPA), 42 U.S.C. § 1997e,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authorized to investigate public facilities (such as prisons, jails, nursing homes, and institutions for the mentally retarded or mentally ill) in which it is believed that confined individuals are being deprived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This responsibility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Department's Civil Rights Division, which by 1 June 1999 had initiated CRIPA actions regarding approximately 340 facilities, resulting in nearly 100 consent decrees governing conditions in about 200 facilities.

328. These investigations and consent decrees typically focus on protection from abuse and harm, provision of adequate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proper sanitary and fire safety conditions. For example, in 1997, the Civil Rights Division entered into consent decrees with institutions in Wisconsin and Tennessee regarding those facilities' provision of proper medical treatment, use of restraints, and use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on the mentally retarded. In that same year, the Division settled a lawsuit against the Montana State Prison with an agreement ensuring that vulnerable inmates are protected from predatory inmates.

330. Inmates with disabilities. In addition to the Rehabilitation Act, the federal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 codified at 42 U.S.C. § 12101, has been held to prohibit state prison facilities from discriminating against inmates with disabilities. *Yeskey v. Com. Of Pa. Dept. Of Corrections*, 118 F.3d 168 (3rd Cir. 1997), *aff'd.*, 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et al. v. Yeskey, 524 U.S. 206, 118 S.Ct.1952 (1998).

331. Castration of habitual sex offenders.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castration as a method of sex related crime prevention, especially in those cases in which the antecedent offence did not involve penile penetration. In August 1996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became the first state to require either the chemical or the surgical castration of repeat child molesters prior to their release from prison. See Cal. Penal Code § 645(b). The new law, which applies to persons convicted after 1 January 1997, mandates that anyone, male or female, who has been convicted of two sexual assaults on minors, must be injected during the week prior to release on parole with a drug to reduce sexual drive if the individual does not choose to be surgically castrated. Montana and Georgia have adopted similar legislation, and proposed bills are or have been under consideration in at

least 10 other states, including Florida, Massachusetts, Missouri, Texas and Wisconsin.

334. Prisoners on chain gangs. In May 1995 the State of Alabama reintroduced the practice of “chain gang” labour for felony convicts in the state correctional system (the term derives from the use of shackles attached to the prisoners legs and wrist to prevent escape). The practice was also instituted the following year for women in Maricopa County, Arizona, where teams of prisoners work along busy streets pulling weeds and performing similar tasks under armed guard. It has also been in use in Florida, Iowa, and Wisconsin. 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 “Florida Reintroduces Chain Gangs” (January 1996).

335. Non consensual medical and scientific testing. Informed consent is the touchston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medical and scientific testing. In 1991 the Government adopted a formal polic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research conducted, supported or regulated by any of the 17 federal agencies to which it applies. This policy is set out at 45 C.F.R. Part 46. Research covered by these regulations must be reviewed by an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composed of experts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research and at least one member who is not a scientist and one member who is not affiliated with the institution in question.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must review and approve any proposed research and informed consent documents. The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is currently study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protections,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topics, such as research involving individuals with diminished capacity.

344. Illegal immigrants in custody.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intending illegal immigran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creased markedly. When apprehended, those attempting or achieving illegal entry are typically detained pending the adjudication of their cases according to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The INS has focus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iens awaiting the completion of immigration proceedings are detained. Over the years the INS has worked on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set of detention standards covering most of the issues identified for detainees housed in INS facilities. It has also focused attention on the conditions of confinement of its detainees housed in state and local facilities. The INS conducts regular inspections of such facilities and attempts to ensure that

they meet or exceed the standards contained in its jail inspection programme, which are themselves undergoing review. INS officials have also engaged in discussion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nd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in an effort to inform them about its ongoing efforts to review and improve detention conditions.

拾、參考文獻

個人申訴案件

Adel Tebourski v. France, Communication No. 300/2006, U.N. Doc. CAT/C/38/D/300/2006 (2007)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A.R. v. Netherlands , Communication No. 203/2002, U.N. Doc. CAT/C/31/D/203/2002 (2003)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A.M.A.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344/2008, U.N. Doc. CAT/C/45/D/344/2008 (2010)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Ashim Rakishev and Dmitry Rakishe v. Kazakhstan, Communication No. 661/2015, U.N. Doc. CAT/C/61/D/661/2015 (2017)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Besim Osmani v. Serbia. Communication No. 261/2005, U.N. Doc. CAT/C/42/D/261/2005 (2009)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Blanco Abad v. Spain, Communication No. 59/1996, U.N. Doc. CAT/C/20/D/59/1996 (1998)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Bouabdallah Ltaief v. Tunisia, Communication No. 189/2001, U.N. Doc. CAT/C/31/D/189/2001 (2003)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T. and K.M. v. Sweden , Communication No. 279/2005, U.N. Doc. CAT/C/37/D/279/2005 (2006)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Damien Ndarisigaranye v. Burund, Communication No. 493/2012, U.N. Doc. CAT/C/62/D/493/2012 (2018)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Déogratias Niyonzima v. Burundi, Communication No. 514/2012, U.N. Doc. CAT/C/53/D/514/2012 (2015)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Dhaou Belgacem Thabti v. Tunisia, Communication No. 187/2001,

U.N. DOC. CAT/C/31/D/187/2001 (2003)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Ennaâma Asfari v. Morocco, Communication No. 606/2014, U.N. Doc. CAT/C/59/D/606/2014 (2016)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E.N. v. Burundi, Communication No. 578/2013, U.N. Doc. CAT/C/56/D/578/2013 (2016)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F.K. v. Denmark, Communication No. 580/2014, U.N. DOC. CAT/C/56/D/580/2014 (2016)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Hajrizi Dzemajl et al. v. Yugoslavia, Complaint No.161/2000,U.N.Doc. CAT/C/29/D/161/2000 (2002)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Ismaev v. Canada , Communication No. 333/2007, U.N. Doc. CAT/C/45/D/333/2007 (2010)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Jean Ndagijimana v. Burundi, Communication No. 496/2012, U.N. Doc. CAT/C/62/D/496/2012 (2018)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Kabura v. Burundi, Communication No. 549/2013, U.N. Doc. CAT/C/59/D/549/2013 (2016)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Mafhoud Brada v. France, Communication No. 195/2002, U.N. Doc. CAT/C/34/D/195/2002 (2005)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Mikel Kabikoitz Carrera Sarobe v.France, Communication No. 675/2015, U.N. Doc. CAT/C/62/D/675/2015 (2018)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Mr. Kostadin Nikolov Keremedchiev v. Bulgaria, Communication No. 257/2004, U.N. Doc. CAT/C/41/D/257/2004 (2008)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Mr. Kepa Urra Guridi v. Spain, Communication No. 212/2002, U.N. Doc. CAT/C/34/D/212/2002 (2005)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Ms. P.E v. France, Complaint No. 193/2001, U.N. Doc.
CAT/C/29/D/193/2001 (2002)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Ms. G. K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219/2002, U.N. Doc.
CAT/C/30/D/219/2002 (2003)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Rached Jaïdane v. Tunisia, Communication No. 654/2015, U.N. Doc.
CAT/C/61/D/654/2015 (2017)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R.D.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426/2010, U.N. Doc.
CAT/C/51/D/426/2010 (2013)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Sergei Kirsanov v. Russian Federation, Communication No. 478/2011
U.N.Doc. CAT/C/52/D/478/2011 (2014)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Suleyman Guengueng et al v. Senegal, Communication No.181/2001,
U.N. Doc. CAT/C/36/D/181/2001 (2006)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S.S.H. v. Switzerland, Communication No. 254/2004, U.N. Doc.
CAT/C/35/D/254/2004 (2005)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Taoufik Elaïba and Christian Act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Torture (ACAT-
France) v. Tunisia, Communication No. 551/2013, U.N. Doc.
CAT/C/57/D/551/2013 (2016)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X. v. Kazakhstan ,Communication No. 554/2013, U.N. Doc.
CAT/C/55/D/554/2013 (2015)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公約列表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公約》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任擇議定書》(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保護所有移徙工作者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歐洲理事會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美洲人權公約》(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非洲人權和公民權利憲章》(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1949 年日內瓦四公約》(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國際刑事法院規則》(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官方文件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的第 20 號一般性意見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0)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1)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的第 35 號
一般性意見(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5)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關於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U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14)

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關於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U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2)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第 2 號一般性意見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 General Comment No. 2)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第 3 號一般性意見 (UN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General Comment No. 3)

聯合國大會第 70/146 號決議(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0/146)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 16/23 號決議(UN Human Rights Council
resolution 16/23)

特別報告員關於訪問土耳其的報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f punishment
on his mission to Turkey, A/HRC/37/50/Add.1)

關於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的臨時報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ques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56/156)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特別報告員的報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HRC/34/54)

人權委員會特別報告員關於法外、即決處決或任意處決問題的報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A/51/457)

特別報告員 M. Cherif Bassiouni 教授所提供的特別報告(Final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Mr. M. Cherif Bassiouni,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resolution 1999/33, U.N. Doc. E/CN.4/2000/62)

特別報告員 Nigel Rodley, 先生依照人權委員會

2001/62, E/CN.4/2003/68 決議所提供的特別報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Sir Nigel Rodley, submitted pursuant to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2001/62, E/CN.4/2003/68)

伊斯坦布爾議定書(Istanbul Protocol)

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者原則(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有效防止和調查法外、任意和即決處決的原則(UN 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Extra-Legal, Arbitrary and Summary Executions)

有效調查和記錄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的原則(Principles on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執法人員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武器的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on the Use of Force and Firearms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聯合國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Guidelin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ors)

關於醫務人員、特別是醫生在保護被監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方面的任務的醫療道德原則(Principles of Medical Ethics relevant to the Role of Health Personnel, particularly Physicians, in the Protection of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囚犯待遇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國家人權報告共同準則(Guidelines O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Reports To Be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T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禁止酷刑公約初次報告的形式和內容準則(Guidelines O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Initial Reports Under Article 19 To Be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Selected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Volume I, United
Nation Publication,2008.